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文學院學報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第十三期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三月

Volume 13, March 201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十三期

發行者

郭艷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彭輝榮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總顧問

莊坤良 逢甲大學

主編

陳冠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常務編輯委員

王年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趙玉芝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宋郁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李宗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編輯顧問

陳一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邱文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封面設計

黃玉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顧問

萊恩安德魯 澳洲坎培拉大學
連清吉 日本長崎大學
楊貴美 東密西根大學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

彭輝榮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編輯委員

何寄澎 國立臺灣大學
林明德 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
廖美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陳貺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宋德喜 國立中興大學
曾守得 靜宜大學
陳彥豪 國立臺北大學
黃儀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莊俐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蔡 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莊世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魯漢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編輯助理

洪月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劉宜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林之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13

Publisher

Yen-kuang Kuo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ditorial Committee

Editor-in-Chief

Hui-zung Per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dvisor-in-Chief

Kun-liang Chaung *Feng Chia University*

Issue Editor

Kuan-chun Che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xecutive Editors

Nien-shuang W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u-gi Chao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u-ling So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ung-hsin Li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rt Advisors

Yi-fan Che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n-cheng Chi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over Design

Yu-shuan Hw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dvisors

Andrew P. Lian *University of Canberra*
Seikichi Ren *Nagasaki University*
Guey-meei Yang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Editorial Committee Convener

Hui-zung Per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ditorial Board

Chi-peng Ho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in-der Lin *Chinese Folk Arts Foundation*
Mei-ling Liao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Kuang-yi Che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Arts*
Der-shi Sung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hoou-der Tseng *Providence University*
Yane-hao Che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Yi-kuan Hu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i-ling Chu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eng Tsai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hih-tzu Chua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n-ping L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naging Assistants

Yueh-chao Hu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Yi-chia Liu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ih-yun Li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十三期總編序

本校為因應時代變遷，配合國家社會整體發展，冀望藉深耕人文教育，強化文史、藝術之生活與環境關懷，彌補自然科技、工商類學科急速發展所帶來之新世紀缺憾，進而對增進人類生活意義，創造繼起生命，做出積極貢獻，乃於民國 89 年 10 月 5 日正式成立文學院，由原屬教育學院中的英語學系（民 63 年成立）、國文學系（民 80 年）、美術學系（民 82 年）、地理學系（民 82 年）與藝術教育研究所（民 87 年成立，101 年因教育部系所員額新制併入美術系改名「藝術教育碩士班」）共同組成。十餘年來，本院快速成長，除了各系所原有之碩、博士班之外（英、國、地均有碩博士班，美術系有碩士班），93 年續獲准成立兒童英語研究所與翻譯研究所，94 年成立台灣文學研究所，96 年成立環境觀光研究所（101 年併入地理系成「環境暨觀光遊憩碩士班」）。另，98 年歷史學研究所則自社科體育學院轉入。目前本院組織架構涵蓋人文、英語、藝術、歷史、地理等傳統科目，還新創兒童英語、口筆譯及台灣文學學門，既有古老傳承，亦隨造物者之無盡藏，展開新局，使領域愈加完備。數十年來，各系所均以師資培育為首要教學目標，以訓練社會各界專業菁英為輔助目標，故不但已有為數龐大的中學教師在全國各地服務，也已化育不少人才在社會各界發揮專業所長。首任院長由英語系張水木教授（89.10~95.7）擔任，後由本校前副校長國文系林明德教授（95.08~96.07）代理院長，第三任院長為地理系何猷賓教授（96.08~98.07），第三任代理院長由地理系蔡衡教授（98.08~99.07）擔任，之後第四、五任院長則由本人擔任至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也稱《彰化師大文學院學報》，於民國 91 年由首任院長創刊。之後，每年刊出一期，至民國 94 年共刊了四期各領域數十篇優質論文。本人 99 年接任第四任院長時，有鑑於學術實需喉舌，人文哲思亟待宣揚，且評鑑改變學術生態，教師專業成長以出版為先，而透過完善的外審制度與國內學術界各相應學門進行良性溝通，拓展華文世界人文學門之論文發表園地，鼓吹系統人文思想研究，與理工學科積極對話，以達相輔相成，互為勝場之效果，更是中台灣師範領域人文學界立言圖強的機會，乃毅然決定從有限經費中撥款復刊。幾年來，經過大家辛勤耕耘、歷任校長及高層大力支持，以及國內外學者積極投稿，使得各項編輯業務得以順利推展。由於係半年刊，截至目前，已然出版 5 至 11 期（出版日期分別為 101 年 3 月、101 年 9 月、102 年 3 月、102 年 9 月、103 年 3 月、103 年 9 月及 104 年 3 月），每期均獲佳評，稿源順利湧進，而以外稿居多。

目前，《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除了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機構典藏系統」正式為數位版本定稿之外，還已列入「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索引」（TCI）、「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凌網科技數位出版品營運平台」、「遠流/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文化部」、「南華大學彰雲嘉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庫」等機構的數位典藏資料庫中。「華藝線上圖書館」是華人目

前在世界上最具野心的學術著作數位典藏機構，該公司還定期向收錄單位函報引用記錄。隨著本期順利出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即已連續出版滿8期。依據科技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規範，本學報已經可以向該單位申請列入多年來學界俗稱為「THCI Core」的核心期刊審核，希望能再接再厲，獲得肯定。本學報常務編委基本上由本院各系所之主管擔任，每期均開兩次編委會，第一次討論所獲稿件的數量及基本狀況，並由各系所編委迅速推薦外審委員，第二次則在外審結果送回之後，開會確認，如無疑問，隨即責成助理進行編輯作業。學報另聘台灣師大英語系前主任，現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莊坤良博士擔任總顧問，並請各系所主管就其領域每年推薦國內外資深學者擔任常務及國際顧問。大家都希望，學報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收錄於這個台灣學界重要的指標資料庫。所有委員們均表示，以有限經費之經營觀之，學報之今日，令人欣慰，而本院雖偏處一隅，但勉力成就學門之專業出版，用力之深，並不落人後。

和其他學報不一樣之處，本學報除了選刊國內外學者投稿之論文以外，尚有「總編邀稿」之設計。此設計旨在向各方借將，誠意累積不同學門重要論文，冀望有機會介紹更多華人人文學界主要學門的重要學者。過去8期，我們介紹的學者有耿志堅博士這位國文系的漢語語言學家（第5期），郭鳳蘭博士這位英語系的語言學與英語教學學家（第6期），黃忠慎博士這位國文系的經學家（第7期），及賴秉彥博士這位翻譯所的經濟學家與法學家（第8期），大陸資深歷史及考古學者王子今教授（第9期），前中山大學及成功大學教授，國內知名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學者邱源貴教授（第10期），前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英系主任暨外語學院院長，現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任暨人文社會學院院長陳英輝博士近著（第11期），以及為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出版的《臺灣藝術教育史》、《臺灣藝術教育年鑑》、「《臺灣百年來學校藝術教育發展》等重要藝術教育書籍擔任主編的彰化師大美術系鄭明憲副教授（第12期）。

為了完成彰化師大文學院各領域的引介，這一期的「總編邀稿」我們再度邀請本院美術學系展現該系除了藝術教育史以外的美學學術底蘊。冠軍兄現為系主任，專長領域為數位藝術創作、藝術策展、藝術評論，在國內這些美學學術領域具有相當影響力。他目前擔任國立台灣美術館數位知識流通平台的審查委員，曾任國內重要美展評展：高雄獎、台中大墩獎、彰化礪溪獎、桃園創作獎評審、台新獎觀察團委員等。他的《遺失的風景》個展發表於台中市文化中心大墩藝廊（2013），作品探討近年來土地重劃與風景消失、人文地景保存的議題。顯然，這些議題對目前岌岌可危的地球人文環境永續發展而言，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我們獲賜的文章名為〈消散於風景之中：冷面攝影的美學〉。冠軍兄告訴我，研究動機來自於《遺失的風景》個展的創作歷程。原來，他在《遺失的風景》撰述創作理念期間，感受到作品產生須要紮實美學論述作為支持。他發現，創作者的美學觀點固然源自感性抒發與現實參照，但「冷面」（deadpan）攝影仍缺乏系統性史觀與分析架構，特別是國內對於「冷面攝影」作品缺乏立論，形成有作

品而無學理的窘境。因此從藝術史的風景主題探索中，他發想，他必須求得人與風景的「存有」關係，而且必須從冷靜而現實的風景影像裡開闢美學豁徑，讓觀者在欣賞攝影作品之際，感知到創作者的眼與心，並期待在百家爭鳴的藝術流派中，還能留下後人研究的引線。

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之得以順利完成，無名英雄總在靜默的世界中大聲喧嚷著。本期之出版，一如往常，仍要繼續感謝國內外學者們投稿，編輯委員們提供審查委員名單與不厭其煩參與開會，數十位外校審查委員悉心閱讀，美術系的一凡兄及文正兄帶著學生們執行美編，還有一群認真負責而可愛的研究生盈琇及之允細心處理文字編輯工作。冠軍兄主持系務、教研與撰寫這期總編邀稿之餘，還另外答應我輪流擔任主編，思考法規，主持會議，並協助撰寫「主編的話」，亦當再受我一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總編

彭輝榮謹誌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主編的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於民國八十九年成立文學院，集合了英語、國文、地理、美術、藝術教育、歷史、翻譯、兒童英語、臺灣文學等系所。為厚植人文精神，扎根學術研究，特發行文學院學報，作為學術議題與研討社會問題的平台，提供校內與校外進行思想與創作交流，深具啟發與參考的意義。

歷史不斷流動，知識不斷增加，我們生活在一條思想的時間之流中，本期論文所涉及文學、歷史、語言、美學、教育、哲學等各個領域，研究者顯現一項重要的人文內涵，同時觀注知識形成的演繹過程與歷史的脈絡，以繁複浩瀚的人文領域內，形塑思想起源與結晶之路，可見研究者埋首伏案的執著與心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本學報每年二期，本期已屆十三。本期共收稿件十九篇及特約稿一篇，在嚴謹的審查機制下，通過八篇，其中六篇為外稿，二篇為內稿，退稿率達 57.9%，顯示刊登難度高，另外外稿的比例增加，也顯示學報品質愈來愈受到學界注目。

承蒙彭輝榮院長之邀，擔任學報第十三期主編，學報得以順利出刊，特別感謝論文投稿人、審查委員，以及文學院學報編輯委員，還有編輯助理林之允的協助。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十三期主編

美術學系教授 陳冠君 謹誌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十三期

目錄

總編邀稿

消散於風景之中：論冷面攝影的美學

.....陳冠君 1

外審委員建議刊登稿件

會議言談插話現象之禮貌策略研究：以大學英語學習者為例

.....李佳家 15

鍾惺《詩經》觀析探

.....賴昭君 37

讀寫示徑：蔣祖怡與一九四〇年代的國文教育

.....劉怡伶 59

嘉道經世思潮中龔自珍「援經議政」的今文學走向

.....張麗珠 93

大學英文教育之政策面與執行面：個案研究

.....楊岳龍 123

語意具體性及華語名詞複合詞之構詞研究

.....龔書萍 151

借鏡與反思：臺灣士紳林獻堂觀見的美國

.....蔡米虹 167

以符號學的視角探勘兩首圖像詩的讀解

.....吳正芬 199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ume 13

Contents

Editor-in-Chief's Invited Paper

Being in the Landscape: On Aesthetics of Deadpan Photography	Champion Chen	1
---	---------------	---

Review-Approved Papers

Interruptions in Meeting Talks: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of EFL University Learners	Chia-chia Lee	15
The Study of Zhong Xing's <i>Shijing</i> Opinions	Chao-chun Lai	37
Paths to Literacy: Mr. Zu-Yi Jiang and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1940s	Yi-ling Liu	59
Development of the Jinwen School Based on Gong Zizhen's Citing Classics to Criticize Political Situatio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chu Zhang	93
Policy as Text vs. Policy as Practice in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A Case Study in Taiwan	Yueh-long Yang	123
Concreten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Noun-Noun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Shu-ping Gong	151
Learning and Reflection: American Travel Notes of the Taiwanese Gentry Lin Hsien-Tang	Mi-hung Tsai	167
A Semiotic Exploration of Two Concrete Poems	Zheng-fen Wu	199

消散於風景之中：論冷面攝影的美學

陳冠君^{*}

摘要

「冷面」如何形成美學？「冷面」攝影被視為冷觀、客觀、疏離、銳利的風格。透過攝影歷史上幾個重要時期，關於寫實攝影的演變：從攝影術發明之初，新客觀主義、新地景攝影、杜塞多夫學派、到台灣寫實攝影等。本論文分析各種風格形式，攝影家對於「真實」的詮釋，觀測不同年代審美觀念的轉移，得以抽繹出「冷面」萌生原因。進而開啓「冷面」所衍生的美感，透過「風景」主題的追尋，題材的脈絡，解析「冷面」的風景再現，及美學的顯現。從「冷面」作品所開展的視野，我們居於觀者位置，投向客觀的風景，減低個人情感，遠離自身，生活於風景的真實所在，消散於風景之中。

關鍵詞：冷面攝影、新客觀主義、寫實攝影、新地景攝影、攝影美學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教授。
到稿日期：2016 年 1 月 30 日。

Being in the Landscape: On Aesthetics of Deadpan

Photography

Champion Chen^{*}

Abstract

How does the term “deadpan” become an aesthetic of photography? The deadpan photography is described as a cool, objective, detached and sharp style. Through several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of photography, on the issue of realistic photography, from the beginning of photography, New Objectivity, New Topologies, Düsseldorf School, and realistic photography evolved in Taiwan, this paper analyzes various style and form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photographer interprets “reality.” By observing transformation of deadpan aesthetics at different art period, this analysis investigates the reason why “deadpan” was created, traces different themes of landscape photographs, reali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and its specific context of subject. From perspectives of deadpan’s artwork, as an observer, viewers can approach objective landscape, reduce personal feeling and subjectivity, indulge themselves in the landscape, and live in the reality of landscape.

Keywords: Deadpan Photography, New Objectivity, Realism Photography, New Topographic, and Aesthetics of Photograph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Jan 30, 2016.

一、冷面的開端

「冷面」(deadpan)一詞，字義中的 pan，是 19 世紀時美國俚語用法，解釋是 face 的意思，所謂冷面(dead face)，字義上是描述人物在攝影機前的表情，形容人的表情是呆板，舉止僵直，彷彿是被鏡頭所震懾；然而事實上，這不僅是被攝者的表情，也可能是攝影者的安排，它刻意被安排成一種「刻板印象」。這個現象可以追溯到 1839 年「達格爾銀版攝影」(daguerreotype)發表時期，由於早期底片感光須要較長的時間，因此拍攝人像照是一件耗時費力的事情，模特兒在鏡頭前須要配合曝光時間，維持固定表情，直視著鏡頭，導致臉部表情看起來都很僵硬，形成當時人像攝影的普遍存在的「冷面注視」(deadpan gaze)特徵。

「冷面」一語開始使用於攝影風格與視覺形式的描述，問到「冷面」要如何形成美學？如何決定影像的審美標準？「冷面」所表達的美感與傳統美感有所不同，它的影像本質是什麼，藝術屬性又是什麼；什麼是美感，什麼是平庸；什麼是理性，什麼是唯美；態度為何要冷漠，而不是激情？

何種因素決定於攝影者的觀念，攝影的感知是直覺的，還是認知的活動；康德在「審美判斷力」提供分析的方向：人具有主觀的經驗，對於美麗的事物感到愉悅，如遇見夕陽景觀時，心中驚嘆於美景，美感來自於主觀內在經驗；相對地面對的客觀世界時，理解自然界的完美形式與客觀的「合目的性」，在於理解夕陽的成因，認識光的折射、運行時間、大氣的光澤等因素，美感來自於認知大自然的完滿性。

分析攝影歷史上各時期的冷面作品，主要是「人像」與「風景」題材，本研究是著重在「風景」主題，主因是 1970 年代後的名家作品與流派，普遍地向現實世界開啓探險之路，以照片詮釋各種風景的「真實性」：地景、建築、都市化、歷史見證、野生／人造風景議題等。引用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存有論(ontological)來分析風景的影像意義，論述「冷面」是如何改變風景的感知方式，後續引用「在世界的存在」¹(Being-in-the-world)的概念，去詮釋「人在風景之中」的境遇，如何融入風景，進入「無人的風景」的存有問題。

二、攝影的美感取向

1907 年李漢楨在《實用映相學》序：「將留存天下名勝之境，奇怪罕有之形，英雄豪傑之真象，驚天動地之奇跡，使之毫芒畢肖，令遇目者有曠神秘之趣也，其惟映相之事乎」²，這個論述是中國引進攝影術之後，攝影家為了區分攝

¹ 陳榮華《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3，頁 37。

² 陳申，胡志川，馬運增，錢章表，彭永祥著，《中國攝影史》，台北市：攝影家出版社，1990，

影與繪畫不同的特徵，樹立攝影的審美價值，所謂「天下名勝之境，奇怪罕有之形」觀點，突顯攝影對於風景題材的美感取向，點出觀賞所須要的美感品味。清末民初的「風光攝影」迎合大眾欣賞與收藏，照片成為可以流通的印刷品，印書館複製出版各地名勝影集及風景明信片，照片從美感經驗到的物化消費，特別是歐美的消費者，逢旅遊攝影的興起，西方的攝影師對於「殖民地」的凝視，與殖民地影像的好奇需求等。

西方攝影術發明初期，被當作是科學測量的工具，攝影的藝術性尚未產生，被排除藝術界門外。為獲得藝術界的認同，「畫意」或「繪畫主義」攝影取向就是隨著繪畫潮流走，刻意模仿繪畫的美感形式。受到這思維的影響，在民國初年照相就分為兩大類：寫真與寫意，為了尋找「美感」，常用「寫意」來表達其義，在《半農談影》：「寫意，乃是要作者的意境，借著照相表露出來。意境是人人不同的，而且是隨時隨地不同的，必須有所寄籍。被寄籍的東西，原來是死的；但到作者把意境寄籍上去之後，就變做了活的。」³

中國攝影學會郎靜山所創「中國山水集錦攝影」是最具代表性攝影，提倡畫意式沙龍風格。水祥雲：「郎氏根據中國畫理，繪畫六法中的『傳模移寫』的道理，獨創國畫作風的集錦照相，講求氣韻，天衣無縫，妙造自然。」⁴對於摹仿山水畫境的風格，提倡寫意的人為了讓攝影擁有藝術內涵，審美時仍借用一般的藝術理論，再移植到攝影創作，卻沒有讓攝影產生主體性思考。所謂照片中的「詩情」、「畫意」、「風景如畫」，以作者的主觀意識為優先，表現理想的美感，抒發情感，創造心中的意境，認為自然美要經過人為改造才稱為藝術美，才能被認定藝術攝影。

寫意（畫意）與寫實主義的路線之爭，在台灣攝影（比賽）活動是常見現象，彼此有不少論戰，形成各護其主的現象，然而針對審美問題之探究，仍侷限在當時歷史情境，與攝影家之間的「風格」比較，對影像本質之價值的討論還是不足。張照堂：「台灣攝影界的一股主流導線，40年代至80年代不遺餘力地鼓吹虛構的、唯美的沙龍照相，他們寧願看到美麗的片面假相，而不去正視生活的廣闊面貌。幸好以新聞記錄，街頭速寫等為出發點的一些攝影者，仍然努力踏實地在默默耕耘，使得這些當時不能見容於沙龍潮流的棄作，變為今日在攝影藝術及歷史見證上最可貴的時代資產。」⁵

頁 113。

³ 同註 2，《半農談影》是中國第一本攝影藝術理論的專著，劉半農著，1927 出版。

⁴ 廖新田〈風格與風範：名家、名流、名士郎靜山在台灣〉，「郎靜山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建武夷山市政府，2012。

⁵ 張照堂《影像的追尋：台灣攝影家寫實風貌》，台北市：遠足文化，2015，頁 107。

三、台灣寫實攝影脈絡

台灣初期的寫實攝影風格，遺留自日本的「寫真」技術的影響，以日人對殖民地進行人類學與風景民俗的研究，過去攝影者亦承襲日治教育的養成，以及二次戰後經濟復甦的背景，西方歐美寫實攝影思潮輸入，注入現代攝影的新觀念。當時一群攝影有志之士對於「畫意式」風格產生質疑與反動，相對地引發「寫實」觀念的提倡，這股力量的集結與反省作用，自行創立新的攝影團體⁶，轉注於社會寫實的攝影理念。

本身對於鄉土文化的自覺，凡現實題材來皆來自於生活實境，以寫實與客觀的鏡頭去面對自己的文化與土地，貼近市井小民的生活作息與素樸人物的敘事，賦有故事性與感性的要素，影像再現如同親臨現場，訴諸於照片裡動人畫面與讀者的同情心。雖然反對「沙龍唯美化」的姿態，仍然要為情感找到出口，在客觀與冷漠的畫面之外，有時候得折衷處理，直接表達事件真實性，又要召喚內在情感經驗，寫實意識仍然流露出感性與唯美化的修飾意圖。

1940 到 1970 年代的「寫實攝影」尚未具備「紀實」（Documentary）的條件，是因為影像與政治仍然保持清楚的界線，寫實題材受到政治檢查與自我約束，迴避或遮蔽許多政治性題材，甚至寫實作品若有損於「美觀」，還是加以排除，鄧南光的〈革新攝影風格，確認努力方向〉文中提出：「悲慘、頹廢、殘忍等不文明的事物做為攝影題材雖然好，但是一旦此類題材被送到外國展覽，對國家民族產生一種損害。」⁷取用社會現實的題材，真實人物加上現實場景，雖然是描述庶民、勞工、原住民等社會階層的樣貌，如果只是著重生活細節瑣事與小人物個人特寫，淡化了真實面目，或失去異議發聲的位置，靜態的畫面在黑白調子催化下，攝影反而成為戲劇化的推手，提供溫馨閱讀的影像文本。

在「寫實」、「紀實」背後支持的意識，還是在於歷史情感與社會集體意識的萌生，以「社會真實」、「土地關懷」來反映當時社會各階層生活、弱勢族群、地方紀事、地域文化、歷史記憶等，擁有挖掘真象與顯露人性內涵的力量，以直擊問題，提出議題，批評反思等方式推進。「社會寫實主義」工作者所營造的議題目的，以取得影像介入社會的合理性，不是為了瞬間取得或即興的照片，或作為感性訴求的機會，而是相信議題會將人的視界深入到社會問題的核心，用客觀的影像來訴說與見證，照明事實內外層次，帶著批判態度去反制社會的不平等。

⁶ 1953 年鄧南光等人成立「自影展」同人會，致力推廣寫實攝影，有別於中國攝影學會所強調的大中國山水畫意風格。錄自：簡永彬、楊永智，《看見的時代：影會時期的影像追尋 1940s～1970s》，台北市：夏綠原國際，2014，頁 87。

⁷ 同註 5，頁 139。引自《台灣攝影》第九期，1966 年出版。

郭力昕定義「現實主義影像」(photographic realism)是：「現場目擊、抓拍的攝影方式，進行見證、揭露、評議現實的攝影實踐方式。」⁸他批評台灣現實主義影像文化裡的政治話語能力不足，欠缺的條件在於：「現實主義影像的創作者需要有對現實問題的掌握能力，以同樣重要的，他們需要有以現實材料為基礎的，具有說服力、感染力、引人入勝的影像敘事能力。」⁹

前述從日治時以來，台灣盛行多年的「寫實攝影」，總是理性中帶著憂愁的感性，信仰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式「決定性瞬間」之精神感召。對於寫實的客觀要求，是否能夠接納冷漠的性格，或是它又須在本土泥淖中重新調和新的基調。

四、風景的追尋

德國的「新客觀主義」(New Objectivity)攝影被視為是冷面美學的開端，與當時另一流派「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作出區隔，最有名的例子是在1920-1930年代時期，德國攝影家奧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s)，他以德國人為主題，蒐集各種行業工作者，拍攝接近600幅的人像照，彙集一本《時代的面孔》(Face of Our Times)，拍攝方法像是針對社會階層的人口普查，補捉每一種職業人士的工作姿態與精神，冷靜無差錯的紀錄手法，可說是人類類型學(human typology)的社會實驗。

1975年在紐約「新地景」(New Topographics，或譯作新地誌學)攝影展，副標「人類介入之地景攝影」(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當時展覽並未受到重視，因為藝評圈與觀眾的審美尚未能領略其中的意涵。參展者都是尚未成名的「地景」攝影家：羅伯·亞當斯(Robert Adams)、路易斯·巴茲(Lewis Baltz)、法蘭克·葛漢(Frank Gohlke)、尼克勞斯·尼克森(Nicholas Nixon)、史蒂芬·休爾(Stephen Shore)，唯一的德籍藝術家是伯恩與希拉·貝歇夫婦(Bernd and Hila Becher)，他們正在各地進行系列式「工業建築」專題攝影。

當時使用「新地景」是為了區別「自然景觀」的攝影主流的不同。這個歷史性展覽改變了風景攝影的視野，從偏向浪漫色彩與華麗的風景，拉回到現實地景，從自然景色到人為的荒漠，如日常都市景觀，平凡不起眼的建築，無用的、人為破壞、遺棄的土地，他們的作品帶著批判角度，用冷靜與諷刺的看待「美國夢」、「大西部風光」的崩壞景況。策展人威廉·詹肯斯(William Jenkins)在展覽介紹文中提到普普藝術家艾德華·魯沙(Ed Rucha)的作品「26個加油站」作為「冷面」攝影的預告，策展論述「新地景」的意義：「新地景的照片，完全撕掉

⁸ 郭力昕 〈影像介入現實的政治話語能力〉，《真實的叩問》，台北市：麥田出版，2014，頁59。

⁹ 同註9，頁58頁。

藝術的裝飾邊，只要承載地景的視覺訊息，避免美感與個人情緒意見，純粹而直接，冷面而且幽默，忽視過去認定攝影價值」¹⁰，文字中也用（deadpan humor）來形容這類照片的審美態度。

五、26 個加油站

1960 年是美國普普藝術與觀念藝術盛行的年代，艾德華·魯沙（Ed Rucha）1963 年出版的攝影作品「二十六個加油站」（Twenty-six Gasoline Stations）（圖 1），原來是一本藝術家自製的作品書（artist's book），當時是藝術家用較低的成本，簡單直白編輯，大量印刷發行，藝評家喬安娜·德魯克（Johanna Drucker）：「極限藝術作品有刻板式重覆、系列延續的特質，這本書受到極限主義的影響，同時被解讀是嘲諷那些標榜主流攝影的大製作、講究美學的風景攝影書。」¹¹「二十六個加油站」是一系列攝影，從加州的洛杉磯到奧克拉荷馬他市（父母親居住地）的返鄉之路，中途所經過的 26 個加油站。在書本內容呈現僅有 26 個加油站的即景，都是在洲際 66 號公路旁所攝入的照片，翻閱時候，隨著加油站的更迭，旅行的印象逐頁移動著。艾德華·魯沙將照片編輯成書的意圖，為的是呈現一個連續性意象，如果只是觀看單張照片，雖然比較像是欣賞作品的情境，會失去了個體與整體之間的連結關係。

在照片的構圖中，加油站建築位在地景中央，水平構圖並無特殊安排，反而各家石油公司的標誌招牌較吸引注目，視覺上較符合普普藝術家的興趣，艾德華·魯沙的照片後來也陸續轉換為油畫作品，因為普普藝術作品中所取材的商標、招牌、廣告等消費文化的產物，都是流行文化底下熟悉的符號。艾德華·魯沙稱呼自己的作品：「工業照片的技術性資訊」，在書中照片是「無風格」、「無文字描述」的，客觀如工業生產的冰冷資訊，清楚呈現在觀眾前，他並不美化這個事實的原始樣貌，同樣在談到「普普藝術」的時常挪用「現成物」時時，其實是去除物體的象徵性，不去美化物體，找回原初物象。

要樹立「冷面」美學觀點，亞倫·溫尼格（Aaron Vinegar）以海德格的「存有學」（Ontological）¹²理論來評論魯沙與冷面攝影美學，以存有的概念：「事實性」（facticity）¹³來說，照片中加油站的「實體」早已存在，是在藝術家攝影之前就已在這裡，攝影的目的表面上是以加油站為對象，如果作為收集各種加油

¹⁰Jenkins, William,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opographics in: New Topographics: 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 (Rochester, NY, The Museum), 1975.

¹¹Karen Hop. "Deadpan Photography" 2010 ,

<http://nightworkersstyle.blogspot.tw/2010/04/deadpan-photography.html> (30 June 2016).

¹²Vinegar, Aaron. "Ed Ruscha, Heidegger, and Deadpan Photography." Art History Magazine, Volume 32, Issue 5,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2010 , 2009 : 859 .

¹³「事實性」（facticity），或譯為「實際性」。同註 1，頁 138。

站的照片集錦，只能達到「實物性」(factuality)層次，而為了營造美學的概念，區別意識與實物上的差異，找到足以洞悉現實的創作意識。每天有無數車輛從公路駛過，都已習慣看到它。對普通駕駛而言，加油站或是其它公路旁的景物，雖然各有其所在功能，卻無清楚的概念；對於創作者而言，先將單一名稱的景物從風景中抽離（存有論的區別方法），再獨立看待，在雜亂物象中抽繹概念，成為了解風景的入口。

為何用「事實性」(facticity)解釋冷面美學，在於強調生活的「日常狀態」，「加油站」的存在是因為旅程中必見之物，是美國西部地景中的重要標記，影像中的加油站是座落在平靜公路上，有白天，也有夜晚的時間，冷面攝影的特徵常常是隱蔽、沉伏、靜置地取得影像，在於表達無作者的主觀涉入；沒有敘事作為加油站的背景描述。加油站只是一個地點，26 個加油站連結起來，不只是一個設施或功能而已，而是還原到一個「旅行空間」概念，引用海德格的「在之中」(Being-in)的概念，是從冷靜而現實的地景中找出答案：「人在某地方旅行」或是「忘懷於風景之內」(消散於風景之中)，如果要揣摩創作者艾德華·魯沙的想法，可能會說：「這一路上都是普普藝術」。

德國的攝影家伯恩與希拉·貝歇夫婦(Bernd and Hila Becher)在 1960 年開始拍攝 19 世紀工業建築，讓 19 世紀工業歷史景象藉由攝影得以保存，他們沿用 1930 年代「新客觀攝影」(New Objectivity)的風格，開始是基於建築功能性(factuality)作有系統的紀錄，貝歇夫婦的足跡從德國、英國、美國各地工業地區，拍攝對象以主題作為分類，包括：高爐(煤礦)、煤礦分類廠、到木製水塔、油槽，到鋼鐵工業區勞工住宅(木框式的建築 framework houses)¹⁴，將類型同一化，進行序列性拍攝。不論對象為何，他們的手法是將建築置於構圖的中央，如同歌德教堂般立於風景之中。用遠距離攝取建築物的正面，攝影視點是以平視的角度，對於照片的畫質要求標準化，背後的風景化作統一黑白照片的灰色調，他們甚至願意等到天空灰暗後才拍攝，符合照片光線與調子一致性的要求。

要如何呈現「客觀性」(objectivity)，讓物體自我顯現，靜態畫面中建築物，不管它們的原來的身份，透過照片重新觀看它們的姿態，像是一個能夠自我顯現，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藝術品。作者拒絕連結其它意義，減少主觀(subjectivity)的情感來左右作品意義，作者不願介入風景，成為孤立狀態，夏蒂·柯頓(Charlotte·Cotton)：「攝影者可能會有的情緒，卻不再是觀眾理解影像意義的明確指南。」¹⁵

¹⁴位在德國錫根(Siegen)為具歷史的冶鐵工業區，木框式建築是勞工房舍，特簡單建築結構，著重實用性，沒有多餘的裝飾，建築的年代約在 1870 至 1914 年間。

¹⁵夏蒂·柯頓(Charlotte·Cotton)，《這就是當代攝影》，張世倫譯，台北市：遠足文化，2011，頁 91。

以作品《水塔》（1972）（圖2）為例，當作品不是當作個別化物體（殊相）解讀，呈現物體的各自的樣貌，但貝歇夫婦將影像有系統分類，作為比較，是為了歸納一個普遍性概念（共相）。好奇的是，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建造的人是如何構想「水塔」，而能夠製造出相似之物。形成「水塔」的因素有很多：地方傳統、地理因素、技術、質料、使用功能等，「水塔」的概念是存在於它的製造因素裡，透過物象的分類與闡釋，「水塔」的普遍本質因為攝影類型學而受到印證。海德格在〈藝術作品的本源〉透過梵谷（Van Gogh）的一幅油畫，畫中農婦穿著破舊的工作鞋，當她在穿著時候，勞動使用的過程中，只覺得有用；當她不注意時，鞋子的存有反而益發真實，¹⁶（重新觀看作品時）就是鞋子象徵勞動的真實，它的意象連接到大地。這個歸屬使得原本不去思量、不去留心的東西反而閃耀出現。相同地「水塔」在使用時，只會看見它的材質、形式、有用的功能，但是攝影使它失去了有用性，「冷面」寫實使得「水塔」無所用處，「本身才得以出現而自持，保持著原樣」¹⁷，它的原始面貌才得以照亮，成為自身顯現的作品。

貝歇夫婦在德國杜塞多夫藝術學院（1971-2015）教學多年，影響當代攝影觀念甚為深遠，成就 90 年代重要的藝術學派—杜塞多夫學派（Düsseldorf School），門下追隨的學生亦成就非凡，成為重要攝影家者有：托馬斯·施特魯斯（Thomas Struth）、托馬斯·魯夫（Thomas Ruff）、阿克塞爾·赫特（Axel Hütte）、坎蒂達·霍夫（Candida Höfer）、佩特拉·溫德利希（Petra Wunderlich）、約格·薩瑟（Jörg Sasse）以及勞倫茲·布爾格斯（Laurenz Berges）、安德烈·古爾斯基（Andreas Gursky）等，「冷面」攝影的紀實取材更為多元，作品以巨大影像、格式化、冷靜、銳利的影像粒子呈現，社會的真實性更為深刻直接，遂成為新攝影與觀念藝術的核心。

六、台灣冷面風景走向

西方的「新客觀主義」、「新地景攝影」、到「杜塞多夫學派」之後，這個脈絡是否影響到台灣當代攝影的發展與取向。以下舉例幾位都是當代攝影的藝術家，他們各自提出不同主題，以冷靜的觀點，遊走於底層，針對台灣社會現實狀態敢於批判，敘事與議論的成份較多，作品都具有「冷面」的素質，卻較少用「冷面」的觀點來評析。

最早觀測到地誌學（新地景，Topology）與攝影紀實精神的藝術家是游本寬，他的攝影是觀念與方法並行，依循地誌學的方法論，歸納各種符號表徵再作分類，

¹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藝術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孫周興譯，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頁16。

¹⁷同註16，頁16。

作品有《真假之間》：動物篇、肖像篇、信仰篇，《台灣房子》系列、《公共藝術：地標篇、》等，精準捕捉台灣社會空間裡既現實又虛幻的影像，眾人視覺與認知的矛盾現象。

新聞記者出身的沈昭良，他攝影面向深入到社會底層行業與人群之間，但從早期的新聞紀實到藝術觀念的風格，以江湖走唱為生「綜藝團」為題材，看見從野台戲的生財道具光彩耀眼的「活動舞台車」。同是舞台車，作品分歧出兩種美學面貌，分離出《Singer》「台灣綜藝團」：是人間舞台，屬於古典紀實性；《Stage》「舞台」：是華麗的空場，是無人冷凝的景象，呈現舞台餘音繚繞的景象，從美學的觀點來看，「冷面」的取向似乎更能喚醒庶民俗豔的魅力。

陳伯義的紀實攝影涉及台灣社會大遷村（紅毛港）的歷史，卻不是用激情的抗議現場來突顯議題，離開激情與人聲，留下建築物的空寂與殘破影像，這是一個很容易感傷與懷舊的題材，攝影者必須釐清自己的美學訴求，以「窗景」系列最能說明「冷面」的自我顯現本質，窗景是房屋拆除的遺跡，是一個空虛的景觀，空無之後自動填滿風景，借由他者的風景來補白，「窗景」呈現房子的存有事實，是被褫奪後的空無。

《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調》是近年來台灣大型社會檔案田調，計畫是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LSD，結合約七十名大學生策畫組成），以攝影作為「蚊子館」普查工具，因為目標數量龐大，累積巨量的照片檔案，終結編成三本厚重的影像檔案書，展示大量廢墟式的圖像，形成建構社會真實的「檔案格式」，運用「冷面」的攝影手法，達成田調的「信度」；堅持均一黑白影像，強調空間「閒蕩」、「無人」處境，雖然攝影構圖、視角、取景不是嚴謹考量，可能因為取景過程是突擊式，或街拍式，但藝術行動是具有「效度」。

七、結論：美學的顯現

要理解「冷面」攝影美學的概念，「真實」是「冷面」首先要詮釋的命題。藉由攝影來理解各種事物，無論是寫實攝影，新客觀主義的攝影，新地景攝影，紀實攝影等，無論用主／客觀的角度切入，同樣是以直接現實觀點來看世界，攝影所得到的影像是真實（reality）的再現，並非真實的本身，所有的攝影都須要顯現美學內涵，被詮釋，開啓其意義。綜合以上作品風格比較，審美概念與形式分析的整理，「冷面」美學的性質可歸納下列幾項命題：

1. 「冷面」是觀看與理解，不是偶發的感觸

觀看本身就是涉入主體的企圖，「冷面」的觀看經驗是美感的平均化，壓抑主觀個別的表現，讓風景重新回到中性的位置；風景不再是「奇觀化」

的視覺，或作為情感消費的觀賞，攝影的重點在於超越個別觀點的侷限，「冷面」美學使攝影不再運用誇大、感傷，且容易陷入主觀情境的照片。

2. 「冷面」的真實感

蘇珊·桑塔（Susan Sontag）分析攝影引發的取代現象：現代化社會裡已被「影像世界」所取代，第一、影像成為消費之物，控制我們的生活、經濟、個人享樂。第二、真實生活經過攝影之後，重新產生新的物件，成為一個文件、檔案，這個文件會從家庭相簿到社會的資訊體系。第三、攝影的真實造就了影像的「權力」（power）與對人的控制，使得「影像」更趨近於權力的運作。¹⁸攝影成像過程其實是光學機器生產的過程，它比人為（繪畫）更為正確、精緻與快速，這種自動化的特質（減少人為的操作）製造出感知層面的「真實感」，改變了人與影像世界的關係，影像更容易取得人的信任與依賴。

3. 「冷面」攝影是建構在文件體系之內

攝影過程如同田野調查過程，影像作為系統分析的工具，記錄工作是呈現作品的原始面貌，分類是歸納其同質與異質的關係。實踐方法是產生物性自我記錄的意圖，成為文件書寫的自律，影像成為話語的形態，進入真實與文件交換之體系。

4. 影像之檔案性

「冷面」攝影建構在「見證」、「證據」的基礎，檔案性（evidentiary）是將影像發生的時間繼續綿延，賦與文件的時間標記。檔案的存有在於回溯歷史的能力，將片斷的記憶、知識與真實世界連結起來。檔案是無形的紀念碑，每張照片標記著歷史的編號，卻是片斷的數字，不連貫的歷史，檔案的軌跡邏輯是依照某種真實的想像而建構的，當記憶消失的時候，檔案便將取代歷史。

5. 意圖建構出世界的類型學（typology）

拍攝同一主題影像，最明顯例子是貝歇夫婦作品實踐方式，貝歇夫婦（Bernd and Hilla Becher）的攝影觀是：找到一種拍攝主題，並終其身緊追不捨。從攝影對象的發現到設定，主題概念一直在普遍性與獨特性之間交互作用著。以檔案形式來規範展示主題，雖然限縮了拍攝的對象，卻開展另一種美學的試探：主題的對象之物是早已存在的，受制於人的後天經驗，無法被發現，所以發現「類型」等於實證了先驗的知識，普遍的本質早已置入於對象之物。在「冷面」

¹⁸Sontag, Susan.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Anchor Book, 1977:53.

的照片裡，類型學作為物質整理工具，同時也校對了空間與時間的秩序，成為一個全觀的風景，作為重構理性世界的目的。

6. 冷漠的場域

冷面的另一項特徵是挑選無人氛圍的風景，早期是以自然地景，經濟地景與工業場所，而後轉移日常的都市空間，面對人類開發之前後的地景，過渡地景與偏僻地景，「冷漠」在審美作用之下，凸顯出了工業進化後人類破壞自然的事實，「新地景」與「杜塞多夫學派」攝影所標記的「人為建築」、「日常風景」、「無人的風景」的事實，反轉西方傳統景觀美學，反諷了以壯麗為傲的美國西部山水。

另外一支則挑選具有社會性的建築體，進入室內景觀中：公共空間、大企業空間、歷史性空間等，同樣是無人的景觀，缺少了人更能顯示建築的存有意義：展現自身的形態與功能、與合於目的性的美感。

7. 從個人的風景到無人的風景

風景的含義是因人而異，會因為人的年紀、性別、時間、活動性質，而有不同的體驗，接收的內容也不逕相同，以致無法歸納共同的美感；個人的風景是混亂的，只聽見每個人的任意描述，卻看不見風景。從世界存有的角度來看，陳榮華：「在存有學上，他的存有總是瞭解世界的，因此他與世界是統一的」¹⁹，任何地方風景都是整體世界的一隅，我生活在於風景之中，並不須要特別的安排或意圖製造，正如本文的題意：「消散於風景之中」，寓居而不自知，忘懷於自身的存在，存有才得以開始。「冷面」的風景，冷靜地觀看，「無人的風景」是美學最好的詮釋。「冷面」攝影將風景放在存有者的存有位置，讓風景揭露自身，等待有人到無人之時，人消融於風景之中。

¹⁹同註 1，頁 38。

參考書目

- Jenkins, William,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opographics in: New Topographics: Photographs of a Man-Altered Landscape." (Rochester, NY, The Museum) 1975.
- Karen Hop. "Deadpan Photography" 2010,
<http://nightworkersstyle.blogspot.tw/2010/04/deadpan-photography.html> (30 Jan, 2016.)
- Sontag, Susan.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Anchor Book, 1977:153.
- Vinegar, Aaron. "Ed Ruscha, Heidegger, and Deadpan Photography." Art History Magazine, Volume 32, Issue 5, Association of Art Historians 2010:859.
- 夏綠蒂·柯頓 (Charlotte·Cotton), 《這就是當代攝影》，張世倫譯，台北市：遠足文化，2011。
- 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藝術作品的本源〉，《林中路》，孫周興譯，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
- 張照堂，《影像的追尋：台灣攝影家寫實風貌》，台北市：遠足文化，2015。
- 郭力昕，〈影像介入現實的政治話語能力〉，《真實的叩問》，台北市：麥田出版，2014。
- 陳申，胡志川，馬運增，錢章表，彭永祥著 (1990)。《中國攝影史》，台北市：攝影家出版社。
- 陳榮華，《海德格存有與時間闡釋》，台北市：臺大出版中心，2003。
- 廖新田，〈風格與風範：名家、名流、名士郎靜山在台灣〉，「郎靜山 12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福建武夷山市政府，2012。
- 簡永彬、楊永智，《看見的時代：影會時期的影像追尋 1940s~1970s》，台北市：夏綠原國際，2014。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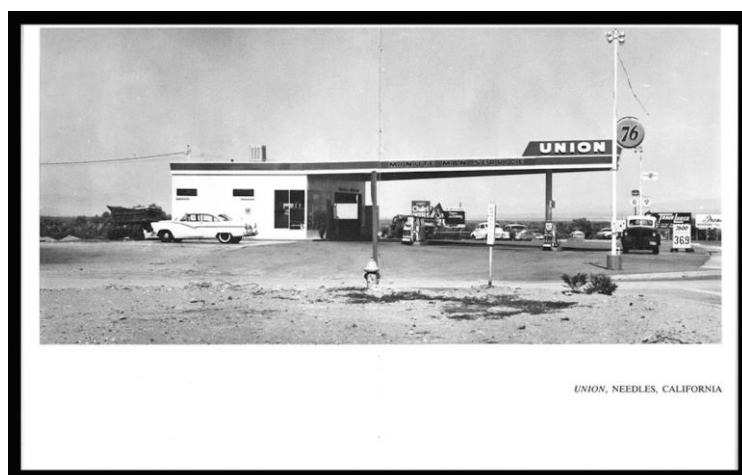


圖 1，艾德華·魯沙（Ed Rucha）《二十六個加油站》內頁，1963，攝影書出版。

圖片來源：Maite Muñoz, This is the first e-mail we got from there. *O newsletter*.

<http://abcdefghijklmn-pqrstuvwxyz.com/en/im-off-fictional-autobiographic-story-in-epistolary-form/>



圖 2，伯恩與希拉·貝歇（Bernd and Hila Becher），《水塔》，1972，黑白照片。

圖片來源：Bernd and Hila Becher. *Water Tower. The Board*.

<http://www.thebroad.org/art/bernd-and-hilla-becher/water-towers-0>

Interruptions in Meeting Talks: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of EFL University Learners

Chia-chia Lee*

Abstract

Pragmatic necessity derived from globalness has led to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meeting skills have been a key area for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eeting skills have been challenging for non-native professionals. Among a variety of meetings-related skills,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is difficult for non-native professionals to perform because of its inherently face-threatening nature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in challenging meeting skills from EFL learners' perspectives is rarely addressed. Thus,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used during situated meetings conducted by EFL university learners. The spoken data collected from 52 participants with English ability at level B2-C1 of the CEFR was analyzed based on Brown and Levinson's politeness theor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both intrusive and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emerged, for the purposes of showing disagreements, taking the flo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and 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and repetition. Negative politeness was most commonly used across different purposes of interruptions. The use of output strategies varied. Avoiding disagreements and apology were frequently adopted in interrupting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Questions and hedges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frequency in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Apology was a common strategy employed in interrupting for clarification. The participants tended to notice and attend to hearers in interrupting f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were drawn based on the results.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s, pragmatics, politeness strategy, meeting skill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 Lecturer,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eceived Jan 29, 2016.

會議言談插話現象之禮貌策略研究：

以大學英語學習者為例

李佳家*

摘要

全球化已促進商務英語溝通的實務需求與發展。在各項商務英語溝通技巧中，掌握英語會議溝通技巧已成為一大學習重點。然而，相關研究指出，對於英語非母語人士而言，英語會議溝通能力不易掌握，其中「插話技巧」的能力培養尤具挑戰。「插話」經常涵蓋威脅面子的行為及禮貌策略，因此尤具難度。以往研究鮮少探討在以英語為外語的會議溝通情境下，學習者如何使用禮貌策略。本研究包含兩項研究焦點：其一，探討大學英語學習者在英語會議溝通中的插話目的，其二，分析其在插話過程中所使用之禮貌策略。語料來自大學英語學習者之英語會議溝通內容，研究對象總計 52 名，英文程度為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 B2-C1 級。以禮貌理論為基礎，分析與歸納會議言談插話現象之目的及禮貌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學習者常用的插話目的主分為干擾型(intrusive)以及合作型(cooperative)。干擾型以反駁觀點(showing disagreements)與取得發言權(taking the floor)為主，合作型以表達肯定(making positive comments)與釐清觀點(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and repetition)為主。學習者多使用迴避反駁(avoid disagreement)與表示道歉(apology)來表達反駁觀點；在取得發言權上，學習者多使用提問及閃避詞(questions and hedges)；為釐清觀點，學習者多使用道歉(apology)；在表達肯定中，學習者則多著重於注意聽話者喜好(notice and attend to the hearers)。綜觀學習者所使用之禮貌策略，消極禮貌策略(negative politeness)之使用頻率相對較高。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對專業英語教學提出教學實務上的建議。

關鍵字：社會語言學、語用學、禮貌策略、會議技巧、專業英語

*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講師。
到稿日期：2016 年 1 月 29 日。

1. INTRODUCTION

English meeting skills hav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necessity such as global expansion,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talent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erger and acquisition has led to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in corporations (Graddol, 2006; Rogerson-Revell, 2008; “The English Empire,” 2014). In multinationals, English has been adopted as an official or corporate language for employee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eetings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routine (Rogerson-Revell, 2008). Through meetings, people form teamwork and actualize visions in businesses. As Warren (2014, p. 12) suggested, “Meetings,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ny professional context.” People across cultures use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nd deal with real-time verbal interaction worldwide.

Among a variety of meetings-related skills, interruption appears to be more problematic for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n a large-scale survey targeting at 1,010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across four sectors (Warren, 2014), interrupting effectively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skills for respondents. It is treated as a challenging skill even for non-native speakers with higher self-evaluated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s (Rogerson-Revell, 2008). International Actuarial Association (IAA) even encourages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o interrupt and ask for clarification in meetings to improve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reduce misunderstandings (as cited in Rogerson-Revell, 2008).

The findings above demonstrate that effective interruption in meetings may derive from reasons beyo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Non-native speakers with high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may not be pragmatically competent to deal with interruptions since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is potentially face-threatening as speakers make attempts to violate turn-taking principles.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by implication, is inherently impolite even though speakers’ intentions could be intrusive or cooperative. In order to minimize imposition or threats, people tend to use politeness strategies.

There is no gener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across cultur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dopt politeness strategies different from native speakers both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García, 1989a, Maier, 1992; Kong, 2014).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s not a neutral language in that speakers still connect the language with their own communication culture or style (Louhiala-Salminen, Charles, & Kankaanranta, 2005). Pragmatic transfer of language use did exist. It could be assumed that when speakers interrupt in meetings their use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very often depends on their own cultur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in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may ensure a mor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meetings as interruption is a challenging skill for non-native speakers. Very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in challenging meeting skills identified by non-native professionals and further investigated relevant acts from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point of view. In addition, different from DCTs (The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s) which focuse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pragmatic knowledge of speech acts, situated meeting talks adopted in the study allow observation of interruptions in real-time verbal interaction. The study sheds light on politeness strategy choice of EFL learners from a "productive" point of view and provide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of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e research addresse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in the meetings held by EFL university learners in the study?
2. What politeness strategies are employed when the EFL university learners interrupt in the meetings?

2. LITERATURE REVIEW

2.1 Politeness and Face

In social interaction, politeness plays a key role which creates prerequisites shared by a specific community. Scholars have observed human behaviors and theorized politeness and face-threatening acts.

Although politeness has been interpret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is commonly accepted that politeness generates acts which make people feel good. Lakoff (1973) suggests that politeness involves guidelines which people use to avoid threats of imposition and make others feel comfortable in interaction. In Leech's (1983) principle of politeness, politeness is involved in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avoid negative responses and maintain positive relations. Kasper (1990) and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stress that politeness strategies lead to appropriate behaviors or attitudes and minimization of disruption or even aggression.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elaborate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oliteness and the concept of face. They define face as a self-image all of the people would like to maintai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The notion of fac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categories: positive face and negative face. Positive face means that "the positive consistent self-image or personality (crucially including the desire that this self-image be appreciated and approved of) claimed by interactants" (Brown & Levinson, 1987, p. 61). Negative face indicates "the basic claim to territories, personal pre-serves, rights to non-distraction – i.e. to freedom of action and freedom from imposition" (Brown & Levinson, 1987, p. 61).

2.2 Face Threatening Act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Face Threatening Acts (FTAs) occur when a person damages the face of another by showing behaviors which fail to meet others' expectations. Positive FTAs which ignore a hearer's desire of being appreciated or approved may include disagreements, complaints, etc. Negative FTAs challenges the freedom of action and freedom from imposition. A speaker may do negative FTAs to threaten the negative face of a hearer

by performing acts such as requests, suggestions, warnings, anger, compliments, offers, or promises. Whether interruption 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FTA depends on speakers' intentions since the act could threate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e (Brown & Levinson, 1987).

Doing FTAs involves the employment of different politeness strategies. People estimate the risk of face loss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hey would do the FTAs. In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model, speakers may avoid FTAs when risks of losing face turn to be greater than what the speakers can cope with. If speakers decide to adopt FTAs, they may estimate the risk of face loss and use different politeness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hierarchies of strategies consist of higher-order and lower-order strategies. The higher-order strategies, called super-strategie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main categories including bald on-record, positive politeness, negative politeness, and off-record. The lower-order strategies, called output strategies, are sub-categories of super-strategies. In bald on-record strategies speakers perform an act baldly without redressive action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This suggests no minimization of a threat. Bald on-record strategies are often chosen when a circumstance such as urgency overrides the importance of saving a hearer's face. Different from bald on-record strategies, positive politeness and negative politeness both involve redressive action which mitigates threats to the hearer's face. Positive politeness seeks to approve or admire the hearer's positive face, mainly focusing on the aspects of common ground, cooperation, and fulfillment of wants. Negative politeness is oriented towards the hearer's negative face, focusing on aspects such as indirectness, minimal assumptions about wants, minimization of imposition or coercion, minimal impingement, and the redressing of the hearer's other wants. The final politeness strategy is off-record strategies. In off-record strategies, speakers use indirect languages and make inferences. Hints are given without directly asking the hearer to take any action.

2.3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across Cultur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pported that different cultures may employ different politeness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High-beginning-level Korean ESL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prefer to use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ithout showing concern over whether the face threatening acts damage one's negative or positive face (Bell, 1998). It seems tha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ir learning of pragmatics these Korean ESL learners pragmatically transfer Korean norms which rely on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more into English speeches (Bell, 1998). Lin (2005) investigates persuasive sales talk in Taiwan mandarin. Negative politeness is also most frequently used. Common output strategies of negative politeness include hedges and giving deference. However, in terms of showing disagreements or giving advice, it is found that speakers from Korean and Taiwanese cultures may adopt more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Bell, 1998; Lin, 2005). That is to say, these speakers adopt more direct languages and may not maintain hearers' face. The phenomen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s frequently

use non-confrontational devices when showing disagreements such as giving reasons or conveying cooperation (García, 1989b). American participants in previous research may adopt token agreement which is an output strategy in Brown and Levinson's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Beebe & Takahashi, 1989; Bell, 1998). In Korean and Taiwanese cultures,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are adopted more in speech acts such as showing concern, giving promises and guarantees, promoting solidarity, telling jokes, and giving reasons (Bell, 1998; Lin, 2005). These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politeness strategy choice may depend o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ragmatic transfer may exist when non-native speakers use English.

2.4 Interruption

Interruption, by nature, is a face-threatening act. It is a device interlocutors use to violate turn-taking rules and further dominate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Bennett, 1981; West, 1982; West & Zimmerman, 1983; Roger, Bull, & Smith, 1988). Ferguson (1977) ha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rruption classification: simple interruption, silent interruption, overlap, and butting-in interruption. Simple interruption occurs when there is simultaneous speech and the original speaker does not complete the turn successful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imple interruption and silent interruption is that there is no occurrence of simultaneous speech in silent interruption. In overlap, simultaneous speech occurs, but the original speaker successfully completes the turn. Butting-in interruption indicates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attempts of interruption fail and simultaneous speech does not occur.

The purpose of interruptions may vary. Although scholars have defined purposes of interruptions in a variety of terms, interruptions can be broad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ntrusive and cooperative (Goldberg, 1990; Murata, 1994; Ng et al., 1995). It can be a power device which discontinues a person's right to show rejection or take the floor to manage a topic (Kennedy & Camden, 1983; James & Clarke, 1993). It can also be supportive and cooperative (Kennedy & Camden, 1983; James & Clark, 1993). For example, speakers may show positive comments or elaborate on a topic to show active listening, build up rapport, or express solidarity in group discussion (Coates, 1989; Greenwood, 1989; Coon & Schwanenflugel, 1996). Interruption consists of a variety of functions ranging from disconfirmation, rejection, to rapport building (Kennedy & Camden, 1983).

Relevant researches have provided discussions of whether interruption depends on cultures.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Asian or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speakers use more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in order to show solidarity and common ground. For example, Japanese and Thai people use more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than intrusive ones in conversations for cooperation or coordination (Mizutani, 1988; Moerman, 1988). Compared to Japanese people, Americans tend to use fewer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in conversations (Hayashi, 1988).

3. RESEARCH METHODOLOGY

3.1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52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iversity learners taking a one-year Business English Communication program in a university in Taiwan.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was reported as measured by TOEIC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scores ranging between 780 and 950 that approximately correspond to levels B2-C1 of the CEFR announced by 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formed into thirteen 4-person groups and told in advance that they would hold situated meetings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in class. These participants come from a variety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busines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2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 corpus of spoken data from the participants was collect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hold two situated meetings in English based on a specific business context and an agenda given (See Appendix I for a sample). They were also asked to use interruptions in the meeting talks. In the situated meetings, each group had 3 minutes for preparation and 6 minutes for meeting discussion.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had received any meeting talk training before the meeting tasks were given. The meeting talks were audiotaped for further transcription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for different purposes and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Interruptions in the spoken data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Ferguson's (1977) classification of interruptions. Silent interruption and simple interruption were adopted in the study since they represent interruptions in which the original speaker failed to complete the utterance as the interrupter violated the turn-taking rules. Overlap and butting-in interruption were not considered because the interrupter failed to interject the remarks of another.

On the basis of silent and simple interruptions,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were coded. Categories of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were generated through open coding of data collected.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politeness theory was then adopted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function practice of interruptions. Although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model has been criticized on the grounds of universality, it is still "a rather explicit and detailed model of linguistic politeness" (Leech, 2014, p. 81) and has "set milestones for further research of politeness" (Kedveš, 2013, p. 436). In addition, all of the spoken data were in English and collected from EFL participants. The context provides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how non-native speakers adopt politeness strategies when they interrupt in English.

The coding scheme for the study shown in Appendix II was based on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principles and it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meeting talks. Strategies of bald on record, positive politeness, and negative politeness were coded whereas off-record strategies were not covered because they were not significantly shown in the data. One of the potential reasons is that off-record strategies tend to rely

on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to interpret relevant clues. It seems plausible that the participants' relationships may not necessari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off-record strategies.

4. RESULTS

The section examines the key findings from the data source mentioned above, including the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used in the meeting talks.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ata source is shown in Table 1-7.

4.1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in the Meeting Talks

Five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emerged from the data, including showing disagreements, taking the flo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for confirmation, and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for repetition. Interrupting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was mainly used when participants would like to gi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a topic or issue from someone else. Different from interrupting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was adopted when the interruptors made attempts to seize control of a relevant topic they thought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the speaker had been talking about. Interrupting f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aimed at showing common ground, cooperation, or fulfillment of wants to indicate agreements and supports. When the participants interrupted in order to ask for confirmation, they made efforts to check information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of interrupting for asking for a repetition was to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of unclear ideas.

The spoken data analyzed consists of 127 acts of interrupting: 40 acts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31.50%), 45 acts for taking the floor (35.43%), 30 acts f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23.62%), 7 acts for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for confirmation (5.51%), and 5 acts for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for repetition (3.94%).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accounted for 66.93% of the acts whereas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33.07%. More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occurred than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Totals for each category are shown in Table 1.

Table 1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in the Meeting Talks

Purposes	Frequency	% of frequency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Showing Disagreements	40	31.50%
Taking the Floor	45	35.43%
Total	85	66.93%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30	23.62%
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7	5.51%
Clarifying for Repetition	5	3.94%
Total	42	33.07%

4.2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in Interruptions in the Meeting Talks

4.2.1 Analysis of Super-strategies of Politeness

A general analysis of the politeness strategies used shows that the three super-strategies were all found in the data: bald on record, positive politeness, and negative politeness. Specifically, negative politeness (53.54%) was most frequently used. Fewer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35.43%) were employed. Compared to negative politeness and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bald-on record strategies were rarely adopted with a percentage of 11.2. Table 2 lists overall use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the current study.

Table 2.

Overall Strategy Use of Politeness in the Meeting Talks

Politeness Strategies	Frequency	% of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Maximum Efficiency (B-1-2)	6	4.72%
Little or no interest to maintain somebody's face (B-1-4)	6	4.72%
Offers (B-2-3)	2	1.57%
Total	14	11.02%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Notice, attend to Hearer (P-1-1)	26	20.47%
Exaggerate (P-1-2)	1	0.79%
Avoid disagreement (P-1-6)	17	13.39%
Presuppose/raise/assert common ground (P-1-7)	1	0.79%
Total	45	35.43%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N-1-1)	3	2.36%
Question, hedge (N-2-2)	29	22.83%
Give deference (N-3-3)	2	1.57%
Apologize (N-4-1)	32	25.20%
Impersonalize S/H (N-4-2)	1	0.79%
Go on record as incurring a debt or as not indebting H (N-5-1)	1	0.79%
Total	68	53.54%

4.2.2 Analysis of Output Strategies of Politeness

The participants chose a fairly limited range of output strategies. As shown in Table 2, of 8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in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model, 3 were found, including "maximum efficiency," "little or no interest to maintain somebody's

face,” and “offers”; of 15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4 were found, including “notice, attend to Hearer,” “exaggerate,” “avoid disagreement,” and “presuppose/raise/assert common ground”; of 10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6 were found, including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question, hedge,” “give deference,” “apologize,” “impersonalize S/H,” and “go on record as incurring a debt or as not indebted Hearer.” Among all of the politeness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study, “Apologize” (25.20%), “Question, hedge” (22.83%), and “Notice, attend to Hearer” (20.47%) were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other output strategies. Table 2 presents all of the output strategies identified in the data.

Interrupting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Five output strategies were adopted in interrupting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including “maximum efficiency,” “little or no interest to maintain somebody’s face,” “avoid disagreement,” “question, hedge,” and “apologize.” Compared to other output strategies used, “avoid disagreement” (35%) and “apologize” (32.5%) had higher level of frequency. In “avoid disagreement” token agreement occurred in many instances. Examples include: “I think [...] is a good idea, but [...]”; “Yes, I agree with your point, but [...]”; “I see your point, but [...]”; “Good idea, but [...].” For participants who used “apologize,” they chose phrases such as “Sorry” and “Sorry to interrupt.” Table 3 provides a list of five output strategies and examples used in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Table 3.

Output Strategies: Interruptions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Output strategies	Frequency	% of frequency	Example
Maximum Efficiency (B-1-2)	2	5.00%	Wait, but [...]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I highly suggest to use Internet.
Little or no interest to maintain somebody’s face (B-1-4)	4	10.00%	Come on. Don't choose the book store.
Avoid disagreement (P-1-6)	14	35.00%	I see your point but I think...
Question, hedge (N-2-2)	7	17.50%	I am afraid that I can't agree with you.
Apologize (N-4-1)	13	32.50%	Sorry to interrupt...
Total	40	100.00%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The data collected reveals that when the participants interrupted for taking the floor, they adopted more types of output strategies than they did for other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As shown by Table 4, 11 types of output strategies were used in total. The participants frequently used the strategy of “question, hedge” (33.33%). In

“question, hedge,” the participants softened the tone by using “OK,” “Well,” “just,” “it seems that...,” “maybe,” “might,” or “may.” See Table 4 for the strategy use and examples of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Table 4.
Output Strategies: Interruptions for Taking the Floor

Output strategies	Frequency	% of frequency	Example
Maximum Efficiency (B-1-2)	4	8.89%	Excuse me. As a customer service manager, in my opinion, I think FB is a good and useful social media, so I think maybe we can...
Little or no interest to maintain somebody's face (B-1-4)	2	4.44%	OK. Calm down [Try to ask the other two people to stop a quarrel.]...
Notice, attend to Hearer (P-1-1)	6	13.33%	Yes. I think magazine maybe is a good way and I think we can...
Avoid disagreement (P-1-6)	3	6.67%	Sure, but how could we...
Presuppose/raise/assert common ground (P-1-7)	1	2.22%	I see. To solve problems we can...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N-1-1)	1	2.22%	Could you just let Alice finish her words, thank you?
Question, hedge (N-2-2)	15	33.33%	Just Internet? But, I think we can focus on...
Give deference (N-3-3)	2	4.44%	Oh Sir, I can explain it. May I?
Apologize (N-4-1)	9	20.00%	Sorry to interrupt...
Impersonalize (N-4-2)	1	2.22%	It's mom and dad's smartphone. [instead of: it's not a smartphone for me]
Go on record as incurring a debt or as not indebting H (N-5-1)	1	2.22%	Huh, thanks Rosen [if you would]...
Total	45	100%	

Interrupting f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concern and support by adopting six types of output strategies including “offers,” “notice, attend to hearer,” “exaggerate,”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question, hedge,” and “apologize.” They frequently

employed the strategy of “Notice, attend to Hearer” (66.67%). Phrases such as “Yes” or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the points)” were adopted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utterance to emphasize the common ground with the original speaker before they provided supports or positive feedback. Output strategies used in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for positive comments and examples are shown in Table 5.

Table 5.

Output Strategies: Interruptions f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Output strategies	Frequency	% of frequency	Example
Offers (B-2-3)	1	3.33%	Don't worry about the problem. There are two other previous products that are typically suitable for...
Notice, attend to Hearer (P-1-1)	20	66.67%	Yes, I agree with the opinion and e-commerce too because...
Exaggerate (P-1-2)	1	3.33%	Yes, I think Mandy's suggestion is so cool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word of cool]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N-1-1)	1	3.33%	May I have a word?
Question, hedge (N-2-2)	5	16.67%	OK. I think Harry's idea is not bad.
Apologize (N-4-1)	2	6.67%	I am sorry, I think department store is very good because...
Total	30	100.00%	

Interrupting for 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The data yielded limited number of interruption for clarification. Three types of output strategies were mainly adopted including “offers,” “question, hedge,” and “apologize.” Of 127 speech acts of interruption, 7 acts of clarification for confirmation were identified.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adopted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to interrupt for clarification for confirmation. “Apologize”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frequency in the acts. See Table 6 for the participants’ strategy choice in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for clarification for confirmation.

Table 6.

Output Strategies: Interruptions for 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Output strategies	Frequency	% of frequency	Example
Offers (B-2-3)	1	14.29%	Let me clarify that...do you mean...
Question, hedge (N-2-2)	1	14.29%	So, you mean that special offer easier to attract our consumer? [with a rising tone to show it's a question form]
Apologize (N-4-1)	5	71.43%	Sorry.
Total	7	100.00%	

Interrupting for Clarifying for Repetition

Similar to interrupting for 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interrupting for clarifying for repetition had a low level of frequency, covering three types of output strategies including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question, hedge,” and “apologize.” All of the output strategies were under the super strategy of negative politeness.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and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ere not used. See Table 7 for the participants’ strategy choice in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for clarification for repetition and examples.

Table 7.

Output Strategies: Interruptions for Clarifying for Repetition

Output strategies	Frequency	% of frequency	Example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N-1-1)	1	20.00%	Could I interrupt you?
Question, hedge (N-2-2)	1	20.00%	I am afraid that I didn't understand what's the difference...
Apologize (N-4-1)	3	60.00%	Sorry, what is hunger marketing?
Total	5	100.00%	

5. DISCUSSI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ata source indicates several interesting results.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participants adopted acts of interrupting for purposes observed in previous studies including both intrusive and cooperative types. The participants interrupted to show rejection and make attempts to take the floor in order to give opinions or arguments. The participants also interrupted to support the original speaker by giving positive comments or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The productions from

the participants support previous perspectives that interruptions involve both intrusive and cooperative functions (Coates, 1989; Coon & Schwanenflugel, 1996; Goldberg, 1990; Greenwood, 1989; James & Clarke, 1993; Kennedy & Camden, 1983; Murata, 1994; Ng et al., 1995).

Although the participants employed both intrusive and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the evidence is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ose in previous studies in terms of propor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participants employed more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than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The resul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data shown in previous studies in which Asian or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tend to use more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in conversations (Hayashi, 1988; Mizutani, 1988; Moerman, 1988). Some people may assume that these EFL participants encounter difficulty in performing acts of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when they speak English. However, the results have shown that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ed 42 acts of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33.07%) compared to 85 acts of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66.93%). Therefore, possibly, from these Taiwanese participants' point of view, interruption is perceived as a more disruptive act in business meetings conducted in English. They may believe that interruption is mainly used when people have the intention of showing disapproval, seizing power, or criticizing people in turn exchange. From the participants' point of view, it could be impolite to show common ground, cooperation, fulfillment of wants, and the need for clarification by acts of interrupting. The phenomenon may partly provide an explanation why previous research found that Asian professionals usually keep silent in meetings (Warren, 2014; Rogerson-Revell, 2008). The practice of interrupting acts is connected with cultural values and beliefs, going beyond linguistic competence.

Different from participants in previous studies, those in the current study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awareness of showing politeness when they chose to interrupt for disagreements.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speakers from some Asian areas such as Korea and Taiwan tended to adopt more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when showing disagreements. The study does not share similar results. In fact,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were rarely adopted in showing disagreement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can be that the participants' previous grammatical training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The participants may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with an imperative nature may create a tone of giving people an order; therefore, they avoided adopting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when they confronted original speakers.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is required to explore the perspective.

Although the participants may be aware of using "avoid disagreement" to interrupt for disagreements,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dopted more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positive FTAs. The result in the current study goes against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principle in which speakers would be expected to adopt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positive FTAs. Interestingly,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ere not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category in the current study even though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ed more acts of intrusive interruption (66.93%) which threaten people's positive face by showing non-cooper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disagreements or taking the floor. In fact,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study,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ere most frequently employed only when the participants interrupted f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which is considered a type of negative FTA. A possible interpretation is that pragmatic transfer exists. In Taiwanese culture,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are mainly employed to convey cooperation or membership instead of common ground (Lin, 2005). Therefore, these participants tended not to frequently use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Pragmatic transfer is also shown in a previous study focusing on Korean EFL learners who pragmatically transfer Korean norms which rely on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more in English speeches (Bell, 1998).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aking the floor may be more challenging than the other four face-threatening acts (i.e. showing disagreements, making comments, 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and clarifying for repetition) from EFL learners' point of view. "Question, hedge" was used most frequently in the act of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The use of more questions and hedges might suggest that the participants lacked confidence in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arguments on the basis of other's ideas in order to seize the control of speech. The viewpoint supports Warren's (2014) study which shows that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feel difficult to present an effective argument. Thus, the learning of effective interruption for taking the floor may involve both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and skills in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arguments.

A fairly limited range of strategy use based on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theoretical model addresses the practi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Of 33 politeness strategies used in Brown and Levinson's model, only 13 strategies were adopted. Phrases the participants chose to use appear to be linguistically simple such as "Sorry," "Maybe," and "Yes." This may partly explain why some of the strategies did not occur in the result. Bell's (1998) study also suggests that high-beginning-level Korean ESL learners tend to adopt devices with simple linguistic structure when they show disagreements. Different from Bell's participants, those in the study have higher level of English proficiency (B2-C1 CEFR level). They should have developed intermediate to high-intermediate level of grammatical knowledge. A concern could be their receptive knowledge may not turn into productive skills. Even though they may be aware of politeness strategies with more sophisticated sentence patterns and they may be able to deal with grammatical exercises on paper, it is challenging for these participants to express politeness strategies with more complicated linguistic structures in oral productions.

6. CONCLUSIONS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iscover the main purposes of interrupting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used in situated meetings held by EFL university learner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obtained results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Both intrusive and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emerged for the purposes of showing disagreements, taking the flo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clarifying for

confirmation, and clarifying for repetition. More intrusive interruptions were shown than cooperative interruptions. Although three super-strategies were all adopted,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ere used most frequently. In interrupting for showing disagreements, the participants frequently adopted “avoid disagreement” and “apology.” In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it was found that “questions and hedges” had the highest level of frequency. In interrupting for clarification (both for confirmation and repetition), “apologize”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adopted whereas none of the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listed in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model was employed. Different from other interruptions, interruption for positive comments was the only act in which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It was common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notice and attend to the hearer when they interrupted for making positive comments.

Several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instruction were drawn based on the findings. First of all, as interruptions are culturally specific, it is essential for ESP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teachers to guide EFL learners to interpret and practice acts of interrupting in target cultures for different contexts and purpose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Taiwanese participants may assume interruptions have a more disruptive nature in business meetings conducted in English. However,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view of literature, interruption could also be an opportunity to show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for a better rapport if the language and turn-exchange are used appropriately. The noti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ragmatic learning. Useful phrases provided in business English textbooks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EFL learners are not aware of the levels of appropriateness or formality beyond the phrases themselves. EFL learners need more exposure to the cultures beyond a pool of useful languages to understand what kinds of phrases are appropriate to use in what kind of business situations in terms of interruptions. Through comparison of how functions and phrases of interruptions are interpreted in different target cultures and how the target cultures differ from their own, EFL learners may gain knowledge of appropriateness which could significantly benefit the practice of interrupting acts across cultures. Secondly, it seems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needs training more than the awareness of appropriatenes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articipants may not be confident in taking the floor on the basis of others’ ideas since questions and hedges were frequently used. In order to develop successful skills in interrupting for taking the floor, both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and skills on expressing opinions and arguments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aining process. Thirdly, as the participants tended to adopt phrases which are linguistically simple, it could be a goal for ESP teachers to rethink how grammatical skills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 variety of business situ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kills. In intermediate or high-intermediate classroom, ESP teachers often assume that students’ grammatical skills are competent enough for them to move to higher level of communication training. It seems tha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may not fully support the notion.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current study did not show the ability to use more sophisticated linguistic structures in their politeness

strategy choices. The findings lead to the perspective that more materials, classroom activities, assignments, and even assessments could be designed in order to help EFL learners apply their receptive knowledge into produc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earning.

Even though the research provides insights into pragmatic study of meeting talk as a genre, there are still some concerns. First of all, th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e study may not be generalizable to all instructional environments due to its corpus size. Secondly,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model still left questions unanswered.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the model provides a well-organized framework, the model based on linguistic elements to identify politeness strategies may limit interpretations. The model could hardly explain whether the participants' understanding of a context has a significant connection with their choice of level of politeness. According to Scrivener (2011), the awareness of topics and style for a context significantly decides how speakers perform speech acts. If the participants are not aware of the nature of a context, it could be difficult for them to perform speech acts with appropriate politeness strategies. However,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ve insufficient knowledge of politeness or incompetence of performing the speech acts. As Brown and Levinson's model is linguistically oriented rather than socially oriented, the influence of contexts or settings could barely be explained. In addition, as Mills (2003, p. 82) mentioned, Brown and Levinson identify politeness strategies on the basis of "short stretches of speeche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a sentence level does not allow access to speeches in a practical meta-discourse level which emphasizes on how speakers reflect on utterances having been produced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 (Taylor, 1992). The practical meta-discours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nalyzing politeness (Mills, 2003). Brown and Levinson's (1987) model may not be able to interpret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from a turn-by-turn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 great deal more to be studied. The current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participants'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on the basis of their oral productions in situated meetings. Extensive research could go further to explore EFL participants' perceptions towards contexts, awareness of levels of politeness, and the productive practice of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M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could be explored for understanding politeness strategy use in a practical meta-discourse level. The discovery may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how ESP teachers can guide students to move from receptive knowledge to productions for authentic situations. In addition, the pragmat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EFL learners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English proficiency could be another direction.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learners with different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s deal with politeness strategies when facing different power or social relationships may contribute to pragmatic learning in ESP education.

REFERENCES

- Beebe, L. & Takahashi, T. (1989).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in face-threatening speech acts: Chastisement and disagreement. In M. Eisenstein (Ed.), *The Dynamic Inter language: Empirical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Variation* (pp.199-218). New York: Plenum.
- Bell, N. (1998). Politeness in the Speech of Korean ESL Learners. *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1(1), 25-47.
- Bennett, A. (1981). Interrup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versation. *Discourse Processes*, 4, 171-188.
- Brown, P. & Levinson, S.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ates, J. (1989). Gossip revisited: Language in all-female group. In J. Coates & D. Cameron (Eds.), *Women in their speech community* (pp. 94-122). New York: Longman.
- Coon, A. & Schwanenflugel, P. (1996). Evaluation of interruption behavior by naïve encoders. *Discourse Processes*, 22, 1-24.
- Ferguson, N. (1977). Simultaneous speech, interruptions, and dominance.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6, 295-302.
- García, C. (1989a). Apologizing in English: Politeness strategies used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Multilingua*, 8(1), 3-20.
- García, C. (1989b). Disagreeing and requesting by Americans and Venezuelans.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3), 299-321.
- Goldberg, J. (1990). Interrupting the discourse on interruptions: An analysis in terms of relationally neutral, power- and rapport-oriented act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883-903.
- Graddol, D. (2006). English next. Retrieved July 21, 2015, from <http://englishagenda.britishcouncil.org/sites/ec/files/books-english-next.pdf>.
- Greenwood, A. (1989). *Discourse variation and social comfort: A study of topic initiation and interruption patterns in the dinner conversation of preadolescent children*. Ph.D. diss.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 Hayashi, R. (1988). Simultaneous talk—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oor management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speakers. *World Englishes*, 7, 269-288.
- James, D. & Clarke, S. (1993). Women, men and interruptions: A critical review. In D. Tannen (Ed.), *Gender and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pp. 231-280).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sper, G. (1990). Linguistic politeness: Current research issu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193-218.
- Kedveš, A. (2013). Face threatening acts and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summer school application calls. *Jezikoslovlje*, 14(2-3), 431-444.
- Kennedy, C.W., & Camden, C. T. (1983). A new look at interruption.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7, 45-58.
- Kong, K. (2014). *Professional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R. (1973). 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 *Chicago*

- Linguistic Society*, 8, 292-305.
- Leech, G. (2014).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Harlow: Longman.
- Lin, H. (2005). *Contextualizing linguistic politeness in Chinese – A socio-pragmatic approach with examples from persuasive Sales talk in Taiwan mandari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July 21, 2015, from https://etd.ohiolink.edu/!etd.send_file?accession=osu1109961198&disposition=inline.
- Louhiala-Salminen, L., Charles, M., & Kankaanranta, A. (2005).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Nordic corporate mergers: Two case companie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Special issue: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texts*, C. Nickerson (Ed.), 24(4), 401-421.
- Maier, P. (1992). Politeness Strategies in Business Letters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English Speaker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11(3), 189-205.
- Mills, S. (2003). *Gender and Pol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zutani, O. (1988). Hanaskikotoba no tokushoku [Characteristics of Spoken Japanese]. In Y. Miyaji & O. Mizutani (Eds.), *Nihongo* (pp. 55-65). Tokyo: NHK.
- Moerman, M. (1988). Finding life in dry dust. In M. Moreman (Ed.), *Talking culture: Ethnography and conversation analysis* (pp. 19-3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Murata, K. (1994). Intrusive or cooperative?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interrup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21, 385-400.
- Ng, S. H., Brook, M. & Dunne, M. (1995). Interruption and influence in discussion group.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4, 369-381.
- Roger, D. B., Bull, P., & Smith, S. (1988).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classifying interruption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7, 27-35.
- Rogerson-Revell, P. (2008). Particip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eetings.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27, 338-360.
- Scrivener, J. (2011). *Learning Teaching: The Essential Guide t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Macmillan.
- Taylor, T. J. (1992). *Mutual Misunderstanding: Scepticism and the Theorizing of Language and Interpret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The English Empire. (2014, Feb). *The Economist*. Retrieved from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596538-growing-number-firms-worldwide-are-adopting-english-their-official-language-english>.
- Warren, M. (2014). "Preparation is everything": Meetings in professional contexts in Hong Kong.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36, 12-26.
- West, C. & Zimmerman, D. H. (1983). Small insults: A study of interruptions in cross-sex conversations between unacquainted persons. In B. Thorne, C. Kramarae and N. Henley (Eds), *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 West, C. (1982). Why can't a woman be more like a man? *Work and Occupations*, 9, 5-29.

Appendix I

Situated Meeting Context and Agenda (Sample)

Business Context

JNT, based in USA, makes high quality bikes. It is a well-known brand name in the USA. JNT emphasizes in its advertising that its products are “made in America.” Recently, the company’s market share in Asia has decreased. One reason for this has been the increased competition from Asian companies selling similar products at much lower prices. It must decide how to protect its brand and increase sales. As a marketing team,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to decide two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increase sales in the Asian markets.

Agenda

JNT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the Asian market

1. **Target customers** we should focus on

2. **Advertising Media**

What kind of advertising media should we use to promote the JNT products?

(Choose **2-3 channels** below for discussion.)

- TV
- Radio
- Newspaper / Magazine
- Internet
- Billboard

3. **e-commerce**

Should we develop sales using e-commerce (i.e. selling products on line)?

Appendix II

Coding Scheme (based on Brown and Levinson, 1987)

Bald on record Strategies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B-1 Cases of non-minimization of the face threat - B-1-1 Urgency or Desperation - B-1-2 Maximum Efficiency - B-1-3 Task oriented - B-1-4 Little or no interest to maintain somebody's face - B-1-5 Interests of the audience B-2 Cases of FTA-oriented bald-on-record usage - B-2-1 Invitations - B-2-2 Greetings and Farewells - B-2-3 Offers	P-1 Claim common ground - P-1-1 Notice, attend to H - P-1-2 Exaggerate - P-1-3 Intensify interest to H - P-1-4 Use group-identity markers - P-1-5 Seek agreement - P-1-6 Avoid disagreement - P-1-7 Presuppose/raise/assert common ground - P-1-8 Joke P-2 Convey that S/H are cooperators - P-2-1 Assert or presuppose S' knowledge of and concern for H's wants - P-2-2 Offer, promise - P-2-3 Being optimistic - P-2-4 Include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S/H) in activity - P-2-5 Give (or ask for) reasons - P-2-6 Assume/assert reciprocity P-3 Fulfil H's want - P-3-1 Give gifts to H	N-1 Be direct - N-1-1 Be conventionally indirect N-2 Don't presume/assume - N-2-2 Question, hedge N-3 Don't coerce H (where x involves H doing A) - N-3-1 Being pessimistic - N-3-2 Minimize imposition - N-3-3 Give deference N-4 Communicate S's want to not impinge on H - N-4-1 Apologize - N-4-2 Impersonalize S/H - N-4-3 State the FTA as a general rule - N-4-4 Nominalize N-5 Redress other wants of H's derivative from negative face - N-5-1 Go on record as incurring a debt or as not indebting H

Note: S is the speaker and H is the hearer.

鍾惺《詩經》觀析探

賴昭君*

摘要

晚明是評點風氣盛行的時代，文人受到宋元以來講求心學、理學的影響，評點作品亦反映出個人之體悟，從中寄託個人情感；「重文章之美，不重文字訓詁」成為晚明文人的習尚，而《詩經》評點在晚明也成為一股熱潮，鍾惺居處於這樣的時代，其評點作品亦受大環境所影響。

明代的經學地位一般在歷史上的評價不高，乃因學者多半以「純經學」的眼光視之，而忽略了當時品評所展現出來的藝術成就，清代學者對鍾惺的貶抑尤甚，更以「詩妖」稱之，這種尊經的衛道立場，直到民國以後興起公安、竟陵的研究熱潮才被扭轉過來。

本文主要從鍾惺〈詩論〉中的核心觀點，輔以國家圖書館藏的《鍾惺評點詩經》來探察其《詩經》評點，主要的內容包括探討鍾惺《詩經》評點對「經學」權威的反動，〈詩論〉的完成時代背景及版本、年代的考察，並闡述成書年代的考察是否真具實質意義。另外也要借用西方詮釋學的概念來檢視鍾惺的〈詩論〉見解，並說明其影響及評價。

關鍵詞：鍾惺、《詩經》、評點、竟陵派、明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生。
到稿日期：2015 年 12 月 23 日。

The Study of Zhong Xing's *Shijing* Opinions

Chao-chun Lai*

Abstract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a prevalent age of annotations atmosphere gained popularity. At that time, many literati to be affected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ind, Neo-Confucianism from Song and Yuan Dynasty, their annotations works reflected personal comprehension, and entrusted their emotions. The literati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beauty of the writings, and looking down 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entences and the words is the atmosphere in that 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annotations of *Shijing* (*The Book of Songs*) formed a upsurge, Zhong Xing lived in the age, his works of annotations was affected with the big circumstance too.

The Ming Dynasty'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ad not obtained better valuation, just because most scholars emphasized the pur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ignor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rts from the criticism and punctuation in Confucian classics. The scholars of Qing Dynasty even lessened Zhong Xin as 'the monster of poem' that standpoint of Defending Conventional Feudal Values, turned back until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Core Issue of Zhong Xing's *Shilu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etry*), and *Zhong Xing's Shijing annotations*,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reaction of Zhong Xing's *Shijing* annotations to the authorities from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ackground of *Shilun*, the investigations on this book's Version, age, and I will expound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rom the research of this book's finish times. Besides, this research borrowed some conceptions of the western hermeneutics to inspect the concepts of Zhong Xing's *Shilun*, moreover, explained his influences and evaluations.

Keywords: Zhong Xing, *Shijing* (*The Book of Songs*), annotations, Jing Ling School, Ming Dynasty

* Post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Dec 23, 2015.

一、前言

就《詩經》研究的發展歷史而言，影響最為深遠，且又堪稱為典範著作的大概就是代表《詩經》漢學的毛亨《傳》、鄭玄（127-200）《箋》、孔穎達（574-648）《正義》，以及代表《詩經》宋學最高成就的朱熹（1130-1200）《詩集傳》。¹至於清代《詩經》學則是呈現多元發展的現象，宗宋、尊漢、漢宋兼採者皆有出色之研究成果，²由於其解《詩》型態非漢學、宋學所能範限，而考據之專精又非歷代所能及，故學者或以為宜另有「《詩經》清學」之稱。³相對於宋代與清代，明代的《詩經》學成果較難以獲得經學史家的首肯，⁴不過，明代仍然出現了幾位自有所長的《詩經》研究者，⁵且若以晚明而言，《詩經》的研究不僅足以稱為蓬勃發展，⁶而且還走出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特色。

在元代之前，三百篇是標準的經典文本，到了明朝，以「文學」點評、詮釋典籍，成為當時文人的風氣，群經中最具文學本質的《詩經》當然也就從帶有教化色彩的聖典，轉而成為深具心靈情味的美學要籍。明代評點之產生，受有科舉制度的影響，⁷蓋自唐代以來，科舉考官的評語，往往加註於答卷之上，

¹ 夏傳才：「《詩集傳》是在宋學批評漢學和宋代考據學興起的基礎上，宋學《詩經》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是《毛詩傳箋》、《毛詩正義》之後，《詩經》研究的第三個里程碑。」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7月），頁172。

² 詳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頁475-602。

³ 洪湛侯：「以義理為特色的『《詩經》宋學』，和以訓詁為特色的『《詩經》漢學』、以考據為特色的『《詩經》清學』一樣，都是不折不扣的經學，只不過治學方法各有側重而已。」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5月），上冊，頁378。

⁴ 《明史》：「有明諸儒，衍伊、雒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譌，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第24冊，卷282，頁7222。皮錫瑞：「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劉敞、王安石諸儒，其先皆嘗潛心注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論疏，稱《周禮》而下《易》、《書》，非於諸疏功力甚深，何能斷得如此確鑿。宋儒學有根柢，故雖撥棄古義，猶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而於注疏所得甚淺。如熊朋來《五經說》，於古義古音多所抵牾，是元不及宋也。明人又株守元人之書，於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憑臆說，楊慎作偽欺人，豐坊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以行世而世莫能辨，是明又不及元也。」〔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11月），頁310-311。

⁵ 馬宗霍：「明人於《詩》，莫不推衍朱子，或申或補，罔或違之。其有主《毛序》抑朱《傳》者，則有袁仁《毛詩或問》，呂柟《毛詩說序》，而朱謀瑋《詩故》，確宗漢訓，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旁摭史傳，季本《詩說解頤》，不襲前人，李先芳《讀詩私記》，折衷眾說，陳第《毛詩古音考》，發明古音之例，亦異乎朱《傳》者也。」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9月），頁135-136。

⁶ 劉毓慶：「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年間，關於《詩經》研究的專著，竟多達六百餘種！比今所知的自漢至元一千五百多年間《詩經》專著的總和還要多！《四庫全書總目》與《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清代到民國的《詩經》專著，總計也不到五百種。由此也可知明代《詩》學研究的盛況了！」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自序〉，頁2。

⁷ 詳見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頁246-257。

顯示對詩文的優劣的看法，至宋明以後，評點風氣漸而濃盛，因此造就了明末前所未見的高峰，多數文人均投入評點行列。

鍾惺(1574-1624)為晚明竟陵派的代表人物，因與同里譚元春(1586-1637)矯七子、公安之弊而名噪一時，是輩倡導獨特的詩論，⁸使「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鍾譚體」。⁹鍾、譚論詩重視的是新變的、直覺的論斷，¹⁰對於歷代舊注和訓詁之學加以摒棄排斥，使得當時以心性、美感出發的「評點」蔚為一股潮流。

《詩經》評點為鍾惺對經學權威的反動，鍾氏以一種「純欣賞」的角度看待這部歷代高舉的典籍，這樣的思潮為當時的讀者找出一條閱讀品評的新路，這與西方接受美學(reception aesthetics)的理念不謀而合；從鍾氏對《詩經》評點的態度，可以看出晚明以文學說經的痕跡，亦可窺見竟陵派的文學思想，對於後人的文學鑑賞實有積極的啟導意義。

二、鍾惺《詩經》評點的成書背景

(一) 時代背景

明代文學思想，此起彼落，蔚為大觀，其卓然成家者，有前後七子與公安、竟陵兩派。以李夢陽(1472-1529)、何景明(1483-1521)為領袖的「前七子」出現於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年間，其文學之主張、表現為復古、擬古；嘉靖(1522-1566)、萬曆(1573-1620)間，文壇又出現了以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為代表的「後七子」，再一次發起復古運動。前後七子振興詩文之舉未竟其功，且引起公安派、竟陵派之反彈。文學史家以為，公安、竟陵兩派為萬曆中葉以後文學思想之主流，其影響至清初始絕。

11

⁸ 錢謙益〈鍾提學惺〉：「伯敬少負才藻，有聲公車間。擢第之後，思別出手眼，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以驅駕古人之上。」〔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1月），頁610。按：「深幽孤峭」為鍾惺所提倡、形塑的詩境，根據游國恩(1899-1978)之說，鍾惺、譚元春其實也主張獨好「性靈」，但更多的卻是乞靈於古人。他們選《詩歸》，以為古人之精神是「幽情單緒」，「孤行」，「孤詣」，這樣他們就把詩文創作引向一條更為狹窄的小路。詳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年11月），下冊，頁1151。

⁹ 〔清〕錢謙益：〈鍾提學惺〉，《列朝詩集小傳》，頁610。

¹⁰ 鍾惺與譚元春分別在《古詩歸》卷前作〈詩歸序〉，鍾惺云：「作詩者之意興，慮無不代求其高。高者，取異於途徑耳。夫途徑者，不能不異者也，然其變有窮也。精神者，不能不同者也，然其變無窮也。操其有窮者以求變，而欲以其異與氣運爭，吾以為能為異，而終不能為高。其究途徑窮，而異者與之俱窮，不亦愈勞而愈遠乎？」譚元春云：「法不前定，以筆所至為法；趣不強括，以詣所安為趣；詞不準古，以情所迫為詞；才不由天，以念所冥為才。」分別見於〔明〕鍾惺、譚元春：《古詩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589冊，卷前，頁351、353。

¹¹ 詳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臺北：作者自印本，1975年8月），頁486-493。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與譚元春同為竟陵派創始者。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人稱鍾提學。¹²在文學主張方面，鍾惺以為讀古人之詩，要得古人之精神，而非襲其面貌，創作要表現個體不與人同的性靈，而非步趨前人，以修正七子派的偏頗。¹³鍾惺居於晚明萬曆（1573-1620）年間，在政治上是一個極為黑暗動蕩的時代，¹⁴而就當時的《詩經》研究大環境而言，宋元以來備受尊崇的朱熹《詩集傳》仍居於主導地位，¹⁵以《詩》為「經」的載道思想仍普遍影響明初的文人。明代科舉考試「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¹⁶其中，《詩》以朱熹的《詩集傳》為主，¹⁷《詩集傳》因此成為明人學《詩》的首要範本。鍾惺也經歷過科舉考試，對於《詩集傳》當然頗為熟悉，其評點《詩經》時，所取讀者即是朱《傳》。其於〈詩論〉自云：

予家世受《詩》，暇日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¹⁸

鍾惺「流覽三百篇」，「意有所得」、「間拈數語」時，在詩文訓釋方面主要是「依考亭所注」的《詩集傳》，不過，在鍾惺眼裡，早已對《詩集傳》的詩篇詮釋產生懷疑：

漢儒說《詩》據〈小序〉，每一詩必欲指一人、一事實之。考亭儒者，虛而慎，寧無其人、無其事，而不敢傳疑，欲盡廢〈小序〉不用。然考亭所

¹²其詳可參〔清〕張廷玉等：《明史》，第24冊，卷288，頁7398-7399。

¹³詳見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頁102-103。

¹⁴明朝萬曆帝貪財獨斷，怠於朝政，使得朋黨之爭在晚明越演越劇，正如清儒趙翼（1727-1814）所云：「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月），下冊，卷35，頁797。孟森（1868-1938）亦言：「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孟森：《明代史》（臺北：臺灣書店，1957年12月），頁268。

¹⁵蘇燾：「《詩經》宋學的主流思想影響一直延及後世，元明以理學開國，故從元至明中期的《詩經》學主流皆追隨朱熹之說。」〈進退於理、心之間—宋明《詩經》學發展中跨越與回縮〉，《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第31卷第1期（2005年2月），頁47。

¹⁶《明史》，第6冊，卷70，〈選舉志〉，頁1693。

¹⁷鍾惺：「國家立《詩》於學官，以考亭注為主。」〔明〕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集部第48冊，《隱秀軒文集》，〈論一〉，頁3，總頁374；〈詩論〉，〔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卷23，頁392。按：本文引用〈詩論〉以此二版本並參，前者簡稱《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後者簡稱《隱秀軒集》標校本。

¹⁸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3，總頁374；《隱秀軒集》標校本，卷23，頁392。

間指為一人、一事者，又未必信也。考亭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考亭之意非以為《詩》盡於吾之注，即考亭自為說《詩》，恐亦不盡於考亭之注也。¹⁹

朱熹所注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而朱氏說《詩》又「恐不盡於考亭之注」，在這樣的情況下，鍾惺在「暇日」之時，取「《三百篇》正文」與《詩集傳》來加以評點，也就成為他平常的休閒活動了。

明朝晚期，在時代風氣的轉變之下，文人對經學產生近乎截然不同的見地，²⁰對於歷來乘著「聖道」翅膀高飛的《詩經》，明人自覺地發展出前所未見的文學鑑賞時潮，鍾惺處於這樣的時代氛圍，對於《詩經》的體悟亦從自身出發，除了對宋朝以來尊為一宗的《詩集傳》產生反思之外，更具體提出《詩》為「活物」之說，開創對《詩經》的新觀點，這是鍾惺《詩經》學的一大特質。

（二）版本及成書年代

鍾惺《詩經》評點之書並無所謂最終改定本，隨著晚明刊刻時期、地點的差異，呈現出不同的內容。據今人侯美珍的考察，鍾氏之《詩經》評點至少有兩個不同時期的版本，流傳刊刻起碼有八、九種以上。²¹鍾惺〈詩論〉自云：

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業已刻之吳興。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覺有異於前者。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詩》者也，難予曰：「過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後已不可強同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²²

「刻之吳興」者乃為初評本，「再取披一過」者則為再評本。「初評本」即鍾惺首次評完交給凌濛初（1580-1644），凌濛初再交給其侄凌杜若之刊刻本；²³再評本所謂「異於前者」者，正表示鍾氏根據初評本進行第二度的補充、修正，或是增入新的觀點；在鍾惺看來，「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是可以「能新之有」

¹⁹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2，總頁374；《隱秀軒集》標校本，卷23，頁392。

²⁰劉毓慶：「明代《詩經》學最有意義的貢獻……，在於這個時代的學者第一次從文學的角度審視這部聖人經典，以群體的力量改變了《詩經》原初經學的研究方向，開創了「《詩經》學」的新航線，並將《詩經》的文學研究推向高峰。」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論明代「《詩經》學」的歷史貢獻〉，《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頁98。

²¹侯美珍：〈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收於林慶彰：《經學研究論叢》第11輯（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6月），頁173-194。

²²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3，總頁374；《隱秀軒集》標校本，卷23，頁392。

²³詳見侯美珍：〈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頁174-175。

的。明人刻書勇於採用新的技術，萬曆之後，有些私人刻書採用了套版，在工藝上大有進步，²⁴而上述二種版本在墨色方面的差別分別是「朱墨套印本」及「三色本」，²⁵內容最大之不同則在於卷首是否冠以〈詩論〉。值得注意的是，侯美珍如是表示：「若再全面考察、比較《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標識為『明凌杜若刻朱墨套印本』的二十三處藏本及標識為『凌杜若刻三色套印本』的十一處藏本，說不定又有出於筆者所論之外者。」²⁶侯氏所引《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為上海古籍於 1998 年出版的藏書狀況，其中之「二十三處」、「十一處」，經筆者比對 2005 年綫裝書局出版《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所列三條鍾惺《詩經》評點的藏書狀況，已分別標為三十一處、四處、一處，這兩種書目的呈現，不論在版本或藏書所在地上均有所歧異，²⁷因此若以侯氏考察為基礎，再至中國各圖書館一一詳考，「出於其所論之外」的情況是極可能發生的。

至若鍾惺《詩經》評點的成書時間，侯美珍提及其見到復旦大學藏鍾評《詩經》三色套印本，卷前所附〈詩論〉後署「明泰昌紀元歲庚申冬十一月竟陵鍾惺書」，由此而認定再評本的成書年代當為泰昌元年（1620）；²⁸筆者從《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之三條資料中，發現其中確有一條亦標示著「明泰昌元年刻本」字樣，²⁹此刻本僅藏於中國湖北省圖書館，蓋此本亦可呼應侯氏所云的「再評本」，即後出本，所以「泰昌元年」所刊刻的版本，當可定為再評本的成書時間無疑。

然而初評本在有限的資料證據中，卻無法確知其完成於何時。³⁰由於凌濛初在〈鍾伯敬批點《詩經》序〉中言及「吾友鍾伯敬，以《詩》起家，在長安邸中，示余以所評本」，³¹研究者乃據文中的「長安邸」，而考察出鍾惺在萬曆四十一年、四十三年、四十四年為停留於北京的三個時段，認為初評本當完成於這三個時段之一。³²不過，筆者以為，若鍾惺評點《詩經》是趁其「暇日」

²⁴陳國慶、劉國鈞：《版本學》（臺北：西南書局，1978 年 6 月），頁 79。

²⁵「三色，指朱、黛、墨三色，經文用墨，以朱、黛二色施之於圈評上。」見侯美珍：〈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收於林慶彰編：《經學研究論叢》第 11 輯，頁 180。

²⁶侯美珍：〈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頁 194。

²⁷《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綫裝書局出版，2005 年 5 月），經部，《詩》類，頁 52、60-61。

²⁸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頁 112。

²⁹「《詩經》四卷，明鍾惺批點，明泰昌元年刻本，八行十七字白口上黑魚尾四周單邊」，見《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經部，《詩》類，頁 52。

³⁰劉毓慶：「鍾氏的《詩經》評點，到底成於何年，今不大清楚。今所知有泰昌元年刊本。據一本前的《詩論》說，他生前最少也有原本與修訂本兩種不同本子。」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頁 346。

³¹《鍾惺批點詩經》，國家圖書館藏十七世紀初明吳興凌杜若刊朱墨套印本，卷前，頁 3。

³²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頁 113-114。案：根據侯美珍的研究，凌濛初之〈鍾伯敬批點《詩經》序〉後雖未署時間，但「長安邸」是一個重要線索。在以往的詩文中，就有以「長安」來泛稱京師的現象，如李白〈金陵詩〉云「晉家南渡日，此地舊長安」，而在鍾惺的詩文中亦不乏其證，《隱秀軒集》卷六有〈十七夜到京看月所寓因題其軒曰僦月〉一

所作(已見前引),則其原始出發點即非傾力不懈以求刊刻之意念,如此批點《詩經》在時間上恐非一時一地完成。當然,初評本之所以能刊刻成書,確是「在長安邸中」鍾惺出示給凌濛初看的已評本,凌濛初讀完再拿給其侄刊刻成書的。是以,初評本在刊刻之前,亦有可能鍾惺早已壓箱許久,待好友來訪才「示」之。若是如此,對其刊刻成書的時間考察是否真有實質意義,恐怕就有待更多證據來為之解疑了。

三、鍾惺的《詩》論

(一) 文學的《詩經》

書目著錄或坊間可見冠以鍾惺評點之作者甚多,姑不論這些著作是否確然皆出其手,³³由其數量之可觀即得以斷定「評點」當為鍾惺個人的長期閱讀慣性。

明代原本即是是評點文學的全盛時期,受自宋代以來理學、心學的影響,加上復古風氣的盛行,使得明人對經文的探求,著重在以義理為主的精神層次,摒棄了訓詁解義的面向。郭紹虞(1893-1984)云:「明人於文,確是專攻。任何書籍,都用文學眼光讀之。」³⁴的確,「經學的文學化」現象,在這個朝代發展得相當透徹,鍾惺處於這樣的時代風潮,賞文、品文的個人習慣也不免受到環境的影響,所以即使是「經」,也將之視之為「文」來體會,這當能令人理解。

德國的詮釋學大師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曾對「理解」提出其「前結構(Vorurteil)至少要包含前見(pre-judice)、權威、和傳統這三

詩:「不見長安月,那知近二年。卜居惟問此,對影已欣然。光在更深後,圓當我到先。清寒真可耐,絕勝買鄰錢。」據鍾惺生平考察,此「長安月」指的是北京的月色,依此類推,凌〈序〉所云的「長安邸」,指的當是鍾惺在北京的住所,以長安舊為京師,故在此詩及凌濛初的〈序〉中用來代指北京。詳見《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頁112-113。

³³按:在古書辨偽史上,鍾惺的評點著作每每引起討論,例如屈萬里(1907-1979)言及《明詩歸》與《名媛詩歸》云:「《明詩歸》,十卷;補遺一卷。題明鍾惺、譚元春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所錄如錢秉鐙《從紀事詩》,首稱「皇帝十四載,仲冬月上弦」,是崇禎辛巳歲也。考鍾惺歿於天啟乙丑,元春亦以崇禎辛未旅卒,何從得秉鐙辛巳之詩而評之?』王士禎以為託名竟陵(《池北偶談》),信不誣也。又《名媛詩歸》一書,題鍾惺編。王士禎(《居易錄》)亦以為坊賈託名為之。說亦可信。」屈萬里:《古籍導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7月),頁101。由於署名鍾惺評點著作之真偽,只能就週邊資料進行推測,故鄭艷玲在概述鍾惺評點之著作時,亦有下述之語:「鍾惺的評點著述真偽相雜,難以辨別。根據《隱秀軒集》的收錄,鍾惺的評點有《詩歸》(包括《古詩歸》和《唐詩歸》)、《詩經》評點、《東坡文選二十卷》評點、《三注鈔》等四種。此外,從評點風格來看,《綰春園傳奇》評點、《韓詩外傳》評點、《合刻五家言》等三種也當為鍾惺所作。畢竟《隱秀軒集》為鍾惺的自選本,其全貌難以窺見,所以,對於各種鍾惺評點本的真偽考證,就成了《鍾惺評點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然而目前資料有限,暫時只能從鍾惺的詩文集、文學思想等方面加以判斷,其他不相符合者,劃入『托名鍾惺評點』一類……。」鄭艷玲:《鍾惺評點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4月),頁43。

³⁴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7月),頁729。

個要素」的看法，³⁵在此，「前見」亦意調歷史上的「前理解」。鍾惺生處明朝末年，《詩經》的發展已累積漢、宋儒者的「前見」，特別又接續由宋朝以來「傳統」及「權威」的代表—朱熹《詩集傳》進入理解的視界；所以，當他在對《詩經》作理解的同時，必然無法拋棄這樣的「前理解」，也就是一種「完全性的前把握或前概念」。³⁶透過這種前理解，「文本和我們的視域被相互聯繫起來。這種關係把文本帶入我們的視域中，並且我們能使自己面對它的提問而表態」，³⁷然後產生「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³⁸視域融合使文本和讀者得到某種共同的視域，也就是讀者能在文本的前理解中再認識文本。

我們可以說鍾惺的「前理解」主要來自朱熹《詩集傳》及當代對《詩經》的觀點，在「視域融合」之下，使他在評點時有了自己的「新理解」。

鍾惺在評點《詩經》時，很少會在各詩之下進行詩篇的解題工作，以筆者手中的明刻本《鍾惺批點詩經》而言，其於〈國風〉160篇中，僅有36篇在篇題之下繫以簡單的主題解釋，比例僅有22.5%，包括〈北門〉、〈二子乘舟〉、〈碩人〉、〈有狐〉、〈木瓜〉、〈黍離〉、〈君子于役〉、〈中谷有蓷〉、〈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緇衣〉、〈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羔裘(〈鄭風〉)〉、〈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薤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墀〉、〈子衿〉、〈揚之水(〈鄭風〉)〉、〈野有蔓草〉、〈葛屨〉、〈揚之水(〈唐風〉)〉、〈椒聊〉、〈無衣〉、〈渭陽〉、〈羔裘(〈檜風〉)〉、〈蟋蟀〉，至於大小〈雅〉與三〈頌〉部份，基本上鍾惺的評點並不涉及主題的解釋，不過，偶亦在評點的內容中觸及對篇旨的意見，例如其於〈小宛〉云：「此詩自是一篇家箴，不獨處亂世宜然。此詩與〈汙水〉同旨……」，於〈谷風〉云：「按說通曰：『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事，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³⁹由此可見，鍾惺的評點興致在於詩的文學創作技巧，在賞析文學時，詩的主題如何未必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此外，〈小宛〉、〈汙水〉等少數詩篇僅在評點的文字中現出鍾惺對於詩旨的判定，

³⁵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223。

³⁶洪漢鼎：「我們對於文本的解釋是必然由一種完全性的前把握或前概念所指導的，這種完全性的前概念是我們前理解的一部份，它是我們一般理解文本的必然條件。」《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頁228-229。

³⁷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頁233。

³⁸加達默爾認為，「視域融合」這一觀點可以用來解釋詮釋學處境，意思就是，「我們自己總是與我們所要理解的傳承物處於相關連的這樣一種處境」。「對這種處境的闡釋，也就是說，進行效果歷史的反思，並不是可以完成的，但這種不可完成性不是由於缺乏反思，而是在於我們自身作為歷史存在的本質。所謂歷史地存在，就是說，永遠不能進行自我認識。」〔德〕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7月)，上卷，頁390。

³⁹分見《鍾惺批點詩經》，國家圖書館藏十七世紀初明吳興凌杜若刊朱墨套印本，頁24、29。

但真正為詩定下題旨者僅在〈國風〉的 36 篇，可見在鍾惺心目中，〈雅〉、〈頌〉各詩的主題更可以不必多加思索，至於在說解詩旨時，他又必然出之以最精簡的文字，這應該是仿《詩序》中「首序」之作法，⁴⁰而其說解是否如張壽林（1907-？）所言之「著語無多，而領會要歸，表章性情，深得詩人之本意」，或者劉毓慶所說的「往往要言不繁，直探驪珠，給讀者以醒目之感」，當然也是仁智互見的。⁴¹以張氏所舉 9 篇、劉氏所舉詩解 13 篇為例，⁴²即使其評點未必皆能深中肯綮，⁴³但仍須肯定從這些詩旨的研判當中，實可探得鍾惺解詩的「揆之性情，參之以理」，盡是含帶個人情感在理解作品，這可謂是鍾惺個人的「新理解」。西方的「讀者反應理論」以讀者為中心的概念是：「文學作品的意義取決於讀者個人的創造性闡釋，作品的意義實際上是讀者的『創造物』。」正如龍協濤所言，「此一論點把讀者對作品意義的創造性闡釋提到批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⁴⁴事實上，作者雖然創造出了文本，但若沒有讀者，作品當然不具任何意義。鍾惺在閱讀評點《詩經》時，將之與所評點其他作品的地位等同看待，作為一個讀者，他並非刻意忽略《詩經》的聖典道統，而是受到閱讀品評的時代氛圍所影響，使得《詩經》評點成為其帶著真實情感的閱讀感受之一。於是在他眼裡，《詩經》就不再是「經」，而只是「詩」，沒有「經典」的枷鎖，⁴⁵而成為實際為讀者存在的純文學作品。再者，鍾惺亦明言：

說《詩》者盈天下，達於後世，屢遷數變，而《詩》不知，而《詩》固已明矣，而《詩》固已行矣。然而《詩》之為《詩》，自如也，此《詩》

⁴⁰按：《詩序》各篇開頭一句之語可稱為〈首序〉，其下申說之語則為〈後序〉。相關名詞的討論可參張西堂：〈關於毛詩序的一些問題〉，張西堂：《詩經六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年 9 月），頁 116-120。

⁴¹分見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7 月），經部，上冊，《詩》類，「張壽林〈批點詩經不分卷〉」條，頁 321；劉毓慶：〈鍾惺《詩》學略論〉，《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5 期（2001 年 10 月），頁 45。

⁴²張氏所舉九篇為：〈有狐〉，思配也；〈木瓜〉，篤友也；〈君子于役〉，閨思也；〈中谷有蓷〉，悲離也；〈葛藟〉，歎依人也；〈采芣〉，有所思也；〈丘中有麻〉，遲所私也；〈有女同車〉，懷佳人也；〈丰〉，失約也；劉氏所舉之例多出 4 篇：〈將仲子〉，淫始也；〈子衿〉，思良友也；〈揚之水〉，畏間也；〈野有蔓草〉，晤好友也，即班荆之意。分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冊，《詩》類，頁 321；劉毓慶：〈鍾惺《詩》學略論〉，《山西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5 期，頁 45。按：鍾惺：「〈丘中有麻〉，遲所私也。」「私」，張壽林誤引作「思」，茲逕改。見《鍾惺批點詩經》，國家圖書館藏十七世紀初明吳興凌杜若刊朱墨套印本，頁 28。

⁴³按：張壽林亦謂鍾惺之批點《詩經》「雖平心揣度，不無臆斷之私，然千慮一失，賢者不免，必謂批點之法，非詁經之體，遂併其書而廢之，是則未免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議也。」《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冊，《詩》類，頁 321。

⁴⁴分別可詳龍協濤兩篇論文，其一，《讀者反應理論》（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3 月），頁 7；其二，《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 年 8 月），頁 13。

⁴⁵如同楊晉龍所言，「『經典』是載錄恆常規範內容的重要文本，『經學』是研究探討『經典』的學問，規範不在現實中落實，就不能成其為規範，『經學』就是探討如何『致用』以『經世』的學問。」楊晉龍：〈楊序·公婆說的都有理纔是經典〉，收於呂珍玉主編：《閱讀詩經》（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 年 10 月），頁 2。

所以為經也。⁴⁶

「《詩》之為詩，自如也」，因為《詩》所收者本來就是文學之詩，在「屢遷數變」之後，自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之所以為被後世學者高抬至「經典」之地位，乃是因為《三百篇》與其他經典一樣，是經過後人不斷地詮釋，最後才能成為一種權威性與超越性的文本，並且取得大多數人的共識，且允許讓人給予多元化的體會而成其價值。⁴⁷這樣的「心得」或「體會」，鍾惺是非常珍視的，所以當他遇到好友凌濛初時，才願意大方出示其詳加評點之《詩經》，希望由此而得到共鳴。此外，鍾惺也承認詩未必都可以解出，有些詩篇甚至毋庸作解，其言：「詩有不可解、不必解，然亦有可解且不可不解者，如〈蜉蝣〉『於我歸處』、『歸息』、『歸說』是也。今人于不可解不必解者，必欲解之；于可解且不可不解者，反置之不解。甚矣，詩之難言也！」⁴⁸這個態度應該是來自謝榛（1495-1575）的啟示，⁴⁹用在三百篇的解讀上，自然有其合理性。

（二）活物的《詩經》

「《詩》，活物」為鍾惺評點《詩經》的中心思想，〈詩論〉開宗明義說：

《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為物，不能不如是也。

50

《詩》為活物，意指三百篇歷史悠久，但卻永遠具有新的生命，也就是說，在「《詩》無達詁」的實際現象之下，⁵¹三百篇的內涵義蘊不斷被後世的讀者生發

⁴⁶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 2，總頁 374；《隱秀軒集》標校本，卷 23，頁 391-392。

⁴⁷黃忠慎：「一部文本是否夠格被稱為經典，不是由某一時代的某一群人來決定的。經典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勢必經由縝密的語言表述系統，經過後人不斷地傳譯、詮釋，最後才能成為一種權威性與超越性的文本，並且取得大多數人的共識。……所謂的權威性、超越性，就如同黑格爾所言，經典是自身有意義的，它可以自我解釋，又如加達默爾所言，『經典是超乎不斷變化的時代及其趣味之變遷的』，經典之所以是經典，就在於它不僅屬於某一特定時代的時間和空間，而且能克服歷史距離，對不同時代甚至不同地點的人說話。也就由於經典內容對於不同時代與地點的讀者可以帶來不一樣的意義，所以經典教育的內涵與實踐方式也是極具彈性的。」〈古今皆釋，通讀大義：以《尚書》的教學為例〉，黃師忠慎：《詩書教學與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 年 9 月），頁 121-122。

⁴⁸《鍾惺批點詩經》，國家圖書館藏十七世紀初明吳興凌杜若刊朱墨套印本，頁 54

⁴⁹謝榛：「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跡可也。」〔明〕謝榛：《四溟詩話》（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1，頁 1。

⁵⁰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 1，總頁 373；《隱秀軒集》標校本，卷 23，頁 391。

⁵¹《春秋繁露·精華第五》：「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出來，也就因為這樣的無限之可闡釋性，才使得三百篇足以成兼具可讀性（readerly）與可寫性（writerly）之經典文本。⁵²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這些前朝各代的「說《詩》」者，即令其具有權威學者的身分，在《詩經》文本之前就僅是「讀者」。有「讀者」，才有「闡釋」，而讀者之立場、解讀之不同，才會帶來不同的闡釋。根據鍾氏的意見，《詩》之為活物，是可以透過讀者的自由——也就是「活」來理解的。《詩》作為「活物」，存在於「可以說」與「不必皆有當於《詩》」的兩極之間；「可以說」是說《詩》的一種基礎，也是讀者闡釋的一種自由。

鍾惺的想法可以從後世西方詮釋學大師加達默爾的理論中得到印證。今人張隆溪在〈經典在闡釋學上的意義〉一文中如此解釋加達默爾的看法：

高達美（按：即加達默爾）以為解釋者與經典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而是相互對話的參與式關係。⁵³

張鼎國（1953-2010）也提出：

對有效的詮釋而言，重要的是發明作品中的「事理之真」，而非追究其原意或原樣如何。……高達美重視的不是「照原意」亦非「照原樣」理解，卻是作品本身蘊含的意義，以及如此意義何以能一再被重新體認而得以流傳分享。事實上，人的思想正和人的詮釋理解活動一般，是無法完全停留在一個只是重複前人已有知識及見解的範圍內，所以「較好地理解」和「不同地理解」終將取代「照原樣理解」及「照原意理解」。⁵⁴

文本與讀者是「相互對話的參與式關係」，人的思想與詮解並非只是沿襲前人之理解，而是「發明」新的理解；因此，《詩經》必然是活物，而讀者的解經也是活的，有多少讀經的人，就有多少解經的看法。

鍾惺除了認為《詩》之文本是活物之外，他也肯定讀者解釋之「活」的必要與意義。前面在探討鍾惺版本時，曾引述過鍾惺《詩經》再評本的產生，他強調「再取披一過，而趣以境生，情由日徙，已覺有異於前者。……後之視今，

館，1983年12月），第181冊，卷3，頁717。按：「奉人」之「人」字，清儒盧文弨校作「天」。

⁵²黃忠慎〈詩經詮釋的流變〉：「可讀性文本是一種固定的自足的現實文本，在其中能指與所指是預設的、先驗的，其關係是明確的，文本的意義是可以解讀的、把握的，讀者不是意義的生產者，而是消費者。可寫性文本則是消解了各種明確的規則和模式，允許以無限多的方式表達和詮釋意義，是一種可供讀者參與重新書寫的文本。它可以被重寫、被再生產、被再創造，其意義和內容可以在無限的差異中被擴散。就閱讀者而言，《詩經》不僅是『可讀』的明確文本，也該是可以產生新義的文本。」黃師忠慎：《嚴粲詩緝新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2月），頁251-252。

⁵³張隆溪：〈經典在闡釋學上的意義〉，收於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年6月），頁8。

⁵⁴張鼎國：〈較好地還是不同地理解：從詮釋學論爭看經典註疏中的詮釋定位與取向問題〉，收於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頁24-25。

猶今之視前，何不能新之有？」依其意見，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對同一部作品的理解會產生差異，因此他「再取披一過」，而覺得「趣以境生，情由日徙」。以加達默爾的理論來看，一種「新的理解」或「不同的理解」是優於前者的，所以後者「終將取代」前者。鍾惺的「活物說」，不僅了解到新時代對《詩經》解釋的新異性，甚至同一個人隨著時間的變遷、視野的不同，也會有新的觀點；因此「前後不可強同」，當然「能更取而新之」。這樣看來，鍾惺的「活物」說與加達默爾的立論十分相似，《詩經》作為一部經典，可以跨越時空，與不同地點的讀者對話，然後發現「事理之真」，進而有一個新的理解，這是鍾惺以《詩》為「活」的最主要意涵。

鍾惺既然以《詩》為「活」，自能不盲從於時人所尊奉的朱子《詩集傳》，他在選輯《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的序文中說：

……紫陽道其正尊一，紫陽乏矣。奚又集古名儒之解曰。不觀眾水之歸，不識滄海之大，不聆八音之奏，不知大樂之成。孔穎達有言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守一家之言而遂謂詩之道，在是豈不陋哉？予故集諸儒之解以補紫陽之未備，俾學詩者匪觀之，將見此解也，彼亦解也，皆有意義。或有觸於興、觀、群、怨，或有感於事父事君，或有得於鳥獸草木之名；精者精之，粗者粗之，則孔子取其義理興道通，而事與詞非，其至之意見矣。苟得此意解可也，不解可也，千百皆解而終無一解可也。⁵⁵

此處明白地道出，解《詩經》不是只有尊「紫陽」為正道，所以「集諸儒之解以補紫陽之未備」，從這裡也可以探得他讀《詩經》時不求甚解的態度：雖然尊經卻不盲從（紫陽），為方便後學詳覽而集各家之解，「得此意解可也，不解可也，千百皆解而終無一解可也」。當然，在每個讀者閱讀各家之解之後，勢必衍生出各人的「新的理解」。這也就是西方詮釋學（Hermeneutics）中所謂的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⁵⁶

鍾惺的詩論，以讀者的感受為上，他以為讀詩「取斷章者」，可以「無損於此」。〈詩論〉云：

孔子，親刪《詩》者也，而七十子之徒，親受《詩》於孔子而學之者也。

⁵⁵鍾惺：《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2月），第65冊，經部，《詩》類，頁6-7。

⁵⁶加達默爾：「誰想理解某個文本，誰就總是在完成一種籌劃。一當某個最初的意義在文本中出現了，那麼解釋者就為整個文本預先籌劃了某種意義。一種這樣的最初意義之所以又出現，只是因為我們帶著對某種特殊意義的期待去讀文本。做出這樣一種預先的籌劃——這當然不斷地根據繼續進入意義而出現的東西被修改——就是對這裡存在的東西的理解。」〔德〕加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頁375。

以至春秋列國大夫，與孔子刪《詩》之時，不甚先後，而聞且見之者也。以至韓嬰，漢儒之能為《詩》者也。今讀孔子及其弟子之所引《詩》，列國盟會聘享之所賦《詩》，與韓氏之所傳《詩》者，其詩、其文、其義，不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而引之、賦之、傳之者乎？既引之、賦之、傳之，又覺與《詩》之事、之文、之義未嘗不合也。其故何也？夫《詩》，取斷章者也。斷之於彼，而無損於此。此無所予，而彼取之。⁵⁷

從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到韓嬰等漢儒之為《詩》者，「有與《詩》之本事、本文、本義絕不相蒙」，又有「未嘗不合」者，《詩》有其多義性，故說《詩》者可以盡依各人之意自由闡釋；「詩」是「活物」，是因著讀者的感受而流動的，所以「斷章取義」是《詩》「活物」的旨歸。

「斷章取義」之說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⁵⁸

盧蒲癸所謂「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凸出了用詩者的主體性，說明了「賦詩言志」時只要引用的詩句與賦詩者當時想要傳達的思想，有著一致性或相似性即可，並不要求它在原詩中的本義，也可以說，用詩者的拋開文本，借題發揮，是可以被接受的，此一概念不是一種純思維，而是春秋時代貴族官宦階層中的用《詩》事實，而這與鍾惺之「活物」說在某種精神層面上也是一致的。說詩者的「前見」、「前理解」是為了創造性的「新理解」而存在，作品是「活」的，讀者也能作「活」的理解，是以「取斷章者」可以「無損於此」。當然，鍾惺這樣的著眼點，讓自己的評點《詩經》過程可以較無拘束、障礙，但其「詮釋效度」的問題亦可能引起後人爭議。⁵⁹

鍾惺認為不同的讀者對《詩經》的接受不同，不應該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所以他認為，「說《詩》者散為萬，而《詩》之體自一，執其一，而《詩》之用且萬。噫！此《詩》之所以為經也」，⁶⁰此語可謂道盡《詩》為活物之真諦。

⁵⁷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 1-2，總頁 373-374；《隱秀軒集》標校本，卷 23，頁 391。

⁵⁸〔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第 6 冊，卷 38，頁 654。

⁵⁹本文審查委員以為，詮釋學有三個導向，作者、文本、讀者。鍾惺以為讀詩「取斷章者」，可以「無損於此」，這是太過強調讀者「斷章取義」的權力，忽略了「詮釋效度」的問題。備之以參。

⁶⁰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 43，總頁 375；《隱秀軒集》標校本，卷 23，頁 393。

（三）趣味的《詩經》

《詩經》既是經典，亦是文學，只要是文學，其來源或本質總帶有些許的遊戲性、趣味性。而且，不僅文學作品有其趣味性、活潑性，讀者在閱讀、欣賞文學時，也往往帶著其原先就有的各種經驗、趣味、素養、理想……來接受文學作品，這是很合理的審美過程。⁶¹在鍾惺心目中，三百篇的特性與價值在其美學成就，本文在前面小幅徵引張壽林評論鍾惺批點《詩經》之特長，此處當作稍為詳盡的徵引。張氏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如此說明鍾惺《詩經》評點的內容：

……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漢儒之拘牽。蓋惺本文士，又為竟陵一派之宗主，故其說《詩》，意在品題。與經生之說《詩》之株守門戶、斤斤於名物訓詁者，固自不同。其於經文之旁，加以卷圈，且各附眉批旁注，以摘發字句，標示語脈。雖不脫時文之習，然其間品題玩味，多出新意，不肯剽襲前人。揆之性情，參之以義理，頗能平心靜氣，以玩索詩人之旨。於篇內微言，詞外寄托，未嘗無所闡發。⁶²

從這段描述當可看出鍾惺在評點《詩經》時所抱持的態度。鍾惺說《詩》，意在「品題」，不在「訓詁」，以「玩索」、「品味」的方式閱讀《詩經》，是一種強調「詩歌」所賦予讀者的美感，從這段記述亦間接說明了鍾惺以文學眼光看待這部經典的事實；「揆之性情，參之以理，頗能平心靜氣，以玩索詩人之旨」，可見閱讀《詩經》對他來說並不枯澀，反倒是輕鬆又富有趣味的。

這樣的趣味始自於鍾惺未曾將《詩》視為「經」的事實，在他閱讀完、評點完之後，大方示予凌濛初，是一種心得分享的喜悅，而凌濛初也予以讚賞自嘆不如。凌濛初云：

吾友鍾伯敬，以詩起家，在長安邸中示予以評本。領會要歸，表章性情，摘發字句，標示指月。為言雖不多，而說詩諸法，種種具備。予讀而快心。

63

鍾惺拿評點完的《詩經》給凌濛初過目，原先並未示意凌濛初為其刊刻出版，

⁶¹若謂文學也是一種藝術，則最流行的學說正是把藝術溯源到遊戲。德國的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便已指出藝術和遊戲的類似。此外，人類的行為，凡是聽任先天本能的支配，並非由於後天生活經驗或教育所引起者，如審美、模仿、遊戲、佔有、表達等，心理學家稱之為衝動。西方很多學者認為人類原始的情感，在本能在具有向外表現的傾向，而向外表現之後才能增加快樂。因此，人類便順應這種本能，用種種方式將內在的情感表現出來，而成為藝術。詳參朱光潛：《文藝心理學》（臺北：開明書店，1975年12月），頁182；王志忱：《文學原論》（臺北：啟德出版社，1972年2月），頁44。

⁶²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冊，《詩》類，頁321。

⁶³劉毓慶：〈鍾惺《詩》學略論〉引凌濛初鍾評《詩經》序言，《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5期（2010年10月），頁43。

初評本的問世，實出自於凌濛初個人的欣賞與喜愛，由此我們更能推得，鍾惺評點《詩經》的心態並非要標舉此書的個人成就以示大眾，而是在「玩味」《詩經》，同時也享受《詩經》為其個人「暇日」時所帶來的樂趣。本文前引鍾惺在〈詩論〉中言及其「取《三百篇》正文流覽之。意有所得，間拈數語，大抵依考亭所注」，其下又有「稍為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疎，省其累，奧其膚，徑其迂」之語，⁶⁴這裡「稍為之」顯現出一種不經之意，只是信手予以品評，而「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疎，省其累，奧其膚，徑其迂」則是其為《詩經》評點所作的貢獻，一種以心之所之的真性情使其「拈數語」在其間，近似於在為整部《詩經》「改作文」，所以凌濛初看完謂其「為言雖不多，而說《詩》諸法，種種具備」，由此可知，《詩經》在歷代學者的詮釋下，雖然早已奠定了其經典之地位，但在鍾惺手裡，便成了一部文學小品總集，可以玩味、可以賞評，澈底顛覆了傳統聖典之形象。

再看《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詩經評》不分卷，明閔氏刊朱墨套印本」條下所云：

明鍾惺評點，是書廢棄一切傳箋注，止就三百篇正文，略拈數語，或著行間，或列欄上，或括題下，語簡而彌雋永，大抵本其所撰詩歸之旨，亦說詩者別一法門也。⁶⁵

鍾惺評點《詩經》，廢棄先前所有的古傳箋注，全由己意出發，就西方詮釋學所言的以他對歷史的「前見」進行「視域融合」，提出對《詩經》的「新理解」；若這種「新理解」能得到凌濛初的首肯，以及後世文人的刊刻流傳，則可以見出他的帶有獨特文學意義的「新理解」，已經得到了其餘讀者的共鳴；也就是說，在他「廢棄一切傳箋注」之後，以隨性的心態品評《詩經》仍能在當時造成推崇或仿效，其評點的語言藝術，就不僅帶有自身的成就，在《詩經》研究史上當然也就帶有創新的意涵。

四、影響與評價

鍾惺為竟陵詩派的代表人物，繼公安派之後，真正為晚明造成一股「性靈」之旋風，對當時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此由前引錢謙益（1582-1664）謂鍾惺與譚元春相互應和，「海內稱詩者靡然從之，謂之鍾譚體」，即可略知一二。鍾譚體能夠吸引眾多的追隨者跟進，堪稱為當年一股極大的效應。我們從今日所見題

⁶⁴鍾惺：〈詩論〉，《四庫禁燬書叢刊》本，〈論一〉，頁3，總頁374；《隱秀軒集》標校本，卷23，頁392。

⁶⁵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7月），〈《詩》類·《毛詩》〉，頁321。

名鍾惺著之《詩經纂注》、《詩經圖史合考》、《名媛詩歸》等書觀之，可以發現內容錯誤訛雜甚為嚴重，即可判定實為訛作，若非當時鍾惺名氣甚大，則書商或文人不曾託其名以牟利，這也是吾人檢視鍾惺分量的一個可以思考的線索。

然而，鍾惺固然在晚明時期可以引領風潮，但在清人眼裡，鍾氏的表現不僅未必值得推崇，甚且對之頗有微詞，例如朱彝尊（1629-1709）引張文寺之說：

伯敬入中郎之室，而思別出奇，以其道易天下，多見其不知量也。友夏別出蹊徑，特為雕刻。要其才情不奇，故失之纖；學問不厚，故失之陋；性靈不貴，故失之鬼；風雅不道，故失之鄙；一言以蔽之，總之，不讀書之病也。⁶⁶

張氏認為鍾惺「學問不厚」、「性靈不貴」、「風雅不道」，實孤陋寡聞；這樣的批評，立基在經學為經、道統為道的立場上。另外，清代對鍾惺發出最大批評聲音者，為錢謙益和顧炎武（1613-1682）兩人。錢謙益說他：

當其創獲之初，亦嘗覃思苦心，尋味古人之微言奧旨，少有一知半見，掠影希光，以求絕出於時俗。久之，見日益僻，膽日益粗。舉古人之高文大篇鋪陳排比者，以為繁蕪熟爛，胥欲掃而刊之，而惟其僻見之是師，其所謂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獨君之冥語，如夢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國。浸淫三十餘年，風移俗易，滔滔不返。……鍾譚之類，豈亦〈五行志〉所謂詩妖者乎！余豈忍以蚓竅之音，為〈關雎〉之亂哉！⁶⁷

對「古人之微言奧旨」、「一知半解」，「舉古人之高文大篇」、「欲掃而刊之」，將鍾惺看為「深幽孤峭」、學識淺薄、論斷偏頗之「詩妖」，這樣的批判是非常直接而強悍的。又，顧炎武似乎承繼了錢謙益的說法，再對鍾惺加重抨擊：

鍾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閒，《五經》掃地。化子衿為錢樹，桃李堪羞；登駟僉於皋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遊。疑為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坐是沈廢於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於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為文人矣。余聞閩人言，學臣之嚮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於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為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為《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舉業至於抄佛書，講學至於會男女，考試至於

⁶⁶ [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8月），卷60，頁21。

⁶⁷ [清]錢謙益：〈鍾提學惺〉，《列朝詩集小傳》，頁611。

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於《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⁶⁸

由此看來，顧炎武對鍾惺的批判更加猛烈，除了對其人品——「挾姬妾游武夷山」表示不滿，甚至以為「病狂喪心」之外，再對他的評論諸作，發出「好行小慧，自立新說」的攻擊。顧炎武對鍾惺批點《詩經》的強烈不滿，肇因於經典在傳統士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諸多的批評應該只是由此而來的情緒延伸。⁶⁹

事實上，錢謙益與顧炎武兩人的說法未免有失公允；排除個人的人品格調不說，就《詩經》評點或著作觀念來看，鍾惺本來就不是將自己定位在一個「經學家」的角色上，既從未高張「道統」的大旗，何來因此使「國乃滅亡」呢？這樣極端的批評，在清代似乎也成為對明人經學認定的一種成見、一股風氣。

然而，清儒姚際恆（1647-1715）一如對朱熹《詩集傳》所發出負面的意見，在當時他也一反錢謙益與顧炎武的看法，而在《詩經通論》中，對於自己針對詩文所加的圈評，也坦承是沿襲竟陵派的作法，只是圈點的重心有異：

《詩》何以必加圈評，得無類月峰、竟陵之見乎？曰，非也。予亦以明詩旨也。知其辭之妙而其義可知；知其義之妙而其旨亦可知。學者于此可以思過半矣。且詩之為用與天地而無窮，《三百篇》固始祖也，苟能別出心眼，無妨標舉，忍使千古佳文遂爾埋沒乎！爰是嘆賞感激，不能自己；加以圈評，抑亦好學深思之一助爾。⁷⁰

姚際恆以為讀《詩》當從「涵詠篇章，尋繹文義」入手，對於「明詩旨」也作出極高的肯定。這與鍾惺的文學、活物、趣味的《詩經》觀正是相互呼應的，姚氏讀《詩》，追尋詩的根本，視三百篇為「千古佳文」，可以「嘆賞感激」，與鍾惺評點的立場相似。

五、結語

明代評點風氣盛行，以文學眼光看待經典在當時可說是一種常態。在傳統觀念裡，明代是經學最衰微的時代，⁷¹因為它最不為「道統」、「聖教」發聲，

⁶⁸〔清〕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4月），卷20，頁541。

⁶⁹村山吉廣：「書店除加圈評在《四書》上外，像孫鑣和鍾惺活躍的明末間，膽敢在《左傳》和《詩經》那樣的五經經典加圈評的學者是極為稀少的。因此，他們的作法，也引起堅持『古之于經傳，敬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誰敢僭而加之評駁』的立場的顧炎武的反感。」〔日〕村山吉廣著，林慶彰譯：〈竟陵派的詩經學——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5卷第1期（1995年3月），頁90。

⁷⁰〔清〕姚際恆：《詩經通論》，收於《姚際恆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6月），第1冊，〈詩經論旨〉，頁11。

⁷¹皮錫瑞：「明時所謂經學，不過蒙存淺達之流；即自成一書者，亦如顧炎武云：明人之書，無非盜竊。弘治以後，經解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而已。其見於《四庫存目》者，新奇謬

並且視「經」為「文」。鍾惺處於明代末年，從其《詩經》評點可以探得竟陵派以「心性」為主的文學立場。

鍾惺從事《詩經》評點工作，其同好不少，但明朝評點《詩經》的學者中，仍以鍾惺的表現最受注重。⁷²本文從詮釋學的「前見」及「視域融合」來看鍾惺〈詩論〉所提出的見解。其中，「活物說」是他對《詩經》評點表現的最重要觀念，每個文人不可能只用一種解釋來盡括詩意，同一個文人在不同時空環境背景之下，對同一部作品也會產生不同理解，所以鍾惺對《詩經》就前後評了兩次；對鍾惺來說，《詩經》是可以用「文學」來欣賞的，解釋是「活」的，評點是「趣味」的。他把《詩經》中的詩，和一般的古詩、樂府、唐宋詩等同看待，於是將「經」的地位轉換成「文」，這也正是後來引發清代某些學者對他抱持負面議論的最大理由。

古之學者通常視《詩經》為高文典冊，三百篇的探討成為經學研究成果中的重要一環，只是，經學研究因為經典文本及其古典解釋失載而欠缺完整性，也存在種種限制，很難形成完整體系，⁷³何況，傳統儒家詩論關注的是作品的合乎正統思想內容，和社會倫理的效果，難免忽視了詩歌的立美過程及審美特質。⁷⁴鍾惺顯然不屬於這一類的儒家詩論者，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鍾惺從來就不是一位經學家，而是一位詩學家或文學家。若謂「詩」是「心之所之」者，則任何文本在鍾惺手中都可以「文」或「詩」的眼光來看待，《詩經》當然也是。所以錢謙益與顧炎武對他發出的批判，實因立場之不同，態度之有異，若能暫時忽略《詩》的經典性，而以三百篇的原詩閱讀，摒棄漢、宋以來的箋注論說，或許《詩經》的閱讀也可以回歸到一個純欣賞的角度，如此，鍾惺的「活物」說就可以讓評點的工作具有意義，而其內容也可以具有語言的藝術價值。

戾，不可究詰。五經掃地，至此而極。」「……元以宋儒之書取士，《禮記》猶存鄭注；明並此而去之，使學者全不覩古義，而代以陳澹之空疏固陋，《經義考》所目為免園冊子者。故經學至明為極衰時代。」〔清〕皮錫瑞：《經學歷史》，頁 303-318。

⁷²戴維曾經表示，明代「思想上以王陽明心學為主，奢談心性，不務實學，最重要的是文學上出現公安、竟陵派，對評點《詩經》更是推波助瀾，當時出現一系列較有影響的著述，如孫鑛《批評詩經》、戴君恩《讀風臆評》、沈守正《詩經說通》、鍾惺《評點詩經》。……數家評點，以戴君恩《讀風臆評》為最著。」但據侯美珍的考察，若以孫鑛、戴君恩、鍾惺三人的《詩》評而論，最常被徵引、最受矚目、最具知名度的其實是鍾惺之作。分見戴維：《詩經研究史》，頁 462-463；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頁 154。

⁷³蔡長林：〈訓詁與微言〉，收於勞悅強、梁秉賦主編：《經學的多元脈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 10 月），頁 167。

⁷⁴尚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1 月），頁 2。

參考書目

傳統文獻

-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收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2月），第181冊。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收於《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5月），第6冊。
- 〔明〕鍾惺、譚元春：《古詩歸》，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第1589冊。
- 〔明〕鍾惺：《鍾惺批點詩經》，國家圖書館藏十七世紀初明吳興凌杜若刊朱墨套印本。
- 〔明〕鍾惺：〈詩論〉，收於〔明〕鍾惺：《隱秀軒文列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集部第48冊。
- 〔明〕鍾惺：〈詩論〉，收於〔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
- 〔明〕鍾惺：《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2月），經部，第65冊。
- 〔明〕謝榛：《四溟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叢書集成初編》本）。
-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月）。
-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0年11月）。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1月）。
-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月）。
- 〔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8月）。
- 〔清〕顧炎武：《日知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4月）。
- 〔清〕姚際恆：《詩經通論》，收於《姚際恆著作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年6月），第1冊。

近人論著—專書

- 王志忱：《文學原論》（臺北：啟德出版社，1972年2月）。
-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7月）。
- 朱光潛：《文藝心理學》（臺北：開明書店，1975年12月）。
- 肖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11月）。
- 孟森：《明代史》（臺北：臺灣書店，1957年12月）。

- 屈萬里：《古籍導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7月）。
- 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5月）。
- 洪漢鼎：《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代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
- 侯美珍：〈鍾惺《詩經》評點的版本問題〉，收於林慶彰：《經學研究論叢》第11輯（臺灣：學生書局，2003年6月）。
-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3月）。
-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9月）。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7月）。
- 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年7月）。
- 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年11月）。
- 張西堂：《詩經六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9月）。
- 陳國慶、劉國鈞：《版本學》（臺北：西南書局，1978年6月）。
- 黃俊傑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一）通論篇》（臺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2年6月）。
- 黃忠慎：《詩書教學與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
- 黃忠慎：《嚴粲詩緝新探》（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2月）。
-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臺北：作者自印本，1975年8月）。
- 楊晉龍：〈楊序·公婆說的都有理纔是經典〉，收於呂珍玉主編：《閱讀詩經》（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年10月）。
- 勞悅強、梁秉賦主編：《經學的多元脈絡》（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10月）。
-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明代《詩經》學史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6月）。
- 劉毓慶：〈鍾惺《詩》學略論〉，《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5期（2001年10月）。
-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論明代「《詩經》學」的歷史貢獻〉，《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 鄭艷玲：《鍾惺評點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4月）。
- 龍協濤：《讀者反應理論》（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3月）。
- 龍協濤：《文學讀解與美的再創造》（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8月）。
- 戴維：《詩經研究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
- 蘇燾：〈進退於理、心之間——宋明《詩經》學發展中跨越與回縮〉，《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第31卷第1期（2005年2月）。

〔日〕村山吉廣著，林慶彰譯：〈竟陵派的詩經學—以鍾惺的評價為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5 卷第 1 期（1995 年 3 月）。

〔德〕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年 7 月）。

《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綫裝書局，2005 年 5 月）。

讀寫示徑：蔣祖怡與一九四〇年代的國文教育*

劉怡伶*

摘要

蔣祖怡（1913-1992），浙江富陽縣人，蔣伯潛之子，畢業於江蘇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曾任浙西三中、富陽簡師的國文教師，後於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及杭州大學中文系執教，並曾兼上海世界書局編輯、編審，以及正中書局《新學生》月刊的主編。

一九四〇年代，蔣祖怡與父親受世界書局之邀，為青年編寫「國文自學輔導叢書」，這套叢書包含經學、文學及語文類，蔣祖怡負責其中的語文讀物，著名的《章與句》（又名《文則》）即見其中，他另撰有「作文自學輔導叢書」、《文章病院》、《文章學纂要》等，指引精進寫作、改善修辭的門徑，如：《章與句》以故事體呈現語法及修辭等知識；《文章病院》則以「積滯」、「軟骨病」、「服飾病」、「興奮病」、「肥胖病」、「瘦弱病」、「殘廢病」、「貧血病」等喻，說明古今人在錯字、成語、文法、虛字及修辭上常出現的弊病，兼含解析與對策，其書寫方式別具一格。

蔣祖怡的語文著作在臺灣有數種翻印本，流傳頗廣，其所揭示的諸多修辭觀點，亦受到中國修辭學領域學者的重視。然而後世對蔣祖怡的既有印象，多停留在文藝理論與中國文學批評史，鮮少有人注意其早年致力語文教育的部分，甚至因政治干擾，使其人與著述被扭曲或刻意消音。本論文即客觀梳理蔣祖怡早年對現代國文教育的建構——尤其著眼於其中的讀寫部分。

關鍵詞：蔣祖怡、國文教育、寫作、修辭、教材

* 本文乃科技部專題計畫「實踐中的反饋：1920~1949 年間中學國語文教材教法的論述」的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2-2410-H-562-002-MY2）。初稿曾在 2015 年 4 月 17 日宣讀於江蘇師範大學主辦「第三屆國際語言傳播學前沿論壇」，本文係會後的修訂稿。修訂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又承蔣紹愚教授提供相關資料並協助釋義，一併致謝。

*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到稿日期：2015 年 12 月 31 日。

Paths to Literacy: Mr. Zu-Yi Jiang and Chinese Education during 1940s*

Yi-ling Liu*

Abstract

Mr. Zu-Yi Jiang (1913-1992), son of Mr. Bo-Chian Jiang, was born in Fuyang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Having graduated from the Wuxi College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Jiangsu (now Soochow University), he became a Chinese teacher of the West Zhejiang Third Senior High School and Fuyang Teacher College. Later, he was appointed to teach at Shanghai Municipal College of Education (now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Hangzhou University. He had also worked as the editor and reviewer of the Shanghai World Bookstore,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a monthly of the Zhengzhong Bookstore, *New Student*.

In 1940s, Mr. Zu-Yi Jiang and his father were invited by the World Bookstore to write and compile a series of books for the youngster, *Chinese Self-Learning Guide*. This compilation covered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ures,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and Mr. Zu-Yi Jiang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 sections. His renowned book, *Chapter and Sentences* (also known as Principles of Writing), was included. He also wrote books about good writing skills and rhetoric including *Writing Guide for Self-Learners*, *Treatments for Problematic Writing*, and *Article Writing Guidelines* etc. In *Chapter and Sentences*, he presented knowledge about linguistics and rhetoric in the style of short stories whereas in *Treatments for Problematic Writing*, he employed medical terms to similize and discuss about common writing mistakes, for example, “sluggish,” “osteomalacia,” “dressing problem,” “excessive excitatory sickness,” “obesity,” “emaciation,” “disability” and “anemia.” Writing in unique writing style, he pinpointed common mistakes in words, idioms, grammar, empty words and rhetoric, and discussed about how to avoid making those mistakes. This book showed his unique writing style.

There were many reprints of Mr. Jiang’s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 books in Taiwan that were very popular. His books revealed many critical points about rhetoric so have earned respect from experts in Chinese rhetoric. However, Mr. Zu-Yi Jiang is now well known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very few people know about his dedication to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 education in his early years. His books unfortunately have been distorted or even intentionally prohibited due to political interference. In this study, Mr. Zu-Yi Jiang’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n his early years was objectively discussed with emphasi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Keywords: Zu-Yi Jiang, Chinese education, writing, rhetoric, teaching materials

* The portion research and results of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on “Feedback during Practice: Discourse o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of Chinese Curriculum for Secondary School (1920~1949)” (Project No: MOST 102-2410-H-562-002-MY2).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St. Mary’s Junior College of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Received Dec 31, 2015.

一、前言

蔣祖怡（1913-1992，參圖一），浙江富陽縣新關村人，蔣伯潛（1892-1956）之子¹，1937年畢業於江蘇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曾任浙西昌化第三臨時中學、富陽簡師的國文教師，後於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²、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及杭州大學中文系執教，並曾兼上海世界書局編輯、編審，以及正中書局《新學生》月刊的主編。

一九四〇年代，國內外戰火頻仍，儘管教學環境及編印的客觀條件欠佳，但蔣祖怡卻不畏艱難，此際有多種語文著述問世，積極推展語文教育。限於篇幅，本文將先集中研討蔣祖怡對修辭學及相關遣詞方法的見解，並以《章與句》、《字與詞》、《文章病院》、《文章學纂要》、《文章技巧的研究》為主要研究文本，因為這些書不但指引怎樣精進寫作、也提出諸多改善修辭的門徑，其所揭示的修辭觀點並受到中國修辭學領域學者鄭子瑜的重視³。

蔣祖怡的語文著作在臺灣有多種翻印本，流傳頗廣，然而後世對蔣祖怡的既有印象，多停留在文藝理論與中國文學批評史⁴，鮮少有人注意其早年致力語文教育的部分，甚至因政治干擾，使其人與著述被扭曲或刻意消音。本論文即客觀梳理蔣祖怡早年對現代國文教育的建構——尤其著眼於其中的讀寫部分。

在進行以下相關研討之前，先疏理「蔣祖貽」其人身分的疑問，因現存的資料常見「蔣祖怡」名字有異稱的亂象，如：一、誤為蔣祖「貽」，例：激流書店1947年印行的《文章病院》，標示了編著者「蔣祖貽」⁵。二、誤為蔣祖「詒」，例：陸立儀《淺論蔣伯潛語文教育改革思想》提到蔣伯潛「與其子蔣祖詒共同編撰課外讀本」⁶。三、

¹ 根據蔣祖怡之子——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蔣紹愚提供的〈蔣祖怡〉簡介，蔣祖怡自幼接受父親蔣伯潛及其友人郁達夫、朱自清、葉聖陶、周予同等之教育和薰陶，於中學階段即常投稿寫小說，還曾擔任浙江省人民代表、作家協會浙江分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副主委。至於蔣祖怡的家屬，妻子是同鄉的沈月秋（1914-1996），其子女有五名，分別是：蔣紹惠（女，原名蔣紹蕙），蔣紹愚、蔣紹恣（女）、蔣紹忠、蔣紹心。另有一子蔣紹錫，抗戰時病死於老家富陽（10歲）。以上，感謝蔣教授提供其父與家人之背景資料。

² 蔣紹愚教授提供的〈蔣祖怡〉，指其父於1945年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任正中書局編審，「兼任新陸師專中文系副教授」。而署名「習之」的作者謂：「1946年任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見習之〈蔣祖怡教授小傳〉，《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5期，頁88。按：筆者請教蔣紹愚教授此事，其云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就在上海新陸村，故「新陸師專」即「上海市立師範專科學校」。

³ 鄭子瑜即肯定《章與句》、《文章學纂要》，例如他特別點出《章與句》一段話：「修辭學只告訴你一個修辭文章的方法，也和文法一樣，是由文章中歸納出來的，而不是預先設立一個修辭學來教別人作文照樣去做的。」鄭子瑜認同蔣氏從既有的撰文經驗歸納出「修飾文章的方法」之修辭學觀念——這是「很有意義的話」，見其《中國修辭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頁616。

⁴ 例如：蔣祖怡《中國人民文學史》（上海：北新書局，1950年；另有上海文藝出版社於1991年印行影印本）、蔣祖怡《王充的文學理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另有臺灣繁體版，由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於1991年印行）、蔣祖怡《文心雕龍論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蔣祖怡《詩品箋證》（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蔣祖怡與陳志樞主編《中國詩話詞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蔣祖怡《中國古代文論的雙璧——〈文心雕龍〉〈詩品〉論文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

⁵ 筆者手頭有兩冊激流書店印行的《文章病院》，一是1947年1月出版，一是1947年11月出版，這一前一後的書，均標明編著者是「蔣祖貽」。

⁶ 陸立儀：《淺論蔣伯潛語文教育改革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頁3。筆者按：蔣祖詒（1896-1973）係浙江著名藏書世家蔣氏「傳書堂」之後人，乃藏書家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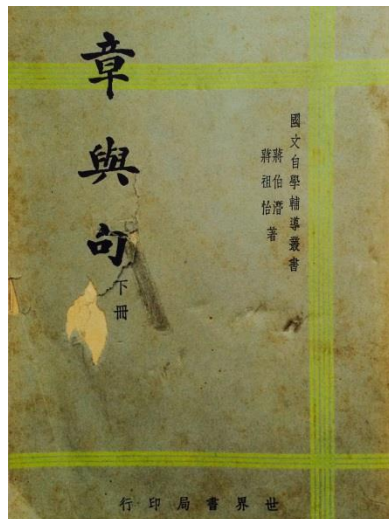
與另位「蔣祖怡」相混，如：大陸「百度百科」之「蔣祖怡」詞條之附圖誤植為文化界名人蔣復璁之幼子⁷。這些名字，或因出版社刻意形誤⁸、或研究者一時不察、或因同名牽連，而與「蔣祖怡」本尊相混。本文所研究的對象，係指蔣伯潛之子蔣祖怡，而非上述的蔣祖貽、蔣祖詒或蔣復璁之子。

二、蔣祖怡的著作概述

蔣祖怡在一九四〇年代致力編寫語文著述，曾與父親蔣伯潛受上海世界書局之邀，為青年及中學生合寫「國文自學輔導叢書」十二冊，這套書首度發行時，父子聯名各冊（見圖二：《章與句》初版封面書影，右上並列兩人名字。），蔣伯潛還寫了一篇序文說明發行這套適用自學、有系統的課外讀物之動機及經過，他特別提到兒子在成書過程的角色：「材料之蒐集，意匠之經營，文字之推敲，則兒子祖怡臂助尤力。」⁹該套叢書後來在臺灣多次再版（原書局部內容，因現實政治之顧慮亦有所刪節，詳後述），而臺灣的世界書局又調整了作者名字，僅標「蔣伯潛」一人，蔣祖怡名字則不復見。



圖一：蔣祖怡像
（感謝蔣紹愚教授提供照片）



圖二：《章與句》書影
（世界書局 1940 年初版）

汝藻（1877-1954）之子。根據蘇精的研究，蔣祖詒「字穀孫，也精於圖書板本學，來臺後擔任臺灣大學教授，輯『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一書。」見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3年），頁209。

⁷ 蔣復璁（1898-1990），係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首任館長，服務央圖三十餘年，後又任職故宮博物院院長逾十七年，並於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其育有三子二女，其中，蔣祖怡是其幼子。蔣祖怡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槃先生的助理。關於蔣復璁及其子蔣祖怡的背景，詳參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蔣祖怡〈先生之德，山高水長——記先父蔣復璁先生的生平事蹟（一）〉，《傳記文學》第93卷第5期（2008年11月，總號第558號），頁4-23。

⁸ 激流書店的版權頁並無黏貼如海天書店1940年印行《文章病院》所附之版權票，有可能是私印，故不敢明目張膽地印出「蔣祖怡」的名字，只好改以字形相似、字音相同的「貽」字混淆。

⁹ 蔣伯潛：〈自序〉，《章與句》（上海：世界書局，1940年初版），下冊，頁3。

據蔣祖怡於 1987 年所寫的〈先嚴蔣伯潛傳略〉，此套書由他負責的是：《字與詞》（上、下兩冊）、《章與句》（上、下兩冊）、《駢文與散文》、《小說與戲曲》、《詩》、《詞曲》八冊；而父親蔣伯潛主筆《體裁與風格》（上、下兩冊）、《諸子與理學》、《經與經學》四冊。蔣祖怡說：

初中六冊，均用小說形式編寫：《字與詞》、《章與句》、《體裁與風格》（均為上下冊）。高中，六冊不用小說形式：《駢文與散文》、《小說與戲曲》、《論詩》、《詞曲》、《諸子與理學》、《經與經學》。其中《體裁與風格》（上、下）、《諸子與理學》、《經與經學》均為先嚴手撰。這一套課本由世界書局於 1939 年至 1940 年間陸續出版，現在尚在臺灣流行，有的多至 13 次印刷，《論詩》一書於 1986 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重版。¹⁰

其中，《章與句》，蔣祖怡後來修訂了部分內容，並另題《文則》，由黃山書社於 1986 年出版¹¹。從《章與句》到《文則》，蔣祖怡嘗試用小說故事的形式，闡述寫作原則與修辭知識。

筆者 2015 年 9 月赴北京諮訪蔣紹愚教授，其特別提到祖父與父親採故事體的書寫特色，而小說人物之原型、地點場景的塑造，部分源於自家人及切身的生活經歷。例如《字與詞》裡的周伯臧，其原型即蔣伯潛，蔣紹愚解釋：「他從小喪母，繼母對他不大好，是祖母把他撫養大的，所以書中祖母去世那一章是很真實的。書中提到伯臧的異母弟，先祖父確有一個異母弟，叫蔣仲超，先在中學教書，後來從商，在上海時和我們家住在一起，關係很好。」此外，書裡寫到對人生看法與寫「撞鐘主義」，蔣紹愚說這都是蔣伯潛的真實思想，書中周伯臧熱愛教育、厭惡官場文化、鄙視商人，亦是從小熟知的印象。至於《體裁與風格》裡的尹莘耜，其實也隱藏蔣伯潛的名字，因為其小名即「尹耕」（取意於《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故事裡的「宗貽」即蔣祖怡、「月仙」即沈月秋（蔣祖怡之妻，字逸仙）、「錫官」即蔣紹錫（蔣祖怡之子）、「蕙官」即蔣蕙官（後改為蔣惠官，蔣祖怡之女），而「愚官」即蔣紹愚教授本人。至於地點的構築，以《體裁與風格》為例，其中的葫蘆谷，其原型是家鄉富陽的一處偏僻山區神功山，彼時因躲避戰禍而在那裡住過一陣子，此處原是蔣伯潛弟子張堃老家；還有書中說尹莘耜跌斷了腿，蔣紹愚表示其祖父確實也跌斷過腿，但此事發生在富陽老家而非神功山。

此外，蔣氏父子亦為正中書局編寫「國學彙纂叢書」十種¹²，其中《文章學纂要》、《詩歌文學纂要》、《史學纂要》由蔣祖怡執筆¹³。「作文自學輔導叢書」，則是蔣祖怡

¹⁰詳蔣祖怡：〈先嚴蔣伯潛傳略〉，收於蔣伯潛《校讎目錄學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年）附錄，頁 178。

¹¹增刪幅度最大的是〈思想與想像〉這一章，其將原先所提到的俄國文藝作家思想，如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夫退益夫斯基的思想及高爾基標榜的新寫實主義，移出《章與句》。

¹²據〈國學彙纂編輯例言〉，這十種是：《文章學纂要》、《文體論纂要》、《文字學纂要》、《校讎目錄學纂要》、《詩歌文學纂要》、《小說纂要》、《史學纂要》、《諸子學纂要》、《理學纂要》、《經學纂要》。

¹³詳臺北的正中書局於 1957 年印行蔣祖怡編著《文章學纂要》（修訂臺二版，該版原據 1942 年重慶〔渝〕初版）所附之〈國學彙纂編輯例言〉。父子各負責哪幾冊？按蔣祖怡自己的說法：「《文章學》、《史學》、《詩歌文學》三種，由我撰寫。」，餘七種則由父親「親自撰寫」（見其〈先嚴蔣伯潛傳略〉所記，頁 180）。然蔣紹愚教授提供的資料，把《小說纂要》列為蔣祖怡之作；而筆者擁有的《小說

個人接受世界書局主編陸高誼之提議，在與陸氏多次商討後而編寫設計，原稿曾試驗於蔣祖怡任教的學校，因學生進步顯著，故印行分享。該套書計六冊：《記敘文一題數作法》、《描寫文一題數作法》、《論說文一題數作法》、《抒情文一題數作法》、《文體綜合的研究》、《文章技巧的研究》¹⁴。

值得一提的是，蔣祖怡在 1940 年曾撰一冊專講易犯的寫作弊病——《文章病院》，該書流傳頗廣，海峽兩岸均有數種版本（詳後述），全書分十章，前九章是：〈文章的疾病與衛生〉談文章的要素；〈文章的癥結〉談用字；〈文章的積滯〉談用典；〈文章的軟骨病〉談詞性與文法；〈文章的服飾病〉關切標點符號；〈文章的興奮病〉、〈文章的肥胖病與瘦弱病〉均涉及修辭問題；〈文章的殘廢病〉則論文章的構造；〈文章的貧血病〉談的是內容與辭藻。最末的第十章乃〈文章的總治療〉，主要藉由觀摩他人的文本，一方面複習前九章所提示的觀點及作法，另一方面亦可藉以系統地自我試驗。此書舉出許多古今中外的實例，講解錯字、不當用字、不通、謬誤、重複、累贅、晦澀之句、思想淺薄或矛盾等寫作上的各種問題，既點出致誤的現象及原因，亦仔細說明如何改正，使讀者清楚知道改正的理由，以避免重蹈覆轍。

蔣祖怡於 1946 至 1948 年間亦為上海的正中書局主編《新學生》月刊¹⁵，這份面向中學師生及青年讀者的課外讀物，包括「中學教材研究」、「學習方法討論」、「新書介評」、「學生原地」等題材。蔣祖怡身為編輯也寫稿¹⁶，如：〈文藝與敏感〉（1 卷 2

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87 年臺初版第六次印行）亦署蔣祖怡編著。為何蔣祖怡本人未認寫《小說纂要》，而正中書局卻認定出自蔣祖怡之手，箇中原因待考。筆者推測，蔣祖怡〈先嚴蔣伯潛傳略〉寫於晚年的 1987 年，年老誤記不無可能，或該書受父親指點較多而不居功。

¹⁴ 〈作文自學輔導叢書編輯凡例〉將《文章技巧的研究》誤植為《作文技巧的研究》。按：這套叢書，各冊之版權頁均未註明出版時間，且紙張較為粗造，今據主編陸高誼之言：「在此物力維艱的時候。」（〈主編者言〉，《文章技巧的研究》，頁 1），以及版權頁署發行人「李煜瀛」，大致可判斷「作文自學輔導叢書」應是一九四〇年代的出版品，且至遲不晚於 1946 年問世。一九四〇年代時值對日戰爭，國難當頭、物力維艱，印務日益困難，故這時期的書刊，紙質及印刷多顯粗劣、書刊拖期或中斷印行，時有所聞，例如《國文雜誌》因戰事而脫期，編輯致歉說：「我們最先要向讀者諸君道歉的，就是本刊不能如期初版。固然在戰時排印一本雜誌，要比平時困難些，但我們沒有能夠以最大的努力來克復重重困難，這是應該由我們來負責的。這次因為脫期過久，所以把四、五期合併刊行。」見〈編者的話〉，《國文雜誌》第 1 卷第 4、5 期（1943 年 3 月），頁 37。又，曾在世界書局工作二十餘年、擔任經理的朱聯保回憶：「1946 年起，該書局出版物上刊用發行人李煜瀛字樣。」（〈關於世界書局的回憶〉，收於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 卷，現代部分，頁 256。）而蔣祖怡這套書上的發行人名字也正是「李煜瀛」。另，臺灣的文致出版社於 1973 年曾翻印《文章技巧的研究》，書名並略稱為《文章技巧研究》，一併繫此備參。

¹⁵ 蔣祖怡主編《新學生》之時間起迄，係依版權頁註記，自第 1 卷第 1 期 1946 年 5 月起至第 4 卷第 4 期 1948 年 2 月止，均署編者蔣祖怡名字。但自第 4 卷第 5 期起，蔣祖怡已不見其名，而改換「新學生月刊社」，此概稱直至第 6 卷第 3 期（1949 年 1 月）終刊。筆者又按：《新學生》月刊後期，自蔣祖怡卸任後，接續的主編人似乎變動不定，根據最末一期的〈編後記〉所言：「本月刊原定每月十五日出版一期。但本期脫期多日，有負愛讀者之企待，殊為歉疚。緣本刊主編人半年來頗有更迭，自本期起又因洽聘特約主編，以致寄稿輾轉稽延，又以京滬局勢動盪不安，各方面多受影響，編排校印刷比較費時。現六卷四期（印二月號）稿亦同時付排，可望不日出版。」（詳見〈編後記〉，《新學生》6 卷 3 期，1949 年 1 月，頁 42）但筆者覆按上海圖書館館藏資料，顯示該刊最後原訂發行的第 6 卷第 4 期似因局勢動盪而無疾而終，上圖僅收藏至 1949 年 1 月的第 6 卷第 3 期。

¹⁶ 蔣伯潛亦是《新學生》作者群之一，且父子兩人均集中談論閱讀及寫作議題，如：蔣伯潛的〈國文是什麼〉（1 卷 1 期）、〈童年學習國文底回憶〉（1 卷 5 期）、〈詩文中所抒寫的感情之一——「傷逝」之情〉（4 卷 1 期）。又，正中書局 1946 年「為激勵青年利用暑期自學進修並紀念葉公楚愴起見，由新學生月刊社主辦葉公楚愴紀念獎金徵文比賽」（詳見〈本刊擴大徵文啟事〉，《新學生》第 1 卷第 5 期，1946 年 9 月，頁 84），蔣伯潛還擔任徵文比賽的評審委員。《新學生》月刊由具國民黨色彩的

期)、〈論文章的感染性〉(1卷5期)、〈我國古代的神話與傳說〉(1卷6期)、〈人類的語言〉(3卷1期)、〈中國語文的孳乳〉(4卷1期)等。《新學生》因有各地(包含：臺灣在內)正中書局的配合發行，故銷行廣遠，影響亦大。

以上，是蔣祖怡於一九四〇年代在國文教育上的具體表現，他多從「輔導自學」角度，建立對讀寫方面的觀念及實踐原則。唯《文章病院》、《章與句》等書後來在臺灣多次印行，卻也衍生了內容增刪不一、作者名字張冠李戴的現象。

趙元任回憶清華國學院知名學者陳寅恪常對人說：「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¹⁷故在研究蔣祖怡的相關議題時，筆者將先至關重要的基礎材料，以實事求是態度進行文獻的整理，進而去思考蔣祖怡致力國文教育的意義。以下，舉《文章病院》為說。

截至目前所能掌握的《文章病院》版本，在臺灣地區，有：

啟明書局(1960年，作者署「蔡巧因」)

大漢出版社(1981年，作者署「蔣黎光」)

書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作者署「夏丐尊」)

遠流出版社(1978年，作者署「蔡巧因」，書名換為《文章醫院》)

大陸地區，有：

激流出版社(1937年1月及11月兩種版次，作者署「蔣祖貽」)

海天書店(1940年，作者署「蔣祖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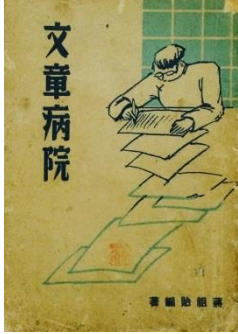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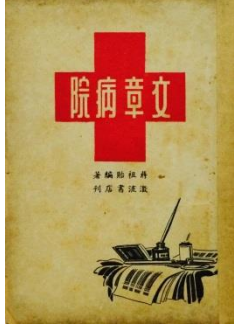
為便討論，茲先表列各版異同及筆者正誤註解，如下二表：

正確	
蔣祖怡	蔣黎光
海天版	漢光版
	
1.書名又稱《怎樣糾正文字的錯誤》。 2.附有作者用印的版權憑證。 3.書末有校訂者「侯定遠」的跋文。	1.作者署「蔣黎光」。按：黎光是蔣祖怡的筆名。 2.列為「作文暨讀書叢刊」。

正中書局印行，社長即國民黨政要「葉溯中」，故該社舉辦以紀念同為國民黨要人葉楚傖(葉氏於1946年2月病逝於上海)的徵文比賽也是可以理解的。

¹⁷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收於俞大為等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頁27。

表一：各版《文章病院》比較表之一

錯誤			
蔡丐因		蔣祖貽	
啟明版	遠流版	激流版	
			
			
1.省略第十章。 2.目錄之每章另增提要性質的副題。 3.列為「讀書作文入門叢書」之一。	1.書名換為《文章醫院》。 2.列為「遠流青少年百科全書」第3輯。	1.第一種封面以人物的伏案閱讀及寫作為設計特色。 2.第二種封面以醫療救治的「紅十字」為設計特色。	1.封面及版權頁均誤為「夏『丐』尊」（應為夏『丐』尊）。 2.序文末尾署撰者「蔡丐因」，且調整了若干字句。

表二：各版《文章病院》比較表之二

以上，臺灣的大漢出版社，署蔣祖怡之筆名——「蔣黎光」，並重新打印文字及排版。而啟明書局及遠流出版社，竟把寫序的「蔡丐因」誤為作者了，蔡丐因是蔣伯潛的老友，1938年蔣伯潛應蔡丐因等人之邀，到上海大夏大學、無錫國專（時該校已遷至上海）教書，並兼任世界書局特約館外編審。蔡丐因與蔣伯潛熟識而為其子蔣祖怡著作寫序。此外，兩家出版社亦將蔣祖怡原書的第十章刪除。

《文章病院》第十章專收《中學生》等書刊曾解剖及救治的病患¹⁸。所援患者之例，均轉錄他刊，非出於蔣祖怡之筆；又，部分取材離臺灣青少年讀者的生活經驗較遠，且觸及若干敏感的政治議題如〈今後《申報》努力的工作〉，此或遭刪之局部底

¹⁸患者計有：〈今後《申報》努力的工作〉、〈《初級中學國文教本》編輯條例〉（以上原載《中學生》「文章病院」專欄，後收入《寫作的健康與疾病》）。〈開河〉、〈姊姊的死〉（以上原載《中學生》「文章修改」專欄）。〈刺激與希望〉、〈生產消費對於國計民生的關係〉（筆者按：〈生產和消費對於國計民生的關係〉，以上兩文原載《青年週報》「作文批改」專欄）。蔣祖怡引用的這些文章，在出處方面，僅略註書刊名，未詳列具體出版項，筆者回查原刊，其詳細出處如下：〈開河〉，嵇汝運原作、葉聖陶修改，《中學生》「作文修改」第71號（1937年1月）。〈姊姊的死〉，《中學生》「作文修改」專欄第73號（1937年73月）。〈刺激與希望〉，原作者待查、胡山源批改，《青年週報》第12期「作文批改」專欄。〈難中所見的一頁〉，朱緯原作、胡山源批改，《青年週報》第13期「作文批改」專欄。〈回鄉的途上〉，戴君原原作、胡山源批改，《青年週報》第14期「作文批改」專欄。〈生產和消費對於國計民生的關係〉，陸鳳池原作，胡山源批改，《青年週報》第18期「作文批改」專欄。又按：受限《青年週報》原刊掌握不足，目前僅能利用已知之第50期所載第一卷（1-50）總目索引，先確認部分原作者及修改者的身分，至於各自的出刊時間仍待補，但以上各篇不晚於1939年3月出刊的第50期。

蘊。至於書銘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誤為「夏丐尊」，恐因開明書店編輯夏丐尊、葉聖陶等人，曾於一九三〇年代在《中學生》雜誌推出「文章病院」專欄，因「同名」而一時不察致誤。以上臺灣諸版似皆自行翻印，不見蔣祖怡授予的相關憑證（如版權票，詳後述）。尤有甚者，上海的激流書店以「蔣祖貽」相混，以規避私印的行徑，且或因銷售不錯，故同一年度還先後印了兩次（封面更換）。

目前所見最早本子為上海「海天書店」的《文章病院》（又名《怎樣糾正文章的錯誤》），書前有「蔡丐因」的序文，書末則有校訂者「侯寄遠」的跋文¹⁹。侯寄遠表示：

「文章病院」，許多的病體，都是經過內科外科各異的手術的，這些手術，醫生一著者並沒有賣祕訣，都盡量地告訴了我們，意思是叫我們自己的缺點來，老子說「勇者自克」。青年人尤其要有這種勇氣。²⁰

又云：

我希望著者再來辦一所「文章美容館」使讀者得更進一步，研究求美的方法，眼睛不美怎樣使他美，鼻子不正怎樣使他正，總之是要使去了病象的人，又增加了美的條件。我想人類都是有愛美的心理的，為一切藝術產生的泉源，要發這泉源，當從人人必須要寫作的文章來開始。這是我校定這本書後的一點意見。²¹

侯於文末署時間「二十九年雙十節」，而版權頁所標示的發行日期是「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至於這個版本的蔡丐因序文，文末僅署名卻略去了蔡文原有的落款日期，筆者在稍後出版的上海激流書局所印《文章病院》裡，看見蔡氏署簽日期為「二八，八，一四」。故雖無蔣祖怡個人直接的成書經過說明，但比對目前所能掌握的局部版本，大致可推定：《文章病院》至遲應在民國二十八年蔡丐因寫序之前即完稿。

海天書店是目前所能覓得的較早本子²²、又經侯寄遠校訂、內容也較完整（臺灣有些版本，略去第十章〈文章的總治療〉），又版權頁黏貼一張印有「月壽」字樣的小紙片（參圖三），乃作者蔣祖怡授予的憑證——版權票²³，故本文所據引的《文章病院》，

¹⁹侯寄遠係國民黨黨員，曾任中學校長、教育部蘇浙巡教團視察，以及具工會背景，根據《上海時人誌》介紹：「侯寄遠先生，年三十五歲，浙江諸暨人，上海法政大學畢業，曾任上海曉光中學校長，中華海員黨部上海區黨部書記長，中華海員工會上海分會主任委員，教育部蘇浙巡教團視察，杭市戰區主任督導員等職。現任第七區區長，並兼中華海員黨部執行委員，上海市參議員。吾國海員，為數至多，以其飄洋涉海，得風氣之先，思想咸多前進，而極富向上意識，故對國民革命之貢獻極巨，實為國民黨之有力黨員，而能發生領導作用者，先生即其一也！」繫此備參。詳戚再玉主編《上海時人誌》（上海：展望出版社，1947年），頁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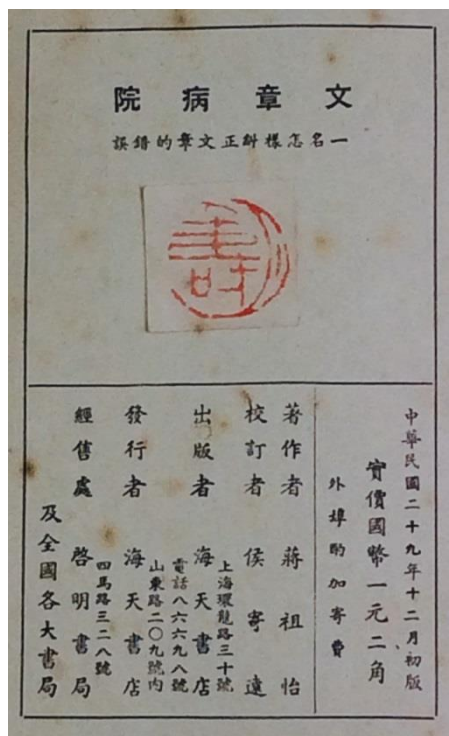
²⁰侯寄遠的跋文，見蔣祖怡：《文章病院》（上海：海天書店，1940年），未繫頁碼。

²¹同前註。

²²值得注意的是，海天書店印行之前似已存在更早的書稿或本子，因為侯寄遠說校訂這本書之後，另有設置「文章美容館」的構想，顯然侯氏所校應有所本，且海天書店把蔡丐因序文原先註記的日期省略沒有印出。但其他稍後的《文章病院》版本則重現了日期。這意謂在海天書店之外，或許另有較早之書稿或本子存在，但受限文獻掌握不足，仍待深考。

²³這是徵信的作法、保護著作者的權益，作者即可據以向出版社收取版稅，若市面發現同書而未貼，即出版社夾帶私售。誠如賈俊學所言：「版權票又稱版權證，它是作者與出版者互相制約的一種方

以海天書店本為主。



圖三：海天書店《文章病院》版權頁上方
黏貼蔣祖怡的「月壽」字樣（白底紅印）憑證

三、國文的定義

關於「國文」，一般認為國文課內容是無所不包、什麼都有，蔣祖怡即認為「國文的範圍很大，從幾個字的選擇，一直到各種專門學問的研究都在其內」²⁴。就教育部頒布的課程標準，小學階段稱「國語」，初高中以上多稱「國文」，以致於一般人誤會是因小學全教語體文故稱「國語」，中學語體文漸少而文言文漸增故稱「國文」。蔣伯潛認為語體文「只是用口語體寫成的文字，決不能說它仍是語言，而且也決不能與語言完全一致的。所以『語體文』仍是『國文』而非『國語』。」況且若小學稱國語，中學稱國文，「頗有把語體文、文言文分別高下的嫌疑，那更不妥當了。」²⁵其子蔣祖怡也認為語體文、文言文都屬於「國文」，「白話文和文言文雖然有着形態上的不同，實際說起來只要傳達的效果相同，便根本不能互分軒輊。」²⁶、「文言文和語體

式。也有的是出版者自家印刷以防盜印，另外也有稅務單位控稅的作用。」見賈俊學編著《衣帶書香：藏書票與版權票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33-134。

²⁴蔣祖怡：〈孤兒之淚〉，《章與句》（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三版），上冊，頁6。按：除因部分觸及版本，蔣伯潛序文而引用上海世界書局1940年的初版（筆者僅掌握了下冊，不能滿足研究之需），其餘則以臺灣世界書局於1977年發行的上下兩冊為據。

²⁵蔣伯潛：〈國文是什麼〉，《新學生》第1卷第1期（1946年5月），頁22-23。

²⁶蔣祖怡：〈語體文和駢散的比較〉，《駢文與散文》（上海：世界書局，1941年），頁135。按：雖然文言文、語體文是不同的文體，本難以比較，不過，蔣祖怡曾粗略地分出六項不同點：一、詞之單複的不同、代名詞之不同、連詞之不同、介詞助詞之不同、語調之不同、詞性的變化。以上，詳蔣祖怡〈文言文與語體文之比較〉，《文章技巧的研究》，頁123。

文並無優劣可分的，文言文是古代的文字，我們也得學習它；語體文是近代通行的文字，我們更要學習。」²⁷那麼，究竟哪些內容可劃為國文的範疇？蔣氏父子答案是：文字與文章。

蔣祖怡在《章與句》裡化身為國文教師「李亦平」，解釋何謂文字、文章，說：

文字，便是字和詞的認識，每個字有每個字的意義，中國有專於研究字的學問叫做「小學」，又叫做「文字學」；這裏面專於討論每一個字的組成和音讀的。例如中國的「國」字照理便是「或」字，「口」代表疆域，「戈」是表示守土的兵士，後來「或」字借做虛字了，便在「或」字上面再加一個圈子。²⁸

對文章，則指：

本來「文章」的旁邊應該加上這三撇的（筆者按：即「𠂔彰」），說是有文彩的意思。從文字組成了句語，再由句語組成了文章，整篇文章的好不好，有好多個條件：第一是句子通不通，第二是句子安排得好不好，第三是標點和段落，第四是整篇結構和思想；讀別人的文章，正可以作自己作文時的參考。²⁹

蔣伯潛對文字也說：

「文字」，是教學生識字。所謂識字，須熟識文字底形體，不至於寫別字錯字；能讀出文字底聲音，不至於讀錯；須明瞭文字底意義，不至於誤解誤用；並須知道複詞底組織和變化，詞類底分別和活用。文字底教學，雖然不必使學生個個都懂得文字學，而且以龜甲文、鐘鼎文、大小篆等古文字教授學生，但是國文教師必須有文字學底素養和常識。中小學生雖然不必把所有的文字都認識，但常見常用的文字，必須能寫、能讀、能解、能用。³⁰

對文章，亦云：

「文章」，是教學生讀文章，做文章。換句話說，就是要養成學生底閱讀能力和發表能力。我以為中學畢業生應有閱讀語體文和平易的文言文的能力，應有寫作明白曉暢的語體文的能力。教學文章，便須使學生明瞭語句篇章底組織，文章底體裁，修辭底方法。所以國文教員必須有文法、文體論、修辭學底素養和常識。³¹

蔣伯潛總結對文字、文章的看法：

凡是寫在紙上，以一個形體代表一個聲音，一個或一個以上形體代表一個意義的，都叫做「文字」。用許多文字組成語句，用許多語句組成篇章，藉以寫記景物，敘述人事，表達情意，記錄語言，便叫做「文章」。從幼稚園識字教學起，一直到中學大學，閱讀習作洋洋千言的大文章，都可以稱為「國文」。³²

²⁷蔣祖怡：〈語氣〉，《章與句》，上冊，頁40。

²⁸蔣祖怡：〈孤兒之淚〉，《章與句》，上冊，頁6。

²⁹同前註，頁6-7。

³⁰蔣伯潛：〈國文是什麼〉，《新學生》第1卷第1期（1946年5月），頁27。

³¹同前註。

³²同前註，頁24。

此外，蔣伯潛不喜歡別人稱他為「文學家」、「國學家」，他直言教了二十多年的國文，是「老教書匠」——「教國文的，怎麼便會是文學家、國學家呢？」他自嘲這好比「驢頭不對馬嘴」³³。更直接表明：「中學國文科，教學的是一般的『文章』，不是純粹的『文學』。」³⁴從蔣伯潛對國文教師的任務認知，以及「老教書匠」自居及與兒子合寫輔導叢書，可知蔣氏父子基本上認為「文章」不等於「文學」、「國文」和「國學」也不同，雖彼此間有些聯繫（文學亦是由文字組成語句篇章，也算是文章），但就狹義的性質功用，頗見差異。儘管如此，國文教學仍可納入純文學的教材，但蔣氏父子以為那是在熟習遣詞造句、謀篇成章及瞭解文章大概變遷之後，即文字及文章的教學有成，才去欣賞歷代的純文學作品。

蔣祖怡與父親主張國文教學應循序漸進³⁵，首重從文字及文章的形式去習得理解與發表的能力，因此國文科最應著眼以下四項：一、教導文字學，以正確識字及活用詞類；二、教導文法常識，以明瞭語句的結構及變化；三、研究文體論，以研討篇章的組織結構；四、接觸修辭學，以正確使用修辭的技巧。

四、強調課堂外自學

具多年國文教學經驗的蔣伯潛，在一九四〇年代所發表的以下經驗談，很能反映當時在教學上所遇到的困境：

我曾為浙江省教育廳典試中學畢業會考的國文四次，覺得中學畢業生的國文試卷，大有一屆不如一屆之勢。論者往往歸咎於學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縮短了一年。其實，小學縮短了一年，中學已延長了二年；雖然大學的三年預科被廢除了，但這於中學畢業生的程度，是沒有影響的。或謂從前的中學生大都是家塾出來的，現在的中學生完全是小學畢業的；家塾可以說是專讀國文的，而且由教師個別教授；小學的學科較繁，花樣較多，學生已不能專攻國文，而且用的是班級教學；這便是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這一說，頗有相當的理由。可是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家塾裏讀死書的教學方法——只重背誦，不重講解——比現代小學裏的教學法，優劣如何？家塾裏採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書》、《五經》——比現代的小學國語教科書，那一類適合於兒童的學習？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種原因了！³⁶

教與學失衡，校園的實境是偏重教師單線教學，卻相對輕忽了學生的課外自學，教材教法亦待精進。那麼，要改進即應知致力的方向，蔣祖怡與父親都主張不能只是課堂上讓老師講授而已，課外的自學更不能輕忽。《章與句》裡的兩位國文老師：趙鳴之、李亦平的一段對話，正呈現蔣祖怡的教學觀念及作法。李老師說：

³³同前註。

³⁴蔣伯潛：〈習作與批改〉，《國文月刊》第48期（1946年10月），頁35。

³⁵蔣伯潛甚至寫成一本專門的教學用書《中學國文教學法》，限於篇幅及本文研究的對象，此不贅述，將另文探討蔣伯潛的教學經驗及研究所得。

³⁶蔣伯潛：〈自序〉，《章與句》（1940年初版），下冊，頁1。

單解釋文句有什麼意思？多作文的好處也有限的。所以我一星期叫他們作文，另一星期是教他們「辭的活用」、「文法」、「修辭」上的種種問題，也叫他們練習一下。我所選的都是比較有趣味的記述文和描寫文，議論文很少讀，即使有了也選擇其中清楚而容易了解的。他們底文章先得解決別字和文法上的錯誤。同時，課外讀物，我選得很多，每一本書讀完了，要他們做一個報告。³⁷

趙老師說：「工作真繁重，每星期要改謄清，默書，作文，大小楷，再有週記。國文教師不是萬能的。」³⁸不只改文章、批週記、甚至還要指導書法，趙老師不免抱怨說：「國文教師改大小楷。這是適用於老學究的，他們一手的秀才字，可以教學生們學，但是現代的國文教師卻是不善此道的人多。要他改大小楷，未免強人所難了。」³⁹蔣祖怡認為老師平時應盡量騰出時間教如何鑑賞、如何創作，甚至動態的壁報製作、文字遊戲設計⁴⁰，都可考慮。即使寒暑假的作業，也得兼顧閱讀與寫作的訓練，以下是李亦平老師所交辦的寒假作業項目：

（甲）閱讀——《修辭學發凡》、《左拉短篇小說集》、《水滸》、《莫泊桑短篇小說集》、《明清散文選》、《注釋本中國文學史》。任擇三種，每種讀完之後，寫一篇報告，裏面分「批評」、「感想」、「參考」三項。……（乙）寫作——每禮拜做一篇週記，將自己底生活情形，國內外的大事及自己底感想寫下來，不必很長，求文章暢達，注意別字和不通的詞句。再作文言文譯語體文一篇，語體文譯文言文一篇，字數不拘。⁴¹

不僅交代作業內容，同時具體提示步驟，以讀書報告為例，李老師分別解釋「批評」、「感想」、「參考」的作法：「批評是讀者對於每本書中文字上，結構上或編製上，思想上的批評，不可空泛。感想是讀者讀了這書以後所感到的種種問題。參考，在本書以外，可以用他書來作證引的材料。」⁴²

以上國文老師們的經驗談，點出當時教學的沈重負擔，儘管大環境嚴苛，但蔣祖怡筆下的國文老師多勇於任事，嘗試以生動教法提高學習趣味，並多次強調文法修辭的重要，總之「我們教書的人，也不該因環境而氣餒的」⁴³。

蔣祖怡在《字與詞》裡，專章談如何組織「讀書會」的方法，包括草擬簡章及安排開會流程；而在《章與句》中，亦專章強調課外輔導及口頭研討的重要，組織了「語文研究會」。無論研究會，抑或讀書會，這樣的課外自主性的組織，實可得到不同家庭的教學資源挹注，誠如蔣祖怡筆下的彭旭初校長所言：「要國文好，必須課內

³⁷蔣祖怡：〈中秋之後〉，《章與句》，上冊，頁 151-152。

³⁸同前註，頁 152。

³⁹同前註。

⁴⁰蔣祖怡《字與詞》即設計了〈文字遊戲〉，如猜字謎，題目有：「鑿壁偷光（打三國時人的字一）」【孔明】、「重男輕女（打現在地名一）」【貴陽】、「割稻的鐮刀（打字一）」【利】、「六十天（打字一）」【朋，六十天即兩個月，兩個月字，就是朋】，寓教於樂。以上，詳見蔣祖怡〈文字遊戲〉，《字與詞》（臺北：世界書局，1966 年再版），下冊，頁 190-192。

⁴¹蔣祖怡：〈今文十弊〉，《章與句》，上冊，頁 212。

⁴²同前註。

⁴³蔣祖怡：〈中秋之後〉，《章與句》，上冊，頁 151。

課外雙方並進，學校家庭雙方督導，方能有效。」⁴⁴比較蔣祖怡所經營的這兩個課外團體，「學生家長」都居於主要位置，取代了校內正課的國文老師，而且指導的重點都置於家長怎樣增加學生的文法常識、具體陳述文法修辭上的問題，這包含了直接輔導以及間接的捐書。例如：邀請學生的家長陳女士（故事中虛構的學生陳祖平之母），擔任研究會的導師，輔導國文常識，例如講解各種詞類的特色⁴⁵；有些則捐贈「開明書局出版的《中學生雜誌》一年」、「《文心》、《詞和句》、《文章作法》、《愛的教育》」等等⁴⁶。

與父親蔣伯潛合寫「國文自學輔導叢書」，此套書正可為蔣祖怡重視「課外」、「自學」的理念做註腳，其父撰寫的書序也補強了這樣的教學思維，蔣伯潛表示：

中學本身六年內的國文教學，只重在教師的教，而不重在學生的學，只重在課內的受教，而不重在課外的自學！中等學校的國文授課時間，每週至多不過六七小時；去了二小時作文，只有四五小時了。講授選文，如果貪多求速，每週也可以講授三、四篇。但這樣草率了事，囫圇吞棗，學生能完全了解嗎？能完全記誦嗎？不但食而不化，難期應用，怕嚥都來不及嚥下去哩！如預習、試講、範講、復講、內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讀、朗讀、背誦、默寫，要樣樣都做到，一週四五小時，怕只能選授一兩篇文章。一學年不過四十多週，六年工夫只讀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國文當然不會有長足的進步了。何況大部分學生在教室裏聽講，和坐茶店聽說書一般，有興趣時，眉飛色舞，沒興趣時，便昏昏入睡；下了課，把講義一丟，等到考試時再來臨渴掘井呢！——所以我認為要提高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非提倡他們自學不可！非輔導他們自學不可！非養成他們課外閱讀的能力興趣和習慣不可！⁴⁷

蔣氏父子都憂慮學校的國文時數有限，無法顧及聽、說、讀、寫的方方面面，有些教材內容雜亂陳腐，內容也引不起學生的興趣，國文程度每下愈況。因此要完善國文教學，勢必精進教材及教法。蔣伯潛就說：

適宜於中學生課外閱讀的讀物，實在難找。他們得不到適當的讀物，而自由閱讀的興趣又非常強烈，於是大多數學生盡量地閱讀他們自認為有興趣的小說，無論是武俠、神怪、戀愛、偵探等等，無所不閱，結果是無往不迷。雖然看小說於國文也不無小補，但終是所得不償所失。學校當局，或聽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無效，聽其自然也不是辦法。現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愛的教育》、《文章講話》、《文章作法》、《詞和句》等，為學生的課外讀物。可是這一冊，那一冊，各自獨立，並不是按照中學生程度，由淺入深，整套編成的；就各書的形式和內容看，也分不出牠們的深淺。所以甲校定《文心》為一年級的讀物，乙校定《文

⁴⁴蔣祖怡：〈組織讀書會〉，《字與詞》，上冊，頁31。

⁴⁵陳女士為學生介紹了九品詞種（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嘆詞）及七位實體詞（主位、呼位、賓位、副位、補位、領位、同位），詳見蔣祖怡：〈語文研究會〉，《章與句》，上冊，頁52-56。

⁴⁶蔣祖怡：〈組織讀書會〉，《字與詞》，上冊，頁32。

⁴⁷蔣伯潛：〈自序〉，《章與句》（1940年初版），下冊，頁2。

心》為二年級的讀物，丙校又定《文心》為三年級的讀物，把牠看成萬應靈膏，什麼人什麼病都可貼的了。至於高中。尤其沒有辦法；許多教師只得將《孟子》、《史記》、《戰國策》、《通鑑紀事本末》，提起筆來，隨便替學生開一張書單子。⁴⁸

蔣伯潛這番話除了反映一九四〇年代市面流通不少開明書店印行的書刊，也點出了適當教材難覓的實情，各校各自為政的結果，就是任由師生各以所好而行，閱讀及寫作的能力必然無法有效提升。對此，蔣祖怡與父親便替中學程度的青年編寫了一系列適於自學的課外讀物「國文自學輔導叢書」，而蔣祖怡更具體而微地撰寫「作文自學輔導叢書」。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分為二輯各六冊，第一輯適用於初中生，主要談論字詞、章句結構、文體及作風，「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冶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為宗旨」；第二輯適用於高中生，「以文學，子學，經學為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為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⁴⁹至於「作文自學輔導叢書」，則是蔣祖怡的新嘗試，他把同一題目，用數種作法表示，使學生可以互映對照，書裡的範文都是他親自撰寫的，而不是「利用簡單漿糊，雜湊成書」，這套書有六冊，前四冊是記敘文、描寫文、論說文、抒情文的基本練習，後兩冊研究文體及作文技巧，目的「使學生對於各種寫作技術，得融會貫通，不致拘泥於一二『公式』，有筆法不能開展之苦。」⁵⁰以上，從蔣祖怡致力編纂的書籍種類，即可窺知其國文教學雖不偏廢文化義理及文學鑑賞，但更重視培養「語言文字」的基本功，他以輔導、自學的理念，留意文字形式的表現，企圖彌補國文教室裡的不足之處。

五、重視國文基本功

蔣祖怡語文著述關涉修辭議題的，主要集中於《章與句》、《文章學纂要》、《文章病院》，部分則零星散見其他書刊。《章與句》專章論及修辭，有：〈古代修辭論〉、〈比喻種種〉、〈誇飾的研究〉、〈省略和婉曲〉、〈比擬和借代〉。《文章學纂要》則有：〈明喻暗喻和寓言〉、〈誇飾〉。《文章病院》有：〈文章的興奮病〉、〈文章的肥胖病與瘦弱病〉以及〈文章的總治療〉。其他如與父親合寫的《風格與體裁》部分內容亦觸及了字詞、章句修辭問題，例：〈文辭的繁簡〉、〈從章句形式上辨別風格〉。

蔣祖怡看重如何培養語文基本功以及各式技巧作法的提示，單從他一系列專書命名略可得證，如：《章與句》（《文則》）、《字與詞》、《文章技巧的研究》、《記敘文一題數作法》等。以《文則》為例，該書早年於上海世界書局印行時即名為《章與句》，而一九八〇年代合肥的黃山書社擬重印《章與句》，認為原名未能充分彰顯小說體裁、文法修辭的寫作特色，因而蔣祖怡沿用南宋陳騭《文則》之例，改為同名⁵¹。蔣祖怡

⁴⁸同前註，頁 2-3。

⁴⁹見〈編輯例言〉，《章與句》（1940 年初版），下冊，頁 1。

⁵⁰主編（筆者按：陸高誼）：〈主編者言〉，《記敘文一題數作法》（世界書局，未繫出版年月），頁 1。

⁵¹蔣祖怡說：「我國南宋時代，有位名字叫陳騭的，他寫過古代文法、修辭知識的書，名曰《文則》；我的這本書，雖則用小說體裁寫的，而主要目的還在給青年讀者們以修辭的知識，所以就沿用《文

直言撰寫時就集中考慮怎樣有機統一「修辭知識」和「小說形象」，他深信結合這兩種的寫法，對改進青年的語文能力應該有益。

（一）對文法、修辭的認知

蔣祖怡執編《新學生》月刊時，曾不諱言看重學習文法及修辭學，他說：

「中學國文教學上的一個基本問題」一文的作者（筆者按：作者係「周遲明」）認為文法的學習，是學習本國語文的重要基本工作之一，我也一向有着這種見解，文法是從語文中歸納出來的法則，用文法來矯正習作上的錯誤以及研究別人底文學，較之抽象的解釋，可以有「事半功倍」的成效。不但文法如此，文章法則，也可以作歸納具體的研究，修辭學就是致力於此的一種學問。⁵²

他透過小說人物—陳祖平之母，說明「修辭」與「文法」的差異，她在指導語文讀書會成員時，屢次說道：

◎關於「修辭」兩個字，到現代纔盛行起來，在西洋古代，有雄辯的風氣，「修辭」實在最初完全是作雄辯用的。但是中國古代《易經》上也有一句：「修辭立其誠」的話，那末，就用這兩字來譯原文“Rhetoric”了。文法，是使文章如何可以通順，修辭是使已通順了的文章如何能更動人。所以如果將文章修飾得更不明白，便失了修辭的本義了。⁵³

◎讀了修辭，要能夠實用，對於鑑賞及作文都有很大的益處。修辭不單是在文字上的修飾，內容也應注意。內容的修飾，在乎自己底修養，關於自己生活上的種種經驗，正可以增進自己學問上的知識。⁵⁴

◎修辭學只告訴你一個修飾文章的方法，也和文法一樣，是由文章中歸納出來，而不是預先設立一個修辭學來使別人作文照樣去做的。但是在你們初學國文的人，卻有許多幫助，在文法以外，文辭上的疑慮處很多，可以用修辭法的眼光來解釋。同時對自己作文也有幫助，可以應用。⁵⁵

◎文章並非是神而明之的事，裏面有文法的組織。——但是我得先聲明：文法不是發生於有文字之前，而是從許多文章裏歸納出來的，初學國文的人應知道文法。

⁵⁶

國文教師李亦平也發表意見：

「修辭」兩個字，最早見於《易經·乾卦·文言》：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關於「修辭」兩字，古人大抵有兩種見解，照

則》的舊名。至於內容，除必要的略加修改、補充之外，基本上保持不變，以存其真。」〈重版新序〉，《文則》，頁4。

⁵²蔣祖怡：〈編後記〉，《新學生》第1卷第4期（1946年8月），頁95。

⁵³蔣祖怡：〈急雨〉，《章與句》，上冊，頁60。

⁵⁴同前註。

⁵⁵蔣祖怡：〈誇飾的研究〉，《章與句》，上冊，頁120。

⁵⁶蔣祖怡：〈語文研究會〉，《章與句》，上冊，頁51。

孔款達（筆者按：孔穎達）說，是修理文教的意思。照阮元的說法，修辭一定要對偶，要文章的表面漂亮。但是這都不是修辭的真義。《論語》上有一句話：辭，達而已矣！所謂「達」正是修辭的任務。⁵⁷

至於蔣祖怡自己則從中國的語原及西洋的譯文解釋「文法」：

「文法」兩字的語原，乃是文書法令之類。《史記》：好興事，舞文法。即指「刀筆吏舞文弄法」的意思。而現今所謂「文法」，指英語 Grammar 的譯文而言的。

58

他進一步申說：

文章之有文法正如文字之有「六書」一樣，不是造文章文字的人，先定如此一個原則，叫人家仿製，乃是從已成事實的文章文字作歸納的研究而得到的結論。文章中既歸納出「文法」的原則，那麼這就是做文章時大致應該依據的東西，我們不必再叩那「玄奧」「神秘」之門，不如先將此歸納的結果來研究一下，來作自己作文時的借鏡。⁵⁹

由上可知，不論是文法，抑或修辭，蔣祖怡認為都是從既有的文字文章歸納出的原則。寫作下筆之前，需要一架「文法」機器，以這部機器檢測校正自己的行文是否有病疵。蔣祖怡把「文法」當成是「一架大機器，是一面大鏡子，文章有否錯誤，只要拿文法衡量，便可知道它錯誤在什麼地方。」⁶⁰至於文法對文章的功效為何？蔣祖怡認為有三：一、幫助了解；二、辨別錯誤；三、幫助表達。⁶¹

總之，若能研究文章的文法，對作文及閱讀甚有益處。蔣祖怡也不時在書裡安插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的觀點，如認同陳望道提示的修辭三種用處及治療兩種文病，三用處是：一、解決疑難；二、消滅歧視；三、確定意義。修辭可以治療的是：一、瑣屑的模仿；二、美辭的堆砌。⁶²

（二）比喻修辭格的新見：「寓言」

對於修辭格，蔣祖怡曾關切：比喻、比擬、借代、誇飾、婉曲、節短⁶³、縮合⁶⁴、

⁵⁷蔣祖怡：〈古代修辭論〉，《章與句》，上冊，頁 93-94。

⁵⁸蔣祖怡：〈文法與文章之關係〉，《文章技巧的研究》，頁 48。

⁵⁹同前註。

⁶⁰同前註，頁 50-51。

⁶¹同前註，頁 48。

⁶²蔣祖怡：〈急雨〉，《章與句》，上冊，頁 60。

⁶³「節短」修辭，蔣祖怡舉數例說明：「王勃〈滕王閣序〉說『楊意不逢，鍾期既遇』，楊意即楊得意，鍾期即鍾子期」、「常看見報紙上稱中央黨部常務會議為『中常會』，浙江省教育廳為『浙教廳』，這些把古人名字省略一字、簡稱部會機關的作法，蔣祖怡認為「在修辭學上，叫做『節短』」。以上所引，見蔣祖怡：〈節縮省略與文章繁簡〉，《字與詞》，下冊，頁 90。

⁶⁴「縮合」修辭，即二字急讀可縮合為一，蔣祖怡曾舉《禮記》、《論語》、《馬氏文通》、《孟子》、《經傳釋詞》等例以解釋縮合之意，如「《禮記·檀弓》有人對晉太子申生說：『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鄭玄注：『盍，何不也。』『何不』二字可縮合為『盍』。《論語》：『子張書諸紳。』《馬氏文通》說：『之合於字，疾讀之曰諸。』『之於』二字可縮合為一『諸』。」以上見〈節縮省略與文章繁簡〉，《字與詞》，下冊，頁 92。這種縮合現象，蔣祖怡認為這在民間俗語中常見，但「這不是故意使文意繚繞而是習慣」，純粹為「口頭便利起見」，見其〈省略和婉曲〉，《章與句》，上冊，頁 126-127。

對偶、倒裝、錯綜等多種修辭技法。其論述，或借鏡前人研究之成果，亦有個人創見，限於篇幅，以下僅就「比喻」為說。

首先，他評析了南宋學者陳騭《文則》所提的十條比喻修辭，並將陳氏所言數類，如：直喻、類喻、虛喻、詳喻、博喻、隱喻、詰喻、對喻、簡喻，整併為「明喻」及「暗喻」兩種，並另立「寓言」一種。第一種是明喻，可包含直喻、類喻、虛喻、詳喻、博喻；第二種是暗喻，可包含隱喻、詰喻、對喻、簡喻。為方便說明，先將陳騭及蔣祖怡兩說對照如下簡表：

比喻修辭			
陳騭《文則》		蔣祖怡評析	
直喻	或言『猶』，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見。	◎「猶緣木而求魚也」(《孟子》) ◎「若朽索之馭六馬」(《尚書》) ◎「譬如北辰」(《論語》) ◎「淒然似秋」(《莊子》)	一、把陳騭這五類，歸為「明喻」一種。 二、這比喻多以具體物比喻抽象物；或以較熟悉的事物來比喻他物。 三、其他範例： ◎「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莊子》)以具體物「水」、「醴」之性質，比較說明抽象的「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 ◎「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琵琶行》)描寫琵琶聲，因為「急雨」聲，「私語」聲，比較熟習，故可用以說明不常聽到的琵琶聲。 ◎「如處荊棘」比喻生活之不安。 ◎「似芒刺在背」比喻手足無措。 ◎「亭亭如蓋」比喻樹高大茂盛。 ◎「纍纍如貫珠」比喻連續不斷。 四、人生喜怒哀悲之情，也常用比喻來表達的。如： ◎「愁如迴飈白雪」(李白詩) ◎「柔情不斷甘春水」(寇準詞)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詞)。
類喻	取其類，以次喻之。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尚書》)歲、月、日一類也。 ◎「子如堂，羣臣如陸，眾庶如地。」(賈誼《新書》)堂、陸、地一類也。	五、使用明喻的時機主要有兩個：一、所喻之物與被喻之物要有一特性相似。如「柔情」和「春水」相同特性是「不斷」。若不提明「不斷」，即失卻比喻的效力。二、所喻之物與被喻之物不能同屬一小類，即此兩物只能相似而不能相同。如「柔情」是抽象的，而「春水」是具體的。若如「窗如牖一樣」或「窗如牖」，即失比喻之效。
虛喻	既不指物，亦不指事。	◎「其言似不足者」(《論語》) ◎「颺兮似無所止」(《老子》)	
詳喻	須假多辭，然後義顯。	◎「夫耀蟬者，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天主有能明其德，明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荀子》)	
博喻	取以為喻，不一而定。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尚書》) ◎「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春黍也，猶以錐殫壺也。」(《荀子》)	
隱喻	其文雖晦，義則可尋。	◎「諸侯不下漁色」(《禮記》) ◎「平公軍無秕政」、「雖蝎潛焉避之」(《國語》) ◎「是豢吳也夫」(《左傳》) ◎「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歟」(《公羊傳》)	一、把陳騭這五類，歸為「暗喻」一種。 二、暗喻的方式，所喻物與被喻物之關係更密切。明喻只說出兩者的相似，而暗喻卻說兩者之關係是相等的。至於「若」、「如」、「猶」、「是」等詞，在暗喻中往往省略。 三、暗喻和明喻，初看似相同，實則不一。以下，即無「如」、「若」等字： ◎「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左傳》)。「趙衰」即「冬日」，「趙盾」即「夏日」。
詰喻	雖為喻文，似成詰難。	◎「虎兕出乎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論語》)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蘇軾詞)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李煜詞)

		◎「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婬之隙，壞誰之咎也？」（《左傳》）	◎「虎狼之勢」、「虎豺之國」，「鐵石心腸」，「參商之隔」等，皆暗喻。
對喻	先比後證，上下相符。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莊子》） ◎「流丸止於瓠臬，流言止於智者。」（《荀子》）	四、明喻與暗喻之相異點及示例： 明喻：甲（似）乙 暗喻：甲（等於）乙 ◎「十字街頭」是可徘徊之處，故稱徘徊皆曰「彷徨於十字街頭」。 ◎「藝術之宮」亦稱「象牙之塔」。 ◎「揭幕」代開始。 ◎「摩擦」代衝突。 ◎「衡量」代比較。 ◎「鷹」象徵兇暴。 ◎「安斯兒」（筆者按：angel 譯音，天使之意）代和平。
簡喻	其文雖略，其意甚明。	◎「名，德之輿也。」（《左傳》） ◎「仁，宅也。」（揚子《法言》）	六、其他：暗而不明的，亦可稱之「暗喻」 ◎「我覺得立在大荒野的邊界，到處都是飛沙」（〈點滴〉〔筆者按：巴金作品〕），以大荒野代「惡濁的社會」，以飛沙代壞人。
備註：整理自蔣祖怡〈明喻暗喻和寓言〉，《文章學纂要》，頁 109-112。			

表三：陳騭、蔣祖怡關於比喻修辭看法的對照表

蔣祖怡在比喻修辭格，另立一種「寓言」。作者引用寓言，其意非著眼寓言故事的真實與否，而是據以為說話、寫文之理論，他說：

《論語》上的：「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整句在說「在動搖的時代中，纔可以知道真真有節操的人」。這一類我們給它另外起一個名字，叫做「寓言」。「寓言」現代大都解釋作故事的，但是就本義講，是「寓意之言」，不管它所寓的是否是故事，只要有意寓在裏面，而不明白顯示就是了。……普通一般的寓言，總是先舉故事，後述真意；實在這是畫蛇添足的勾當。《列子》中所載的〈愚公移山〉，故事完了，不再加什麼說明方纔是好的寓言。因為「有志竟成」的意思，別人見了，也已明白。⁶⁵

又：

古代善辯之士，往往用寓言來作他們論辯的根據的。所以各種子書中寓言也很多。每個寓言一定有一個言外之意，就是整個寓言的功能也只等於一句寓意之言的話，所以後人也往往以寓言中的一個綱領來當作一個詞兒運用的。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長」、「大而無當」、「刻舟求劍」、「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用作成語，已不足為異了。現代人作文，也往往引用這種寓言的節縮詞，來充實文章底內容。讀者如果知道了原來的寓言，也可了解所引用的話。⁶⁶

寓言是以一句話來表示一個比喻，不單是一個詞語上的關係，有時將比喻「寫成很長很長的故事，後面不寫出作者的原意，即是變成『寓言』。較簡單的，也有人稱作『諷喻』。」⁶⁷，蔣祖怡認為「愚公移山」、「齊人有一妻一妾」、「守株待兔」都可稱為寓

⁶⁵蔣祖怡：〈明喻暗喻和寓言〉，《文章學纂要》（臺北：正中書局，1957年，修訂臺二版），頁 113。

⁶⁶同前註，頁 115。

⁶⁷蔣祖怡：〈比喻種種〉，《章與句》，上冊，頁 109。

言。他把寓言視為另一種比喻模式，這在其他修辭類的書籍中，是比較特殊的修辭觀點。

六、具體指引

（一）文法修辭的原則

審形、辨音、釋義的文字學基礎能力具備後，方可進一步研討篇章的組織結構，蔣祖怡非常重視寫作的形式及方法，他認為現代社會不能像過往專尚談玄或模糊以抽象名目，他主張要研究文章的形式，須經三項程序：第一、歸納的工夫；第二、分析的研究；第三、有證例可查。

首先，收集同類的若干文章，再歸納共同特點，且研究其例外的底蘊，如此可得大致的原則。例如人物記敘類文章，可以歸納出通常不能被忽略的傳主背景，其舉魏禧〈大鐵椎傳〉開首「大鐵椎，不知何許人。」為證，強調「記人之文，除文章開端有議論的外，開端的原則，總先述所記者的名氏與籍貫。即使沒籍貫的，也是如此。」⁶⁸此即是從歸納得出的寫作原則。

其次，分析的方法，蔣祖怡認同黎錦熙《國語文法》以圖解法剖析文章，他還曾不厭其煩地援引黎氏分析班超〈請還朝疏〉一段⁶⁹，強調分解圖可化繁為簡，釐清每段的佈局關係、了解遣詞用句的美妙之處。

最後，要多方查對例證，舉例要謹嚴周備，不能臆測。例如「舟」、「舫」兩字，經查《廣雅·釋水》：「舫，船也。」及《爾雅》：「小舟也。」，舫也是小船之意，故歐陽修〈真州東園記〉並用「舟」、「舫」兩字，即知其疊床架屋之累。

（二）遣詞造句的方法

蔣祖怡主張用字遣詞最當留意，「字和詞便是文章的原子和細胞。字和詞用得不得妥當，雖然句子的構造沒有文法上的錯誤，也不能算是好句子，好文章。」⁷⁰斟酌文句中的字詞，或因意義或因聲調，反覆推敲找出最適宜的字詞。他從兩方面說明遣詞造句之法：一、消極：求無過；二、積極：重適當。蔣祖怡透過國文教師李亦平之口，解釋：「積句可以成為文章，文字的好壞，句是一個基礎條件。句子造不好，文章也不會好的。同時造句有積極消極兩方面，消極是求它沒有錯誤，積極方面是使它沒有錯誤之後，如何會更美妙動人。」⁷¹遣詞造句如何求其無過？蔣祖怡認為要做到三個條件：「明白」、「準確」及「平易」⁷²。

所謂的「明白」，即欲使別人明白所表達的意思，蔣祖怡以為有些古人因刻意求古而用僻字，或者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形同而義不同」的字，前者如信札以「鴻雁」、「雙鯉」、「玉璫」取代，鏡子以「圓冰」、「菱花」、「秦臺」取代；後者如韓愈〈雜說〉及王安石〈遊褒禪山記〉：

⁶⁸蔣祖怡：〈餘論〉，《文章技巧的研究》，頁 156。

⁶⁹黎錦熙之範例，詳蔣祖怡〈文法與文章之關係〉，《文章技巧的研究》，頁 49-50。

⁷⁰蔣祖怡：〈推敲〉，《字與詞》，上冊，頁 142。

⁷¹蔣祖怡：〈孤兒之淚〉，《章與句》，上冊，頁 12。

⁷²蔣祖怡：〈遣詞的方法〉，《文章學纂要》，頁 66-75。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韓愈〈雜說〉）⁷³

◎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王安石〈遊褒禪山記〉）⁷⁴

蔣祖怡分析韓愈文句：

第一「千里馬」和第二「千里馬」代替兩個不同的意念，前一個「千里馬」說伯樂所賞識的「千里馬」，後一個「千里馬」是指實在而並不出名的「千里馬」。如果不加分析，便覺這兩句話自相矛盾了。⁷⁵

又說王文：「上一『文』字代表『文章』，下一『文』字，代表文字，也是容易令人疑惑的。」⁷⁶前引，人多不懂其義，蔣祖怡以為應「文從字順」，所使用的字面最好人人知曉，否則費解便失去文章的效力了。

其次，「準確」，就是要求妥當。蔣祖怡舉了許多古文遣辭不準確之病，如：

病辭	
案例	蔣祖怡評析
「大夫不得造車馬」、「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禮記》）	「車」可以說「造」，但是「馬」怎樣可以說「造」呢？「猩猩」是獸，但不是「禽」；何以下面可以用禽獸？這是很顯明的錯誤。
「沽酒市脯不食」（《論語》）	「酒」字下面用「食」字不準確，應作「沽酒不飲，市脯不食」纔對。
「水，吾乞以畫舫之舟」（歐陽修〈真州東園記〉）	「畫舫之舟」有語病，因為「舫」字和「舟」字重複。古人有時因要求句子勻適及章節之和諧，任意加字，以致重複為病了。
「雖無絲竹管絃之盛」（王羲之〈蘭亭集序〉）	「絲竹」和「管絃」重複。絲竹本來是管絃樂器之一部分，借它代替全部，故管絃有時可稱絲竹，然王羲之並列二者，即有語病。
備註：整理自蔣祖怡《文章學纂要》、《文章病院》。	

表四：用詞不確之案例簡表

以上，屬疊牀架屋之病例，然其中對「禽」、「獸」二字的理解，則未必恰當⁷⁷。至於用模糊的字詞代替所欲之言，這樣的情形也常見於古詩文，如蘇軾詩：「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⁷⁸其中，「青州從事」代替美酒，蔣祖怡引用瑞典漢學家「珂羅倨倫」（筆者按：即 Karlgren，高本漢，1889-1978）的《中國語與中國文》對此費解的說法：

⁷³同前註，頁 66。

⁷⁴同前註，頁 67。筆者按：蔣祖怡引證王安石之作，但把〈遊褒禪山記〉誤為〈褒禪山記〉。

⁷⁵同前註，頁 67。

⁷⁶同前註。

⁷⁷匿名審查人表示：「就古籍中『禽』字概念可以涵括『獸』，印證於甲骨、金文之辭例亦然。換言之，《禮記》所言『禽獸』，並非後人所指『羽類為禽，四足為獸』分立的觀念。蔣氏之批評，是以後人的觀念去批評古籍的用法，實不恰當。」感謝審查人賜正，繫此備參。

⁷⁸此係蘇軾〈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蔣祖怡《文章病院》原引「不意青州六從事」（見前揭書，頁 76），按首字「不」字應為「豈」字。蘇軾作詩的背景是友人章質夫擬送六壺酒，但苦等不到贈酒，日夜惦記酒事，遂將「青州從事」的典故化成「青州六從事」，其中的「青州從事」指稱好酒，而「烏有先生」則是烏有此事，沒有這件事，即這份酒禮落空了。

「青州從事」替代「優等的酒」。中國人說：美酒可以及於「臍」，……。這個「臍」字，恰好和另外一個也讀這音的「齊」字，形體相似，而「齊」為一個地名，屬於青州治下；所以美酒叫做「青州從事」。⁷⁹

原來古人以為美酒及於肚臍，而「臍」與「齊」音近，然「齊」又屬「青州」所轄之地名，故最後轉稱「青州從事」，蔣祖怡認為這樣曲折的、費力的解釋，剛好給外國的漢學家引去做中國文辭費解的力證。

至於「平易」，即修改文章使其平易，如白居易詩歌老嫗皆能解，便以平易為修改之標準，蔣祖怡認為「修改」是修辭求平易「最普通的一種工夫」⁸⁰，如黃庭堅的「歸燕略無三月字，高蟬正用一枝鳴。」其多次調整，從起初的「抱」、「占」、「在」、「帶」、「要」到最後才定為「用」字⁸¹。國文教師李亦平也提醒學生：

你們作文，我幾次勸你們自己先打稿子，再自己修改，自己已無從修改了，那麼再謄清了交給我，看我如何改法。這樣作文才有進步。這樣才可了解修詞的真義。否則信筆寫來，就交了給我。我改好了還你們以後，你們又不肯用心去探討，即使對你們說修詞如何如何，也不過變成一種學科給你們隨便閱讀而已，於作文是沒有補益的。⁸²

這裡浮現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教國文是否需要批改習作？如果學生心存敷衍塞責，寫作既不積極，對教師批改的意見又視若無睹，那麼批改的效力，恐令人懷疑。蔣伯潛就曾被學生「潑冷水」，他說：

從前，我和朱自清、劉延陵二先生同在某校教國文。朱先生和我是努力批改作文的；劉先生卻從不批改，而且常笑我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一天，校工替我們買了一包花生米來，包的紙便是我仔細批改、三天前發還給學生的作文。⁸³

蔣伯潛、朱自清乃至葉聖陶，他們花在改文的時間非常多，在朱自清、葉聖陶的往來書信及各自的日記裡，即頻見改文（自己與他人的）的紀錄⁸⁴。雖然蔣伯潛有不愉快的經驗，但朱自清安慰他這僅僅是個案，毋須因噎廢食。

⁷⁹高本漢語，見蔣祖怡：〈文章的興奮病〉，《文章病院》，頁 77。

⁸⁰蔣祖怡：〈古代修辭論〉，《章與句》，上冊，頁 98。

⁸¹蔣祖怡：〈古代修辭論〉，《章與句》，上冊，頁 97。按：除舉出古人咬文嚼字的著名之例，如賈島、白居易、齊己、歐陽修、黃庭堅等改易其字，蔣祖怡亦將毛廁趣聞列為解說文本，例如《字與詞》裡提到：「板闊尿流急；坑深糞落多。」這兩句，把上句的「闊」改為「側」，把下句的「多」改為「遲」，並分析說：「板的闊狹與尿流之緩急無甚關係，坑的深淺與糞落之多少毫不相干。板側了，所以尿流得急了；坑深了，所以糞落得遲了。」（見〈推敲〉，《字與詞》，上冊，頁 141）此例雖較俚俗，卻不免讓人會心一笑，加深了讀者的印象。

⁸²蔣祖怡：〈古代修辭論〉，《章與句》，上冊，頁 98。

⁸³蔣伯潛：〈習作與批改〉，《國文月刊》第 48 期（1946 年 10 月），頁 34。

⁸⁴例如：朱自清寫信給葉聖陶商討改文問題：「『夢幻泡影』一條如照下改，不知行否？乞酌——『夢幻和水泡的影子都是虛空的，詩裡是隱喻。』如不便，可將『明喻』的『明』改『隱』字」（1948 年 7 月 10 致葉聖陶信，《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1 卷，頁 114）；朱自清的日記如：「下午修正〈詩言志〉一文」（1944 年 4 月 3 日，《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頁 286）、「因改學生作文未睡，致五華上課歸來疲憊不堪」（1946 年 1 月 17 日，《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頁 386）。至於葉聖陶日記亦載：「竟日改文三篇」（1942 年 1 月 15 日，《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

基本上，蔣祖怡與父親的立場一致，主張要習作與批改，他在《章與句》及《文章病院》，花了不少篇幅談批改文章的心得及值得借鏡的案例，如歸納學生寫作上常犯的十個問題：空泛、無病呻吟、語無倫次、自相矛盾、嚕囁、引用不適當、喜歡用濫調、句意不貫串、文法錯誤、別字⁸⁵。他還提倡批改後的文章，可在課堂上共同研討，加深學生的印象，增加改文的效果。

語文是傳達情意的憑藉，若一味求曲（不直說而繞彎路）、求古（濫用成語典故），讀者看不懂又不能達，便失卻表現的功用。蔣祖怡表示在緊要處適當引用成語或典故，可增強文章的力道，但引用不當卻成了畫蛇添足，容易罹患「過飽或不消化病」⁸⁶，他舉了數例因不瞭解原義而鬧笑話的故事，但也正面羅列同一字詞之不同使用時機及意思，如「亡羊」的四種涵義：

亡羊		
成語	範例	意思
亡羊得牛	亡羊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淮南子》》	喻失小而得大
亡羊補牢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戰國策·楚策》》	喻事後的補救
歧途亡羊	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列子·說符》》	喻愛博的人，結果一無所獲。
亡羊	「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莊子·駢拇》》	喻不務應作的工作，結果一定不會好的。
備註：整理自蔣祖怡〈文章的積滯〉，《文章病院》，頁 20。		

表五：「亡羊」具多義之說明表

蔣祖怡建議引用成語諺語應完整採用，才不致於使意思含糊，若割裂式的變用，除了展示自以為博學的炫耀心態，其實讀者卻往往感到不知所以、莫名其妙。文章欲求其達，不求曲、不求古，用詞造句亦須留意：避免歧義、避免不通用之新名詞、少用專門術語、少用譯音而不通用的外來語、少用方言⁸⁷。唯蔣祖怡雖認同少用方言，但也承認有時因時地之關係「用土語加在文章裏，或寫出當時說話的情形，可使文章逼真。」⁸⁸，他以白居易、蘇軾作品為例，前者「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又復易之。」⁸⁹；而蘇軾詩「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⁹⁰蔣祖怡指蘇軾雖用了一般文人不敢採用的口頭常語，如牛矢（牛

出版社，2004 年，第 19 卷，頁 434）、「改來稿及三官之作」（1942 年 2 月 19 日，《葉聖陶集》第 19 卷，頁 442）。

⁸⁵蔣祖怡：〈今文十弊〉，《章與句》，上冊，頁 216-221。

⁸⁶蔣祖怡：〈文章的積滯〉，《文章病院》，頁 18。

⁸⁷以上的注意事項，見蔣祖怡：〈辭達而已矣〉，《字與詞》，下冊，頁 173-174。

⁸⁸蔣祖怡：〈遣詞的方法〉，《文章學纂要》，頁 73。

⁸⁹此例出自惠洪《冷齋夜話》，蔣祖怡轉引《顏氏家訓·文章篇》裡的沈約之言，但《冷齋夜話》誤為《冷齋夜語》，繫此備參。

⁹⁰此係蘇軾被貶至海南時所寫〈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詩，蔣祖怡將蘇軾「但尋牛矢覓歸路」寫成「醉尋牛矢覓歸路」，按首字「但」應為「醉」字，而「牛矢」即牛糞。

冀)，卻不因而損害詩意，反倒認為如明代文人丘濬論作詩「尋常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辭」，「佩服」白、蘇兩人用詞平易、使文藝大眾化的精神⁹¹。

符合「明白」、「準確」、「平易」三要件之後，詞的應用雖已無誤，但也未必是佳文，仍得思考怎樣使其美妙，因此，蔣祖怡提出要進一步做到「適合」及「生動」。其中，使文句生動的方法有二：第一、活用詞類；第二、運用助字。前者，詞類的活用方面，詞類雖分九品，但究竟何者屬於那一類，並無嚴格規定。蔣祖怡以為得視其在文句中的位置而論。

他指出古人作文認為活用詞類是很好的修辭法，故可常見交相替用的現象，不受文法上的限制卻用得適當、有趣。比方「手」字，同一字而有不同變化：

手工業	形容詞
手自筆錄（宋廉〈送東陽馬生序〉）	副詞
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林嗣環〈口技〉）	名詞
人手一編	動詞
備註：整理自蔣祖怡〈文法與文章之關係〉，《文章技巧的研究》，頁 53。	

表六：「手」具多義之說明表

類此之例，多不勝數。又如，蔣祖怡數度以王安石多次改易其作為說：

◎《容齋筆記》所記載：「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字，復圈去『過』字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餘字，始定為『綠』」。⁹²

◎王安石做的那一首「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原來他底原稿上那「綠」字一句，本來寫作「又到江南岸」，圈了「到」字，注了「不好」兩個字；改做「過」字，又圈掉了又改作「入」字，最後才改做「綠」字。⁹³

蔣祖怡評論「這幾個字中，比較起來，是『綠』字最有趣了。因為其他皆是『動詞』，而『綠』字是由形容詞轉成動詞的，比其他更具體而生動。」⁹⁴亦即：到→過→入→滿→綠，從詞性分析變化：動詞→動詞→動詞→動詞→形容詞。⁹⁵這正是活用詞類。

⁹¹蔣祖怡：〈遣詞的方法〉，《文章學纂要》，頁 72。按：蔣祖怡該書將「丘濬」誤植為「邱濬」，而所引丘濬詩句，即〈答友人論詩〉，唯「尋常景物口頭語」此句，一作「眼前景物口頭語」。

⁹²同前註，頁 79。

⁹³蔣祖怡：〈古代修辭論〉，《章與句》，上冊，頁 97。

⁹⁴蔣祖怡：〈遣詞的方法〉，《文章學纂要》，頁 79。

⁹⁵蔣祖怡從「詞性」區分，而臺灣早期知名文藝作家趙友培則從「意象」理解，趙友培說：「『綠』字」跟其餘那些字之所以不同，也是由於意象的不同，一個『綠』字，把江南春景完全顯露出來了。這樣地鍛鍊字句，乃在調整意象，修飾意象，自非咬文嚼字可比。」見其〈談作品的修改〉，《文藝書簡》（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77 年，增訂十版），頁 153。

關於助詞的運用，蔣祖怡強調助詞是中國特有⁹⁶，他在《文章病院》介紹了文言文及語體文常用的助詞，如：焉、也、吧、矣等⁹⁷；在《字與詞》裡則專門探討「了」字的多種用法，以及語體文中的嗎、呢、吧、啊等助詞特色。以「了」字為例，他舉例及說明如下簡表：

了	用法
你如此用功，自然進步就快了。 這封信，我本來早該復你了。 你真是用功極了	助判定事理的完結語氣
我昨天已經工作過一天了 我已經接到你三封信了 我昨天已經告過一天假了	助過去完成時的完結語氣
現在已到春天了 你現在復學了，心境自然很愉快。 老太太，你白疼我了。	助現在完成時的完結語氣
再過一個半月，我要離開上海了。 明天這時候，我的工作一定做好了。 再過兩個月，暑假便到了。	助將來完成時的語氣
如果明天再下這麼大的雨，那事情就糟了。 如果中學畢業國文仍不能通順，永遠不會通順了。 我們若去求他，這就不是品行了。	助虛擬結果或虛擬原因的完結語氣
他們都要餓死了，你還如此快活！ 大哥多喝兩杯，小弟要走了。 我那裏趕得上，只怕不能夠了。	助不定或預擬的完結語氣
我們的友情，別因此而冷淡了！ 別說懊喪的話了，快提起精神來吧！ 好孩子，別儘管牽記我了。	助請求或勸阻的完結語氣
備註：整理自蔣祖怡《字與詞》下冊，頁 102-105；《文章技巧的研究》，頁 57-58。	

表七：「了」之多種用法說明表

蔣祖怡從心理層面歸納出助詞的五種語氣：決定、商榷、祈使、疑問、驚歎語氣，若使用「了」為語末助詞，「便是決定的或祈使的語氣」，它用在決定句，可不問句子所述說之事是否完結或有無實現，總之，「了」是完結的語氣，與時間前後並無關係。蔣祖怡還區分了「助詞」與「助動詞」（用在動詞之後的，如「他們來了一個鐘頭了」、

⁹⁶英文的詞類有八種，而中國詞類除了八種之外，還多了一種「助詞」。蔣祖怡利用小說人物伯臧所說的話，這麼分析：「我們中國向來是不講究文法的；或以為『文無定法』，或以為『文成法立』，或以為即使有所謂文法，也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所以文句的通不通，往往只能知其然，而不能明其所以然。自從西歐文字輸入中國，漸漸地有人把西洋的文法用來研究中國的文章。於是英文有詞類，中國文也有詞類了。可是所謂助詞，是中國特有的。譬如英文的疑問句，只須把主詞和動詞的位置互易，或在前面加 do 或 did 等字；中文則須用『乎』、『哉』、『嗎』、『呢』等助詞來表示疑問。『八品詞』加了一類助詞，所以有『九品詞』了。可是中文畢竟和西洋文字有許多不同；把英文的文法，生吞活剝地引用到中文裏來，終有覺得鑿枘的地方。」見蔣伯潛：〈詞類的綜合和變化〉，《字與詞》，上冊，頁 186。

⁹⁷蔣祖怡：〈文章的軟骨病〉，《文章病院》，頁 54-58。

「我們已經分別了半年了」、「饒了我吧」等）的特徵，並提醒不能混為一談⁹⁸。助詞很多類而用法也各具其趣，但終究句法的完成與助詞關係較遠，不過，卻牽涉了語氣，例如：「我的財產還不止此哩！」（表自豪）、「這也許是我的住宅吧？」（表揣度）。蔣祖怡認為表達文中的語氣很重要，助詞或虛字皆能強調語氣，「從前古人作文，很重語調，連幾個虛字都不肯隨便亂用，因為虛字是可以調劑語氣的。」⁹⁹蔣祖怡鼓勵多誦讀、感受讀每個字詞時的語氣變化，例如：

例句	意思分析	說明
下雨了	表示天氣轉變，原本非雨天，然現在下雨了。	著重在「下雨」二字
下的是雨	天上落下來的不是雪或其他東西，而是雨。	著重在「雨」字
備註：整理自蔣祖怡〈語氣〉，《章與句》，上冊，頁 43。		

表八：「雨」之兩種語氣及語義偏重對照表

同樣都是雨天，卻可以有多種的說法，只要著重的位置不一樣，那麼意義也隨之不同。再如，從語氣看文言文及語體文的差異，他覺得兩者並無顯著差異，只是所用虛字不同，語氣有別。蔣祖怡透過李亦平老師把文言文與語體文的各種句法並列比較如下：

文言文句法	語體文句法
則史公可法也！	是史公可法啊！
乃史公可法乎？	是史公可法嗎？
乃史公可法耳！	是史公可法呢！
豈史公可法哉？	難道是史公可法？
此史公可法矣！	這是史公可法了！
備註：整理自蔣祖怡〈語氣〉，《章與句》，下冊，頁 41-42。此例句，出自方苞〈左忠毅公軼事〉。	

表九：文言文及語體文多種句法之比較表

由這張比較表，可知助詞、虛字及句調的緊密關係，而且從這角度看，文言、語體只是形式有別，「沒有好和不好的分別」¹⁰⁰，蔣祖怡把語氣切入文言、語體的討論，是比較科學的觀察，並沒有捲入文、白之論爭，純以國文教學的立場去發揮。蔣祖怡提倡要多讀文章，不管文言或語體：

現在一般人一聽說讀文章便感覺到太冬烘，其實讀文章卻並不很笨拙。無論語體文文言文都是可以誦讀的，不過只要表達出文中的語氣，不必拘拘於一定的調子，文章不去讀，實在沒法可以使學者熟悉文調文句和作者思想的。散文，音調上的美是在於錯綜，有時連用幾個仄聲字，使文句生硬，可以表示強烈的情感。¹⁰¹

⁹⁸詳見蔣祖怡〈「了」字的用法〉，《字與詞》，下冊，頁 102-106。

⁹⁹蔣祖怡：〈語氣〉，《章與句》，上冊，頁 44。

¹⁰⁰蔣祖怡：〈語氣〉，《章與句》，上冊，頁 29、32。

¹⁰¹蔣祖怡：〈音調與節奏〉，《章與句》，上冊，頁 22。

蔣祖怡主張語體、文言皆可朗朗上口，按照部定的課程標準，其實吟、讀、說的訓練是被要求的，而朱自清、夏丏尊、葉聖陶等語文專家編著如《精讀指導舉隅》、《文心》，也多強調自修時更應該吟誦；另一位國文教師曹聚仁也不諱言，吟誦是他教國文的重心¹⁰²。蔣祖怡所說一般人認為讀文章是冬烘行為，這個現象，朱自清曾解釋過：此源自於五四以還的偏見，因為當時人喜用「搖頭擺尾」形容一些迷戀古人的保守者，而「搖頭擺尾正是吟文的醜態」，為免被貼上落伍標籤以致不敢吟誦了¹⁰³。另外，蔣祖怡推薦了瞭解助詞、虛詞用法的參考書籍，如《馬氏文通》、《中等國文典》、《詞詮》等¹⁰⁴。

（三）各式文體的作法

文章優美巧妙，首先來自於妥適地用字、選詞、造句。字詞用得正確、句子構造穩妥，有了遣詞的基本功後，便要留心文體（文章的體裁），但文體的類別多，分類亦非一成不變，例如可分為韻文、散文，也可分為小說、戲劇、詩歌，不管如何分類，其皆有助於國文教學，避免淪為玄談空說。蔣祖怡認為「研究文體，實為作文上之要務」，他表示：

可以幫助作文——古人有言：「作文必先定體」。我們在着手做文章的時候，先得問問自己，我這篇文章，做給誰讀的？為什麼而作的？目的在哪裏？這三個問題，均牽涉於文體。¹⁰⁵

又：「文章是代替語言的工具，所以求它與所表達的意思能夠符合。然而又因人情之複雜，情景之變幻無定，便不得不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適應。」¹⁰⁶鑑於文體之繁複，蔣祖怡特地針對最基本的四種文體：記敘文、描寫文、論說文、抒情文，設計一套能清楚寫作各體文的程序。

他的作法是每冊書前都有一篇總論性質的提示文，扼述各體的主要形式及內容特色，接著正文放置四篇範文及說明，再以表解方式呈現，最後還設計幾道相關例題讓學生擬作練習。其輔導的方法非常具體、明確，範文亦都自創，這樣的教材設想，據蔣祖怡的說法，在當時可謂為新的嘗試，並曾在執教的學校試驗，而參與試驗者的寫作成績，顯著進步。

（四）文病例舉

開明書店編輯夏丏尊、葉聖陶等輩，曾於一九三〇年代在《中學生》雜誌推出「文章病院」專欄¹⁰⁷，而被收進「文章病院」的資格，根據其「規約」，即：

一、本院以維護並促進文章界的「公眾衛生」為宗旨。二、根據上項宗旨，本院從出現於社會間之病患者中擇尤收容，加以診治。三、本院祇診治病患者本身——

¹⁰²曹聚仁：〈語文教學新論〉，《到新文藝之路》（香港：現代書局，1952年，再版），頁5。

¹⁰³朱自清：〈論朗讀〉，《國文雜誌》第1卷第3期（1942年11月），頁5。

¹⁰⁴詳蔣祖怡：〈語體文中的助詞〉，《字與詞》，下冊，頁134-144。

¹⁰⁵蔣祖怡：〈文體之發生演變及其功用〉，《文體綜合的研究》（世界書局，未繫出版年月），頁9。

¹⁰⁶同前註，頁1。

¹⁰⁷後結集收入《寫作的疾病與治療》。

文章，對於產生文章的作者絕不作任何評價，毫無人身攻擊等卑劣意味。四、本院對於病患者詳細診治後，即將診治方案公布，使公眾知道如此如彼是病，即不如此不如彼是健康，是正常。五、院外同志遇有病患者，希望介紹來院，倘加以診治而將所開方案交由本院公布，尤所歡迎。六、本院附設於《中學生雜誌》中，所有公布的文件，悉歸《中學生雜誌》編輯者負責。¹⁰⁸

《中學生》後又開闢「文章修改」專欄，編輯葉聖陶說：

前幾年的本誌刊載過「文章病院」，很受讀者歡迎。自從停止了以後，常常接到讀者來信，要我們繼續刊載。更有許多投稿者在稿子後面附着一些話，話登不登倒沒有關係，最希望我們能把稿子修改一下。我們很不願意辜負這批熱心寫作的人的希望，可是我們沒有這許多時間，終於辜負了，實在抱歉。現在添設「文章修改」這一欄，算是對於以上兩種囑咐的報答。「文章修改」就是「文章病院」。我們覺得「文章病院」這名稱欠莊重一點，所以改為現在的名稱。文章的疵病往往是大同小異的，取幾篇作為例子，「舉一」，可以「反三」。諸位看了人家文章的改本，對於自己文章的疵病也會發見出來。¹⁰⁹

《中學生》前後兩個專欄，比較大的差異是：「文章病院」的病患是編輯刻意招進來，且多為當時受注目者；「文章修改」的病患則是編輯由來稿中隨意取樣。葉聖陶說：

拿來修改的文章是從投稿中隨意取出的。修改以儘可能不改動作者原意為標準。打個譬喻說，作者原文是一件粗製的器物，我們把牠琢磨，把牠雕削或是修補，使牠成為比較精美完善的器物。我們不把原來的器物毀壞了，自己來另造一件。有一些國文教師給學生改文章，往往把原文塗去了大半，甚而至於全篇，在這旁邊，密密細細寫上自己的文章。這是自己作文而不是給人修改了。這樣辦法，我們以為對於學生並沒有多大益處。¹¹⁰

葉聖陶不主張大幅修改作者原意的態度，蔣祖怡也持以同樣的立場，云：

文病需要治療，治療之後，文章的本身便沒有瑕疵了，但是文章醫生不單醫治文章本身的病，並且得治療作文章的人底文章病。因此，改作文的將原文一概刪去，加上自己底話，這並不是真正的治療法，猶如將病人弄死，再抬進一個沒病的人來替代一樣。對於作文的人，根本沒有一些益處。所以醫治文章，並不比醫治人們的疾病更容易，第一得儘量保持原作者的本意，第二修改的地方，應該不怕仔細地舉出理由來。¹¹¹

¹⁰⁸「文章病院規約」，《中學生》1933年35號。筆者按：規約一文，未署名，據葉聖陶之子葉至善說法，應是章雪村、夏丏尊及葉聖陶共商後，由葉聖陶執筆。至於「文章病院」欄名，也是大家商議而來的。見葉至善〈《中學生雜誌》的《文章病院》〉，《民主》1999年第5期，頁43。

¹⁰⁹詳未署名（筆者按：應是葉聖陶）：〈文章病院〉前言，《中學生》第71號（1937年1月），頁1（總頁321）。

¹¹⁰同前註。

¹¹¹蔣祖怡：〈文章的總治療〉，《文章病院》，頁126。

蔣祖怡認為過多的修改，就像先弄死病人再弄一個無病者取代，此非有效的救治方法。寫作要能精進，不只是應瞭解致病的原因，最終得學會「舉一反三」、「自己領悟」、「自己講求衛生」、「自己盡力修養」。《文章病院》最末一章，便是重視觀摩他人的文本，並期讀者藉以系統地自我訓練。

蔣祖怡的《文章病院》收留了不同症狀的病患，其中對「肥胖病」尤其關心，他說「太嚕嚕，便是犯了肥胖病」¹¹²他以為文章或繁或簡，過猶不及皆非理想。自古以來，論文重繁重簡各有支持者，重繁者如：

◎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陸機〈文賦〉）¹¹³

◎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方苞〈與程若韓書〉）¹¹⁴

重簡者如：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章無補。如皆有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王充《論衡·自紀篇》）¹¹⁵

蔣祖怡從文章病態及修辭學的角度，說明他對所謂繁、簡的看法：

就修辭上來說，也並不是以繁複為上乘，是要文章繁複了，而能增加文章的意趣，否則便不如簡單。繁複而變成嚕嚕，不但不能達到修辭的目的，而且對於文句的文法上也有很大的妨礙。¹¹⁶

過度繁複將損及全句的明白，例如「到了秋天到了的時候的時候」這句，蔣祖怡拿著解剖刀分析：一、為表示同一個意念，重複出現兩個「的時候」，但反而弄得語意不清了。二、重複出現「到了」，這是不妥當的表達，建議改為「到了秋天」、「秋天到了」或者「一到秋天」。三、多用字卻無法增加意義，這就是不經濟的作法，而駢文即常有此疵。蔣祖怡堅信以繁複來使文章嚕嚕，並非修辭學上的事，然修辭學所謂文以繁為工者，則是指繁得可加強文章意趣，換言之，有時為了襯托文章的力度而非繁不可，但那些繁害意的繁法，蔣祖怡指為「文章中的病態」¹¹⁷。

蔣祖怡認為民國初年的語體文，有明晰、質樸、流利之長，但一九四〇年代前後，「受西洋語文的影響，又漸漸趨於繁複一路」，雖然他已意識到這也是自然的趨勢，可是其流弊卻是「嚕嚕與堆砌」，林語堂就看不慣這樣的形式，斥為「新四六」¹¹⁸。蔣祖怡的《文章病院》也把林語堂批評電影「母性之光」說明書的末段文字，列為重複太過之例。「母性之光」電影說明書的末段如下：

¹¹²蔣祖怡：〈文章的肥胖病與瘦弱病〉，《文章病院》，頁 92。

¹¹³同前註，頁 91。

¹¹⁴同前註。

¹¹⁵同前註，頁 92。

¹¹⁶同前註，頁 93。

¹¹⁷同前註，頁 94。

¹¹⁸蔣祖怡：〈白話文體由醞釀而至成功〉，《駢文與散文》，頁 125。

她的悲歌，她的血淚，觀眾們的同情傷感，心絃的緊張——就在欲悲歌血淚，觀眾們的同情傷感，心絃緊張時，繡幕絞絞的（筆者按：應為「緩緩地」）垂落了。¹¹⁹

同時，蔣祖怡也將林語堂在《論語》半月刊上的評語並列：

此文並非比普通白話文不通，其語法亦普通白話文所常見之語法。此種語法好在謹嚴，不善用之，則病嚙嚙。所圈幾句，謂其嚙嚙嚙嚙，誰曰不宜？當係食洋不化者所作。文學革命剛排去駢儷六，却又迎進來新四六，吁，吾惡（筆者按：「惡」應為「憎」）之甚！¹²⁰

語體文趨向專求字面華麗、使用囉唆長句或受歐化句法影響，文字變得繁複不已。蔣祖怡的《文章病院》僅摘錄影片的局部說明書及林語堂的一小段批語，其實林語堂原文還提及至南京觀賞電影「母性之光」，走出電影院後，他對劇中的用語非常有意見：「劇中標目談話，純是不三不四的時行白話，決是鬼話，非人間語。」¹²¹他印象中的「鬼話」是一位母親對女兒所說「你若接收你父親的意見」，這樣的表述，可讓林語堂難受極了（「如蚤子咬癢癢不止」），所謂正常的「人間語」，林語堂認為應該是「你若早聽你爸爸的話」¹²²。蔣祖怡把林語堂所批評的事，當成行文冗沓、惹人討厭的負面案例。

七、結論

蔣祖怡對國文教育的想法與作法，除了個人興趣、從教學實踐及多方研讀中所得，一部份來自父親及其友人的啟蒙薰陶；一部份也受開明書店語文專家夏丏尊、葉聖陶等輩的影響。前者，如父親蔣伯潛之摯友郁達夫對他的提攜，蔣祖怡說過寫小說是受郁達夫啟蒙，並獲其推薦而多次發表作品¹²³。後者，如蔣祖怡仿開明書店《文心》小說體而成《章與句》，取資開明書店《中學生》專欄「文章病院」題材而成《文章病院》，部分實例說解，也引用了夏丏尊之說，尤其留心文字、文章形式的觀點，而與夏丏尊、葉聖陶想法相當接近，他們都把國文當成語言文字的科目，誠如夏丏尊所說「學習國文該着眼在文字的形式方面」、「在國文科裏，我們所要學習的是文字語言上的種種格式和方法」¹²⁴；葉聖陶亦主張「語言是一種工具，工具是用來達到某個目的的，工具不是目的。比如鋸子、刨子、鑿子是工具，是用來做桌子一類東西的。」

¹¹⁹轉見蔣祖怡：〈文章的肥胖病與瘦弱病〉，《文章病院》，頁91。筆者按：蔣祖怡援引時，有誤植，今據林語堂著《我行我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之〈可憎的白話六四〉所附「《母性之光》本事」（頁249）改正。

¹²⁰同前註，頁91。

¹²¹林語堂〈可憎的白話六四〉，《我行我素》，頁247。

¹²²同前註。

¹²³蔣祖怡說：「我從小就愛聽故事，聽得入神時，不禁手舞足蹈，為之神往。及至肄業中學，一九三〇年前後，正是浙江新文學運動極度高漲的時代。我和同學們多數沈浸在莫泊桑，契訶夫、王爾德、巴爾劄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的小說裡；對本國的新文學，以『創造社』為最喜愛。郁達夫先生，是我父親的同鄉至友，我寫小說，他是啟蒙者，更由於他的介紹，我有幾篇小說發表在《文藝月刊》上。及至抗日戰爭期間，郁先生在新加坡主持《星洲日報》副刊，還連載我的中篇小說。」見其〈重版新序〉，《文則》，頁3。

¹²⁴夏丏尊：〈學習國文的著眼點〉，《中學生》第68號（1936年10月）。

¹²⁵當然，形式是相對於內容而言的，究竟語文屬於「工具」還是「本體」（內容本身），各界容或有不一樣的想法¹²⁶，但曾經執教的四位國文老師—夏丏尊、葉聖陶、蔣伯潛、蔣祖怡，卻不約而同地傾重語文的工具性、日常應用的層面¹²⁷。

一九三、四〇年代，因為時空背景相對是較單純的，國、共雖有摩擦但未實質分裂，爭論得不可開交但多直指問題本身，此於建立客觀事理毋寧是極佳的環境。蔣祖怡在這個時期與父親合力推出一系列輔助學習國文的教材、研究合適的國文教學方法，並鼓勵青年讀者利用他們所編纂的讀物自學，其用心於革新國文教育，在現代國語文教育發展史上，佔有一定的位置。尤其在破除前人好弄玄虛、莫名其妙的寫作觀念上，蔣祖怡做出了積極的貢獻，課堂上他常教誨弟子「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落一字空」¹²⁸，課後他努力撰寫如《文章病院》談寫作上的用字、用典、結構、文法、修辭等常識；而《文章技巧的研究》更系統地剖析為文之道，抱持「金針度人」的熱情，《章與句》、《字與詞》則又善用故事體拉近與青年讀者的距離，這些作為欲改善如蔡丏因所指的教學窘境—「學生做一句，先生改一句，為什麼要那樣改？不但學生沒有問，就是先生也未必說得明白。」¹²⁹怎樣說得明白？最基本的門檻是文字及結構應符合「達」。怎樣才能「達」？雖蔣祖怡承認「實無一定之標準」¹³⁰，不過也提醒了「必須使文字造句沒有暗澀的病，同時描寫的活潑，想像的逼真，議論的正確，記事的詳細與明析。」¹³¹

鑑於前人常忽略甚至鄙視文章技巧、文法修辭，蔣祖怡不諱言傳統觀念視此為「遺本逐末」的工作，他說：「宋陳騭有《文則》二卷，是論文章外形的書，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它道：其不使人根據訓典鎔精理以立言，而徒較量於文字之增減，未免逐末而遺本。」¹³²縱然他也覺得一般不贊成有所謂文法修辭的人—持文章變化無定、表達方式千頭萬緒的想法¹³³，這並非沒有道理可尋，只是講究外形，並非盡棄內容，反而要去思考如何透過精進技巧以與所表達的內容相稱，要恰好達到相稱，文法及修辭就是關鍵，如夏丏尊《文心》裡的這段話：「修就是調整，辭就是語言，修辭就是調整語言，使它恰好傳達出我們的意思。」¹³⁴正與蔣祖怡的看法相通。

¹²⁵葉聖陶：〈認真學習語文〉，收於劉國正主編《葉聖陶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卷，頁183。

¹²⁶如潘新和批評：「如果說，語言在一定意義上也體現了工具性，但是以工具性作為語言的基本屬性是不準確、不全面的，語言的基本屬性遠比工具性要複雜、豐富得多。」見其《語文：表現與存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上卷，頁112。

¹²⁷蔣祖怡不忽略應用文題材，如：介紹「稱謂表」、「輓聯」、「對聯」、「訃聞」（訃啟）等、強化閱讀寫作及口頭演說的表達能力，他看重國文「應用」的工具性質，曾表示：「學習國文的目的，最簡括地說是為了應用。多讀別人的文章，可以養成賞鑑批評的能力，多作文，可以使應用時不感受到困難。因此，國文並不是人生的一種點綴品，乃是應用上不可缺少的一件東西。」見其〈孤兒之類〉，《章與句》，上冊，頁6。至於葉聖陶也明確表示：「養成善於運用國文這一種工具來應付生活的普通公民。」見〈發刊辭〉，《國文雜誌》第1期（1942年8月，桂林版），頁4。

¹²⁸習之：〈蔣祖怡教授小傳〉，《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5期，頁90。

¹²⁹蔡丏因：〈序〉，收於蔣祖怡著《文章病院》，頁1。

¹³⁰蔣祖怡：〈文章之目的及其形式內容之分野〉，《文章技巧的研究》，頁13。

¹³¹蔣祖怡：〈文章的疾病與衛生〉，《文章病院》，頁5。

¹³²蔣祖怡：《文章技巧的研究》，頁4。

¹³³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拈花一笑」、「羚羊掛角無處可求」、「文章之妙，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等。

¹³⁴夏丏尊：〈修辭一席話〉，《文心》（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1年重七版），頁215。

蔣祖怡曾說「研究文章雖似迂腐，而實在是艱巨的工作」¹³⁵，怎樣協助青年人得心應手地寫出如王充所謂「內外表裏自相副稱」之文，基於一位語文教師的立場，他不務深奧，從古今中外文章中整理出正負例子，仔細鑽研箇中道理，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紮紮實實地撰就《文章病院》、《章與句》、《字與詞》、《文章技巧的研究》及示範各種文類的原則作法，其間雖例證互見重複，但無損其著之分量，尤其深入淺出的指點，可讀性頗高。當然，文法修辭只是相對而非絕對，也不能過度拘泥成法，他認為活用變通才是根本。形式文理固然重要，也不偏廢內容的充實及思路的清晰，主張「字面」與「思想」密切合作，他認為要解除「想不出什麼」的作文苦悶，平日即需多讀書、多觀察，積學以儲寶，不能僅是空想而已。讀書是間接觀察，而直接觀察則是親身去體驗接觸，兩者應相輔為用，才可寫出「通達」或「動人」的佳文。但有時候作者未必均能經歷，此時適度的聯想「想像」也成了寫作的方法之一，只是「即使是想像，也得『自圓其說』。」¹³⁶此外，蔣祖怡強調了「修改」、「評改」的必要，提醒：「1.有沒有文法上的錯誤？2.用字用詞是否最適當？造句的句調是否太板滯？3.有沒有矛盾的地方？有沒有理由不充足的地方？繁簡是否適當？我該省略哪一部分？5.開頭和結尾有沒有覺得太軟弱些？」¹³⁷這些注意事項如同一份快速的檢核表，學生按表操課即可留意中心思想是否矛盾、論文說理是否充分、遣詞造句是否妥適，這些提問非常具體而實用。

蔣祖怡將讀寫的研究心得試驗於實際教學，沒有泛而不切、不著邊際的毛病，兼顧學理及實作、課內與課外並進，他早年的語文著述現仍流通兩岸，持續發散影響，所表示的意見及作法，雖時空背景迥異於現在，然其中仍不乏值得借鏡者。

¹³⁵蔣祖怡：〈餘論〉，《文章技巧的研究》，頁 158。

¹³⁶蔣祖怡：〈思想與想像〉，《章與句》，下冊，頁 135。

¹³⁷同前註，頁 138。

參考書目

※限於篇幅，凡正文已援引蔣祖怡著述及編輯書刊者，不再贅列。

一、近人論著

-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 林語堂：《我行我素》，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 夏丏尊等：《文心》，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1年，重7版。
- 戚再玉主編：《上海時人誌》，上海：展望出版社，1947。
- 曹聚仁：《到新文藝之路》，香港：現代書局，1952，再版。
- 陸立儀：《淺論蔣伯潛語文教育改革思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1。
- 葉聖陶：《葉聖陶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
- 賈俊學編著：《衣帶書香：藏書票與版權票收藏》，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
- 趙元任、楊步偉：〈憶寅恪〉，收於俞大為等著、傳記文學雜誌社編輯《談陳寅恪》，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
- 趙友培：《文藝書簡》，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77。
- 劉國正主編：《葉聖陶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潘新和：《語文：表現與存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 蔣伯潛：《校讎目錄學纂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 蔣復璁等口述、黃克武編撰：《蔣復璁口述回憶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 鄭子瑜：《中國修辭學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3。

二、期刊及專書論文

- 主編（筆者按：陸高誼）：〈主編者言〉，《記敘文一題數作法》，世界書局，未繫出版年月。
- 主編（筆者按：葉聖陶）：〈編者的話〉，《國文雜誌》第1卷第4、5期，1943年3月。
- 朱自清：〈論朗讀〉，《國文雜誌》第1卷第3期，1942年11月。
- 朱聯保：〈關於世界書局的回憶〉，收於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第1卷。
- 夏丏尊：〈學習國文的著眼點〉，《中學生》第68號，1936年10月。
- 習之：〈蔣祖怡教授小傳〉，《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第5期。
- 葉至善：〈《中學生雜誌》的《文章病院》〉，《民主》1999年第5期。
- 葉聖陶：〈發刊辭〉，《國文雜誌》第1期，1942年8月，桂林版。
- 蔣伯潛：〈自序〉，《章與句》，上海：世界書局，1940，初版。
- 蔣伯潛：〈國文是什麼〉，《新學生》第1卷第1期，1946年5月。
- 蔣伯潛：〈習作與批改〉，《國文月刊》第48期，1946年10月。
- 蔣伯潛：〈童年學習國文底回憶〉，《新學生》第1卷第5期，1946年9月。
- 蔣伯潛：〈詩文中所抒寫的感情之一——「傷逝」之情〉，《新學生》第4卷第1期，1947年11月。

劉怡伶

蔣祖怡：〈先生之德，山高水長——記先父蔣復璁先生的生平事蹟（一）〉，《傳記文學》，第 93 卷第 5 期（總號第 558 號），2008 年 11 月。

三、其他

蔣紹愚：〈蔣祖怡〉，未刊稿。

嘉道經世思潮中龔自珍「援經議政」的今文學走向

張麗珠*

摘要

學術思想豐富博瞻且兼有文采的龔自珍，生當 19 世紀清廷由盛轉衰的嘉道間。其外祖、著名考據學者段玉裁嘗親授以字學，他又從受公羊學於劉逢祿，出入今、古文，並涉獵史學、諸子學與佛學等，是為清代學風從乾嘉考據學轉向晚清今文學，以及嘉道間強調社會變革主題的經世思潮代表人物。其於晚清學風及維新變法，具有鼓動作用的重要影響力。本文主要是將龔氏譏切時政的變法諍言，置諸清代今文學闡發微言大義的「經例闡發/援經議政」學術網絡中加以觀察，以融合學術思想和政治社會的視域，考察其所代表的嘉道今文學走向；並針對學界若干不同觀點的看法，如龔氏劃歸今文家之適切性、龔氏「由亂而治」之歷史觀和「由治而亂」之宇宙觀的今文關聯，以及他圍繞著「如何救弊」和「尊人才」核心思維展開的尊心、尊史、尊子等系列思想之內蘊深度等問題，進行討論。

關鍵字：「三世」說、「三時」說、尊心、尊史、賓賓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到稿日期：2016 年 1 月 23 日。

Development of the Jinwen School Based on Gong Zizhen's Citing Classics to Criticize Political Situation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chu Zhang*

Abstract

Gong Zizhen, a knowledgeable and talented Chinese writer, was born in the 19th century around the time when the Qing Dynasty began falling apart. His grandfather, Duan Yucai, was a famous scholar and personally taught Mr. Go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when he was young. Furthermore, Gong Zizhen also learned the ideology of the Gongyang School from Liu Fenglu. In addition to contemporary and ancient literature, Gong Zizhen dabbled in history, a number of philosophies, and Buddhism. His literary works placed great emphasis on social reform, and he represented the turning point where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gan to become concerned with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stead of just phonology. Gong Zizhen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literature styl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inwen School during the reigns of Emperor Jiaqing and Emperor Daogu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ng Zizhen, through 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s as expressed in his writing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compares different comments of modern scholars to determine the compatibility of Gong Zizhen's literary works with the Jinwen School,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ng Zizhen's historic and world viewpoints and the Jinwen School. Finall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re ideology of Gong Zizhen's thoughts, such as correcting defects and showing intellectuals' respect, in order to evaluate how he interpreted the importance of honoring the mind, history, and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Keywords: the three stages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honoring the mind, honoring history, honoring guests of alien tribe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Received Jan 23, 2016.

一、前言

清代由乾隆間陸燿(1723-1785)《切問齋文鈔》首開風氣，並在賀長齡(1785-1848)之後成為風潮的纂輯「經世文編」之風，具體呈現了儒者經世濟民之改革弊政、創籌良策、致天下於太平等理想。但是長期以來，儒者所有的經世志行，都只能在傳統政體的六部制度下改革，並無法在政體結構上從事根本變革或創新；全面改革政體的契機，是在戊戌變法以後始展露出來的，而此一契機，又溯自嘉道間龔自珍(1792-1841)與魏源(1794-1857)之倡言改革、疾呼變法。因此龔、魏向被視為變動時代中的前驅性代表思想家。

原出司徒官守的儒家在連綿不斷的歷史進程裏，不斷地擴大內涵與變化；但是親民治化、經國治術與淑世理想，始終是儒學的根本思想。儒者面對其當代的「時代課題」，試圖以其所認為最有效的學術方式解決之，並逐漸形成當時具體共識的「學術課題」，遂成就了每一歷史階段能夠反映其時代意識的學術和思想典範，並構成歷史上持續演進的學術動態化發展。19世紀的嘉道經世思潮和17、18世紀清初的經世思潮相比，最大的區別就在突出社會變革的主題要求—清初經世觀比較偏重建設理想社會；19世紀的經世改革則以挽救清朝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為目標，落實現實改革的經世實學，才是嘉道時期的經世訴求及核心思想。龔、魏所處的時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轉衰、內憂外患開始相逼的中葉向近代過渡時期。於時內有白蓮教之亂、外有鴉片輸入。鴉片貿易使得白銀外流，銀荒不但使得政府財政陷於困境，財源枯竭、國庫空虛，銀價暴漲也迫使人民負擔更重的賦稅；尤其威脅國家生存命脈的，是上自親王貴族、下至八旗兵丁紛紛染上的煙癮，不務農、不做工、不經商的結果造成了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國力民力日衰。重以吏治敗壞、奢侈腐化；土地買賣加劇，過多的佃戶和流民平添了社會動盪，皆加深了社會的衰敗危機。值此之際，龔自珍敏感地察覺所謂嘉道「治世」下的真相，是「衰世」面相與「亂世」危機；他充分感受到「山雨欲來」的危疑不安而具憂患感，於是他揭露了清王朝「天命不猶，俱艸木死；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狀況，並提出諸多改革建言。¹至於和龔自珍、林則徐(1785-1850)友好的魏源，亦親見亂後災荒遍地、饑民流離，故潛心經世之學，纂輯《皇朝經世文編》，並撰作《聖武記》、《海國圖志》。《海國圖志》立足在林則徐《四洲志》上，是我國近代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歷史地理與政經文化的巨著，對國人認識西方有極大的推進作用；魏源並在鴉片戰爭後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之具影響力改革思想。斯時復有洪亮吉、李兆洛、管同、包世臣等人，亦皆共起譏評時政。故自龔、魏等人推波後，康熙中葉以後一度沉寂的經世思潮又在嘉道間興盛，並在鴉片戰爭前後趨向高漲。所以梁啟超以維新思想的萌蘗推諸龔、魏，並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²龔、魏站在歷史變動的時點上，其所發揚的儒學經世精神，及其

¹ 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97。

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專集》冊6，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頁54。

結合公羊議政傳統的改革理論等，對於當時沉睡的國人有極大的撼動性。因此欲論晚清思想之「變」，宜自龔、魏始。

本文以龔自珍做為探論對象，在學界已有之眾多研究成果外，³一方面欲藉為觀察學術變遷中晚清今文學風的轉變線索，同時亦欲釐析存在龔氏學術中的若干分歧觀點。譬如龔氏向被劃歸今文家，他曾受公羊學於劉逢祿（1776-1829），並著力發揚「援經議政」之今文精神；但他其實並未著意區分今、古，他在外祖段玉裁（1735-1815）的教導下，亦深契小學訓詁而有考據之作。又如龔氏論經，推闡公羊「三世」說之「由亂而治」階段發展觀，並以此說群經大義；然他對於宇宙觀，另持「由治而亂」之「三時」變動說，惟學界對此罕能區分其邏輯範疇而時有矛盾說法。再者，龔氏之「賓賓」說是否寄寓等待新朝與革命思想？學界從錢穆到張壽安等，都持說「其所待乃在後起之新王」、「自珍述史之意，兼含『以待後王』，……『革命』思想亦暗蘊矣！」⁴但是筆者卻有不同的看法。⁵除上述爭議性論題外，本文兼欲綜理龔氏整體學術思想，欲探索其主張尊人才、尊心、尊史、尊子等理論之軸心線索，以見其非如梁啟超言「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稍進，乃厭其淺薄。」⁶筆者肯定龔自珍活用公羊學「援經議政」精神，從借公羊「三世說」以論《五經》治道、到採取「三時」變動觀來突出更法變制主張；復藉論孔子以《春秋》行「賓法」，以建構其「尊史」、「尊子」之系列理論，誠為嘉道間圍繞「何以救弊」核心意識展開的整體學術思想縮影，可謂為嘉道經世思潮下的代表理論。

³ 學界對龔自珍的研究，其要如張壽安：《龔定菴學術思想研究》（1975年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龔定菴的尊史思想〉（《中國書目季刊》，第12卷第3期，1978.12，頁11-23）、〈龔定菴與常州公羊學〉（《中國書目季刊》，第13卷第2期，1979.9，頁3-21）、〈龔定菴的經世思想〉（《漢學研究》，第10卷第2期，1992.12，頁173-191）；鄭吉雄：《龔自珍「尊史」思想研究》（1995年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龔自珍與晚清改革思潮〉（《第三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中央大學中文系，1997.5，頁91-110）；何佑森：〈龔定菴的思想〉（《故宮文獻》，第1卷第1期，1969.12，頁27-36）；陸寶千：〈龔自珍的社會政治學術思想〉（《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78.3，頁70-76）；周啟榮：〈從「狂言」到「微言」——論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與經今文學〉（《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1984.4，頁295-323）……等；另外，尚有孫文光、王世芸編《龔自珍研究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陳銘編《龔自珍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等會議論文集。至於存在其中的諸多學術爭議與不同論見，另詳本文「三、龔自珍譏切時政的盛世危言」以及註16、58，於此茲不複述。

⁴ 上引分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544；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頁66。

⁵ 筆者論證龔氏強調「尊史」的「賓賓」說係面對朝廷和「賓籍」的異姓卿雙方發言；既呼籲朝廷尊賓以實現太平世「存三統」之義、亦要求在賓須謹守「賓分」以行「賓法」。故自珍乃出於儒者經世理想而以存史自任，期能自尊其心、又備百代禮樂之用，並非革命思想。論詳本文第四節。

⁶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54。

二、清代公羊學發揚微言大義的「經例闡發／援經議政」兩種途徑

清代前期的承平與物阜民豐，推波助瀾了「書本子學問」的乾嘉考據學興盛；清代公羊學立足在常州學派基礎上，在後來的學術發展中，開出了一片迥不同於乾嘉主流考據名物而另主闡發微言大義的天地。乾嘉間常州學派由莊存與（1719-1788）肇始、劉逢祿確立學風——莊氏主要發揚西漢策論文及聖王理想；⁷其外孫劉逢祿則光大董仲舒（前 179-前 104）、何休（129-182）之公羊義法，並突出今、古文對立意識下之今文家法。其後從乾嘉常州學派過渡到嘉道、再到晚清的今文學發展，則清儒用以闡揚微言大義的方式，可以分就典籍工夫、政事發用兩種不同途徑加以考察。

就大體而言，儘管常州學派重視闡發經學「微言大義」的進路，和乾嘉主流價值強調經義的「章句訓詁」有別；但其終不外乎考據學發用，而罕有如嘉道經世學者龔自珍、魏源之針對社會現實以及具體政務的落實改革理論。以代表常州公羊學的莊存與《春秋正辭》和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為例：莊氏《春秋正辭》主要是歸納《春秋》書法義例；劉氏公羊學用以闡發經書微言的方式，亦是《春秋》「屬辭比事」之教，其學主要為分析、歸納何休義例的「何休學」。他將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分散在全書各處並夾注在《公羊傳》傳文下的義例，皆加以歸納、分類，並圍繞著何休「三科九旨」展開一己之理論建構——這些都是典籍功夫，都是以經典義例做為治經進路，其學術旨趣在於經學，且多不外對考據學「釋例」法之運用。是故儘管常州學派發揮微言大義的內容訴求親近西漢今文學，而與乾嘉主流偏好章句訓詁、名物考據之親近東漢古文學有間；但是就論學對象和方法論之運用而言，則不獨莊、劉，即常州學派其他學者如宋翔鳳等，也多是落實在經典文獻上，發揮乾嘉儒者所擅用的「釋例」法，而以「屬辭比事」對經典進行整理歸納與闡發。斯為面對傳統經典以發言。

逮及國勢逐漸中衰的嘉道之世，在加劇的世亂以及鴉片戰爭的經濟侵略、武力威逼中，今文學的發展則逐漸從論學轉向議政，並自公羊學出發而擴及群經，將經義發揮在除弊的論政要求上，從面對經書發言轉向面對社會、面對政事發言。自龔自珍、魏源以迄於晚清康有為、梁啟超等，皆屬於「以經論政」的政事發用路線，亦如西漢時董仲舒之據《春秋》來論政斷案，是為對今文經「援經議政」精神的具體落實。因此龔、魏等人固然以今文家名，他們在學術上也都各有建樹，如龔自珍有《左氏決疣》、《左氏服杜補義》、《春秋決事比》（皆佚），魏源有《詩古微》、《書古微》、《老子本義》等；但是針對經典的證成家法、闡發義例等，並非其學術旨趣，他們主要是將微言大義發揮在建構社會上，是走一條經術經世、通經致用的發揮公羊經義於實際政事之路。是故他們在常州學派的經書旨趣以及劉逢祿、宋翔鳳等人據何休義法以說《論語》之外；龔自珍主要是將公羊大義推向《五經》，而以「三世」說闡明終始治道，魏源則在論學強調三家《詩》和伏

⁷ 論參蔡長林：〈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以臧庸與李兆洛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3.9），頁 263-303。

生今文《尚書》外，復藉《詩》義以諫世。龔、魏之今文學立場及其闡發公羊變易哲學，主要是一種融入社會視野的結合經義、政事方式，故能落實為具體的社會改革和興利除弊主張。以此，自珍雖然借用「三世」說以說群經，但其治經以及援經議政，主要都是發揮大義，是借公羊歷史哲學之變易觀以及階段發展觀，以做為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不是追求《春秋》書法義例。

是故晚清今文學大盛及其被倚為變法維新之理論依據，以及晚清變法思想與今文學產生聯繫等，正是溯自龔、魏等人以經書做為變法更制之所本，據以對現實問題展開批判並提出具體改革主張。易言之，龔、魏等人在傳統經典中融入社會視野，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梁啟超言「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⁸因此龔、魏所代表的嘉道經世思潮和援經議政的嘉道今文學發展，深刻影響了康有為（1858-1927）「托古改制」之藉公羊義法以為變法張軍，以及集政治、經學、哲學於一身的晚清今文學走向，是為居間聯繫常州公羊學和晚清維新變法思想的學術變遷重要關鍵。

三、龔自珍的古文興趣和以經論政的今文發揮

龔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素以今文學及詩文名世——錢穆亟稱其文集「文絕瑰麗，如怨如慕，極動宕之致」、「文絕冷雋，如泣如訴，極淒婉之致」；⁹不過其家學實際上有很深的樸學淵源，他是戴震（1723-1777）著名弟子段玉裁的外孫。其父龔麗正為段玉裁門生及女婿，著有《國語補注》、《楚辭名物考》等；段氏亦嘗親授以《說文解字注》，期望他成為「以經說字，以字說經」的學者。自珍在 23 歲時撰有〈明良論〉4 篇，深獲段氏喜愛，評曰「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並言「耄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¹⁰但是身處嘉道間國家走向動盪不安之際，自珍儘管一方面「深契乎金壇高郵之小學訓詁」；然他在接觸劉逢祿今文學後，其〈己亥雜詩〉即賦詩道「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¹¹表明他走出傳統舊學而轉事於結合經義、政事的今文學決心。在劉逢祿卒後十年，他撰作完成《春秋決事比》之後，並有詩道「端門受命有雲初，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禱劉禮部，東南絕學在毘陵（武進縣）。」¹²說明他以遙遠徒孫繼承公羊絕學和劉氏學的自期。所以他亟以特有的敏銳眼光，對於腐敗的政治與社會現狀加以揭露和批判。其發揮經義於除弊的時政要求，聚焦呈現了其為今文家的身分，已如前述；而其以詩文指摘時弊並抨擊朝政，並開當時以詩文評論政治社會及要求變革的文學新風。尤其 315 首的〈己亥雜詩〉，更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文學改革先鋒的地位，且贏得南社詩

⁸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55-56。

⁹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538、540。

¹⁰ 龔自珍：〈明良論四〉附見，《龔自珍全集》，頁 36；複見吳昌綬編：《定盦先生年譜·二十三歲》（《龔自珍全集》附錄），頁 599。

¹¹ 龔自珍：〈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龔自珍全集》，頁 441。

¹² 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59 首，《龔自珍全集》，頁 514。

人柳亞子（1887-1958）「三百年來第一流」之美譽。¹³故自珍後來雖因「動與世忤」的「狂士」、「狂言」風格，得罪權貴而辭官還鄉；但其宕跌不檢細行的性情、浪漫豐富的情感，以及結合經史百家、小學輿地和當代典章制度以譏評時政的激切論見，在當時頗造成振聾發聵的作用，即反對戊戌變法的守舊派葉德輝（1864-1927）也說「曩者光緒中葉，海內風尚公羊之學，後生晚進，莫不手先生文一編。」¹⁴其鼓動晚清今文學風的影響力，於此可見一斑。

（一）反對據守今文之不廢古文立場

雖然自珍向被稱為清中葉後的今文學代表，梁啟超亦言「今文學之健者，必推龔、魏」；¹⁵但他並非恪守今文傳統的學者。他在 28 歲已經從受公羊學於劉逢祿，後仍於 48 歲的〈己亥雜詩〉中說到「張杜西京說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譌。」¹⁶認同小學訓詁以其實證能夠平息眾議，如此態度頗與魏源等今文家視乾嘉考據學為「錮天下聰明智慧於無用」者不同。¹⁷而且在治經上，他雖重公羊大義，卻刊落條例，並未以師承家法為取捨，其與據守今文而貶斥古文的劉逢祿、魏源等人，有鴻溝之別。他所錄寫的〈尚書古文序〉，更祖承其外祖段玉裁訓示，曰「偽孔氏《尚書》，視馬、鄭本文字無大異也。梅賾及偽孔罪雖大，未嘗竄改文字，又非別經師相承能異文字者也。《尚書》如此，〈書序〉亦然。自珍今寫定〈書序〉，即用偽孔氏本。」可知他不似一般今文家之峻拒古文《尚書》。他甚至倡論「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只不過「一為伏生之徒讀之，一為孔安國讀之」，殆如「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¹⁸所以他不獨對於《尚書》，即於他經，亦表明不廢古文的立場。其自述曰「予說《詩》以涵泳經文為主，於古文《毛》、今文《三家》，無所尊，無所廢。」¹⁹便清楚說明他對今、古文無所尊廢的學術態度。

再者，在學風上，龔自珍也不贊成今文學者素來所好言的災異讖緯說，更反對推擴《春秋》災異說及於他經。他批評劉向在《尚書大傳》中放入〈五行傳〉，是「誣伏生」，他說「〈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認為五

¹³柳亞子：《柳亞子選集·定庵有三別好詩，余仿其意作論詩三截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頁 681。

¹⁴葉德輝：《郎園北遊文存·龔定庵年譜外紀序》（《葉德輝集》冊 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61。

¹⁵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 55-56。

¹⁶分詳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551；章炳麟：《煊書重訂本·學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頁 117；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58 首，《龔自珍全集》，頁 514。

¹⁷魏源嘗言乾隆後的士大夫「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釵析」，「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傳〉，《古微堂外集》（光緒四年淮南書局刻本，卷 4，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¹⁸龔自珍：〈最錄尚書古文序寫定本〉、〈大誓答問第二四：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龔自珍全集》，頁 244、75。

¹⁹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63 首自註，《龔自珍全集》，頁 515。

行本來不具災異義；欲以災異現象說之，只能稱為〈洪範庶徵傳〉，不能稱為〈五行傳〉。所以對於莊存與《春秋正辭·察五行祥異》之歸納《春秋》眾多災異說，如火不炎上、水不潤下、木不曲直、土不稼穡……等五行失性之例，他皆自區別陰陽五行和災異的角度加以反對，強調「五行未嘗失其性也。」他持論「《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陰陽，〈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並且主張「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²⁰顯見其與一般今文學者喜言災異有別。

此外，對於常州學派莊存與，一般今文家多肯定其為清代公羊學首倡；龔自珍之著眼卻大不同於此。他之看重莊存與，並認為是莊氏門徒所「不能宣其道」的地方，正在莊氏維護古文《尚書》，自珍認為這是莊氏為保存聖人之言而行權的做法。自珍說自從閻若璩以《尚書古文疏證》辨明偽《古文》後，莊氏認為已毋須再致辨於《古文》的真偽問題了，蓋「辨古籍真偽，為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是以莊氏《尚書既見》屢稱〈禹謨〉、〈堯誥〉、〈伊訓〉，並反對朝廷廢《古文》學官，不是由於他不知《古文》之偽；而是認為「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自珍指出莊氏為維護聖教，「為有所『權』以求濟天下」，故「自輒污受不學之名」，寧受學者之詬，最後終使《古文》仍得以保留學官一斯即自珍之稱美莊氏為「史之大隱」者。²¹於此可見自珍之肯定莊存與，其與今文家著眼的復興公羊學角度，實大相逕庭。就《尚書》而言，他之讚美莊氏維護古文《尚書》，其實是站在今文學之對立面。而自珍之引宋翔鳳為同志，稱以「樸學奇材」，並賦詩道「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²²也正由於翔鳳雖受外家莊氏學，卻自小學入門，在常州公羊學外復兼有考據之長。是故自珍論學儘管不乏繼承公羊學的一面，但他並未完全以今文學為依歸；他另有緣自政治現實，以及承外祖之教和尊史為經的乾嘉風尚與一己所見，不可純粹以今文家看待之。因此曾對龔自珍和劉逢祿、魏源一視同仁而痛加貶斥的古文派章太炎（1869-1936），也在民國建立後，對支偉成的《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提出商榷，²³認為龔自珍和清代今文學家宜乎有所區別。

（二）以進步觀的公羊「三世說」論《五經》終始治道

龔自珍的思想乃以拯時救弊做為中心意識；其結合經學、政論以及環繞此一意識而展開的學術思想，主要為發揮何休公羊學「三世」說並推諸《五經》治道的階段發展觀，以及立足公羊變動精神上，依「三時」變動說而提出的「更法」變制主張。以下先論其藉公羊「三世」說以論《五經》治道之歷史觀。

²⁰以上皆詳龔自珍：〈非五行傳〉及其案語，《龔自珍全集》，頁130、131。

²¹上詳龔自珍：〈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龔自珍全集》，頁141-142。

²²龔自珍：〈己亥雜詩〉第139首自註、〈投宋于庭〉，《龔自珍全集》，頁522、462。龔氏並在〈己亥雜詩〉「玉立長身宋廣文，長洲重到忽思君。遙憐屈賈英靈地，樸學奇材張一軍」之句下，自註以「『奇材樸學』二十年前目君語，今無以易也。」

²³論參梁紹傑：〈龔自珍學術思想新探（上）〉，《大陸雜誌》第94卷第6期，1997.6，頁46，註5。

身為清代考據學大師戴震高弟段玉裁外孫的龔自珍，儘管段氏曾經親授以《說文解字注》，他亦有《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考》，以及商榷《禮經》的《丙子論禮》、抉摘劉歆竄亂的《左氏決疣》等考證之作；然而他卻是學界盛稱的、清中葉以降今文學之代表。此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接受了何休的「三世」說，並依「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之階段發展觀以說春秋 242 年間事，又據此「三世」說以論《五經》之大義及終始治道——即自珍相當程度地倚重公羊學理論以建構一己學說。不過自珍之於公羊學，主要是接受「三世」發展觀以做為「援經議政」之理論基礎；故他雖然從受公羊學於劉逢祿，卻與劉逢祿在經論和治經方法上務力分別今、古文，以及區別「經/史」而尊《公羊》、黜《左傳》之學術旨趣不同。以此，其與好友魏源之「由典章制度以進於西漢微言大義」——欲上復西漢今文主張，亦復有別。要之，自珍之春秋學，摒棄學界所好言的經、史之爭與今、古文之爭；他之發揚公羊思想，亦非闡揚劉氏所看重的解經義例；他主要是落實實踐孔子所謂的「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欲以「援經議政」精神，逕將《春秋》微言發揮在時政操作上。

在春秋學上，自珍著有《左氏決疣》、《左氏服杜補義》、《春秋決事比》等，惜皆不傳；其《春秋決事比》係效為董仲舒以公羊決獄及「漢廷臣援《春秋》決賞罰」的做法，以發揮《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之「長於斷獄」精神。全書部為十一篇，得百二十事，如論君道、君守、臣守、不應重律、不應輕律、不定律、不屑教律、人倫之變……等；其於經文之「文直義簡，不俟推求而明」者——如書弑、書篡、書叛、書專命、書僭、書滅人國……等，皆不深論，所論多在微言。其書雖佚，然其文集中有〈春秋決事比自序〉及其目錄、答問等。自珍自述其撰作精神為「三傳」並用，但在《春秋》大義上，他乃以《公羊》為依歸；考究事實，則輔以《左傳》，同時兼採《穀梁》為論斷。其曰：

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月日時、區名字氏，純用公羊氏；求事實，間采《左氏》；求雜論斷，間采穀梁氏，下采漢師，總得一百二十事。獨喜效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七十子大義，何邵公所謂非常異義可怪，惻惻乎權之肺肝而皆平也。嚮所謂出沒隱顯於若存若亡也者，朗朗乎日月之運大圓也，四宮二十八宿之攝四序也。²⁴

自珍效董子據《春秋》以決事的精神，自言所撰《春秋決事比》能「權之肺肝而皆平」地體證七十子大義及何休公羊義法，故儘管其春秋學並未定趨於今文學，對《春秋》之記事論斷，他也間採《左傳》、《穀梁》，但就其發揚微言大義及何休義法的進路而言，他確是親近《公羊》之今文經學的。

自珍在要求革除時弊與更法變制的中心關懷下，他將何休義法和《五經》加以結合，以「三世」說闡明《五經》之終始治道，並論以聖人治道「始乎飲食，

²⁴龔自珍：〈春秋決事比自序〉，《龔自珍全集》，頁 234。

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²⁵即由「飲食→制作→道德教化」循序漸進之。故其說《詩》，以后稷為「據亂世」，公劉（后稷曾孫）為「升平世」，武王巡守而祀四嶽河海的〈般〉和封禪以告太平〈我將〉等樂歌為「太平世」；說《尚書》，以〈洪範〉之食、貨為據亂而作，祀、司徒、司寇、司空為治升平之事，賓、師為文致太平之事。曰：

若夫徵之《詩》，后稷春禘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般〉有〈我將〉，〈般〉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²⁶

自珍論《詩經》，謂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到公劉教民，而豳國之民無不尊其宗且上下有章、財用不乏；再到文武加以禮樂文飾，於是《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成王周公更以制禮作樂致太平而《頌》聲興焉，是為《詩經》之「三世」漸進。至於《書》，則他亦以〈洪範〉「八政」與公羊「三世」說相配合，謂致力於百姓民生的食、貨為「據亂世」之法；事死之「祀」以及負責掌教之「司徒」、司法之「司寇」、掌土木水利等邦政之「司空」，即順民情以立制者為治「升平世」之法；接著「太平世」所致力者，依漢儒之說，為禮諸侯遠人的「賓」和以兵除暴的「師」，即後世外交部和軍政部之所事，但是自珍並未採取此說，其賓、師之論另寓有「存三統」和強調師儒教化之義（詳下文），是為「太平世」擴大王化之法。

自珍之以「三世」說《五經》，其路數並非其外祖段玉裁期望他的考據治經、以字說經；而是具有今文學色彩之以何休義法說《五經》。其論又曰：

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為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謹求之《書》，皐陶為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其在〈洪範〉，八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²⁷

自珍縷縷舉證《詩》、《書》、《禮》、《易》，以證明《五經》治道皆先之以「飲食」之道，然後才及於「制作」之道。必使民之飲食、祭祀、城廓、宮室得安，民之訟獄與國之兵刑得當後，即食貨已具、制作已備之後，然後再以「性與天道」等

²⁵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論〉，《龔自珍全集》，頁 41。

²⁶上引見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龔自珍全集》，頁 46。

²⁷上詳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論〉，《龔自珍全集》，頁 41-46。

道德教化加以文飾。而自珍之所以被視為今文家，在相當程度上，正因他以「三世說」說《五經》。

除發揮「三世」之義以對《五經》進行「終始治道」之詮釋外；自珍復將「三世」之邏輯範疇擴大到對一切事物的終始形容之謂。以此，「三世」說不復侷限於通古今而為說，凡事物在一個時期內的演進歷史，亦皆可藉「三世」為其終始喻稱。其言曰：

通古今可以為三世，春秋首尾，亦為三世；大撓作甲子，²⁸一日亦用之，一歲亦用之，一章一節亦用之。²⁹

如此一來，「三世」不徒可以通古今，即日、月、歲、時、事，亦皆可以用之，故可做為所有事物的階段演進之謂。

此外，自珍又由此進論八政各有三世，曰「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³⁰此義且影響及康有為提出「據亂之中有升平、太平；升平之中有據亂、太平；而太平之中有升平、據亂。蓋一世之中又有三世，三重而為八十一世」的「三世三重」說。³¹自珍之謂「八政」各有「三世」者，他曾以〈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篇加以深論。其中如他回答問「司寇之三世」者，他以《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一事為例，³²以闡明「教」與「刑」應循「據亂→升平→太平」—「由亂而治」的「三世」次第漸進。其言曰：

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為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³³

昭公 19 年許世子止進藥而悼公飲藥死，止本欲癒父病，並無害父之意，然而悼公畢竟因止進藥而藥殺，故孔子加「弑」焉。自珍說明此蓋由於依何休之「三世」區分，「所見世」的昭公已進於「太平世」，則就人倫教化言，斯時當為施教久而用心精的時期了，因此孔子對於道德標準必須採取一種「責忠孝也密」的高尺度要求。可見就刑、教言，其施教與量刑之輕重，必須依「所見世 / 所聞世 / 所

²⁸案：黃帝嘗命大撓以干支紀年。

²⁹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龔自珍全集》，頁 48。

³⁰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龔自珍全集》，頁 46。

³¹康有為嘗曰「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為九世，又可推為八十一世，以至於無窮。」「據亂之中有升平、太平；升平之中有據亂、太平；而太平之中有升平、據亂。蓋一世之中又有三世，三重而為八十一世，皆有義可推。」（氏著：《孟子微·總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 1，頁 5；〈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不忍雜誌彙編二集》，台北：中國圖書出版社，1968，卷 3，頁 38）。

³²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 291。

³³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龔自珍全集》，頁 47。

傳聞世」之「三世」次第不同而有階段性標準，此即自珍「八政又各有三世」所寄寓的聖人治道「由亂而治」之歷史發展觀。自珍之推擴「三世」以及於事事物物，所論既有立足在何休「三世」說的一面，也有進一步發揮與擴大引申之一己所見，而皆深具今文經學特色。

（三）以退化觀的「三時說」論「更法」之必要

在進步觀的「三世」階段發展外；自珍又持宇宙萬象「由盛而衰」的變動發展觀，並由此日漸趨敗的角度，說朝廷變法革新之必要性。

自珍的歷史觀和宇宙變動觀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思考：其言「民之醜生，一縱一橫。旦暮為縱，居處為橫；百世為縱，一世為橫。」³⁴自「縱」者之歷史（百世）演進言，如前論歷史意識與歷史哲學，他接受何休「據亂→升平→太平」的「三世」發展說，持「由亂而治」的進步看法；但在「橫」者之「一世」現象變化上，則他立足於公羊變動哲學和《易》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精神上，強調變動的、「由盛而衰」的宇宙循環往復規律——「三時」說，由此突出「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之變革思想。³⁵故在自珍「尊史」的「尊隱」思想中有「縱之隱」與「橫之隱」之別。³⁶他肯定「縱之隱」之能肩負歷史責任而掌握大道、傳承文化，但同時亦肯定「橫之隱」之能肩負時代責任而從事於政治社會改革。在進步發展的歷史哲學外，他又從萬有現象之自然變化與相反相成的運動規律出發，曰「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³⁷他並從現象界不斷變化發展的「萌發→茁長→衰亡」歷程中提煉出「早→午→昏」的「三時」說，曰「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³⁸此蓋由於自珍在史載借鏡中，深刻體悟了一世之法、事、勢與風氣皆無有不變遷者——「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³⁹故他面對清中葉以降的日衰世運與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欲有所警惕於朝廷而呼籲變制除弊，他強調「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寵靈史氏，將不謂之橫天地之隱歟？」⁴⁰因此自珍在當時頗具前瞻性的「更法」變制主張，便是根基於「初→盛→衰」之自然變動觀，而將重心放在「衰世」之

³⁴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頁 88。

³⁵龔自珍：〈古史鉤沉論四〉，《龔自珍全集》，頁 28。

³⁶鄭吉雄前揭書亦嘗涉論「縱之隱」與「橫之隱」；但鄭著偏重強調自珍之論「縱之隱」，其曰「自珍隱約地透露了一個訊息：他自己並不以『橫天地之隱』自居。……他性格毋寧更接近於他所說的『縱天地之隱』。」（頁 186）所論與本文此處以「橫之隱」結合了自珍的「更法」主張，其重心與論述皆異。

³⁷龔自珍：〈王癸之際胎觀第五〉，《龔自珍全集》，頁 16。

³⁸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頁 87。

³⁹龔自珍：〈上大學士書〉，《龔自珍全集》，頁 319。

⁴⁰以上皆詳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頁 88。

救正衰亂現象上；即他乃以此一「由治而亂」、「由盛而衰」的「三時」說，做為要求執政者變革除弊的理論基礎。而自珍之歷史觀與宇宙變動觀雖然存在著殊異性看法，但因其所關涉的邏輯範疇與對象不同，兩者之間並無矛盾。

再就自珍之經典落實來說，則他之發揚《春秋》精神，主要是通過「援經議政」方式，以使學術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等「當今之務」相聯繫。是以他除撰有《春秋決事比》之光大董仲舒以公羊學經世的著作外；更重要的是，他發揮公羊變動哲學於針砭時弊和批判腐朽社會上，並提出各種更法變制的建言，此其與劉逢祿等經書旨趣的常州學派之殊異處。自珍所關懷的時政議題，有滿蒙民族問題、土地分配問題、人口過剩問題、邊疆防衛議題、東南海防議題、鴉片與經濟貿易問題、東南水利問題、君臣議題、胥吏議題、科舉、人才、考核、禮律等等。

⁴¹以下略舉例自珍之以「三時」變動觀論社會問題，以見其一斑：

在〈乙丙之際箸議第一〉中，自珍述及辛酉歲近畿大水，越七年又水，東南河工屢災，財空民窮，當時有客言「物極將返」，「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甚至預言「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越六年，果然「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對此，自珍即以「氣」之積「漸」、尚「動」與成「勢」以說民氣，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⁴²他認為民怨鬱之久而發之暴，其咎正在朝廷漠視民瘼而不能為之疏源導流以通其氣；他更憂心若此以往，則將難免至於「昏時」之衰敗，而「日之將夕，悲風驟至。」故他屢發鐘磬之音警示朝廷而呼籲變法。曰：

履霜之屨，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飄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譴。士勇夫，而厚秦駑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⁴³

自珍亟言當處在履霜、未雨的將變未變之時，執政者就要趁早綢繆，防範未來堅冰和風雨飄搖的對應措施，以使長治久安，切勿等到其變一旦猝然發生，而已如癰疽潰爛、草木枯槁之不可為治，而徒呼負負。故他大聲疾呼朝廷要能「探世變」，在世變之前預為防範。

又如自珍觀察到地權不均、貧富懸殊的現象，正是造成當時社會動盪與危機四起的禍源，他亦說以氣之積鬱而致變。曰：

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

⁴¹關於龔自珍具體論政的經世思想，請另參陸寶千〈龔自珍的社會政治學術思想〉、何佑森〈龔定菴的思想〉、張壽安〈龔定庵的經世思想〉、孫廣德〈龔自珍的經世思想〉、周啟榮〈從「狂言」到「微言」——論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與經今文學〉、劉聿新〈龔自珍的政治思想〉、陳振風〈龔自珍的變革思想〉、孔繁信〈龔自珍的經世思想〉、江雨珍〈龔自珍經世思想之探析〉……等。

⁴²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一〉，《龔自珍全集》，頁1。

⁴³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龔自珍全集》，頁7。

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⁴⁴

自珍亟言物事之「變」皆有其「漸」，並非一夕形成；以「喪天下」之遽變為言，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勢之所起，初時亦不過是「貧富不相齊」之小不平而已，然而不平之氣由小而大，遂至「喪天下」之勢不可為，可不慎乎？於此並可見自珍所諄諄再三、極力呼籲者，在於欲使「操其本原」的執政者，能「隨其時而劑調之」，及早更法變制以預為防範，毋使魚爛而至於喪天下。

以此，自珍亟斥守舊派之不知變通，謂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天下無巨細，一束之於不可破之例。」他大聲疾呼「奈之何不思更法？」「一祖之法無不敝。……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⁴⁵要之，自珍藉「三時」說以闡明世運變化並要求更法變制，力求避免「昏時」而「天命不猶」、「朝士寡助失親」之將至；他甚至帶有恫嚇意味地大膽推論，若不能早從事於此，則必將有取而代之的「勁改革」出現，所論無異在保守的國人心靈中投下了巨石，在當時極具震撼性和啟蒙作用。

四、龔自珍突出人才思想的尊史主張

龔自珍的思想主張皆緣革除時弊的核心意識展開，並提出補偏救弊的良方；故他雖借西漢今文學援經議政的做法，發揮今文經世精神於針砭時政上，實則他是基於論政訴求，不是由於經學興趣。其借經論政，殆亦同於劉逢祿論孔子「王魯」祇為張法之工具——「《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于火之德也。」⁴⁶凡今文經學、或公羊思想等亦祇是做為自珍論政更法的「薪蒸」，即宣火之明的薪柴、工具而已。所以包括藉公羊「三世」說以闡明「太平世」的師法王教重要性、立足在「三時」說上呼籲的變法改革，以及由於經世變革需要人才而主張「尊史」之培養人才等，才是他拯時救弊的核心關懷。

自珍深感專制統治者摧鋤士氣、扼殺人才；他病士風萎靡、世人樂為鄉愿，故謂「士氣申則朝廷益尊」，⁴⁷亟務力於尊人才以提振人心；至於他個人，則傲岸不群地寧願「猖狂乞食過江淮」，不肯與「僥倖故人」同流。⁴⁸而他在要求士人挺立起自我價值之同時，亦正告統治者：變則存，不變則亡，亟以變法更制為訴求。自珍圍繞著「尊人才」展開系列對於個人主體性的「尊心」理論建設，如〈尊隱〉、

⁴⁴龔自珍：〈平均篇〉，《龔自珍全集》，頁 78。

⁴⁵龔自珍：〈乙丙之際箴議第七〉、〈明良論四〉，《龔自珍全集》，頁 5-6、35。

⁴⁶劉逢祿認為孔子借「王魯」做為張法的工具，「王魯」祇如「薪蒸」一般，既非史實、亦非孔子真欲以魯繼周。詳氏著：《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72，卷 1285，頁 5。

⁴⁷龔自珍：〈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龔自珍全集》，頁 12。

⁴⁸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94 首有曰「僥倖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龔自珍全集》，頁 518）。

〈尊史〉、〈賓賓〉、〈尊任〉、〈尊命〉……等，於此包含要求朝廷應「尊其心」地尊士、養士，以及個人應「自尊其心」之雙重層次；此外，他又在文化與學術途轍上，揭示出尊史、尊子等藉以建立個人主體價值的學術門徑。

（一）尊人才與尊心

關於自珍之尊人才與尊心，雖前賢論述已詳，如鄭吉雄與張壽安等；⁴⁹然因「尊人才」是為貫串自珍系列理論的軸心線索，為求脈絡之完整性，筆者仍述論如下：自珍立足在公羊學強調變動思想以及他對事物變動本質的深刻體認上，強烈主張更法變制；而更法有待於人才——「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⁵⁰他嘗賦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之名篇，⁵¹指出只有真正的人才，能令九州生氣。他不滿朝廷未能重視及重用人材，他在強調因時變革的「三時」說外，又相應於宇宙變動觀之「由治而亂」而提出「治世、衰世、亂世」之「世有三等」說，他依其世之有無人才？人才等差？人才是否為世所用？以判定世之「三等」。他抨擊衰世之棄才摒智、人才見黜，並揭露嘉道治世表相下之「不才者以紫奪朱」現象，亟批判衰世與治世貌似而實非的衰敗本質。其言曰：

才之差，治世為一等，亂世為一等，衰世別為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

自珍指陳衰世之流，其文、其名、其聲音笑貌皆貌似治世；然而究其內容，卻是廢五色而冒為治世之素，雜音聲而冒為治世之音，荒隳畔岸而冒為治世大道，人心混逐而冒為治世靜謐。他甚至嘗以滿眼「縛草為形，實以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於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為泥砂」，⁵²以譏刺不才之人。故衰世之與治世別，正在人才、不才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然而尤可怖懼者，還在人才遭嫉、晉用無門，負大才者往往被壓抑而志不能伸。自珍曾撰〈捕蜮第一〉、〈捕熊羆鴟鵂豺狼第二〉、〈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等文，藉其「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輒忌，……「能含沙射人影」、「性善懷，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無性，聚散皆適然也，而朋嚼人，使人憤耗」、「無肺腸」，⁵³以狀寫其害人之甚。他並嘗致論曰：

⁴⁹詳張壽安《龔定菴學術思想研究》，台灣大學 1975 年中文所碩士論文；鄭吉雄《龔自珍「尊史」思想研究》，台灣大學 1995 年中文所博士論文。

⁵⁰龔自珍：〈上大學士書〉，《龔自珍全集》，頁 319。

⁵¹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125 首，《龔自珍全集》，頁 521。

⁵²龔自珍：〈與人箋五〉，《龔自珍全集》，頁 339。

⁵³龔自珍：〈捕蜮第一〉、〈捕熊羆鴟鵂豺狼第二〉、〈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龔自珍全集》，頁 132-133。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戮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漸，或三歲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將見戮，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悻悻者則蚤夜號以求亂。……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⁵⁴

自珍痛心衰亂世之人才每為不才者所督之縛之，他以才士之「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對比朝士之「偃焉偷息，簡焉偷活，側焉惶惶商去留。」故他大膽預言，如此則必將有悻悻者轉而求亂，他甚至說亂亦不遠矣！另外，自珍亦在〈尊隱〉文中反覆申說此義。他說負大才者仕進無門，亦猶「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反之，詐偽不材者「是輦是任」，故「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如此則必將肇致山中豪傑起的嚴重後果。其言曰：

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竄人子篡之，則京師之氣洩；京師之氣洩，則府於野矣。如是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⁵⁵

如論，在自珍一向力陳的更法變制之外，更謂「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有大音聲起」，「有自公侯者」，「山中之歲月定矣！」似是警示了革命將至。故自珍除因倡議變法而成為維新先驅外，更以大膽宣說將有反專制革命發生，而發出驚醒了國人沉睡的鉅音。雖然自珍本人未必有革命想法，所論或用以寄託懷才見絀、久困閒曹的激憤悲嘆；但他不顧自身安危而不諱言革命，其思想膽識與前瞻性，實不待言。

至於造成朝廷不重人才的原因，自珍接著勇敢地把矛頭指向獨尊之帝王。他認為人才之不受重視，尤以帝王獨尊之未能尊士為最，並謂由此造成了天下士不能自尊其心、去廉去恥之嚴重後果。他痛言：

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彊武。⁵⁶

其言士人長期處在帝王集權獨尊而刻意突出「一人為剛」之有力彊武威勢下，造成了「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而已」，「官益久則氣愈嫻，望愈崇則

⁵⁴龔自珍：〈乙丙之際箴議第九〉，《龔自珍全集》，頁 6-7。

⁵⁵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頁 87-88。

⁵⁶龔自珍：〈古史鈎沈論一〉，《龔自珍全集》，頁 20。

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的「萬夫爲柔」結果。對此，梁啟超亦曾加以繼承，他亦批判「一人剛而萬夫皆柔，一人強而天下皆弱，此霸有天下者之恆情也。」⁵⁷要之，自珍雖處專制帝制下，但卻勇敢批判帝王之獨尊正是造成士夫寡廉鮮恥的禍害根源。然則欲臣節之盛，應當如何？曰「以教之恥爲先。」——自珍正是由此開出涵蓋勸諫君主尊士和要求士夫自尊的「尊心」說。

在勸諫朝廷與君主必須尊士、養士上，自珍藉《禮記·中庸》云「敬大臣則不眩」，《戰國策》郭隗說燕王「帝者與師處」、「亡者與役處」，而「憑几其杖，顧盼指使，則徒隸之人至；恣睢奮擊，咆哮叱咄，則厮役之人至。」以及賈誼諫漢文帝「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等賢哲故訓以爲說；復藉「唐宋盛時，大臣講官，不輟賜坐、賜茶之舉，從容乎便殿之下」，以對比後世「朝見長跪，夕見長跪」之殿陛禮儀。闡明盛世君主必是能夠親近賢士且能尊之者，而要求君主親近師儒並保持平行對待的關係。所以「尊其心」其實也就是「尊其人」。要之，自珍認為朝廷不能尊士和士夫希冀寵眷，是造成官僚腐化墮落，終至巧取豪奪的根源，故曰「士不知恥，爲國之大恥。」「士無恥，則名之曰辱國；卿大夫無恥，名之曰辱社稷。」⁵⁸他亟要求朝廷必須以尊士、養士，尊其心以勵其節。

除站在對立面批判朝廷不重人才、不能尊士外；針對士大夫，自珍亦提出「自尊其心」的要求。他首先挺立一己之心的地位，曰「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⁵⁹他要求凡對於一切物事的思考判斷，都必須是一種驗之於心的「心審而後許」狀態，而不能是「察而弗許」的俯仰隨人、從人腳跟。為使人人皆能自尊其心，自珍說明了「我」以及「心之力」所能產生的巨大作用力。其言曰：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⁶⁰

自珍高調論「我」，認為天地間凡一切物事種種，皆由「我」、即人所造；然而「我」如何造之？曰「心之力」，因此他高度看重人之心力，認為人以有「心之力」而能成就一切事。自珍如此充滿活力、熱情且深具感染力的語言，對於維新變法深具鼓動力量，不僅譚嗣同的《仁學》也強調「以心挽劫」，筆鋒同樣常帶感情的梁啟超更受到鼓舞，嘗言「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其「心力」說亦與自珍如出一轍。⁶¹自珍對於晚清思想的解放，確實與有功焉！

⁵⁷梁啟超：〈論尚武〉，《新民說》（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頁113。

⁵⁸上引見龔自珍：〈明良論二〉，《龔自珍全集》，頁31-32。

⁵⁹龔自珍：〈文體箴〉，《龔自珍全集》，頁418。

⁶⁰上引分見龔自珍：〈王癸之際胎觀第一〉、〈王癸之際胎觀第四〉，《龔自珍全集》，頁12-13、15-16。

⁶¹梁啟超嘗曰「蓋心力渙散，勇者亦怯；心力專凝，弱者亦強。是故報大仇、雪大恥、舉大難、

從自珍的尊人、尊心力，很容易又會導向「尊情」之反對種種違拗人情行為，以此自珍又有「尊情」說。不過這是在自珍歷經了一段長時間切身反省後所得的體認。蓋自宋至清，雖然清儒對情的態度，已不像理學家那般嚴格區別性情而主張「尊性黜情」、「性其情」了，但是自珍確曾致力於「鋤情」之除滅我情努力；惟他在經過「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之後，他改以「宥情」的寬宥態度對待之，然而他仍感不能安頓自我，最後他遂「尊情」地改為尊其情的態度，至此始安。其言曰：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

62

自珍之尊情，緣尊心強調誠意以及忠於自我感受而產生。故他對於自己所撰長短句，亦謂「其殆尊情者耶！」⁶³要之，自珍雙管齊下地，既呼籲朝廷尊士、重才，同時也要求人人自尊、善用其力，並由於突出人才之主體性，而建構起系列彰顯主體價值的尊史、尊子等思想理論。

（二）由尊人才而尊史

由於自珍尊人才、尊心力，進而影響其學術觀之尊史思想。蓋「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⁶⁴唯有能夠挺立個人主體價值的學術作為，才足以彰顯人才之可貴！故自珍尊史，不是斤斤於史官「職語言、司謗譽」之職務或學術專業；而是以「人」為著眼，要求史官必須能夠「自尊其心」。蓋唯能「自尊其心」，始能「善入」與「善出」，復能「大出入」地「出乎史，入乎道。」故其尊史，係推重史家由能「尊心」而能超越，能以宏闊之視野與格局，對於政治社會和歷史為一綜觀及客觀之載記；亦如「堂上觀者」，其能觀乎「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故良史對於天下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繫、禮、兵、獄、政、掌故、文章、人之賢否……等，要皆能「如其言家事」般地瞭若指掌，又能「眄睠而指點焉」地超越群倫。所以自珍言「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⁶⁵以此，筆者在學者鄭吉雄突出自珍「尊史」思想強調打破經史鴻溝的「大掌故」，認為自珍觀念中的「史」，「作為一個職位，掌握了一切的文化知識」，⁶⁶凸顯長時期累積的歷史文化傳統之外；另外持論自珍之「尊史」，兼涵尊「人」之尊史氏、史心，以及尊「事」之尊史學、史籍等而言。⁶⁷筆

定大計、任大事，智者所不能謀，鬼神之所不能通者，莫不成於至人之心力。」（氏著：〈論尚武〉，《新民說》，頁115）。

⁶²龔自珍：〈長短句自序〉，《龔自珍全集》，頁232。

⁶³龔自珍：〈長短句自序〉，《龔自珍全集》，頁232。

⁶⁴龔自珍：〈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龔自珍全集》，頁6-7。

⁶⁵龔自珍：〈古史鉤沉論二〉，《龔自珍全集》，頁21。

⁶⁶鄭吉雄：《龔自珍「尊史」思想研究》（1996年台大中文所博士論文），頁14、16。

⁶⁷不過筆者非謂鄭文未涉尊人才、尊心等討論；而是鄭文在論自珍之「尊史」思想及「釋『尊史』」

者認為自珍固然強調良史要能「大出入」地打破經史鴻溝，即鄭氏所稱掌握「大掌故」之一切文化知識；但「尊史」思想實際上仍突出「人才」意識，即自珍言「聞之史氏」、「待後史氏」、「以寵靈史氏」之「史之大隱」者。⁶⁸筆者並且認為自珍著名的「賓賓」說，有相當成分正是緣此而發。因此自珍「尊史」除尊史學之文化知識等客體對象外，兼涵他欲推崇主體之「人」的意義。所以他在「良史之憂憂天下」的尊史思想下，他所看重史學者，更在其「心」——史家那活潑躍動在史籍中，既能「自尊其心」又能「憂天下」的赤誠而高貴的心。是以其言曰「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欲知大道，必先為史。」⁶⁹於此可見自珍之尊史、尊心等理論，尊人才堪稱軸心意識。

以下先就做為客體對象的史學、史籍而言：在自珍之尊史意識下，他雖然也具備考據根基，但他不滿乾嘉漢學流行以來的重經輕史之風，他繼章學誠（1738-1801）之突出史學「專門」、「成家」暨以「六經皆史」針砭乾嘉學風的「博而不約」後，與之同持重史立場。自珍亦辨章經、史源流，鉤沉史統，以批判當時過度重經的風氣，其言曰「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瞽儒小生，稱為儒者流則憚，稱為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為治經則道尊，號為學史則道詘，此失其名也。」他批評徇風氣而一味從風的學者既失器、失情，又失名；反之，他「以經為史」地抬高史學地位，其論曰：

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為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⁷⁰

於此，自珍將《六經》悉納入史學範疇，倡論儒家一切經典都不過是對卜、言、事、詩、樂、律令……之載記罷了，頗同於實齋以發明王官之掌故者為「史」的看法。不過自珍之「尊史」，實際上與實齋強調「文、史分趨」而欲建立起史學「專門」有所區別。自珍「尊史」係綜觀史學對社會的影響價值，並從挺立主體價值的「尊心」以及經世意圖出發，意欲將儒學發展成為應變之學，故「史」負有導引社會風氣之大任，自珍之「尊史」與其「尊人才」的意識是相一貫的。至

時，主要係就其經史一體、反疑經、天人關係等史學概念立論，以突出自珍對「史」的「大掌故」看法，至於自珍之尊人才、尊心等概念，則鄭文另置諸自珍「以改革為目標」之網絡下加以討論（如頁 65-74，「二、以改革為目標的『尊心』思想」）。故鄭文雖也強調「心」與「史」的密切關係，但其論尊史、尊心、尊隱、尊賓等，脈絡不同；而本文所論自珍之「尊史」思想，乃就兼涵客體對象的史學、史籍與主體的史氏、史心等意義為言。

⁶⁸龔自珍：〈尊隱〉，《龔自珍全集》，頁 88。

⁶⁹上論龔氏語皆出〈尊史〉，《龔自珍全集》，頁 80-81。

⁷⁰龔自珍：〈古史鉤沈論四〉，《龔自珍全集》，頁 27-28。

於實齋，則他自「史」為王官制度的一項工具以及「文／史」專業不同的角度出發，欲建立起史學學統之「專門」與「專家」從事，故他亟突出「非識無以斷其義」的史學「專門絕業」、「專家獨斷」。⁷¹但要之，從實齋到自珍，從乾嘉到嘉道，史學確實出現了地位提昇，經、史從事亦有所消長。

而除上述自珍強調史籍所蘊涵的歷史文化傳統、師儒之見及對於社會的影響，以建立他「尊史」之於史的內涵看法外；他又建立起以「尊命」、「尊任」、「尊情」、「尊隱」、「賓分」、「賓法」等思想為基礎而強調「賓賓」之尊「史材」之另一重「尊史」涵義。即自珍又以「賓籍」為出發，指點出凡「在賓」之處賓籍者，可以憑藉史學做為建立個人及文化價值的途徑；而王者亦由尊史學而尊史才，必須禮敬為「賓」者。其曰：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體載籍備百代，夫是以賓「賓」。
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

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⁷²

自珍論王者之所以「賓賓」，由於治國要備數代禮樂以供隨時救弊之用，而書體載籍正是可備為百代之用者；王者之所尊，實際上就是「異名而同實」的「史也，獻也，逸民」等舊朝禮樂與禮制，故王者由尊史學而尊處賓籍的史才。於此可見自珍的「尊史」思想，兼涵尊「事」之尊史學、史籍與尊「人」之尊史氏，且二者密不可分。

那麼，自珍尊史的「賓賓」說是否內蘊革命思想？還必須結合自珍論賓、師是完成「八政」最終實踐的「純太平之言」，以為觀察。考夫《尚書·洪範》之「八政」有關賓、師的說法：孔傳以「禮賓客無不敬」說「賓」，以「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說「師」；孔穎達則疏以「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⁷³是其皆以禮待賓客說「賓」、以軍士兵政說「師」；然而自珍不採此義。自珍之論「賓」：其〈明良論二〉嘗借郭隗勸燕王以「帝者與師處」，來要求朝廷要能尊士。〈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亦論以「《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⁷⁴自珍係自王教師儒與異姓卿的角度說「賓」、「師」，且以為斯即今文家所論「太平世」之能擴大王化範圍、「合內外之道」而天下「一統」的終極實現。準此，則「八政」之最後實踐且為「純太平之言」的賓、師等說和「賓賓」說之間，如何建立起義涵一貫的理解？此中尚有數重曲折。

⁷¹另參張麗珠：〈章學誠的史學核心意識——以突出「專門」、「成家」為主軸的論述〉，《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2期（台北：台灣師大，2009.12），頁197-234。

⁷²龔自珍：〈古史鈎沈論二〉，《龔自珍全集》，頁21。

⁷³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頁171。

⁷⁴龔自珍：〈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龔自珍全集》，頁48。

先說「賓」之取義及其身分定位。自珍從孟子論「異姓之卿」異乎「貴戚之卿」的角度，⁷⁵以「賓籍」的異姓卿說「賓」。他在補編中另題為〈賓賓〉的〈古史鉤沈論四〉一文中，正是以有別於本朝貴戚的異姓卿角度定義「賓」。曰：

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耆者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耆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不敢驕。……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為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⁷⁶

自珍以「史也，獻也，逸民也」即舊朝之聖智魁傑壽耆者為「賓」，以見「賓」雖異姓，但本朝亟應禮敬之，斯即「尊賓」。並認為正因有此「不專為其本朝而生」的「賓」，才使得人主不敢過驕，而嬴秦、劉漢之主之驕於三代者，正是因為其「賓籍闕也」。

接著自珍從另方面的「處賓籍」角度指出「賓」所應謹守的「賓分」——「在賓則當避疑忌。」其言處賓位不能僭越強求，畢竟人主對於「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自珍且以史聘之訓為說，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顛悲憂矣。」他說處賓位當自知其「賓分」而自為節制，他並舉孔、孟之訓以為說，曰「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他指出本為殷民宋人的孔子，其「事公卿」與「從周」，其不議禮、不制度與不考文，正是在「賓籍」下謹守其「賓分」以行不僭越的「賓法」。而孟子亦主異姓卿有所異夫貴戚之卿，賓籍的異姓卿不可以強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自珍認同地說到「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是以自珍論「賓」，由賓籍→賓分→賓法，在明確定義「賓」之身分後，又說其所應遵守的分際，然後再論其安頓自我暨建立文化價值的途徑，由此聯繫其尊史思想。

自珍是承認人各有分位與命的，他嘗言「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此所以處「賓籍」而不可恣意強諫、議論干政。那麼，賓應該如何建立自我價值？則自珍正是從「自尊其心」以建立文化價值的角度，指出為賓之道的最佳歸趨就在存史。蓋「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禮樂有不專為其一代而設者，「微夫儲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⁷⁷故以良史備百代之用，即「賓」之大用，亦賓之最佳自處之道。對此，學者戴景賢說自珍「欲藉所謂『賓

⁷⁵《孟子·萬章下》載：齊宣王問卿，孟子對曰「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順孫：《孟子纂疏》，收在《四書纂疏》，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頁491）。

⁷⁶龔自珍：〈古史鉤沈論四〉，《龔自珍全集》，頁27-28。

⁷⁷上引皆見龔自珍：〈古史鉤沈論四〉，《龔自珍全集》，頁27-28。

籍』之史，將智識份子之地位認同，抽離於『政治結構』外，將之詮釋為乃是具有『獨立身份與人格』之『文化菁英』。……將智識份子之學術承擔，描繪為乃是肩負『歷史知識之延續』與『治術思惟之反省』兩項使命之召喚。」⁷⁸至於處賓籍者，則在自珍「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之指點不可僭越、應順勢作為下，以「史之材」自居，書為載籍以備百代之用、以供後王救弊之用，即在賓之最佳歸趨。

故筆者視自珍之「賓賓」說，係面向本朝和「賓籍」的異姓卿雙方面發言，不同於若干學者認為自珍意在等待新王、新朝，或暗蘊「革命」思想。⁷⁹自珍之「更法」主張，有曰「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⁸⁰亦指出朝廷改革應漸進從事，不宜驟變而導致社會動盪，並未有意於新朝。而在「賓賓」說中，自珍針對本朝所要求的「尊賓」，則以其要求朝廷要能禮敬舊朝聖智魁傑壽耆，而為公羊學「存三統」之實現，斯義並遂可以貫通其〈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所言，賓、師是「八政之最後者也」、「純太平之言」，如此一來，本朝通過「賓賓」便可以完成「太平世」之擴大王化範圍、天下一統之目標了。至於面對仕乎本朝的「賓籍」，則自珍亦指點出「尊史」的存史路徑。在「賓賓」說中，能以史材自居、存史自任，就是自珍所認為「生乎本朝，仕乎本朝」的異姓卿能「自尊其心」、又能行師儒教化於天下的不二「賓法」。如此一來，賓既不會降格取容地落入「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之「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又可以憑藉「載籍備百代」以實現其淑世理想。

（三）由尊史而尊子

儘管自珍論經有公羊之風，並以「三世說」與「三時」變動觀論《五經》大義，但他同時也在外祖段玉裁的傳授下，深契小學訓詁而不分今、古文並尊史，已如前述；而史學強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以其心中不滿清代學風普遍重經輕史，反對「以子為經」之紊亂經、子統緒。他另建諸子皆「一師之自言」、「其名反高于傳記」之尊子理論⁸¹。

在自珍的「尊史」意識下，他繼「以經為史」之謂「五經者，周史之大宗」

⁷⁸戴景賢：〈論清中以迄清晚期學術發展之變局與其中所蘊含之思想脈絡〉，《文與哲》第15期，2009.12，頁371。

⁷⁹學界類此之相關論述頗多，如錢穆言「其所待，乃在後起之新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544）張壽安亦言「定菴述史以『待後王』之意顯矣！」「自珍述史之意，兼含『以待後王』，顯明可見，而『賓之生不專為清朝而生』之『革命』思想亦暗蘊矣。」（分詳〈龔定菴的尊史思想〉，《中國書目季刊》，第12卷第3期，頁19；《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頁66）不過也有學者另持「賓賓」一文以賓法配太平世，不是強調滿漢異種，而是要求「在太平世，滿漢二族已唇齒相依，不當嚴分畛域。」故謂「此處並無暗萌種族革命的意思，亦無希望新朝的來臨。然並非謂自珍缺乏滿漢不平等的意識及不滿。」（詳周啟榮：〈從「狂言」到「微言」——論龔自珍的經世思想與經今文學〉，《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4，頁313）筆者持認同後說的立場。

⁸⁰龔自珍：〈平均篇〉，《龔自珍全集》，頁78。

⁸¹龔自珍：〈六經正名〉，《龔自珍全集》，頁38。

後，又說「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蠡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⁸²認為諸子也都是史官支流，舉凡道家、墨家、農家、雜家、陰陽家、兵家、術數、方技等，都是神農黃帝之書、周史之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⁸²曾經有人問自珍：「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他回答以「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⁸³其尊子之態度顯然可知。故他以「諸子皆史」為出發，反對「以子附經」，而「諸子皆史」亦遂成為自珍學術思想中頗為突出的一個環節。此外，自珍並認為諸子者，皆能自成其一家之言，迥非講求師承家法以傳述師門的傳記所能比，故其「尊子」復自「諸子之名高於傳記」的角度以立說。然不論「諸子皆史」、或諸子高於傳記，並皆立足在他從史學角度出發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基礎上，他在鉤沉古史的〈古史鉤沈論〉外，復藉批判《十三經》「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之紊亂學統，以建立其尊子理論。

先自經學學統言，自珍亟批判《十三經》之「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他首論傳記不應列經，並依班固六藝著錄，曰「〈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于經，羣書頗關經，則附于經。」他認同〈藝文志〉雖以傳記、羣書附經，但並未名之以「經」。故稱許劉向、班固「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⁸⁴反之，他駁斥後儒「以傳爲經」之以師門傳記，或以師法、家法傳述者立為經典，如《公羊》、《穀梁》、《左氏》之立經，導致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者，此其所亟欲破除的紊亂學統一端。

繼批判「以傳爲經」之紊亂經統後，自珍又論《十三經》其他不應立經者，如《孝經》、《論語》與《爾雅》。其謂七十子以來，世儒因尊《論語》而重《孝經》，於是在不敢夷《論語》於記或羣書，但又非傳的情形下，遂使《論語》、《孝經》列經。然而尊經且自陳「述而不作」的孔子，當「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後人又豈得任意撰為他經？何況「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閎意眇指」，其言倘置之二戴所錄，亦僅堪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相比，殊非〈中庸〉、〈禮運〉之倫，故「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何俟後儒？此外，自珍復批判《十三經》之《爾雅》列經。此蓋由於世儒因小學乃經之戶樞而使與群經並列，然「《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膚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輿儻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⁸⁵他認為這些都屬後儒妄列。

接著，便可以論及尤其令自珍不滿者，更在《十三經》之「以子爲經」現象了，如《孟子》列經。其曰「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

⁸²龔自珍：〈古史鉤沈論二〉，《龔自珍全集》，頁 21。

⁸³龔自珍：〈古史鉤沈論三〉，《龔自珍全集》，頁 25。

⁸⁴以上皆詳龔自珍：〈六經正名〉，《龔自珍全集》，頁 37。

⁸⁵上引皆同前註，頁 37-38。

為尊之，反卑之矣！」自珍並於此建立起極具個人特色的理論，他說經、子本來居於同等地位與價值，豈可以子為經？反使諸子淪為與傳記同等？是為欲尊之，而反卑之。其論曰：

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⁸⁶

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⁸⁷

自珍以居君之位、能君其國的公侯來譬喻諸子，以天子畿內的卿大夫來譬喻傳記，謂傳記只是備記其師之言而已，譬如《書》之大小夏侯與歐陽，《詩》之齊、魯、韓、毛，《春秋》之公羊、穀梁、左氏，以及大、小戴氏之記等，概皆用以傳述《六經》之內容，並非如諸子之為一師之言。所以他要求「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還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之釐清學術源流、辨析學統，⁸⁸以使經、子、傳、記互不相亂而皆得正名。如此則子學亦將因「經自經，子自子」而獲得其所應有之獨立與崇高地位。

自珍之尊子可知矣！而在其「諸子皆史」的主張下，其所尊之對象，自然不會侷限在傳統儒家思維中。清學自從汪中（1744-1794）開風氣之先地將所關注之諸子對象，擴及儒家主流外的墨子，⁸⁹逮及自珍，其尊子亦復擺脫儒家視野牢籠，並皆可以視為晚清諸子學興盛的權輿。

自珍不是從傳統尊儒的尊孔孟角度來尊諸子，他是從「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其心中最崇高的史官地位及其流衍來看待諸子思想，所以他破除長期以來狹隘的儒家本位意識，而與傳統儒者一向所採取的非楊、非墨、非道、非釋立場不同，對於歷來被儒者視為異端的列子、告子、墨子、楊朱等各家，他都能採取肯定的兼容廣包態度。自珍論諸子思想，曰：

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為道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考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為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為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名曰任名之史，宜為名家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名曰任文之史，宜為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宜為陰陽家祖。近文章，妙語言，……宜為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宜為墨家祖。……宜為小說家祖。

⁸⁶龔自珍：〈六經正名答問五〉，《龔自珍全集》，頁40。

⁸⁷龔自珍：〈六經正名〉，《龔自珍全集》，頁38。

⁸⁸龔自珍：〈六經正名答問五〉，《龔自珍全集》，頁40。

⁸⁹汪中〈墨子序〉有言「以兼愛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衆口交攻，抑又甚焉。」（《述學·內篇》，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冊307，上海：上海書店，1989，頁3）是其以為孟子說之太過，後儒更習孟子之說而不察，誣墨益甚。

自珍係自史官流裔的角度看待諸子思想，因此對於劉向雖言「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但卻未及於其他各家，他以為仍有所未足，並說以「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他明確指出「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⁹¹謂諸子概出周史分支，而發展成為各種不同的思想流別。

以下試以自珍推闡告子性論，認同告子性無善惡之說為例，以見其別出傳統儒家思想外之一斑。其言曰：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為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為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荀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為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為桀矣，性之堯不亡走。……是故堯與桀互為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⁹²

自珍認為人性無善惡之定向，善惡同時具在人性中，故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則雖然他自言祖述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實則其意與告子「生之謂性」之就生之自然之資而論有間，而頗近於《孟子》文中所引「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一支以及揚雄「善惡混」之後天教化強調。故自珍亦謂揚雄「竊言」，告子則雖知性但「發端未竟」。要之，上論可見自珍不採取儒學主流價值的性善說，且有「堯之本不異桀」、「為堯矣，性之桀不亡走」之謂。又，自珍 27 歲撰為此篇，越十五年讀天台宗書，喜少作與之闇合道，故他削剔斯文蕪蔓而存是文，有會通儒、佛之想。不過須加說明的是，天台雖主諸佛心體兼具染、淨二性而無差別相，但其就「緣起性空」之「無自性空」而言，實與儒家自道德心言性、或自情氣言性具根本殊異。

自珍因受彭紹升（1740-1796）弟子江沅（1767-1838）之影響而好佛，深信輪迴果報之說，喜讀佛書並嘗出資助刊。他自述 46 歲時曾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作詩云「狂禪闢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他亦曾賦〈黃犢謠〉（一名〈佛前謠〉），曰「歸實阻我，求佛其可。念佛夢醒，佛前涕零。」「噫嘻！噫嘻！歸苟樂矣，兒出辱矣。夢中人知之，佛知之夙矣。」⁹³皆可見其信佛之深。他在意欲會通儒、佛外，又以莊、列與佛學會觀比論，也有會通佛、道之意。其曰：

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

⁹⁰龔自珍：〈古史鉤沈論二〉，《龔自珍全集》，頁 21-22。

⁹¹龔自珍：〈古史鉤沈論二〉，《龔自珍全集》，頁 22。

⁹²龔自珍：〈闡告子〉，《龔自珍全集》，頁 129。

⁹³分詳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78 首、〈黃犢謠〉，《龔自珍全集》，頁 517、465。

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⁹⁴

自珍從列子親近西方佛聖的角度，說「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以為列子勝莊而可以安頓身心；其個人好惡之見，雖未符列子偽書不及莊之公論，但於此，主要是備為自珍不受儒學限制之一端線索，以見自珍在乾嘉考據以及外家之學外，對於當世學術與思想之支流，譬如公羊學、諸子學與佛學思想、經世之學等，並皆有所採摭，而自後的今文學家也多好佛，自珍之學往往能開風氣之先。

五、結語

集思想力量與文字魅力於一身的龔自珍，他被時人目為「狂言」的激切論政與時政諍言，使他成為宣告清朝衰世到來的舊制度批判者。他少負奇才，不拘一格的橫溢才華，兼之深諳時勢又喜談兵、議邊事的性格，使他無法被外祖段玉裁傳授的訓詁考據學羈勒，故多方涉獵地出入諸多學術流派，如公羊學、諸子學、經世之學與佛學等，這也使得其學術思想體系極為博雜。就總體而言，雖然自珍也有若干古文考據之作，但其論學，在經學立場上特重今文公羊，喜以今文學理論釋經，推重「三世」大義及於群經。此蓋由於他主要欲借重今文學做為訴求變法更制的工具，實則他反對據守今文而不廢古文；不過對於今文學「援經議政」精神之發揮，到底是他普遍被劃歸今文學家的重要原因。另外在致用之學與學術思想方面，則自珍突出人才思想，並圍繞「尊人才」之軸心線索建立起「尊史」之系列理論；而在強調史學對於政治、社會的作用與價值外，他復推重諸子學，建立起反對「以子為經」的尊子學理論。以下撮要敘述之。

就歷史觀以及經學思想而言，自珍依據公羊「三世」階段發展史觀以論《五經》之「終始治道」，認為《五經》皆內蘊「由亂而治」的「三世」治道於其中，如《尚書》「八政」之治道，即循序漸進地由食貨之「據亂世」、進步到立制掌教的「生平世」、再進到以賓師文致太平的「太平世」。而在宇宙變動觀上，則他持說「三時」變動觀，強調萬有皆循「由治而亂」軌跡，從萌芽、茁壯到衰亡，無時無刻地變動無已，所以為防範不斷變動而導致的日趨衰亡，在政治上就必須以更法變制來對應。自珍正是藉「三世」、「三時」說以做為「更法」主張之理論基礎，此其最具今文色彩者。

至於自珍之「尊史」，亦是一種以史學經世的學術致用思想。他以尊人才與尊心為出發，挺立起個人的主體價值，闡明史學具有以百代禮樂備社會救弊之社會價值。故自珍雖與實齋同持「六經皆史」立場；但其尊「人」之核心思維，有別於實齋尊「事」而強調「文、史分趨」之側重史學「專家」與「專門」從事。自珍主要推崇史官要能「自尊其心」，故其尊史，兼涵尊「人」之尊史氏、史心

⁹⁴龔自珍：〈最錄列子〉，《龔自珍全集》，頁 248-249。

以及尊「事」之尊史學、史籍而言。此外，自珍又從公羊學「存三統」的角度，指點異姓「賓籍」可以藉存史之「自尊其心」，在避免降格取容的同時，復藉以實現淑世理想。因此自珍之「賓賓」說，即以賓、師為太平之言即「太平世」之實現。

再說到自珍在經學外之尊子思想，他對於告子、列子、墨子、楊朱等諸子思想，都能兼容廣包，對於佛學亦極愛重之。他從史官支流的角度看待諸子思想，通過辨析與反對《十三經》攙入「以傳為經」、「以子為經」之紊亂學統現象，闡明諸子實出「一師之自言」，其地位高於諸經傳記之弟子或後儒撰作。故他反對諸子與傳記並列為經，如《孟子》之列經；他並由此建立起「經自經，子自子」，而強調諸子與諸經地位同等之尊子學理論。

生當嘉道間清廷由盛轉衰之際的自珍，自言「積波難挽挽積心，壯歲曾為九牧箴。鐘簾蒼涼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瘡。」⁹⁵他以「狂士」性格而見微知著地敏銳覺察衰世將臨，提出諸多可徵時變的激切論政與變法改制主張，誠為維新變法之先聲。他也曾以「山中有大音聲起」警告朝廷，預言革命之將屆；但這並不表示自珍暗萌革命意識，對他而言，只是敏感悲秋與防微杜漸地提出警告，希望朝廷能重視人才，並正視人才流失的問題嚴重性，兼寓一己抑鬱之悲憤於其中。故自珍實際上乃以一介儒生為出發，學界並毋須以後來歷史進程的變法、革命皆與自珍所論合轍，而過度誇大其危言高論的進步意識；反之，也不應依據後來的實際歷史發展，批判尚處嘉道間的自珍未免仕進求售——「不能隱終，且如京師。」

「乃知有乾嘉，不知有順康，故止於言〈賓賓〉，而不敢言革命。」⁹⁶若此皆非客觀允論。另外，自珍除學術思想理論建構外，在經世治術的實務方面也有諸多建言，譬如他對清廷開闢疆土，稱道不已；他留心邊政，主張西域建省，和對蒙古採行宗教統治策略等，而其經營新疆的建議，也即是左宗棠和劉錦堂等人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新疆所推行的內地化政策。餘如他和林則徐同樣都力主嚴禁鴉片輸入，以因應西力入侵，經濟則要求重農求富以及齊貧富……等，並皆能夠切中時弊肯綮。要之，以龔自珍備為一端線索，可以見嘉道經世思潮下的今文學發展，已自乾嘉間莊存與撰為《春秋正辭》暨劉逢祿樹立今文學旗幟、宋翔鳳擴大今文學陣地等對於經典義例的闡發，轉向到嘉道間的時政關懷。龔自珍正是落實孔子以「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彰顯《春秋》大義之精神。

此外，頗為特殊的，是自珍之批判途徑還包括以詩作方式道出對時局的不滿及其內心悲痛。詩歌體裁在自珍的創作觀中亦與「史」緊密聯繫，他並以 315 首的《己亥雜詩》，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奠定了文學改革先鋒的地位及美譽。其詩作如「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等，都是令人慨然生氣、而又深情纏綿的膾炙人口佳作。而其憂憤時局、痛心社會沉淪的心情，也可通過「百臟發酸淚，夜湧如原泉」，⁹⁷而一斑概見。自珍之詩

⁹⁵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14 首，《龔自珍全集》，頁 510。

⁹⁶論詳錢穆前揭文，頁 541、553。

⁹⁷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5 首、〈戒詩五章〉，《龔自珍全集》，頁 509、451。

文俱佳，其性多情而哀樂過人，他曾有廢園救花之舉——城北一廢園將建新屋，當楣之雜花將悉數剷除；自珍與馮舍人（啟綦）過而哀之，主人遂以桃予馮、以海棠予自珍，自珍且賦〈救花偈〉，曰「門外閒停油壁車，門中雙玉降臣家。因緣指點當如是，救得人間薄命花。」⁹⁸不過自珍不願以文士自居，曰「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又說「但開風氣不為師。」⁹⁹明言他不願徒作驚世文章；但願學術致用，真正發學術鉅音以救衰起敝。

⁹⁸龔自珍：〈城北廢園將起屋，雜花當楣，施斧斤焉。與馮舍人過而哀之，主人諾，馮得桃，余得海棠，作救花偈示舍人〉，《龔自珍全集》，頁 454。

⁹⁹龔自珍：〈金縷曲·我又南行矣〉、〈己亥雜詩〉第 104 首，《龔自珍全集》，頁 565、519。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在《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
- 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在《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
- 章炳麟，《煊書重訂本·學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
- 梁啟超，《新民說》，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
- 張壽安，《龔自珍學術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
- 趙順孫，《四書纂疏》，台北：學海出版社，1977。
- 鄭吉雄，《龔自珍「尊史」思想研究》，台大中研所博士論文，1996。
- 錢 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二、單篇論文

- 周啟榮，〈從「狂言」到「微言」—論龔自珍的經世思想經今文學〉，《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4，頁 295-323。
- 張壽安，〈龔定菴的尊史思想〉，《中國書目季刊》，第 12 卷第 3 期，1978.12，頁 11-23。
- 張壽安，〈龔定菴與常州公羊學〉，《中國書目季刊》，第 13 卷第 2 期，1979.9，頁 3-21。
- 張麗珠，〈章學誠的史學核心意識—以突出「專門」、「成家」為主軸的論述〉，《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2 期，2009.12，頁 197-234。
- 梁紹傑，〈龔自珍學術思想新探（上）〉，《大陸雜誌》第 94 卷第 6 期，1997.6，頁 39-48。
- 戴景賢，〈論清中以迄清晚期學術發展之變局與其中所蘊含之思想脈絡〉，《文與哲》第 15 期，2009.12，頁 333-414。

Policy as Text vs. Policy as Practice in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A Case Study in Taiwan

Yueh-long Yang*

Abstract

Through exploring how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were reflected in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gap between the policy as text and the policy as practice in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southern Taiwan.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in two ways. First, text-based information from the website was critically reviewed, and interviews with the director, the instructo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English curricula in this university were conducted. Secondly, eight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identified from six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White Paper o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Policy,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Draft, 2005-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xis,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White Paper on Expertise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olicies) and were used as a guideline to demonstrate how the curricula reflected the polic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in the curricula, most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while only two were implemented partially. There were still some gaps between the policy as text and the policy as practice, for some of the language policies may require more coordination at the school level.

Keywords: University English education curricula,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 Lecturer, Language Center,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Received Jan 25, 2016.

大學英文教育之政策面與執行面：個案研究

楊岳龍*

摘要

透過檢視南台灣的一所國立大學之英文課程，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英文語言教育政策在政策文字和實際執行上的落差。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方法包含以下兩種：第一、針對該所國立大學的英文課程內容及設計，除了檢閱網頁上的資料及文字，同時也訪談了負責英文課程設計的主任、教師及行政助理；第二、針對目前臺灣的英文語言教育政策，在檢閱完六份國家及政府文件(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中華民國英語文教政策目標及策略草案、教育部2005-2008教育施政主軸、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之後，共歸納出八項共同的語言教育政策。研究結果顯示該所國立大學已執行了六項臺灣英文語言教育政策，兩項為部分執行；也就是說，該所國立大學的英文課程內容及設計在政策文字和實際執行上的落差不大。英文語言教育政策在政策面與執行面上難免有落差，需要學校各行政及教學單位的合作及配合來達成政策面與執行面的一致性。

關鍵詞：大學英文課程、英文語言教育政策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中心講師。
到稿日期：2016年1月25日。

I. INTRODUCTION

There is a growing importance of English in the global village nowadays. According to Nunan (2003), English is now the language of business, technology, science, the Internet, popular entertainment, and even sports. Graddol (2006) also maintains that English has become a global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for it play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culture, linguistics, politics and economy. Given the importance and the new statu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EIL),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learning to use the language. In fact, nearly 600 million people today speak English as a first or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numbers are soaring (Hirsch, 2007).

Of all the people who use English nowadays, Graddol (1999) argues that the balance between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is shifting significantly. Specifically, Graddol (1999) maintain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using English as their second language will grow from 235 million to around 462 million during the next 50 years (p.62).” Moreover,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by British Council, the number of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worldwide is up to 1.5 billion (Bently, 2014). The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who learn English, or at least have some familiarity with English, allows English to act as a 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 for a great variety of purposes, contributing to its status as a global lingua franca and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aiwan takes no exception to this global English-learning “fever”. In order to promote every citizen’s English proficiency to ensure Taiwan’s competitiveness in this global arena,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in Taiwan has taken some actions. At the primary and the secondary level, MOE in Taiwan, based on the Action Plan for Educational Reform (教育改革行動方案), has initiated Nine-Year Integrative Educati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English is now a compulsory subject from Grade 3 and up. Although there is no official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 at the tertiary level, a number of objectives, guidelines, or strategies related to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at the tertiary level has been listed in the government documents or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such as White Paper o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Policy (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Draft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政策目標及策略草案), 2005-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xis (教育部 2005-2008 教育施政主軸),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White Paper on Expertise Cultivation (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olicies (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2012, 2003;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2002;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By closely examining the language-policy-related documents and projects, it is obvious that English is now treated not as a subject, but

as a tool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 various purpos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consistently shown that there is often a gap between “policy as text” and “policy as practice”, and it is often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Fallon & Rublik, 2011; Hu, 2007). Since there is no official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 at the tertiary level, the universities or colleges in Taiwan have their own English curriculum designs, and they are all different to some degrees (陳秋蘭, 2010). Whether or not these curricula (policy as practice at the curriculum level) reflect the language policies proposed by the government (policy as text) need some investiga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policy as text in Taiwan now follows the ideology of EIL. H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nglish curricula in one national university in southern Taiwan and show how the curricula (policy as practice) reflect the language policies (policy as text) in Taiwan.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1. What are the English curricula like in this university?
2. How do the English curricula reflect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II. LITERATURE REVIEW

The literature review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features of EIL are outlined. The objectives, guidelines and strategies related to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at the tertiary level in a number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in Taiwan are summarized in the second part.

A.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 EIL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y deals with the status of languages and varieties, their form, and who else should learn them. (Cooper, 1989) Some scholars called the last point of this defini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policy” (Cooper, 1989), while some called it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Spolsky, 2008). According to Spolsky (2008),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formed practic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language use in education and other crucial spheres of public life, and involved the choice of what languages were to be used and how they were made legitimate by the state for purposes of gaining consent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Since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he language policy in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language policy is defined as the reflection of “the state’s ideologies towards foreign language (English in particular) by imposing principles and regulations on language teaching, learning and use in centralized educational system.” (Pan, 2011, p.248)

According to Crystal (1997), English has assumed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hat exactly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mith (1976) defined it as “one which is used by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s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p.17).

Brutt-Griffler (2002) also discussed four features of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se features were:

1.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 econocultural system.
2.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ends to establish itself alongside other local languages in multilingual contexts composed of bilingual speakers.
3.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unlike an elite lingua franca, is not confined to the socioeconomic elite, but is learned by various levels of society.
4.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preads not only by speakers of that language migrating to other areas, but rather by many individuals acquiring that language.

Before going further,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why English had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ome scholars (Phillipson, 1992) argued that it was the result of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the spread of English was a post-colonial endeavor of core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o maintain dominance over periphery countries. However, some scholars (Chew, 1999; Kachru, 1986) maintained that the spread of English was not because of the linguistic imperialism, but because of the belief in the power of English. Specifically, people believed that when they learned English, they would have access to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economic trade, and higher education (Kachru, 1986; Mufwene, 2010). For example, in a study about Singaporean's view on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some Singaporeans viewed the use of English as key to their economic survival although it also placed a threat to the loss of their ethnic identity and Asian values. Some parents in the same study even claimed that the "lack of a command of English would mean the continued marginalization of their children in a world that would continue to use the language to a greater degree. It would also deny them access to the extensiv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English—resources which would have developed as a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 (Chew, 1999, p.41) Because of the belief in the power of English, many people from various cultures were learning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resulting in large-scale bilingualism, and hence,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The fact that the spread of English today was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efforts to stay competitive in this globalized age had altered the very nature of English in terms of how it was used by its speakers and how it related to culture. It also had some assump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EIL pedagogy. First of all, these bilingual users of English had specific purposes for learning English. Therefore, the teaching of EIL needed to recognize the diverse ways in which bilingual speakers made use of English to fulfill their specific purposes. Secondly, many bilingual users of English might not need or want to acquire native-like competence. On a practical level, bilingual speakers might not need to acquire the full range of grammatical standards, phonological patterns

and discourse competence to use English as a language for wider communication. What matters was the achievement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Finally, since it was now the EIL era, English did not belong to any one culture, and hence, there was a need to be culturally sensitive to the diversity of contexts in which English was used. Consequently, the traditional use of Western cultural content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exts needed to be examined, for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needed to be emphasized (Matsuda & Friedrich, 2011; McKay, 2003).

B.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Before investigating th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it wa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countries of similar context, such as China, Hong Kong, Japan, Korea and Vietnam. From the review, it was obvious that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language,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hese countries (Nunan, 2003).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downward shift of the age at which English became a compulsory subject in all of the countries, and in most of the countries, the trainings of English teachers were emphasized. Countries like China, Hong Kong and Vietnam mad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at tertiary level explicit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English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The mastery of English; therefore, opened up new possibilities in career advancem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ersonal fulfillment (Nunan, 2003)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aiwan, all of the recent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cluding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within 15 years were reviewed. After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se recent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like the policies in the countries above, all of these policies had been formulated to prepare citizens of Taiwan to competitively face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For example, *Challenge 2008: The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of e-Generation Manpower Cultivation*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policies were proposed in order to meet the continual demands of information and the needs of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2002). Similarly, in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張武昌, 2007;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 it was stated:

我國英語文教育政策之總目標以終身學習為架構，在工作、學習及生活範疇內培養國民參與國際事務時所需之溝通能力，以因應國際化及全球化所帶來的各項挑戰，加強在經貿、科技、文化及教育各面向的國際參與，並增進對不同文化的了解、包容與尊重。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country follows the struc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In order to face the challenges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ts aim is to develop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needed for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work, study and in life,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the dimensions economy, technology, 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tolerance and respect for different cultures. (My translation)

In all of these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six of them received special attention in this study as they focused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at the tertiary level: White Paper on University Educational Policy (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Draft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政策目標及策略草案), 2005-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xis (教育部 2005-2008 教育施政主軸),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White Paper on Expertise Cultivation (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 an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olicies (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 Among them, some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could be identified. They were shown as follows (see Table 1): enhancing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creating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encouraging multiple assessments, developing English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university, deepening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and organizing English courses or programs including remedial and advanced level courses.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Government document or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Enhancing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 White Paper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 White Paper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 White Paper on Expertise Cultivation ✓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olicies
Creating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2-2007 ✓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 2005-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xis
Encouraging multiple assessments	✓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2-2007 ✓ 2005-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xis ✓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Developing university English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2-2007 ✓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Deepening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 White Paper on Expertise Cultivation
Organizing English courses or programs including remedial and advanced level courses	✓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 2005-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xis

Table1.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national projects

Other than these seven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there was an additional one worth mentioning. This policy was listed in the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This policy was about promoting the competence for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and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and it corresponded many scholar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one scholar (陳超明, 2012),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aiwan was to cultivate student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to do so,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played a crucial role. This scholar also claimed that the university English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the continuation of high school English, where the focus was on the correctness of language patterns or the consolidation of basic skills. Rather, it should be learner-focused and be tailored to the learner's purposes and needs for learning. Thus, ESP seemed to be the best choice. In the ESP curricula, the ultimate goal was to use the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for a specific purpose. Some guidelines as the basis for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planning were further listed (陳超明, 2012):

1.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should last for at least three years.
2.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should include not only courses, but also intensive camps, all-English teaching, the use of authentic materials,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s.
3.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should be ESP and EAP based.
4.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should focus on the use of the language.
5.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should offer leveled-courses.
6. University English curricula should have a small class size (max. 20 learners).

III. METHODOLOGY

In the methodology section, the setting and the participants are first introduced, and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is particular university are explained. Then, the method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re described.

A. Setting and Participants

The setting of this study was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CLS) in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This center was responsible for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In the center, there were one director, seven full-time English instructors and four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All these people had doctoral or master's degrees in English education.

The CLS in this particular university was chosen as the case of this study because the university had gone through an English curriculum reform six years ago. In addition, the CLS has continuously received funding from the Teaching Excellence Project. Since the curriculum reform, many students benefited as the courses helped them gain the opportunities to study or work abroad. The reformed curricula were also reported in some education-related magazines in Taiwan.

Not only were the students satisfied with and highly recommended the curricula,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Specifically, passing rate of the English benchmark for the first year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school reached 68% four years after the curriculum reform. Furthermore,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in English elective courses increased from 113 to 371, and the number of elective English courses increased from 6 to 19. The CLS was now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best model that created independent, self-learning, interactive nature of a multi-media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was worth investigating what the English education curricula were like in this school and how they reflected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B.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Analysis

The data of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in a number of ways. First of all, the text-based information from the CLS websites was critically reviewed. Specifically, the information included the philosophy and the frameworks of the curriculum design, the summary of the competence indicators, the syllabi of all of the courses within two years, the types of physical facilities and online resources available and the calendar for the scheduled lectures and seminars. The reasons for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planning were then elicited through informal interviews with the director, instructo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s in the center. The interviews were recorded and transcribed.

To answer 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text-based information and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reflect the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discussed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ction. These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chosen because they appeared in two or more government documents or national education projects. The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1. Enhancing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2.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3. Creating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4. Encouraging multiple assessments
5. Developing university English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6. Deepening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7. Organizing English courses or programs including remedial and advanced level courses
8. Promoting the competence for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and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tudy,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s were coded. The categories of the coding were based on the eight common policies above (CP1-CP8) and the interviewees (D for director, I1 to I7 for instructor 1 to instructor 7 and A1 to A4 for assistant 1 to assistant 4). For example, the code “CP2_D” referred to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cond common policies on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nd this information was from the director of CL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this section. The first part presents the answers to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about the English curricula in this particular school, followed by the answers to 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about how the curricula reflect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in the second part. The third part is a discussion on the gap between the curricula (policy as practice) and the actual policies from the government (policy as text), as well as a discussion about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urricula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by scholars.

A. English curricula in the university

This part presents the answers to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What are the English curricula like in this university? The overview of curricula is described first, follow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each curriculum in this university.

1. Overview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CLS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 this school.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cluded three English curricula: th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the curriculum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and the curriculum for Remedial English. The full description of these curricula would be

presented in the later part.

Although there was no national English competence indicator at the tertiary level in Taiwan, there was a shared competence indicator for all three curricula at CLS. The EIL competence indicators, from 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developed internationally for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FL) learners, were adopted (see Appendix 1). This decision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irector's belief in the curriculum design, as responded in the interview:

There is one major goal for a language center in a university - to educate the next-generation leaders or explor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borderless global village. With the well-built language skills and insights, we can expect people can use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on media" for promoting knowledge exchange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 (CP5_D)

Other than these curricula, the CLS organized intensive camps for students periodically. For example, in 2010, a 5-day camp entitled *Career Startup: From Rookies to Professionals* was organized to equip students with the essential skills for future job-searching. These skills included writing resumes, cover letters, statement of purpose, and autobiography, as well as presenting oneself in interviews, group interviews, and oral speeches. One year later, there was another one-month camp, *Intensive English Summer Camp for Career Highlight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skills needed in workplaces, such as conferencing, note-taking, negotiation,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meeting management, networking,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email writing for various purpose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lso a number of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English at the CLS. In terms of facilities, there was a discussion area with many tables and chairs for students to exchange ideas and opinions. There was also a TED area where students could participate in speeches related to English-learning, or where students could practice in making a presentation on stage. In terms of services, the CLS provided many online resources in a language lab for students to do self-access learning. All of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were welcome to drop by at any time from 10:00 a.m. to 5:00 p.m., Monday to Friday. On top of that, there was advisory time. At a certain time every day, the instructors at CLS provided advisory assistance about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or resources. Students could discuss their learning needs and goals, create learning plans and discuss available resources and learning progress. There were also at least two to three English competitions every semester for all the students in the school to participate in. Last semester, there were a classical spelling bee competition, an English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and a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 Th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From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it was clear that the CLS provided four credits (two cour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for first-year students in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as part of the university's General Education requirements, starting from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0. These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were designed to develop an awareness of global issues involving human beings and encouraged critical thinking for academic and workplace English skills. The focus of this curriculum was on the productive skills. It was expected that, after comprehending the content taught in the class, students would be able use the language in both the writing and the speaking tasks.

The courses in this curriculum were leveled courses. There were two levels: Level 1 & Level 2.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ntent in Level 1 corresponded to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 A2-B1, and the difficulty of the content in Level 2 corresponded to CEFR B1-B2. Before students began to take the course, the CLS would conduct a placement test to ensure that the students were placed appropriately in the right level.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of the course content, the courses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types: Practical English Usage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both types of courses,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integrate all four language skills and apply them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ideas and thoughts, either in writing or speaking tasks.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were all encouraged to take an offici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s either as a bonus mark or as a part of the course grade. However, there was a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types of courses. The difference was that for Practical English Usage, the focus of the communication was in every life and multicultural context; fo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focus of the communication was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workplace context.

Course	Practical English Usage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Language Skills	Integrated	Integrated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Encouraged - bonus mark	Encouraged - course grade
Communication Tasks	Every life & multicultural contex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workplace context

Table2. The comparison of two types of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During the interview, the instructors indicated that they would usually give a mini-lesson on the skills needed, either writing or speaking, for the communication tasks in a typical class in both types of the courses. Then the students would be given time to discuss and perform the tasks in English. After students completed this task, the

instructor would prepare students for another productive task.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ll the students in both types of the courses would have to integrate all of the course content and skills to complete and present a final project. For example,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Level 2, th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do a SWOT analysis on one of the top 100 brands in the world. The students would have to use the business concepts,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language skills taught in the course to propose potential changes for the company to stay competitive in the future.

The assessment for the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also involved all four language skill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skills. For the receptive skills, the instructors created an online test bank each of the courses in this curriculum. All of the questions were tested and revised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Up to date, there were a total of eight sets of online test banks, with a total of more than 5,500 questions. There were also digitalized tests for productive or integrated skills. For example, in the speaking test, students would have to record his answers by reading a short passage about a workplace problem in a limited time frame and then orally respond to several questions about the problem on a computer. There were more than 60 sets of speaking tests in the curriculum now.

3. The curriculum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When the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had waived or completed the required General English Education, they could choose to continue learning English at a more advanced curriculum: the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website indicated that the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a certificate program, was designed for students who planned to make a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their overall English proficiency. Upon completion of 20 credit hours of English language instruction, participating students could apply and receive a certificate.

The courses in the curriculum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were elective courses and they were also leveled. There were four levels: pre-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high-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ike th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the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take a placement test to be appropriately placed in the right level. In general, the courses in the pre-intermediate level were taught in 80% English and 20% Chinese. The courses from intermediate level and up were all-English courses.

In addition, the courses in this curriculum were design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EGP, ESP, and EAP (EGAP). Students, depending on their purposes and needs for learning English, were free to choose the courses. Generally speaking, EGP courses were for pre-intermediate and intermediate students; whereas ESP and EAP courses were for more advanced learners such as students in the intermediate levels or up, as the students often needed to integrate all the language skills in most of the ESP and

EAP courses to achie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lthough some of the courses might have a course name with a single language skill (e.g. English Written Communication – High intermediate), it only meant that the instructor would emphasize on that particular language skill more (about 75%); students were still required to use and integrate all four language skills.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for the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was as follo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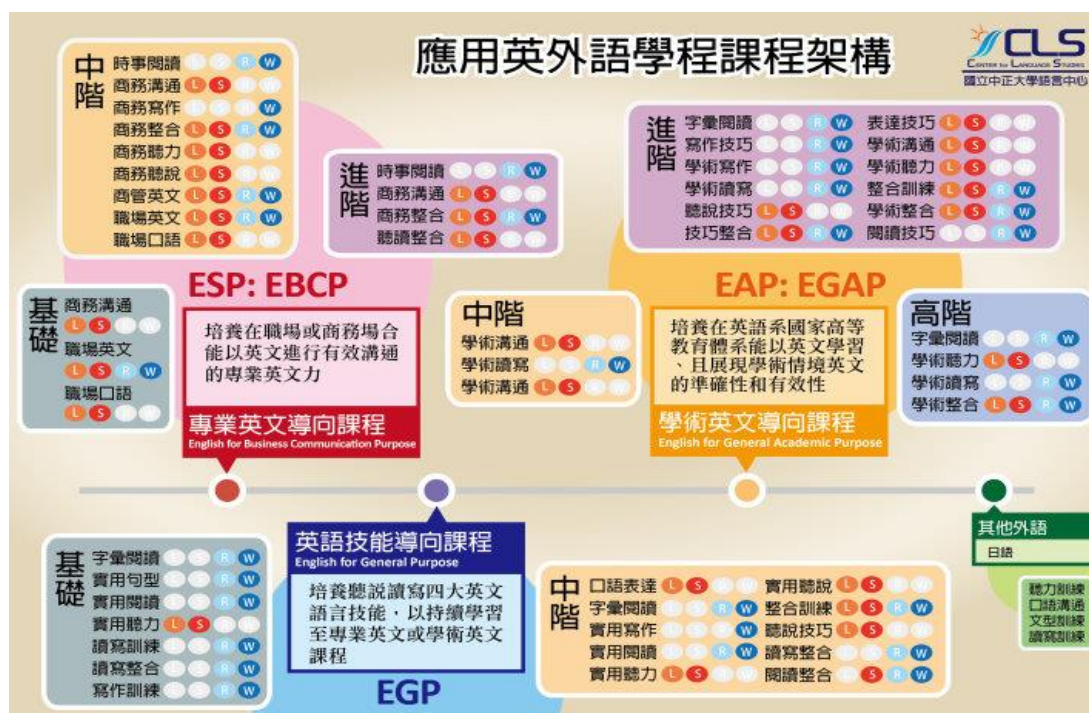


Figure1. Curriculum structure for the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Retrieved July 14, 2014, from http://cls.ccu.edu.tw/center/course_framework.php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director and the instructors, although the courses (EGP, ESP and EAP) in this curriculum served different purpose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was similar - to use the language as a communication media,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o enhance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To illustrate, one of the high-intermediate EAP courses, offered in 2013, was called English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n this course, students were to acquire academic skills such as taking notes, making outlines, writing summaries, making references, asking questions, making presentation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in a simulated conference where students had to present their research on a cutting-edge topic in the world as well as taking notes and asking questions about others' presentations. In another high-intermediate ESP course, English Business Communication, offered in the same year, students were to acquire career skills such as making negotiations, building working relationships, briefing, writing correspondence, managing business meetings and making product pitches. At the end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demonstrate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an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Students had to hold a meeting to decide on

a marketing strategy, make negotiation on the job allotment, and finally, make a product pitch in the trade fair. As it could be seen, the contents and purposes of these two courses were entirely different; however, the common goal was to use the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in an international and multicultural context.

The assessment of the courses in the curriculum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was managed in a similar manner as the assessment of courses in th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Many of the tasks involved the integration of all of the language skills, and most of the tests were digitalized and revised on the regular basis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test questions.

4. The curriculum for Remedial English

In the university, there were a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who had problems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because of their low proficiency. Therefore, the CLS offered the curriculum for remedial English, which was a series of one-hour 0 credit courses for those students who went through placement tests and scored below the standards set by the instruc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curriculum was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he fundamentals of English such as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and basic reading skills so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pass the required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Instructors, during the interview, described a typical class in the curriculum for remedial English. The class would start with a review and a quiz of the content taught in the previous class, follow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ree phonic readers. After explaining the phonic rules and sentence patterns,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books to practice oral reading as well as to complete a worksheet on reading strateg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last ten minutes of the class was for students to apply the sentence patterns from the books to complete a communicative task. The assignment was for students to practice and record reading aloud.

A. How the curricula reflect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To determine the gap between policy as text and policy as practice, the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at the tertiary level in Taiwan needed to be reflected from the English curricula in this particular university.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Enhancing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described in the previous part, the overall objective for all of the English courses at the CLS was to enhanc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The instructors in the courses designed the class in a way that students would have to use the target language skills or the integrated skills to perform a communicative task such as preparing a conference presentation or participating in a trade fair. In this way, English was no longer a subject for students to study, but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2.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There was not much information in terms of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in the curricula at the CLS. In the interview, the director of the CLS mentioned that there used to be a “Flying Eagle Project” in the school.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ject was to develop students’ English competence, research competenc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o that students could be accepted to a doctoral program in a foreign country. In this project, the CLS played the rol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EAP competence.

3. Creating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t CLS, the Level 2 courses of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and the courses in the intermediate level and up of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English only.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use English only when having discussions in the class. In addition, there was a discussion area and a TED area, as well as online resources, advisory assistance and a number of English competitions. All of these contributed to the creation of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4. Encouraging multiple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a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from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the term “multiple assessments” referred to the assessments involving all the language skills. At CLS, the assessment often involved at least three language skills; most of the time, it involved the integration of more than two language skills, as in the example of the speaking test where students had to read and orally respond to several questions. Other than the assessment of the language skills, students had to complete a final project in all of the courses at the CLS. In the final project, students were assessed by how they integrated the content information and the language skills taught in the course.

While taking the compulsory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courses, students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take the offici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s. The CLS did so by making it a requirement for the course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by giving students bonus mark in the course (Practical English Usage). This was also part of the efforts for multiple assessments.

5. Developing university English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Since there was neither university English competence indicators nor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Taiwan, the faculties at CLS had strived to improve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guidelines. However, instead of developing their own competence indicators, the faculties at CLS chose adopt the EIL competence indicators for EFL learners (see Appendix 1).

6. Deepening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In all of the courses at the CLS, the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were integrated in the course design and the communicative tasks. For example, in the final project about the top 100 brands in the world, the students had to consider and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while doing a SWOT analysis, to propose a potential change. The culture here might not be the popular American or English culture; therefore, students coul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

7. Organizing English courses or programs including remedial and advanced level courses

At the school level, there were curricula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roficiency. Th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offered university-level English instruction; however, for those who needed more advanced courses, there was the curriculum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Similarly, for those who needed more basic English instruction, there was the curriculum for Remedial English. At the curriculum level, there were also courses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roficiency. In th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there were two levels. In the curriculum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there were four levels.

8. Promoting the competence for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and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It was obvious that the curriculum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was an effort to promote the ESP or EAP competence, as shown i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in Figure 1. Before students selected the course, the nature (EGP, ESP or EAP) of the course was clearly indicated on the syllabus (see Appendix 2). By designing the curriculum and the course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s of learning English, the CLS successfully promoted ESP and EAP competence.

As the focus of the courses in the curriculum for General Education English was on the productive skills in various communicative tasks, the courses were more EGP in nature, for the content was for neither academic purposes nor any other specific purposes.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ESP elements in the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as the course emphasized on the communication in the business and workplace context.

B. Discussion

After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curricula in this particular university, it seemed like the curricula did not only reflect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it also reflected the EIL pedagogies proposed by some scholars (Matsuda & Friedrich, 2011; McKay, 2003).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courses at the CLS were ESP or EAP in nature demonstrated the efforts to meet the students' needs and purposes, which reflects first

assumption of the EIL pedagogy. Furthermore, in these courses, most of the class time was spent on apply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y, raising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applying productive skills, and completing authentic communicative tasks, and this echoed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assumptions of EIL pedagogy. Therefore, there seemed to be a consistency in the EIL trend,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and the English curricula at this university.

Although the curricula in this study have reflected most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the curricula faile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During the interview, the director at the CLS maintained that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involved more than just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although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 director also questioned whether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this policy to be a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stead, it should be a school education policy. This policy required planning and participation at the school level, as all of the departments could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contributions. Therefore, it would take efforts from all of the departments in the school to make this policy possible, and it also required coordination from the school-level authority. The CLS could be part of the project, like what it did for the “Flying Eagle Project”; however, it would be challenging for a language center to implement a policy like this.

One of the commo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as to develop competence indicators for the school curricula; however, the CLS at this study chose to adopt EIL competence indicator. This decision made practical sense because the curricula were designed with the ideology of EIL, and the EIL competence indicators matched the curricula. However, the last EIL competence indicator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seemed problematic. In the curricula, there was no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gain, this was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policy about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s argued previously, this policy should be a school education policy, instead of an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should be achieved first, and then, the language center in the school could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in the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urricula in this study seemed to reflect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about the promotion of ESP and EAP competence; however, with a more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ourse content, it was clear that the courses entitled ESP or EAP courses were not truly ESP or EAP in nature. Rather, they were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for workplace English (EOP) and English for General Academic Purposes (EGAP), as the

courses in the curricula only equipped the students with the essential academic language competence to perform effectively in the general workplace or academic context, but not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pecific to a certain field. In fact, i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for the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the term EGAP was clearly listed (see Figure 1). The director of the CLS argued it was unreasonable to expect language instructors to teach ESP or EAP courses because they lacked the field-specific domain knowledge. However, it was also unreasonable to expect the professors from the departments to teach ESP or EAP courses because they were not professional language instructors. What's more reasonable was to prepare students with the necessary language skills, such as note-taking, negotiat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EOP or EGAP courses before they attended true ESP or EAP courses offered by the professors in the departments. Again, this might require the school level coordination.

From the instructors' point of view, their goal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OP and EGAP courses was to provide the students the academic language skills needed so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bridge or transfer these skills into their specific field of learning. These courses were what Jordan (2009) called pre-sessional courses and they focused on procedural knowledge. Therefore, the instructors would use the field-specific domain knowledge covered in the textbook as content to practice the target language skills. Although the instructors all reported investing time on learning the field-specific domain knowledge, there were still times that knowledge became too difficult, and they had to invite the students from that field in the class to help explain the concepts, since the classes were made up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This seemed to correspond to the argument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CLS in that the true ESP or EAP courses neede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ield-specific domain knowledge and academic language skills, and this might require school level coordination.

After examining how English curricula reflected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some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we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by the language center alone. Some of them involved more than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required coordination at the school level. Perhaps this explained why the scholar maintained that a language center should be school-run, with the vice-president of the school being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and another professional with the language education background being the co-director. Only in this way could a language center implement all of the current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in the country (陳超明, 2012).

V. CONCLUSION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gap between the policy as text and the policy as practice; specifically, how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are reflected by the curricula

of a national university in Taiwan. In the curricula, most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 enhancing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creating an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encouraging multiple assessment, deepening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and organizing English courses or programs including remedial and advanced level courses; some of them are implemented partially -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developing university English competence indicators and English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promoting the competence for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and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As hard as the school in this study has tried, there are still some gaps between the policy as text and the policy as practice, for some of the language policies may require more coordination at the school level.

There are two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One of the limitations is the lack of classroom observation. The data of this study are collected from the text-based information and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director, instructors and administration assistants. However,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on the actual classroom practices, another potential gap between the policy as text (curricula) and the policy as practice (classroom). Another limit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e lack of student interviews. Since students are also stakeholders of the university English education, their percep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is crucial.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how the curricula reflect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student interviews are essential.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wo folds. On the one hand, the curriculum design at the language center in this school can be served as a model for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since it successfully reflects many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policies i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may als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or the school.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the policy as text and the policy as practice, the government or the school needs to conside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because some of the policies, for example, promo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mobility, are language related but require more than just language competence.

References

- 陳秋蘭(2010)。大學通識英文課程實施現況調查。長庚人文社會學報，3 (2)，253-274。
- 陳超明(2012)。大學英文課程困境與專業英文：政策與執行的幾點看法。
民 103 年 8 月 1 日，取自：<http://www.geat.org.tw/?p=384>
- 張武昌(2007)。中華民國英語文教育政策目標及策略。民 103 年 7 月 22 日，取自：http://engsite.ncu.edu.tw/database/show/feature.asp?CO_no=1073
- Brutt-Griffler, J. (2002). *World Englishes: A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Bently, J. (2014). International TEFL Academy Articles. Retrieved July 22, 2016, From[http://www.internationalteflacademy.com/blog/bid/205659/Report-from-
TESOL-2014-1-5-Billion-English-Learners-Worldwide](http://www.internationalteflacademy.com/blog/bid/205659/Report-from-TESOL-2014-1-5-Billion-English-Learners-Worldwide)
- Chew, P. (1999). Linguistic imperialism, globalism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D. Graddol & U. Meinhof, *English in a changing world*. United Kingdom. 37-47.
- Cooper, R.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2002). *Challenge 2008: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2-2007* (挑戰 2008：國定發展重點計劃 2002-2007). Retrieved July 22, 2014, from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01568&ex=2&ic=0000153>
- Crystal, 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llon, G. & Rublik, N. (2011). Second-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Quebec: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policy of English as a compulsory subject at the early primary level in Quebec. *TESL Canada Journal*, 28(2), 90-101.
- Graddol, D. (1999). The decline of the native speaker. In D. Graddol & U. Meinhof, *English in a changing world*. United Kingdom. 57-68.
- Graddol, D. (2006). English next: Why global English may mean the end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Retrieved July 22, 2014, from
<http://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ing-research-english-next.pdf>
- Hirsch, M. (2007). “Village” shows strength of English. *Taipei Times*, p.2.
- Hu, Y. (2007).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policy on primary English education: What’s behind it? *Language Policy*, 6, 359-376.
- Jordan, R. R. (2009).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A Guide and Resource Book for Teach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chru, B. B. (1985). Standard,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R. Quirk & H. G. Widdowson, *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30.

- Matsuda, A. & Friedrich, P. (2011).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 curriculum blueprint. *World Englishes*, 30(3), 332-344.
- McKay, S. L. (2003). Toward an appropriate EIL pedagogy: re-examining common ELT assump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3(1), 1-22.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White Paper on University Education* (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 Retrieved July 23, 2014, from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20920154843/90.07%E5%A4%A7%E5%AD%B8%E6%95%99%E8%82%B2%E6%94%BF%E7%AD%96%E7%99%BD%E7%9A%AE%E6%9B%B8.pdf>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3). *Goals and Strategies of R.O.C.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drafted)* (中華民國英語文教政策目標及策略草案). The MOE English Education Promotion Committe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5). *2005-2008 Educational Policy Axis* (教育部 2005-2008 教育施政主軸). Retrieved July 23, 2014, from <http://www.edu.tw/SonSearch.aspx?WID=45a6f039-fcaf-44fe-830e-50882aab1121&Key=%E6%96%BD%E6%94%BF%E4%B8%BB%E8%BB%B8>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2). *White Paper on Expertise Cultivation* (教育部人才培育白皮書). Retrieved July 23, 2014, from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31209094223/%E6%95%99%E8%82%B2%E9%83%A8%E4%BA%BA%E6%89%8D%E5%9F%B9%E8%82%B2%E7%99%BD%E7%9A%AE%E6%9B%B81.pdf>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4).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Policies* (教育施政理念與政策). Retrieved July 22, 2014, from <http://www.edu.tw/userfiles/url/20140401163712/%E6%95%99%E8%82%B2%E6%96%BD%E6%94%BF%E7%90%86%E5%BF%B5%E8%88%87%E6%94%BF%E7%AD%96.pdf>
- Mufwene, S. S. (2010).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read of English: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glophone? *English Today*, 26(1), 57-59.
- Nunan, D. (2003). The Impact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on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ESOL Quarterly*, 37, 589-612.
- Pan, L. (2011). English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he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 world-system perspective. *Language Policy*, 10, 245-263.
- Phillipson, R.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frican perspectives. *ELT Journal*, 50(2), 160-167.
- Smith, L. (1976).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 *RELC Journal*, 7(2), 38-42.
- Spolsky, B. (2008). Investigating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K.A. King & N. H.

Hornberger (Ed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2nd Edition),
Volume 10: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p.27-39).

Appendix 1

英語課程能力指標：「英文作為國際語」的課程內涵

Summary of Content Standards: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tandard 1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1.1: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1.2: 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
	1.3: 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
Standard 2	Cultures: Gain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
	2.1: Practice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other cultures
	2.2: Product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other cultures
Standard 3	Connections: Connecting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acquiring new information
	3.1: Knowledge of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3.2: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gain information
Standard 4	Comparisons: Developing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4.1: Nature of language
	4.2: Concept of culture
Standard 5	Communities: Participating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5.1: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beyond the classroom
	5.2: Life-long learning through English
	5.3: Valu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Appendix 2

Course Syllabus

Course # 課程編號	1903415-01	Instructor 任課教授	XXX
Course Title 科目名稱	English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tegrated Skills High-intermediate (I) 進階英文商務整合 (一)	Semester 上課期間	2014 Spring (Feb. 16, 2014~June 17, 2014)
Class Hours 上課時間	10:10~13:00 Thu		
Classroom 上課地點	Room 112,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語言中心 112 教室		
Credit Hours 學分數	3 credits (自由選修 3 學分)		
Phone	XXXXXXX		
E-mail	XXXXXXX		
Web Page 課程網頁	XXXXXXX		
Office	Center for Language Studies		
Office Hours 諮詢時段	10:00~12:00 Tue (建議先與授課教師預約時段)		

1. Course Level/建議修課程度： CEFR B2-C2

1) GEPT High-Intermediate— First Stage (Reading and Writing)	1) 英語程度相當通過 GEPT 中高級初 試(含)以上者
2) TOEIC Listening & Reading Score: Blue Certificate	2) 英語程度相當 TOEIC 「藍色」證書 (含)以上成績者

2. 本課程之分級、課程內涵屬性與語言技能分類

分級 Proficiency Levels	Pre-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High- intermediate	Advanced
			★	
語言技能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Reading	Speaking	Writing
	★	★	★	★
課程內涵屬性 Language spheres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	
		★		

註 1: 語言技能若全部標示, 該課程屬性在語言技能教學上為整合性課程。

註 2: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之課程為 General skills for Academic English, 例如在「英文為母語」之國家進修或遊學時, 英文為主之課堂上所需具備的英文能力, 如聽課及筆記技巧、閱讀學術文章技巧、課堂報告寫作技巧、討論議題技巧、摘要或改寫技巧等。這學術英文能力與各學術專業領域的英文有所不同。請詳讀課程大綱之課程目標、課程描述、及每週授課主題。

註 3: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之課程為商務英文溝通、全球英語溝通力或職場英文技巧為主要導向的課程居多。請詳讀課程大綱之課程目標、課程描述、及每週授課主題。

3. 外語學習五大能力指標之相關程度（1-5，5 表相關程度最高）

「英文作為國際語」的課程內涵外語學習五大能力指標 Content Standards: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相關程度				
	1	2	3	4	5
溝通能力：能以英文進行有意義的及有效的溝通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
文化理解：能以英文汲取新知或理解其他文化深度 Cultures: Gaining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 cultures					★
語文素養：經由英文能力培養對文化視野 Comparisons: Developing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
跨域學習：能以英文學習其他專業領域的新知 Connections: Connecting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acquiring new information					★
社群參與：能以英文參與跨語言的國際社群 Communities: Participating in multilingual communities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

4. Course Objectives/課程目標

After completing the course, students will

- 1) develop career skills in the working world
- 2) develop problem solving skills for business cases

修完本課程後，學生將

- 1) 培養多元商務情境溝通技巧
- 2) 培養商務情境個案討論及問題解決技巧

5. Course Description/課程說明

This course

- 1) helps students develop business concepts.
- 2) helps students enhance learn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business articles
- 3) helps students learn and use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in business
- 4) helps students develop problem-solving skills for business cases.
- 5) helps students develop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skills

本課程

- 1) 培養商務領域之相關背景知識
- 2) 提昇商務領域文章的學習與理解
- 3) 提昇商務領域之字彙及用語能力
- 4) 培養商務情境個案討論及發表所需之溝通技巧
- 5) 培養商務寫作溝通技巧

6. Method of Instruction/授課方式

1. Lecturing
2. Individual practice
3. Pair and group work
4. Class discussion
5. Class activities
6. Online interactive learning

1. 講解
2. 個別練習
3. 小組活動
4. 課堂討論
5. 課堂活動
6. 線上互動學習

7. Course Materials/課程教材

Tonya T. & Graham T., *Intelligent Business Upper Intermediate*.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8. Grading /評量

Grading	評量項目	Percent
1. Placement Test	1. 期初英語能力檢核測驗	4%
2. Attendance	2. 出席率	10%
3. Participation	3. 課程參與	8%
4. Self-access Learning	4. 自學	5%
5. Weekly Assignments	5. 每週作業	15%
6. Weekly Quizzes	6. 每週小考	10%
7. Midterm exam	7. 期中考	15%
8.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8. 英語能力會考	8%
9. Final project	9. 期末呈現發表	10%
10. Final exam	10. 期末考	15%

9. Available Support Service/課程資源

-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podcasts.ox.ac.uk/units/said-business-school>
Webcasts
- MIT Audio and Video <http://ocw.mit.edu/courses/audio-video-courses/>
Lectures
- TED <http://www.ted.com/>
- Writing the Basic <http://owl.english.purdue.edu/owl/resource/653/01/>
Business Letter

10. Course Schedule & Topics/課程大綱

Week	Date	Topics	主題
1	2/20	Course Introduction Placement Test	課程介紹 檢核測驗
2	2/27	Unit 1: Alliance	單元一：策略聯盟
3	3/6	Unit 2: Projects	單元二：專案管理
4	3/13	Unit 3: Teamworking	單元三：團隊合作
5	3/20	Unit 4: Information	單元四：資訊管理
6	3/27	Unit 5: Technology	單元五：科技發展
7	4/3	No Class	補運動會活動未放假（停課一天）
8	4/10	Unit 6: Advertising	單元六：廣告行銷
9	4/17	Mid-term	期中考
10	4/24	Unit 7: Law	單元七：法律
11	5/1	Unit 8: Brands	單元八：企業品牌
12	5/8	Unit 10: Energy	單元十：能源產業
13	5/15	Unit 12: Competition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單元十二：市場競爭 英語能力會考
14	5/22	Unit 13: Banking	單元十三：銀行業
15	5/29	Unit 14: Training	單元十四：人力訓練
16	6/5	Unit 15: Consulting	單元十五：諮商顧問
17	6/12	Final Presentation	成果呈現
18	6/19	Final Exam	期末考

*Adjustments may be made in the syllabus to meet students' needs and course requirements.

*課程進度及課程要求將依教學需要做適度的調整

Yueh-long Yang (楊岳龍)

語意具體性及華語名詞複合詞之構詞研究*

龔書萍*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複合詞詞義具體程度是否影響複合詞構詞方式。我們主張具體詞義的複合詞時，傾向使用「語意關聯」的構詞方式。而抽象詞義的複合詞時，則會使用「特徵映照」的構詞方式。我們利用量詞字典收集名詞複合詞，針對這些名詞，請受試者判斷複合詞的具體程度。另外，我們也分析了這些名詞複合詞的構詞方式，把複合詞分類成「語意關聯」、「特徵映照」及其他類。研究結果顯示具體語意複合詞，使用「語意關聯」的構詞方式比「特徵映照」構詞方式頻率高。然而，在抽象語意複合詞，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的頻率則與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的頻率一樣多。我們研究結果符合我們的假設：複合詞語意具體程度限制了複合詞內部構詞結構。本研究可以提供華語教師了解華語複合詞構詞結構與詞義的互動關係，進而使用這些語言知識於課堂教學，使得外籍學生更容易及成功學習新穎或創新的華語複合詞。

關鍵詞：語意關聯，特徵映照，語料庫方法、具體判斷實驗、構詞

* 謝辭本研究得到科技部計畫補助(104-2420-H-415 -001 -)，特此感謝。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1 月 25-29 日於第十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上，感謝與會專家學者給予之寶貴建議。

*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到稿日期：105 年 1 月 28 日。

Concreten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Noun-Noun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Shu-ping Gong*

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ncreteness in meanings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We propose that when the compounds are concrete, they are likely formed by the semantic-relation method; instead, when the compounds are abstract, they are likely structured by the attributive-mapping method. We used a classifier dictionary to collect 225 noun-noun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se compounds were rated by participants for the level of concreteness. Furthermore, we analyzed the formation of these compounds, categorizing them into three kinds: the thematic-relation method, the attributive-mapping method, and oth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compounds were concrete, the frequency of compounds using the thematic-relation method was higher than the one of compounds using the attributive-mapping 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compounds were abstract, the compounds using the attributive-mapping method occurred as often as those using the thematic-relation one. To conclud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oncreteness is a constraint in determining the formation methods of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It is hoped that our research can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SL teachers and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novel and creative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Keywords: thematic relations, attributive mapping, corpus approach, concreteness judgment task, morphology

*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grants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author (104-2420-H-415 -001 -). The author would like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10th Conference on Chinese Studies and Teaching for their comments on earlier versions of this work. Remaining errors are our sole responsibil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Received Jan 28, 2016.

一、前言

複合詞是指由兩個以上具有意義的詞所組成，在華語詞彙中，複合詞使用很頻繁（Li and Thompson 1981）。複合詞的分類方式很多，若根據詞類，又可以分為「名詞-名詞」複合詞（noun-noun compounds），例如「電燈」、「動詞-動詞」複合詞（verb-verb compounds），例如「打破」、「名詞-動詞」複合詞（noun-verb compounds），例如「地震」，和動詞-名詞複合詞（verb-noun compounds），例如「寫字」。先前的研究著重於分析「動詞-動詞」複合詞（Chen 2008；張麗麗 2003），卻很少針對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來探討。本研究將探討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的分佈及複合詞中的構詞結構與語意的互動關係。

在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中，根據構詞結構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語意關聯」複合詞，而另外一類是「特徵映照」複合詞。「語意關聯」複合詞是指複合詞的兩個詞具有語意關係。例如：「木棒」這個複合詞，是由兩個名詞「木」及「棒」所組合。而且，「木棒」這詞的意義也是由「木」和「棒」兩個詞的語意所組成。也就是，兩個詞「木」和「棒」是使用「製造」語意關聯來連接，是指「棒子是由木頭所製造」。

第二類是「特徵映照」複合詞，其構詞結構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修飾語，一個是被修飾語，結構類似偏正結構，複合詞的語意是由其中一個字詞的特徵來修飾另一個字詞例如「鐵票」，並不是指「用鐵的票」，而「鐵」是指「堅固、堅硬」，這裡指「已經支持特定候選人或政黨的堅定不變的選票」。這裡的「鐵」與「票」並不具有特殊語意關係（例如：製造），而是選取「鐵」的特徵「堅固、堅硬」來描述「票」。本研究將針對這兩類名詞複合詞，利用字典收集華語複合詞，來檢驗這兩類華語複合詞的分佈狀況及與語意具體性的互動關係。

以下本文第二節將介紹研究背景，第三節是研究目的，呈現我們的研究議題。第四節是研究方法，說明我們如何收集語料及分析語料步驟。第五節是研究結果，呈現複合詞的詞義具體程度與構詞方式的相關性。最後是結論及對於華語教學的啟示。

二、研究背景

針對英文名詞-名詞複合詞結構及理解的文獻，過去西方的研究（Downing 1977；Levi 1978）有相當多的討論。而從語言處理（language processing）的角度來看，主要有兩大「名詞-名詞」複合詞的理論（Murphy 1988, 1990; Gagné and Shoben 1997; Gagné 2000, 2002; Esters and Glucksberg 2000; Wisniewski 1996, 1997; Wisniewski et al., 1998）。第一個理論是**名詞語意關聯競爭理論**（The Competition Among Relations in Nominals theory, CARIN, Gagné and Shoben 1997）。Gagné and Shoben（1997）主張「名詞-名詞」複合詞中的兩個詞概念是具有特定「語意關聯」（Thematic relations），例如「花園」的例子中，「花」放置在「園」（Modifier

located noun)。而這種語意結構也會影響人類理解「名詞-名詞」複合詞。根據 Gagné et al. (1997) 的研究，歸納出英語名詞-名詞複合詞的十四種語意關聯（如表一）。例如，在英語中，“milk cow” 的語意關聯是 “cow making milk” 「製造牛奶的牛」。又例如，“chocolate bird” 的語意關聯是 “birds are made of chocolate” 「由巧克力所製造的鳥」。

表一：英語複合詞中二個詞素語意關聯（Gagné and Shoben, 1997）

語意關聯	英文例子
Noun <i>makes</i> modifier	Milk cow
Noun <i>made of</i> modifier	Chocolate bird
Modifier <i>is</i> noun	Dessert food
Noun <i>about</i> modifier	Mountain magazine
Noun <i>derived from</i> modifier	Oil money
Noun <i>located</i> modifier	Mountain cloud
Modifier <i>located</i> noun	Murder town
Noun <i>has</i> modifier	Picture book
Modifier <i>has</i> noun	Lemon peel
Noun <i>causes</i> modifier	Flu virus
Modifier <i>causes</i> noun	College headache
Noun <i>for</i> modifier	Cooking toy
Noun <i>uses</i> modifier	Gas antiques
Noun <i>used by</i> modifier	Servant language

註：modifier 是指複合詞的第一個名詞，而 noun 是指符合詞的第二個名詞

Gagné et al. (1997) 主張這些語意關聯的使用頻率，會影響人類理解複合詞。在 Gagné et al. (1997) 的研究發現當新穎「名詞-名詞」複合詞（novel noun-noun compounds）使用高頻率的語意關聯（例如：“office plant” 使用 *noun located modifier* 語意關聯），受試者比較容易理解這樣的複合詞。然而，新穎「名詞-名詞」複合詞使用低頻率的語意關聯（例如：“chocolate plant” 使用 *noun made of modifier* 語意關聯），受試者對於這種複合詞會使用比較長時間來理解。

第二個理論是**雙歷程理論**（The dual-process theory, Wisniewshi 1996, 1997, Wisniewshi at al., 1998）。Wisniewshi (1996) 認為理解「名詞-名詞」複合詞並非只使用單一歷程方式，而是有兩種理解歷程。其一是「名詞-名詞」複合詞使用語意關聯來理解複合詞的語意，例如「花園」、「木棒」。其二是複合詞會使用「特徵映照」（attributive mapping）來理解複合詞語意。例如，英語中的 “Zebra Clam”，受試者理解為 “A clam has stripes” 「有條紋的蛤蜊」。這樣的詮釋方式是利用 “zebra” 「斑馬」的條紋為特徵，來修飾 “clam” 「蛤蜊」。

Wisniewshi (1996) 的實驗結支持雙歷程理論。在實驗中，受試者看到英語新穎複合詞（novel compounds），例如 “robin snake”，然後寫下這個複合詞的語

意。實驗結果顯示，受試者在詮釋新穎複合詞時，使用「語意關聯」方式為 53%，而使用「特徵映照」方式有 41%，兩種構詞方式的比例都相當高。例如，在詮釋“robin snake”這個複合詞時，有些受試者會解釋為“a snake that eats robins”「吃麻雀的蛇」，這樣詮釋的語意顯示受試者使用「語意關聯」方式來詮釋複合詞。另外，有一半的受試者把“robin snake”解釋成“a snake with a red underbelly”「有紅腹部的蛇」，這樣詮釋的語意表示受試者使用「特徵映照」模式來詮釋複合詞，選取“robin”的顏色來描述“snake”。所以，Wisniewski (1996) 認為這兩種複合詞處理模式並沒有哪一個模式一定比那個模式先使用，似乎與受試者本身的語言經驗有關，選擇其一的詮釋方式。

另外，Gagné (2000) 認為雖然複合詞的內部詞素結構可分為「語意關聯」或是「特徵映照」這兩種分類，但兩種的分佈的數量卻有極大的不同。這個假設可以由 Gagné (2000) 語料庫研究中得到證據。在 Gagné (2000) 研究結果顯示英語複合詞中，使用「特徵映照」數量很少，大約只佔的 1%，而使用「語意關聯」的複合詞卻佔了 99%。雖然受試者會解釋“robin snake”的意義為「有紅腹部的蛇」，但這個發生次數也是非常少。

對於 Gagné (2000) 複合詞語料庫研究發現，複合詞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的數量相當少，只佔語料庫中的 1%，而複合詞使用「語意關聯」方式卻佔了語料庫 99%。但是，Wisniewski and Love (1998) 的研究卻發現使用「特徵映照」複合詞所佔的比例高達 29%。Gagné (2000) 和 Wisniewski and Love (1998) 的研究中，「特徵映照」構詞方式的複合詞的使用頻率有極大差異。Gagné (2000) 提出這兩個研究中所發現頻率分佈不同可能與複合詞是否為自然物 (natural kinds) 有關。在 Wisniewski and Love (1998) 所分析的複合詞大部分與自然物體有關，包括動物 (animal) 植物類 (plant) 的複合詞。而 Gagné (2000) 的語料中，複合詞大部分是人造物 (artifact)。所以，Gagné (2000) 認為「特徵映照」複合詞分佈的不同，可能在於自然物著重於物體的特徵，例如顏色（例如，「紅色的花」）、形狀（例如，動物的耳朵）等等。而人造物著重於物體功能，例如如何使用人造物（例如「電腦」）、或是人造物用於哪個地方或場合（例如「食物」）等等。所以，複合詞如果與自然物體有關，使用「特徵映照」的構詞方式的複合詞或許會比使用「語意關聯」的構詞方式的頻率高。

這兩類複合詞不對稱分佈，除了複合詞概念是否為自然物外，本文主張與複合詞語意的具體性有關。由於 Gagné 所分析的複合詞幾乎都是具體的名詞（例如：“robin snake”，“chocolate birds”等等），所以我們推論詞彙語意的具體性可能會影響複合詞的構詞結構。也就是說，越具體的複合詞，其構詞方法傾向使用「語意關聯」的結構。而越抽象的複合詞，其內部構詞方法則傾向使用「特徵映照」的結構。

有關詞彙語意具體化程度是否會影響語詞的理解或詮釋，先前研究顯示在語言理解實驗中，理解具體單字或句子比理解抽象單字或句子所使用的時間較短或是比較容易理解 (Holcomb et al. 1999; Van Hell and De Groot 1998; West and

Holcomb 2000)。在 West and Holcomb (2000) 的實驗中，他們讓受試者閱讀英語句子，句子的最後一個字可能是具體單字（例如，“spider”，“violin”，和“umbrella”）或是抽象單字（例如，“greed”，“equality”，“chaos”），受試者閱讀後判斷句子語意對或錯（語意判斷作業, semantic decision task）和在大腦裡形成圖像（圖像產製作業, imagery generation task），他們的反應時間和大腦腦波記錄下來。實驗結果發現，在兩種作業中，具體詞彙比抽象詞彙反應時間比較短。腦波的結果顯示具體詞彙比抽象詞彙在 N400 及 N700 的波形幅度還大，這個表示理解具體詞彙時，我們大腦會形成圖像來幫助理解，而理解抽象詞彙大腦比較不能形成明顯的圖像。

另外，在雙語研究中（Van Hell and De Groot 1998; Tokowicz and Kroll 2007），雙語者在翻譯外語詞彙成母語時，詞彙越具體，翻譯時間越少，詞彙越抽象，相對的翻譯時間越長。另外有些研究（Schönpflug 1997）也發現，抽象詞彙有較多的詞義（senses），而具體詞彙的詞義則較少。所以，這些研究結果證實了詞彙具體程度會影響詞彙處理效率及預測詞彙在心理詞典中的語意數量。

總之，名詞-名詞複合詞的內部詞素的結構，可分為「語意關聯」及「特徵映照」者兩大類。在先前研究發現，英語複合詞約 99% 使用「語意關聯」構詞結構，只有 1% 的英語複合詞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我們認為先前複合詞研究集中在具體語意的複合詞（例如：“robin snake”，“chocolate birds” 等等），所以構詞結構會偏向「語意關聯」構詞方式。若是複合詞概念是抽象的，是否複合詞的構詞結構仍會偏向「語意關聯」構詞方式？還是抽象語意的複合詞，多使用「特徵映照」？本研究將探討語意具體性對於複合詞的內部構詞結構是否有影響。

三、研究議題及目的

過去華語複合詞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動詞-動詞複合詞（Chen 2008; 張麗麗 2003）或是華語複合詞理解（Gong 2004; Ye and Qiu 2008），但是，有關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的語意和構詞結構的研究幾乎沒有（Li 1971）。為了更加了解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的特性，本研究將分析華語複合詞詞義具體程度和構詞結構的關連性。

這個研究有二個研究問題：（1）華語複合詞中，使用「語意關聯」構詞結構的複合詞和使用「特徵映照」構詞結構複合詞的分佈如何？是否「語意關聯」複合詞的分佈頻率會遠多過於「特徵映照」複合詞；（2）是否複合詞詞義具體程度會影響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所使用構詞結構？是否複合詞詞義越具體，複合詞較多使用「語意關聯」構詞結構？是否複合詞詞義越抽象，複合詞較多使用「特徵映照」構詞結構？

本研究提出複合詞的語意具體性會影響複合詞內部構詞結構，我們預測當華語複合詞語意具體時，「語意關聯」的複合詞數量應該遠多過「特徵映照」的複合詞。然而，當華語複合詞語意抽象，「特徵映照」的複合詞數量多過「語意關聯」的複合詞。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將利用字典收集約 250 個複合詞，請受試者在 1~7 的評量表上判斷這些華語複合詞的具體程度，然後計算每個複合詞的具體程度之分數。再來，我們根據具體判斷作業後，把複合詞分類為具體複合詞和抽象複合詞。然後，我們將計算具體詞義的複合詞使用的「語意關聯」構詞結構和「特徵映照」構詞結構的頻率。最後，我們將計算抽象詞義的複合詞使用的「語意關聯」構詞結構和「特徵映照」構詞結構的頻率。

四. 研究方法

這個研究目的是了解複合詞語意具體程度是否會影響複合詞構詞方式。我們從「常用量詞詞典」(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 1996)中挑出二十個最常用的分類詞，收集與這些分類詞搭配的複合詞。然後，我們請受試者在 1~7 的量表中來判斷這些複合詞詞義的具體程度，1 代表抽象，7 代表具體。根據這些受試者的資料，平均五分以上複合詞我們分類為具體詞義，五分以下的複合詞，我們分類為抽象詞義。接下來，我們分析具體複合詞中，哪些是使用「語意關聯」構詞結構，哪些是使用「特徵映照」構詞結構。相同的步驟也用於分析抽象複合詞。以下我們將針對以上這些步驟詳細說明。

(一) 收集華語複合詞

我們從利用「常用量詞詞典」(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 1996)中挑出二十個最常用的分類詞，例如條、粒、根、顆、張、個、隻、片等等。然後，收集字典中所收錄的與這些分類詞所搭配的所有名詞，例如與「條」搭配的名詞有「長褲」、「領帶」等等；與「根」搭配的名詞有「電線」、「木棒」等等；與「個」搭配的名詞有「水桶」、「衣架」等等。我們會利用量詞詞典所收錄的複合詞為我們研究華語複合詞的來源，主要原因是我們要收集的複合詞限制在名詞類，由於華語複合詞的詞類並不明顯，所以我們就利用分類詞的語法特性，與分類詞所搭配的詞彙大部分以名詞為主，所以我們以量詞字典中所收集的名詞詞彙作為我們複合詞的研究。

量詞字典中，我們選取與這二十個分類詞所搭配的名詞，一共 255 個名詞組。。由於本研究探討名詞-名詞複合詞，所以我們刪除單字的名詞（例如魚）。另外，若名詞複合詞重複出現，我們也只選取一筆資料。第三，為了控制我們所分析的複合詞有一致性結構，我們也刪除詞綴結構，例如，有「子」詞綴的名詞（例如：「繩子」、「房子」、「釘子」）、以及連綿詞（例如：「螞蟻」、「駱駝」、「蝴蝶」、「蟾蜍」）或是二字詞以上複合詞（例如：「雙人床」、「釣魚竿」、「殺蟲劑」、「木製家具」）。最後，也利用中研院平衡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 1993, <http://dbo.sinica.edu.tw/SinicaCorpus/>)的分類標準來確認這些複合詞的詞是否都為名詞(Na)。複合詞中若一個詞並非名詞，我們也移除這些非名詞-名詞的複合詞。最後符合後續分析的華語複合詞一共有 135 筆。

（二）複合詞語意具體性實驗

收集到名詞後，我們執行了語意具體判斷實驗，施測這 135 個「名詞-名詞」複合詞，了解這些複合詞詞義是否具體。我們找了嘉義大學 41 位大學生為受試者（平均年齡為 19.5 歲，男性 34 人，女性 7 人），評量這些名詞-名詞複合詞。受試者在問卷上，看到這 135 個複合詞，與 1-7 的量表，1 代表抽象，7 代表具體，2~6 則介於中間。他們需要判斷這些複合詞概念具體程度，如果覺得複合詞詞義很具體，圈選 7；如果他們覺得這些複合詞概念很抽象，就圈選 1；若介於具體與抽象中間，則根據他們的語感圈選 2~6。

實驗結果顯示，在五分之上的複合詞有 90 個（67%），我們分類這些複合詞為具體複合詞。而在五分以下的複合詞有 45 個（33%），我們則把這些複合詞歸類為抽象複合詞。

（三）分析具體語意複合詞

我們進一步分析 90 個具體語意的複合詞的構詞方式。這 90 個名詞複合詞的構詞方式。我們把這些複合詞分類為三：（1）「語意關聯」構詞結構；（2）「特徵映照」構詞結構；（3）其他類。第一類是 Gagné and Shoben（1997）提出「語意關聯」構詞方式，是指複合詞的兩個詞可以用一個語意關係來解釋（“A relation can be used to interpret the combination”）。這個語意關聯可以是「製造」關係（MAKE）、「位於」關係（LOCATE）等在表一所列語意關聯之一。例如：「木椅」，這個複合詞是指「椅子是木頭做製造而成」，所以是「製造」的語意關聯。

我們根據 Gagné and Shoben（1997）所定義的複合詞的十四種語意關係，本文我們簡化成八類語意關聯，如表二所列。簡化成八類的原因在於我們認為因為有些語意關聯的準則相當類似，例如 Noun *makes* modifier 和 Noun *made of* modifier，都屬於 MAKE 這個語意關聯，我們認為這兩個準則可以合併成一類語意關聯，也可使複合詞分類流程更為簡潔。所以在這個研究中，我們先採用八類語意關聯來分類 90 個具體語意複合詞。

第二類是「特徵映照」構詞方式，是指其一個詞的特徵轉移到另一個詞上（“A property of one noun is transferred to the other”, Gagné and Shoben, 1997）。例如，這個複合詞「蘋果臉」，是把「蘋果」的特徵「紅色」轉移到臉上，所以這屬於「特徵映照」構詞方式。

第三類為其他，指不屬於「語意關聯」或「特徵映照」構詞方式的複合詞，我們歸類於「其他類」，例如「櫥櫃」，這個複合詞中，屬於並列結構，並不是哪個詞（modifier）修飾哪個詞（head）。複合詞意義雖然是由「櫥」和「櫃」構成，但這兩個詞的概念是一樣重要，並非是「語意關聯」或是「特徵映照」構詞方式，所以我們把這些屬於其他類。

根據上述的三個定義，若複合詞中第一個詞和第二個詞有語意的關係，我們會再分類成八個語意關係。例如，當我們分析「毛衣」時，這個名詞複合詞的語意透明，所以再次分類這個複合詞中第一個詞與第二個詞的語意關係為「製造類」，因為「衣」是由「羊毛」製造而成。

表二：華語複合詞的語意關聯

語意關係	華語例子
製造類 (MAKE)	木椅
隸屬類 (IS)	蘭花
衍生類 (DERIVE)	米酒
位於類 (LOCATE)	田鼠
含有類 (HAVE)	繪本
造成類 (CAUSE)	高山症
功能類 (FOR)	窗簾
使用類 (USE)	兒童椅

然而，當複合詞中第一個詞和第二個詞並不存有語意關係，但是構詞方式是其一個詞的特徵轉移到另一個詞時，我們就歸這個複合詞是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例如，在我們語料中有「漆黑」這個複合詞，第一個詞「漆」的特徵顏色轉移到第二個詞「黑」，意思指「形容顏色極黑」。最後，若是複合詞的其中一詞的語意是屬於語意的延伸或是無法歸屬於前兩類，我們就歸類為第三類其他/無法分類。

（四）分析抽象語意複合詞

根據（三）分析具體語意的複合詞的三種分類方式，我們也採用在分析抽象語意複合詞 45 個複合詞。方法和步驟就如同三步驟所敘述相同。

五、結果及討論

在具體語意複合詞中，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有 52 個複合詞，佔具體複合詞 58%（表三），例如「鋼管」，意思是指「一種管子由鋼鐵所製成」。另外，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只有 5 筆複合詞，佔具體複合詞僅 5%，例如「梯田」，意思是指「田的形狀或排列方式像是梯子」。然而，有 33 筆複合詞是無法分類在這兩類構詞方式，佔具體複合詞 37%，例如「瓦礫」，是指「瓦片和小石頭」，瓦和礫兩個名詞是並列關係，兩個名詞間無任何語意關聯或是利用特徵映照來產生複合詞語意。從具體詞義的複合詞三類數據中，我們發現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比「特徵映照」構詞方式比例還要高。

在抽象語意複合詞，呈現了不一樣的分布。在 45 個抽象複合詞中，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只有 4 筆複合詞，佔抽象複合詞的 9%，例如「掌聲」，意思是指「藉由手掌所發出的聲音」，是由利用「造成」語意關聯連結「掌」和「聲」兩個字。另外，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雖然也只有 5 筆複合詞，但佔抽象詞義複合詞的 11%。例如「銀白」這個詞，意思是指「一種白色，非純白色、而是像銀金屬的白亮顏色」，這個詞是借用銀的顏色來描述「銀白」這種顏色。然而，有 36 筆複合詞是無法分類在這兩類構詞方式，例如「消息」，意思指

「人或事物情況的訊息」，但「消」「息」這兩個字的字義是抽象，我們無法得知「消息」的詞義是如何由這兩個字組合成。從抽象語意的複合詞三類數據中，我們研究發現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比例和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比例相似。所有複合詞樣本，包括抽象語意複合詞 45 個詞和具體語意複合詞 90 個詞，請見附錄。

表三：複合詞具體程度與構詞方式之分佈

	語意關聯	特徵映照	其他	總計
具體複合詞	52 (58%)	5 (5%)	33 (37%)	90 (100%)
	鋼管	梯田	瓦礫	
抽象複合詞	4 (9%)	5 (11%)	36 (80%)	45 (100%)
	掌聲	銀白	消息	
總和	56 (42%)	10 (7%)	69 (51%)	135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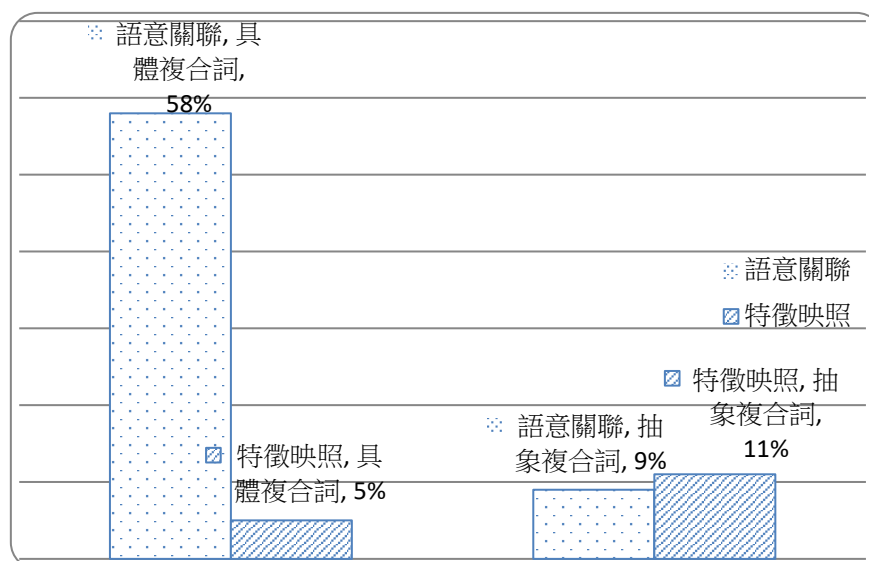
抽象複合詞中，在「其他」類的複合詞數量相當多，比例高達 80%。主要的原因是抽象複合詞的詞義抽象（例如生機、方式），較難判斷詞義是如何從複合詞中的兩個字衍生而來。然而，具體複合詞中，在「其他」類的複合詞數量比例低，只有 37%。主要的原因就是具體複合詞詞義具體明確（例如衣架、書桌），很容易可以從詞義中推論出複合詞中兩個字的語意關係。

這邊的結果顯示具體和抽象語意複合詞呈現不同趨勢。具體複合詞中，使用「語意關聯」複合詞比例遠遠高於使用「特徵映照」複合詞，相差高達 53%。然而，在抽象複合詞中，使用「語意關聯」複合詞的比例並不高，與使用「特徵映照」複合詞比例差不多（9% vs. 11%），只相差 2%。這結果證明了複合詞語意具體程度與構詞方式是有相關性。「語意關聯」的構詞方式較常出現在具體語意複合詞。但是「語意關聯」的構詞方式在抽象語意複合詞並沒有出現偏好。

為何複合詞語意概念比較具體時，會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而複合詞語意概念比較抽象時，會較常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詞彙語意具體性為何會影響複合詞構詞方式？我們認為複合詞是具體概念時，因為比較容易想像或是比較容易形成圖像，通常會選取複合詞的**整體**概念，而「語意關聯」構詞方式也都是由整體概念來構成。例如，「木桌」是指「桌子」用「木頭」製造，所指涉的就是整個「桌子」或是「木頭」的概念。複合詞的意思是使用兩個整體的概念「桌子」和「木頭」來形成。

然而，複合詞是抽象概念時，由於概念比較無法想像或是無法形成圖像，較無法選取整體概念，而是選取複合詞的**局部**特徵，而「特徵映照」構詞方式就是把複合詞中其中一個概念的局部特徵來描述另一個概念。例如，「漆黑」是指「顏

色極黑」，「漆」在複合詞中，並不是指漆樹、而是指由漆所製成的塗料，顏色是黑。「漆」在這裡就是使用局部的特徵——顏色來描述另一個詞。所以把「漆」的顏色用來修飾另一個概念「黑」，表示「很黑的黑色」。



圖一：具體語意及抽象語意複合詞使用「語意關聯」及「特徵映照」百分比例

另外，在具體複合詞中，使用「語意關聯」的規則比例顯示在表四。「功能類」的語意關聯使用最多，佔 33%，複合詞如「衣架」。第二高的語意關聯是「製造類」，佔 25%，複合詞如「木屋」。然而，「衍生類」及「造成類」的複合詞比例較低，在我們的語料中，只發現各一例，顯示這兩類複合詞出現機率很少，例如「蜂蜜」使用「衍生類」語意關係，「牛屎」使用「造成類」語意關係。最後，我們的研究中並沒有發現「使用類」的複合詞。

與先前研究結果比較 (Gagné 2000; Wisniewski and Love 1998) 的研究結果。若以整個分佈而言，「語意關聯」複合詞的數量高於「特徵映照」複合詞 (42% vs. 7%)，符合 Gagné (2000) 的結果，「特徵映照」複合詞所佔比率遠低於「語意關聯」複合詞。但是，若複合詞語意概念抽象時，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的複合詞比率提高很多 (11% vs. 9%)。由我們研究發現抽象複合詞偏好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而具體複合詞則偏好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

雖然我們的研究結果與 Wisniewski and Love (1998) 所發現的「特徵映照」複合詞的比例分佈有些不同，但都呈現相同的趨勢，在構詞的語意或種類有所不同時，會影響複合詞的構詞方式，這都顯示華語構詞方式和語意的互動關係。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選用「語意關聯」或是「特徵映照」的方式在並不是任意 (arbitrary)，其實是受到複合詞語意的限制 (constraint)。我們的結果發現當複合詞語意是「抽象」時，使用「特徵映照」複合詞的頻率較多。若複合詞語意是「具體」時，使用「語意關聯」複合詞的分佈會較多。

表四：具體複合詞的八類「語意關聯」構詞方式比例分佈及例子

八類語意關連	數量	百分比	例子
1. 製造類 (MAKE)	13	25%	木屋
2. 隸屬類 (IS)	9	17%	松樹
3. 衍生類 (DERIVED)	1	2%	蜂蜜
4. 位於類 (LOCATE)	8	15%	頭髮
5. 含有類 (HAVE)	3	6%	斑馬
6. 造成類 (CAUSE)	1	2%	牛屎
7. 功能類 (FOR)	17	33%	衣架
8. 使用類 (USE)	0	0%	N/A
總數	52	100%	

我們的研究結果對於語意影響複合詞的內部結構方式，提供更多的證明。先前研究中，Gagné (2000) 和 Wisniewski and Love (1998) 只有探討到複合詞概念是否為自然物體 (natural kinds) 會影響複合詞的內部構詞方式。而我們的研究更進一步主張了複合詞的語意具體性會影響構詞方式，我們研究結果的支持了我們的假設。

六、結論及教學啟示

本研究探討複合詞語意具體性與構詞結構的互動關係。我們研究結果顯示，複合詞語意的具體程度可能影響到複合詞構詞的方式。複合詞的構詞可分為兩類，一是「語意關聯」構詞方式，二是「特徵映照」構詞方式。我們的研究發現，複合詞概念具體時，較多使用「語意關聯」的構詞結構。但是，複合詞語意抽象時，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比例較高，或是與「語意關聯」構詞方式比例相似。另外，我們也發現，在八種「語意關聯」中，功能類 (FOR) 所佔的比例最高，其次是製造類 (MAKE)。而我們的華語複合詞語料中，沒有找到使用類 (USE) 的複合詞。

有關本研究的兩個研究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華語複合詞中，使用「語意關聯」內部結構的複合詞和使用「特徵映照」內部結構複合詞的分佈如何？本研究發現，若只看具體複合詞，「語意關聯」複合詞的分佈頻率是遠多過於「特徵映照」複合詞，「語意關聯」複合詞佔 58%，而「特徵映照」複合詞佔 5%。雖然頻率的差距並不如 Gagné (2000) 研究中有發現 99% 英語複合詞為「語意關聯」複合詞，1% 為「特徵映照」複合詞，但兩個研究趨勢一樣。

第二個研究問題是，是否複合詞語意具體程度影響華語「名詞-名詞」複合詞所使用構詞方式？我們的研究顯示複合詞語意具體性限制了複合詞的構詞方式。當複合詞概念具體，複合詞偏向使用「語意關聯」構詞結構。然而，複合詞概念越抽象，複合詞偏向使用「特徵映照」構詞結構。

本研究的不足，在於「特徵映照」複合詞的數量並不是很充足。在我們的研究，一共分析 135 的複合詞中，「特徵映照」複合詞出現的數量並不多。原因可能就是「特徵映照」複合詞在華語複合詞的出現頻率本來就不高。另外，由於我們的複合詞來源是來自量詞字典，複合詞種類可能有所侷限。未來，我們將集中更多的複合詞來擴大研究範圍，我們將採用胡志偉等人（2005）所編撰 600 華語語詞和李皇謀及李玉琇（2011）所編撰的 267 中文雙字詞等複合詞，我們預期可以收集到不同種類的複合詞來與本研究做比較。

另外，未來我們也將繼續研究以下議題：若複合詞語意是與「動物」或「植物」相關的自然物體概念，是否偏好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若是複合詞語意是人造物（*artifact*）相關概念，是否偏好使用「語意關聯」複合詞。未來我們將針對複合詞語意範疇（*semantic domains*）和構詞方式進一步來探討。

本研究結果期望在實際華語教學現場，能提供華語教學老師指導學生如何習得華語複合詞。初學者可以先學習具體複合詞，而進階華語學習者再學習抽象複合詞。也希望透過本文的複合詞分析，使華語學習者能更容易瞭解華語複合詞的構詞規則及限制，可以更容易理解及使用新穎或創新華語複合詞（*novel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參考文獻

Chinese

- 中文詞知識庫小組 1993,《新聞語料庫字頻統計表》。台北:中央研究院。 [CKIP. 1993. *The Frequency Book of the News Corpu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 1996,《常用量詞詞典》。台北:國語日報出版中心 [CKIP. 1996. *The Classifier Dictionary*. Taipei: Mandarin Daily News]
- 李皇謀、李玉琇 2011,〈267 個常見中文雙字詞的情緒評量與自由聯想常模〉,《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4 卷第 4 期,頁 495-524. [Lee, Y.S., & Lee, H.M. 2011. Emotionality Ratings and Free Association of 267 Common Chinese Words. *Chinese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4-4: 495-524.]
- 胡志偉、高千惠、羅明 2005,〈600 個中文字的自由聯想常模〉,《中華心理學刊專刊》。[Hue, C. W., Kao, C. H., & Lo, M. 2005. *Monographs of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Free Association Norms for 600 Chinese words*.]
- 張麗麗. 2003. 〈動詞複合與象似性〉,《語言暨語言學》,第 4 卷第 1 期,頁 1-27。[Chang, Li-li. 2003. Verb compounding and iconicit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1: 1-27.]
- 葉文曦、邱立坤 2008. 〈漢語複合詞理解難易度的計算〉,《語言暨語言學》,第 9 卷第 2 期,頁 435-447. [Ye, L. and Qiu, W 2008. Computing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compound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2: 435-447]

English

- Chen, C.-J. (2008), "On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9.2: 325-340.
- Downing, P. (1977), "On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English compound nouns," *Language*, 53, 810-842.
- Esters, Z. and Glucksberg, S. (2000), "Interactive property attribution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Memory & Cognition*, 28(1), 28-34.
- Gagné, C. L. and Shoben, E. J. (1997), "Influence of thematic relations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modifier-noun comb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3, 71-87.
- Gagné, C. L. (2000), "Relation-based combinations versus property-based combinations: a test of the CARIN theory and the dual-process theory of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2, 365-389.
- Gagné, L. C. (2002), "Lexical and rel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processing of novel compounds," *Brain and Language*, 81, 723-735.
- Gong, S.-P. (2004), "The Comprehension of Predicating and Non-predicating Nominal Compounds in Mandarin," Presented at the 1st Workshop 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y 29. Taipei, Taiwan.
- Holcomb, P. J., Kounios, J., and Anderson, J. E. (1999), "Dual-Coding, Context

- Availability, and Concreteness Effects in Sentence Comprehension: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5(3): 721-742.
- Levi, J. N. (1978),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nomin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 (1971), *Semantic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mpounds i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issertation.
- Li, C. N. and Thompson, S. A.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urphy, G. L. 1988. Comprehending complex concepts. *Cognitive Science*, 12, 525-562.
- Murphy, G. L. (1990), “Noun phrase interpretation and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9, 259-288.
- Schönplflug, U. (1997), “Bilingualism and memo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lingualism, Newcastle-upon-Tyne, United Kingdom.
- Tokowicz, N. and Kroll, J. F. (2007), “Number of meanings and concreteness: Consequences of ambiguity within and across languages,” *Language & Cognitive Processes*, 22(5), 727-779.
- Van Hell, J. G. and De Groot, A. M. B. (1998), “Disentangling context availability and concreteness in lexical decision and word transl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 51, 41–63.
- West, W. C. and Holcomb, P. J. (2000), “Imaginal, semantic, and surface-level processing of concrete and abstract words: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12, 1024-1037.
- Wisniewski, E. J. and Love, B. C. (1998), “Relations versus properties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8, 177-202.
- Wisniewski, E. J. (1996), “Construal and similarity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35, 434-453.
- Wisniewski, E. J. (1997), “When concepts combine”, *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 4, 167-183.

附錄：複合體分類樣本

一、具體複合詞

(1) 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

書桌、衣架、水桶、鐵片、旗杆、口罩、松樹、字典、長褲、麵包、假牙、報紙、魚網、鉛筆、鐵路、圓桌、手套、鋼管、廚房、帆船、樂器、毛衣、公路、竹葉、教室、頭髮、木屋、蜂蜜、客房、汽水、冰棒、眉毛、象牙、牛尿、畫冊、海灘、棗樹、草地、鐵絲、木棒、電線、狗毛、相簿、斑馬、沙丘、茶水、海水、茶園、湖水、水道、圓柱、毛料

(2) 使用「特徵映照」構詞方式

彈珠、綿羊、梯田、雪花、路線

(3) 其他（無使用以上兩種構詞方式）

櫥櫃、孔雀、眼睛、香蕉、香菸、犀牛、領帶、右手、郵票、襯衫、證件、鬍鬚、珍珠、子彈、水果、鑽石、雜誌、森林、內衣、鈔票、照片、馬路、瓦礫、現金、草叢、套房、翅膀、綢緞、產品、星星、帳目、原野、會議

二、抽象複合詞

(1) 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

巨龍、弧線、掌聲、馬力

(2) 使用「語意關聯」構詞方式

陰影、銀白、漆黑、橘紅、曉色

(3) 其他（無使用以上兩種構詞方式）

顏色、運動、比賽、疆土、口號、線索、江山、職業、地方、計畫、海線、資源、事情、人命、行動、生機、類型、方式、消息、罪行、毛病、技倆、聲明、理由、朝氣、生命、層面、景氣、愛心、機會、權益、熱心、觀點、和諧、交流、祥和

借鏡與反思：臺灣士紳林獻堂觀見的美國

蔡米虹*

摘要

日治時期，臺中霧峰士紳林獻堂（1881-1956）為了完遂心願與迴避臺灣的紛擾，於 1927 年 5 月至 1928 年 5 月間，進行長達一年環遊歐美各國的長途之旅。他並就旅遊經歷撰文，連載於《臺灣民報》與《臺灣新民報》，即今日《環球遊記》一書內容。本文主要基於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美國見聞錄〉的內容分析，輔以日記的載述資訊，分別由美國民主發展內涵和現代化兩個面向歸結林獻堂的旅遊觀察，並與該趟旅行後林氏思想或活動作為之間的可能關連進行討論。分析結果顯示，林獻堂美國之行停留地點的安排規劃、觀察現象的視角和感受，極可能深受梁啟超、黃朝琴等人之影響。林獻堂透過對美國的獨立建國歷史與民主自由的認知、現代化城市生活的體驗、城市文明特質與美國國民日常行為表現的觀察，歸結出該國得以強勢發展的原因主要在於良好的教育及發達的經濟。美國之行，應具有強化和激勵林獻堂持續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爭取臺民參政權利的作用，而受到梁啟超的影響，其一貫採循文化抗日的策略路線，故他在返臺後仍熱切而積極地投入相關組織的運作，致力於文化推廣和地方自治運動。林氏藉由傳播媒體的刊載，將在美國的見聞以遊記的方式呈現，引介給臺灣人民認知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和臺灣現代化的進步空間，也提醒高度文明發展可能帶來的問題，冀能廣開民智，實現理想。該見聞錄對當時臺灣殖民社會發展所提供的借鏡和反思，可謂是其價值所在。

關鍵詞：林獻堂、《環球遊記》、〈美國見聞錄〉、遊記

*國立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副教授。
到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27 日。

Learning and Reflection: American Travel Notes of the Taiwanese Gentry Lin Hsien-Tang

Mi-hung Tsai*

Abstract

Gentry Lin Hsien-Tang, born in the famous family at Wu-Feng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aiwan, travelled the Global for a year from May 1927 to May 1928, for fulfilling wish and avoiding Taiwan's troubles in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articles which he wrote the formative records during travel period, were serially printed in *Taiwan Min Pao* and *Taiwan Shin Min Pao*. Those are also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of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The studying is desired to discuss the images of America and their meanings which Lin Hsien-Tang represented by analyzing the U.S.A. record of th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The article is focused on political system of American democracy and freedom, landscape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thought in development of great-power state.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Lin Hsien-Tang to American independent history, experiences of the life at modern cities, and observation of civi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aily behavior of American citizens, Lin concluded that the education and economics were the causes of a country to be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Lin's travel notes representing what he saw and he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Taiwan people und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by publishing. Promoting the democratic and developmental cognition of Taiwan society is to be expected and it is maybe the core value of those notes.

Keywords: Lin Hsien-Tang, *th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American travel notes, travel literatur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Received Nov 27, 2015.

一、前言

美國從英國的殖民地走向獨立建國，至今日居於全球強權地位，其發展歷史中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民生等各個面向總多有為世人關注、探究或借鑒之處。例如十九世紀法國政治思想家阿克列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考察美國刑事制度後，有感而發地撰寫《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迄今仍被奉為經典名著。¹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著名知識分子梁啟超（1873-1929）流亡海外期間，曾於1903年應邀赴美國遊歷與訪察，因此撰著了《新大陸遊記》，內容描述他對美國政治制度、社會現況及都市文明生活等面向的觀察與評價，並透露出其變法思維的改變。²梁啟超之外，近代一些至西方旅遊、考察的中國使臣與官員也藉由日記、遊記或雜錄中書寫出他們對西方國家的觀感。³

林獻堂（1881-1956）（字獻堂，名朝琛，號灌園，諱大椿）出身清代臺灣霧峰望族，⁴經歷清、日和民國三個時期，曾積極參與抗日運動或相關組織，且是重要領導人物，主要包括臺灣同化會（1914）、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1923）、臺灣民眾黨（1927）、臺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等，被後世譽稱「臺灣議會之父」，也被史學研究者讚為「臺灣第一公民」、「臺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裸母」，⁵影響當代社會深著，為臺灣近代名人。黃富三指出，林獻堂是一位值得後人瞭解的時代歷史人物，其之所以值得研究，在於：

林獻堂不但出身臺灣世家——霧峰林家，而且因人格高超、知識廣博，自日治至戰後，均是公認的第一號社會領袖。……林獻堂之人格、學識、

¹ 阿克列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秦修明、湯新楣、李宜培等譯，《民主在美國》（又譯為《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臺北：左岸文化，2005年）。事實上，當時與托克維爾一同前往美國考察監獄制度的尚有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 1802-1866）。但是，回國後，他們以各自關注的面向，書寫出不同的美國。博蒙着眼於美國人的風俗民情及種族問題，以書名：《瑪麗——或美國的奴隸制》（*Marie, or Slave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ovel of Jacksonian America*）出版。中譯本：古斯塔夫·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著；裴亞琴譯，《瑪麗——或美國的奴隸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² 鄭海麟，〈從《新大陸遊記》看梁啟超思想的突變與還原〉，《文史知識》2010年第5期（2010年5月），頁31-36。

³ 參見鍾叔河，《從東方到西方：走向世界叢書敘論集》（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鍾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先驅者》（臺北：百川出版，1989年）等書。

⁴ 有關林獻堂的家族及其成長背景，可參見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頁5-20。

⁵ Johanna Menzel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事蹟，均堪稱是臺灣歷史上罕見之典範，值得後人多加瞭解，甚至效法，進一步發揚臺人之光。⁶

1927年林獻堂時齡47歲，他決定離開當時處於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進行一趟環遊歐美各國的長途之旅。他雖非當時臺灣人最早至歐美的旅遊者，⁷但卻是首先將環遊世界的經驗與觀感撰寫成文，並將之刊載於《臺灣民報》的臺灣人，⁸連載內容即今日所見的《環球遊記》一書。⁹當年林氏先遊歐洲，最後至美國，而他在美國的遊歷見聞均書寫於《環球遊記》中的〈美國見聞錄〉。

由於林獻堂在當時臺灣社會具有的重要地位與高度影響力，再加上他遊歷世界各國的經驗，因此其遊記於報紙上連載時便吸引了許多讀者的閱讀目光，林氏甚至計畫日後將文稿匯集出版成書，此一想法或許源於他意欲仿效梁啟超撰寫《歐遊心影錄》¹⁰與《新大陸遊記》，或是高度預期遊記內容可引起廣大的共鳴和回響，達到宣揚理念的目的。猶如許雪姬認為，該《環球遊記》的價值核心在於「能對推動臺灣的自治甚至獨立有所幫助」。¹¹

《環球遊記》是林獻堂畢生除詩詞創作外最主要的文學代表著作，有關此遊記的學術研究，以許雪姬所撰之〈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為濫觴。¹²該文中探討林氏旅行歐美的背景，並對林氏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難以暢快書寫內心的想望有所著墨。許氏之後，學術界對林獻堂《環球遊記》的探討取徑漸趨多

⁶ 黃富三，《林獻堂傳》，自序頁III-IV。

⁷ 據許雪姬指出，最早到歐洲的臺灣人應為顏國年，他曾將其在歐美的旅遊撰寫成《最近歐美旅行記》一書，並未正式出版，而無法使眾人得知。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臺灣文獻》第62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64。

⁸ 連載時間自1927年8月28日至1931年10月3日止，《臺灣民報》第一百七十一號（昭和2年8月28日）至第三百八十四號（昭和6年10月3日），共計一百五十二回。前四期標題為〈環球一週遊記〉，後改為〈環球遊記〉。至第三百六號（昭和5年3月29日）改為《臺灣新民報》（期間有重覆刊文）。按：本文研究分析採用版本以首先刊載於《臺灣民報》內容為依據。

⁹ 有關林獻堂的著作主要收錄於原為葉榮鐘輯，《林獻堂先生紀念集》（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出版，1960年）。另有版本：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遺著》（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臺北：海峽學術出版，2005年）；林獻堂，《林獻堂環球遊記》（臺北：天下雜誌，2015年）。

¹⁰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香港：三達，1961年）。

¹¹ 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頁182。

¹²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第49卷第2期（1998年6月），頁1-33。許氏在文中探討林獻堂赴歐美旅遊的成行背景，並扼要臚列出行程，有助於讀者快速掌握林獻堂的環遊世界概況。因為林獻堂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難以暢快書寫出內心的想望，因此文字上一再作修改，從《臺灣民報》的連載，及再刊於《南方》雜誌，到再修改準備日後發行單行本。文字屢有調整，許氏將各版本的差異詳細列表對照，甚值得參考。另，在徐千惠一文中，更進一步地參考多方資料，詳列出各版本的不同所在，可補許氏所未及者。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頁171-183。

元，諸如遊記的文本分析或遊記內容的比較研究、¹³文化體驗論述等，¹⁴內涵上不僅分析林獻堂的旅遊心態，亦聚焦討論其所見之西方現代化觀察、文明現象和其身為被殖民者的心境反映。其中針對〈美國見聞錄〉為文者，以與同為美國遊記文本的比較分析為主，例如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一文分別整理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與林氏〈美國見聞錄〉內容，簡要歸結遊歷美國在二人政治立場或思想上的影響。¹⁵潘為欣之研究則側重於就黃朝琴〈遊美日記〉與林氏〈美國見聞錄〉的內容解析兩人對於現代化抱持之態度，¹⁶其他討論則見於有關遊記或旅遊文學的研究中。¹⁷

綜觀學界既有的林獻堂美國遊記研究，方法上以與他人的文本比較為主，討論內涵多從其觀覽現代化建設的角度切入，由之對照被殖民者的心境思想。由於美國在西方世界的歷史發展中具有特殊地位與影響力，加以林獻堂於1928年前往旅遊時，適逢該國國勢強盛之際，歷史上譽為「繁榮的1920年代」，林氏如何看待美國？美國見聞對林氏產生何種影響？上述問題之討論應有助於詮釋林氏旅美後的政治主張或社會作為，此一部分尚未有專文進行系統而深入的探討。此外，林氏赴美前，即心嚮往民主自由之制，也關注公共衛生和民眾生存權益。¹⁸赴美之際，則正值臺灣文化抗日運動組織分合擾攘和殖民政府現代化建設起步時期。有鑒於此，本文嘗試基於〈美國見聞錄〉的內容耙梳，輔以日記載述的整理，希冀由美國民主發展內涵和現代化兩個面向歸結林獻堂的旅遊觀察，並與該趟旅行後其思想或活動作為之間的可能關連進行討論。

二、林獻堂與《環球遊記》之〈美國見聞錄〉

1. 環遊世界的動機與目的

¹³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一文；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頁165-170。

¹⁴相關研究成果的整理與介紹多在一些文章中被提出，在此本文不再贅敘，建議可參考：例如，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1月），頁5-10；嚴志玄，〈走向世界——林獻堂環球之旅研究〉（嘉義：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6月），頁5-9。

¹⁵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旅遊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2000年），頁113-164。

¹⁶潘為欣，〈林獻堂與黃朝琴眼中的美國現代化——以《環球遊記》之美國見聞錄與〈遊美日記〉為例〉，《咁仔店電子學報》（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第二期（2008年8月30日），頁1-16。《咁仔店電子學報》。網址：
<http://s22.ntue.edu.tw/%B9q%A4%B4%C1%A5Z/P.htm>（2011年5月30日）。

¹⁷例如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1840-1945）研究》（臺北：文津，2008年），頁387-411。本書為陳氏之博士論文，見：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年6月）；林淑慧，《旅行文學與文化》（臺北：五南，2015年）。

¹⁸林淑慧，《旅行文學與文化》，頁200。

林獻堂《環球遊記》所記載的旅程時間始於1927年5月15日至1928年5月25日止，¹⁹前後歷時約達一年，遊歷十個國家，近百個地點。²⁰因為此次旅遊屬個人活動，所有費用必須自理，花費總計多少，並沒有明確數據可查，²¹就林家當年的資產而言，支付旅費或許不成問題。但是，相對於當時代的臺灣人民生活水準來說，該筆花費應是數量可觀。因此，林氏這次的環遊世界，可謂為日治時期臺灣人之「壯遊」（Grand Tour）²²。

有關林獻堂環遊世界的動機與目的，是研究他的遊記時必須瞭解的背景，基本上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說明：

其一是實踐個人願望。林獻堂在遊記中開宗明義地表示，他甚早便有環遊世界的想法：

余之蓄志漫遊，於今十有八年矣。爾時攀龍十歲，猶龍九歲，率之留學東京，則發此大願，謂二子若能俱畢業大學，即率之同作歐美漫遊，幸能循序漸進，所願得償。……即欲實踐吾志以作環球一週之遊。²³

也就是在林氏送二子至日本留學時，已對旅遊一事許下願望，期待他們取得大學學位後，父子共同環遊世界。許雪姬的研究指出，林獻堂因早有此動機，且深知出遊必須要有通譯協助，才會刻意栽培二子。²⁴然，筆者認為除上述原因外，由於林氏家族擁有雄厚的家族資產得以支助留學費用，是以讓下一代接受較

¹⁹出發時間依據許雪姬的推算是以林獻堂從基隆登船離開臺灣算起，而不以他從霧峰離家5月12日算起。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註一，頁26。又，5月25日是林獻堂返抵日本橫濱的時間，並「擬暫在東京靜養」，但「環球遊記即於此告終」，而非以5月9日離開美國桑港市計算。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環球遊記》，頁1（總頁277）、93（總頁462）。

²⁰依「見聞錄」，林獻堂旅遊歐美的十個主要國家分別為：法、英、德、丹麥、荷蘭、比利時、義大利、瑞士、西班牙、美國。新加坡、埃及、摩納哥等三個國家只稍作停留。另，嚴志玄研究指出，林獻堂的旅遊行程特點「多集中在西歐、中歐與南歐等比較現代化的國家」，沒去北歐地區或是交通和氣候因素；東歐則是政治不穩；美國則是美洲現代化國家。嚴志玄，〈走向世界—林獻堂環球之旅研究〉，頁51。

²¹林獻堂曾在日記中記載蔡惠如（1881-1929）、蔣渭水（1890-1931）及蔡培火（1889-1983）等人勸其放棄旅遊歐美，「將此三、四萬圓之費用，而投之經營日刊新聞」。由此可見這趟旅程林氏至少準備的費用有三至四萬元之多。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臺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2000年），1927年3月11日，頁105。（以下簡稱《灌園日記》）

²²在此本文將其類比為17世紀末歐洲貴族子弟已有學習性質的傳統旅遊教育活動，至18世紀更在英國興起「大旅遊」（或譯「壯遊」）（Grand Tour）的學習。參見：黃郁珪，《十八世紀英國紳士的大旅遊》（臺北：唐山出版社，2008年）一書。

²³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一）〉，《臺灣民報》第一百七十一號，昭和2年8月28日，頁7。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環球遊記》，頁1（總頁277）。手稿內容見：「葉榮鐘全集、文書及文庫數位資料館」。

網址：<http://archives.lib.nthu.edu.tw/jcyeh/main-guide.htm>（2011年4月1日）。

²⁴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頁177。

好的教育資源，培養國際視野，或許亦為林獻堂送子東渡日本，甚至遠赴英國留學的用意之一，故有言該次旅行為林氏給予兩子的「成年禮」，此說法不無道理。²⁵無論林氏漫遊歐美之舉是為了自己或是為了兩個兒子，其應已考慮到若要長期遠行，家人應是最適當同行陪伴者或助手，方有與子「同作歐美漫遊」的大願。此外，就林氏在首次刊登遊記內容時，將表明實踐願望一事作為開端來看，其似乎想表達此次旅遊的目的與動機並非只是單純的出國休閒遊樂，更多的是抱著期待。至於抱持的期待為何？應與他出國前面對臺灣當時的社會、政治局勢有所關聯，容待後述。

其二為「個人目的」的「視察」。林獻堂是以「視察歐美」作為理由向日本官方申請出國旅遊。大正15年（1926年）2月7日官方新聞媒體《臺灣日日新報》中文版新聞刊出林獻堂即將環遊世界的消息：

臺中林獻堂氏，於數日前，向同州大屯郡役所，請附與海外旅卷，林氏此行目的，為其令郎林猶龍氏，於本年四月，將畢業東京帝大，屆時父子一同，豫訂約一箇年間，視察歐美。²⁶

從新聞報導內容來看，林獻堂要「視察歐美」很顯然非關私人事業，此行也無關乎官方公務，而是出於強烈的「個人目的」。他不像基隆瑞芳（今新北市瑞芳區）人顏國年（1886-1937）（舊名瀛洲，號陽山）純因家族事業前往歐美視察。²⁷至於「個人目的」除了「親子同遊」外，徐千惠的研究另指出，林獻堂出遊的首要目的在於印證所讀及開拓視野，其次則是渴望自由；²⁸或為將來推動「各種社會運動儲備新能量」，因此他早有意圖將旅遊生活書寫成作品，²⁹不可否認地，發表的作品是得以作為宣傳理念的工具。洪銘水則認為，林獻堂此行「肩負學習西方的使命感」。³⁰若是如此，顯然林獻堂此次環遊世界有著超越個人層次的強烈企圖。為避免受到日本官方阻礙，林獻堂以「親子同遊」為由，較易順利取得通行證。

²⁵嚴志玄甚至認為這是林獻堂「給攀龍與猶龍的成年禮」。嚴志玄，〈走向世界—林獻堂環球之旅研究〉，頁29。

²⁶《臺灣日日新報》，第九二五二號，大正十五年二月七日。

²⁷顏國年於大正14年（1925年）即已與基隆炭礦株式會社社長牧田環和社鑛務主任尾家重治等共同前往歐美視察，顏氏回臺後撰寫〈最近歐美旅行記〉等文。部分內容只在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一書中的〈歐米視察漫錄〉一文中可見。其餘均未見出版。長濱實編，《顏國年君小傳》（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14年（1925年）11月），頁102-117。另，可見張純甫代顏國年寫歐美旅行遊記序文。張純甫著，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文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37-38。

²⁸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47號（2003年6月），頁450。

²⁹王志弘，〈在人群中感受規則：法律感性在臺灣之既有、擬製與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頁63-64。

³⁰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頁133。

其三是迴避紛擾。林獻堂出遊時間在1927年至1928年間，當時臺灣文化協會處於分裂局面。³¹從他的日記內容中可知，林氏不願再擔任協會委員，³²也不願將此次出遊的費用拿去投資日刊新聞，³³嗣後並和蔣渭水（1890-1931）等人組織「臺灣民眾黨」。³⁴再者，林獻堂長年致力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至此時也尚未能如願達成目的。林獻堂為遠離臺灣文化抗日運動組織間的分合紛擾，另尋新的視野或重新省思未來的方向，選擇出國遊歷不失為有力的理由與最佳的方式。因此，就當時現實環境觀察，這也可視為是促成林獻堂要出國長遠旅行的企圖。

林獻堂環遊世界的路線，³⁵在〈環球遊記校訂後記〉³⁶中有以下的說明：

先生此遊，自民國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發基隆至翌年四月（按：應為五月）十五日於日本橫濱上陸止，為時將近一年。歷遊英、美、德、法、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瑞士、荷蘭、丹麥等十國，其路線係以巴黎為中心，然後分赴各國，故出入巴黎凡五次。計前後住留巴黎達八十一天之久。³⁷

由遊記內容可得知，林獻堂與其次子猶龍（1902-1954）搭乘的船隻沿途曾停靠香港、新加坡、錫蘭及埃及開羅等處，之後到達法國巴黎與留學英國的長子攀龍（1901-1983）會合。³⁸在歐洲各國的漫遊即以法國巴黎為中心點開展。

林獻堂之所以會選擇歐美地區作為他的旅遊目的地，從人的因素來看，一則因長子攀龍在英國留學，可以協助規劃行程事宜，二則也是受到當地的友人邀約，例如當時在法國留學的板橋林家後代林柏壽（1894-1986）；³⁹在美國留

³¹當時以蔣渭水為首的份子退出協會另組臺灣民眾黨，協會正式分裂。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

³²《灌園日記》（一），1927年1月3日，頁16。

³³《灌園日記》（一），1927年3月11日，頁105。

³⁴「臺灣民眾黨」主要為蔣渭水所領導，提倡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實行義務教育、准許臺人出版日報報紙等。後因林獻堂辭退顧問一職及其參與度不夠，而受到總督府打壓。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臺北：益群書店，自刊本，1981年），頁208-213；吳連三、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71年），頁308-392；黃富三，《林獻堂傳》，頁51。

³⁵可參見：嚴志玄，〈走向世界—林獻堂環球之旅研究〉，頁36-42；147-157。該論文中對於林獻堂環遊世界的行程規劃內容有詳細說明與行程表整理。

³⁶陳岫傑研究指出，〈環球遊記校訂後記〉為葉榮鐘抄錄下林獻堂備忘錄之遊記文章，首頁即有對環球遊記之緣由作一說明。見陳岫傑，〈林獻堂著《環球遊記》之地理研究〉，《臺灣文獻》第61卷第2期（2010年6月30日），註48，頁435。

³⁷林獻堂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紀念集卷二遺著·環球遊記》，頁94（總頁462）。

³⁸林獻堂，〈環球遊記(十)〉，《臺灣民報》第一百九十一號，昭和3年1月15日，頁4。自1925年林攀龍取得東京帝大學位，並前往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後，期間父子已有一段時間未曾見面。

³⁹林獻堂，〈環球遊記(十一)〉，《臺灣民報》第一百九十二號，昭和3年1月22日，頁7。

學的屏東東港人林茂生（1887-？）（字維屏，號耕南）⁴⁰等。另由林氏的思想因素層面考量，學界研究多指向其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許雪姬的研究指出，林氏在於「欲效梁任公遊歷歐洲，觀察各國政經事務，俾益後來的革命事業，是必要的經歷。」⁴¹由於林獻堂年輕時期即相當關心時事，再者受到其族侄林幼春與「櫟社」成員的影響，⁴²早已仰慕中國著名知識分子梁啟超。⁴³林獻堂曾於1907年於日本東京旅遊時，偶遇梁啟超，得以趁此機會請教有關臺灣人民爭取自由的問題，⁴⁴自此開始二人多有書信往來。⁴⁵林氏並於1911年3月，邀請梁啟超訪臺。⁴⁶葉榮鐘在回憶錄中描述梁氏訪臺：「對臺人的民族意識予以鼓勵，加強其向心力，對於思想學問方面則有開通風氣、振聾發聵的效果。」⁴⁷梁氏曾赴歐美遊歷並著書記錄，訪臺期間且提供林獻堂許多歐美書籍訊息，林氏選擇歐美，得以在行前即能對當地具有基本的認識或熟悉程度。⁴⁸黃郁升的研究認為，林獻堂選擇歐美地區作為旅遊目的地，這是他對歐美的想像與期盼，而想像來自行前的書籍閱讀，期盼來自獲取新世界的新知。⁴⁹事實上，無論是民主發展或現代化，歐美相對於當時的臺灣而言皆是值得參訪學習的對象。

⁴⁰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二)〉，《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四號，昭和6年3月7日，頁7。

⁴¹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頁2。

⁴²林獻堂因具有強烈的漢族意識，在日本殖民臺灣後，積極參與各項保存漢文化活動，參加「櫟社」活動即是一例。「櫟社」成立於1902年，是當時最具民族意識與聲望最高的文人詩社。倡導者即是霧峰林家下厝的林痴仙（1875-1915）和林幼春（1880-1939）叔侄二人。「櫟社」為林痴仙定名，其意為：「吾學非世用，是謂棄材，心若死灰，是為朽木。今夫櫟，不材之木也，吾以為幟焉。」林幼春撰「櫟社二十年間題名碑記」（1921年），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7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頁43。

⁴³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年；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頁30-31。（本文採用文海出版社版本，以下不再註明）

⁴⁴梁任公表示：「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忙臺人爭取自由。故臺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供（作）無謂之犧牲。最好倣效愛爾蘭人對付英本國之手段，厚結日本中央政界之顯要，以牽制臺灣總督府之政治，使其不敢過份壓迫臺人。」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頁31。

⁴⁵參見許俊雅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2007年）一書。

⁴⁶梁啟超與其長女令嫻及好友湯覺頓於3月28日抵達基隆；至4月9日離臺。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頁31。

⁴⁷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2000年），頁203。

⁴⁸梁啟超提供林獻堂的書籍訊息多為歐美翻譯，目的希望臺灣文人能多研讀政治經濟及社會思想。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10。從「霧峰林家捐贈之手稿」編號023：「臺灣雜誌社經費豫算科目表、臺灣雜誌社財產目錄」中記載的圖書目錄，例如：《西洋通史》、《世界文化史大系》、《歐洲思想大觀》等數十冊，可推測當時林獻堂可能獲得的世界知識書籍。霧峰林家頂厝，《霧峰林家捐贈之手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1年）（微縮資料）編號023。

⁴⁹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頁16-17。

2. 〈美國見聞錄〉中的行程

1928年3月14日，林獻堂結束歐洲的旅遊行程後，自巴黎搭船前往美國，六日後（3月20日）抵達美國紐約（New York）。從1928年3月20日至5月9日，林獻堂總計停留在美國的時間計有五十一天之久，此期間的旅程，橫跨了北美大陸。

林獻堂自東岸的紐約進入美國後，前一個月的時間均在美東地區的都市活動，包括紐約、首都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 C.）、費城（Philadelphia）、波士頓（Boston）等地，佔了整個美國旅行半數以上的時程。之後轉往中部地區的工業都市水牛城（Buffalo）、芝加哥（Chicago）停留數日，續往大峽谷（Grand Canyon），再抵西岸地區的洛杉磯（Los Angeles）和舊金山（San Francisco）。（圖一）如同他在遊歐期間的行程安排，林氏參觀的景點多集中於公園、都市建築、歷史古蹟、博物館等（表一），這是林獻堂環遊世界時的一貫特色。

圖一：林獻堂遊美行程地圖



資料來源：蔡米虹整理自〈美國見聞錄〉；胡育詮繪。

表一：林獻堂在美國的旅遊活動行程

停留地點	日期	行程內容	備註
第一站 紐約市 (New York)	3月20日至 4月10日	下午約1:00（紐約時間），抵達紐約。 1. 觀看紐約市的交通。 2. 逛「中央公園」。 3. 逛「中國街」與「意大利街」。 4. 至「國際會館」(International House)（「萬公寓」），找林茂生。 5. 遊覽古蹟：「朱美爾館」(Morris-Jumel Mansion)。 6. 參觀：「哥倫比亞大學」（林茂生	

			就讀學校)；「哥尼島」(Comy Island)；「熊山公園」(Bear Mountain Park)；「華盛頓厄文故居」(Washington Irving)；「熊山橋」(Bear Mountain Bridge)。	
第二站	華盛頓 (Washington D. C.)	4月10-12日	晚上抵達華盛頓。 1. 華盛頓首都的建築。 2. 白宮。 3. 華盛頓紀念塔。 4. 博物館。 5. 刻版印刷局。 6. 「頗陀馬克公園」(Potomac Park)。 7. 「福爾德劇場」(Ford Theater) (林肯遇刺地)。 8. 「味嫩」(Vernon) (華盛頓故里) 及附近教堂為英國大學者喀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故居。	在華盛頓的活動行程：陪同者有林猶龍、林茂生
第三站	費府(費城) (Philadelphia)	4月13-14日	1. 「朋友教會」；「獨立館」。 2. 參觀：「海軍造船所」。 3. 遊：「佳山公園」(Fairmount Park)。	陪同者林猶龍；王允元、李振元(林茂生介紹)
第四站	紐約	4月15-18日	4月15日從費府返回紐約。 4月18日後離開紐約，前往波士頓。	由費府返回紐約，住三天
第五站	波士頓 (Boston)	4月18-21日	搭火車，下午3:20至波士頓。 1. 參觀「哈佛大學」。 2. 參觀有關美國獨立的遺跡：「革命議事堂」；街角一處為「1774年拋棄英茶處」；「稅關」處。 3. 遊波士頓市區公園——「平民公園」；「州議院」；「普里穆斯」港(Plymouth)。 4. 美術館(未說明那個美術館)。 5. 欣賞表演：「拳鬪」(拳擊)。	
第六站	布法羅城 (水牛城) (Buffalo)	4月22日	早上7:40抵達布法羅城。 換車至「瀑布區」，觀看耐亞嘎拉瀑布(Niagara Falls) (今譯：尼加拉瓜大瀑布)。	4月21日下午6:00離開波士頓，前往布法羅城。
第七站	芝加高 (芝加哥) (Chicago)	4月23-24日	早上8:50抵達芝加高。 (布法羅與芝加高二城的時間差1小時，芝加高晚1小時) 1. 介紹公園：「林肯公園」；「華盛頓公園」；「加飛爾公園」；「約克森公園」(1893年在此舉辦過「世界博覽會」)。 2. 劇場欣賞日劇：(未說明確切名稱)，劇名：「日本御帝」。 3. 參觀：「芝加高屠畜場」。	4月22日，晚上9:00離開布法羅城。

第八站	前往羅府(Los Angeles)途中	4月25-26日	4月25日抵達「多治市」(Dodge City)站 4月26日早上經過「新墨西哥州」州界；中午抵達「亞爾布奎基」(Albuquerque)站	4月24日，下午8:00離開芝加哥，搭車前往羅府
第九站	「大峽谷」(Grand Canyon)	4月27日	早上7:15抵達「大峽谷」。 觀賞峽谷旁一石樓，樓中賣印第安人物品；印第安人的「四日舞」。 晚上8:00離開大峽谷，前往羅府。	
第十站	勞斯安極立司（日本稱：羅府；洛杉磯）(Los Angeles)	4月28日	下午2:00抵達羅府。 1. 適遇羅府的市廳落成，街道有些慶祝遊行活動。 2. 遊羅府LA公園；經過電影明星住宅區。 3. 介紹：拍攝電影最大者：「宇宙會社」，位於LA近郊的「宇宙市」(Universal City)（今譯：「環球影城」）。 4. 途中參觀一古蹟：18世紀末西班牙人建築之寺。 5. 至「飛行場」，搭乘二人飛機。 6. 1928年5月1日，下午1:00，觀賞棒球比賽：「桑港野球團」對「羅府野球團」。	
第十一站	1. 「麥舍德」驛(Merced) 2. 「約森密忒國立公園」(Yosemite Park)（今譯：優勝美地）	5月1-2日	5月1日，晚上（正確時間不詳）由羅府出發。 5月2日，抵達「麥舍德」驛(Merced)，停留50分。 5月2日，抵達「約森密忒國立公園」，並夜宿於此。停留在「步哨」旅舍。	前往「桑港」途中經過地方：「麥舍德」驛；「約森密忒國立公園」
第十二站	桑港市（聖佛蘭西斯科；三藩市）(San Francisco)（日本稱：「桑港」；中國稱：「舊金山」）	5月3-8日	晚上9:40抵達「奧克蘭」(Oakland)之海上鐵橋。 1. 5月4日，遊：「金山公園」（桑港最大公園）；園中有博物館、水族館、童子遊戲場。 2. 5月5日，參觀：「加州大學」；登校中高塔；至附近公園；搭乘「弄船」。 3. 5月7日，遊「華人街」時遇到活動：「五七國恥露天大講演會」。 4. 5月8日，由旅館主人領至「移民官」處報名（辦理出境事宜）。	陪同者林猶龍；林南山（林茂生介紹）
第十三站	離開美國，至橫濱	5月9日	早上10:00，搭「天洋丸」；中午12:00出發，由桑港離開美國。 結束美國行。	5月25日，早上9:00抵達橫濱，10:00上岸

資料來源：蔡米虹整理自〈美國見聞錄〉。

林獻堂在美國境內的旅程為何如此規劃或安排？在其遊記及日記內容中皆未見說明。然而，從〈美國見聞錄〉中的描述與觀察心得記載，筆者認為此次遊程的規劃安排很可能基於前人旅美的經驗。

林獻堂在前往歐美旅遊之前，臺人已有顏國年於 1925 年 4 月至 6 月因公務赴美，並曾撰寫遊記；⁵⁰嘉義縣鹽水港（今臺南市鹽水區）望族黃朝琴（1897-1972）於 1926 年 6 月至 7 月短暫赴美考察，之後撰寫旅遊見聞刊載於《臺灣民報》。⁵¹前者並未出版，後者則公開發表。據此推論，林獻堂在旅遊之前實有機會可讀取黃氏的遊記內容，而建立對於美國的印象或想像。至於黃氏遊記是否對林獻堂的遊程安排有所影響，因既存文獻內容無可稽徵，難以判斷。但從二人遊記中對美國現代化的現象、平等自由的國風、種族歧視等面向多有共同的描述，且對高度文明也有相似的批判來看，⁵²林氏與黃氏的觀察視角極為接近，其關照的層面正是與當時臺灣社會形成強烈對比或多所欠缺之處。

另就林獻堂的〈美國見聞錄〉與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內容進行比較，也可發現其中有諸多雷同之處。洪銘水的研究指出，二人訪美的都市有所重疊，「所見所聞所感，有相似之處，只是粗細不同而已」，⁵³甚至在書寫上也呈現相同文字的內容。黃郁升在〈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一文中就將二人遊記內容依都市區分，做了詳細的對照，其中在舊金山一地的書寫內容上出現長達數百個文字完全相同。⁵⁴由此不難看出，梁氏遊記儼然成為林獻堂在美的旅遊指南，從名勝古蹟至餐飲食物，甚至對歷史事件或景物的觀感觸發。⁵⁵這種現象說明，林獻堂遊美的行程規劃或許是深受梁啟超的影響。

綜結言之，林獻堂在前往歐美前，似已藉由前人文稿所呈現的內容，對旅遊地建立了某種的認知或想像，並影響了其行程的安排規劃與觀察視角，此趟行程對於林獻堂而言，與其說是「探索」，不如說是「驗證」來得更為適切。

三、心之嚮往：爭取獨立自由的美國

美國作為林獻堂歐美旅程中的最後一段，從地理關係來看，或許僅是取其回程之便的路線規劃，然而就當時臺灣所處的政治與社會境況觀之，抑或有其

⁵⁰由於顏國年當時前往歐洲及美國旅遊時曾撰寫一本《最近歐美旅行記》，並未正式出版，而無法廣為人知，僅得以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片面訊息略知一二。許雪姬推斷顏氏書寫遊記的讀者設定在自我家人。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頁 181。

⁵¹《臺灣民報》刊載自 1926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29 日，第一百十三號至第一百二十號，共計八回。

⁵²潘為欣，〈林獻堂與黃朝琴眼中的美國現代化——以《環球遊記》之美國見聞錄與〈遊美日記〉為例〉，頁 3-11。

⁵³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頁 155。

⁵⁴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頁 42-50。

⁵⁵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頁 55-58。

特殊意涵。美國經由革命與戰爭，脫離殖民母國獨立，從而開疆拓土，建立民主政治，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躋身於國際強權之列，發展脈絡有別於歐洲傳統國家。美國由殖民地成為自由民主國家，形塑了自由、民主與平等的核心政治價值觀。⁵⁶對於當時為日本殖民的臺灣而言，美國的發展歷程或結果不啻是一個可資追求的理想目標，至少在政治價值觀核心的建立上是如此，這也是林獻堂對美國歷史發展內涵的強烈認知。職是之故，在林獻堂的〈美國見聞錄〉中，除了對參觀景點的基本介紹外，他也會詳加敘述景點的發展過程或景物的歷史意義，使讀者能對美國這個國家有所認識，並常得以見到林氏藉由所觀景物抒發他渴羨民主情懷，傳達其抱持的理念。

歸納林獻堂在〈美國見聞錄〉中對美國歷史景點的記述和政治發展的觀察，主要可分為獨立建國、追求自由及民主政權運作等三方面說明。

就美國獨立建國之歷史與景點的記載而論，林獻堂在造訪波士頓時提及：「美國獨立之端緒無不發源於波士頓，故波士頓有關於獨立之遺跡者較之他處為多。」林氏遂「按圖索驥，一一而參觀之。」⁵⁷其特別提到「革命議事堂」，本為清教徒禮拜堂，「革命時民黨屢次集議於此，故又名之曰『獨立之搖籃』」。此議事堂應指「舊南方議會廳」（Old South Meeting House），該廳建於 1729 年，原為清教徒的集會中心，1773 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前夕，成為人民抗議英國茶稅（Tea Tax）與發動革命的討論地，在美國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林氏也記載了他參觀的另一處歷史景點—1774 年拋棄英茶處，這是美國歷史上發生「茶葉事件」之地，該事件被視為獨立戰爭的導火線，現今政府特於此地立一銅碑以茲紀念。造訪費城時，林獻堂特別提到「獨立館」（Independence Hall）（獨立紀念廳），這裡是美國發表〈獨立宣言〉與制訂憲法的地方。現今為美國「國家獨立歷史公園」（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 Park）之一部分，並於 1979 年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在鐘樓上原掛有一著名歷史文物—「自由鐘」（Liberty Bell），後移至「自由鐘中心」存放。⁵⁸林獻堂對於自由之鐘有如此的描述：「蓋獨立宣言之日，即大擊此鐘，以告市民也，鐘若有知，應當何等快樂。」看到費城市民對自由鐘的重視，林氏藉此抒發有感於美國人爭取獨立自由的艱辛不易，並在語句中透露出期盼自由鐘聲能在臺灣地區響起，如同鐘上的銘文：「自由鐘聲遍大地，報告居民得自由」⁵⁹對自由世界的殷殷期盼。同時也在他即將結束環球旅遊之際道出：「在此自由天地，無束縛，無壓迫

⁵⁶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1), p. 4.

⁵⁷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六)〉，《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八號，昭和 6 年 6 月 13 日，頁 9。

⁵⁸有關美國「自由鐘」（Liberty Bell）起源及其發展歷史背景的探討，可參見：彼得·里爾巴克（Peter A. Lillback）著，黃劍波、高民貴譯，《自由鐘與美國精神》（*Liberty Bell: American Culture's Heritage*）（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一書有詳盡討論。

⁵⁹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四)〉，《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六號，昭和6年5月30日，頁9。

『我無汝詐，汝無我虞』，得以共享自由之幸福，不亦樂乎。」⁶⁰此一感懷應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未竟其功關連密切，因該運動所要求的是爭取臺灣人的參政權和立憲的修正。但是，自 1921 年至 1934 年，臺灣人民總計已提出 15 次的請願，「除了喚起民眾之自覺外，最後竟一事無成」。⁶¹之後，因社會、經濟問題，林獻堂等人轉向提出地方自治制度改革，朝爭取地方參政權方向努力。⁶²

美國的清教徒移民是追求自由的先驅者，而普里穆斯（Plymouth）港是當年移民北美者追求自由的開端象徵。林獻堂談及該處時，詳加描述這段歷史事件，書寫那些熱愛自由的清教徒，因受到英王壓迫，而紛紛出走，為追求自由，遠渡他鄉。⁶³這些首批北美移民於 1620 年共同訂立《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為美國之後的憲政體制發展奠定基礎。⁶⁴在有關波士頓的記述中，林氏提到該都市是由躲避苛政的英國清教徒移民創建於 1630 年，亦有凸顯其作為追求自由象徵的意涵。紐約則是他進入美國之旅的第一站，取道此城進入美國是從歐洲至美洲的傳統路徑，對於到達此都市的遊人而言，首先映入眼簾的景像就是自由女神像。這座象徵民主自由的雕像，也是以往美國給予移民之意象中最為深刻者。⁶⁵遊記中雖未提及自由女神像一景，然推想當林氏乘船進入該都市時必能見之，當下或有所感。民主自由，是美國給予林獻堂最為深刻的印象，也是他在臺參與和推動各種社會運動所追求的目標。透過遊記「以景抒情」或「寄情於景」的敘寫方式，得以讓讀者在潛移默化中認識民主自由之理念，乃有助於其理想主張的推動。

華盛頓特區作為美國民主制度建立和運作的政治中心，林獻堂於此停留時特別參觀了上、下議院（即參、眾兩院），並在遊記中對議會制度概況加以著墨。當時適逢議會開議期間，使林氏有機會親眼見到美國議會運作的實況。遊記中除了描繪議院的空間配置外，也進一步詳述美國國會議員的選出方式與人數變革。

林獻堂對西方議會制度頗多關注，如他在遊覽英國倫敦時也曾記載：「參觀世界議會政治最早最發達之英國上、下兩院。」⁶⁶實際上，林獻堂並不懂英文，但仍見他記載在美國國會旁聽開會過程約十分鐘，現場或許有人替他翻譯或

⁶⁰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七）〉，《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九號，昭和6年8月29日，頁11。

⁶¹黃富三，《林獻堂傳》，頁35。

⁶²傅奕銘，〈臺灣近代史中的議會政治演變——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為探討議題〉，《臺灣文獻》第50卷第4期（1999年12月），頁30-39。

⁶³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七）〉，《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九號，昭和6年6月20日，頁5。

⁶⁴有關當時《五月花號公約》形成的背景，可參見：威廉·布拉福特（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著；吳丹青譯，《普利茅斯開拓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及威廉·布萊福特（William Bradford）著；王軍偉譯，《「五月花號公約」簽訂始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二書。

⁶⁵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 222.

⁶⁶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臺灣民報》第一百九十四號，昭和3年2月5日，頁7。

講解。⁶⁷在英國倫敦，他則旁聽半小時，並於遊記內載述英國憲政改革訂定的三條重要規定：「一、無故不得逮捕人民；二、非經法庭宣佈不成罪名；三、特別徵稅須得貴族會議許可。」⁶⁸由於未見林氏書寫感想為何，在日記中也無相關記載，因而難以明確得知他對美國議會制度的看法為何。但在英國倫敦議會與美國國會旁聽的體驗觀察，應有助於強化林獻堂對於推動未來臺灣民主制度的思考。

林獻堂在遊記中述及1913年美國參議會議員選舉為消弭一些弊端而進行的改革：「憲法改正遂由人民直接選出，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⁶⁹考察1913年美國參議會議員的改革問題，係源自人民不滿由各州議會選舉參議員，其延伸的弊端眾多，其中之一即為「不民主」，因而興起民選參議員運動。⁷⁰1913年第十七條憲法修正案（The Seventeenth Amendment）通過，參議員也同於眾議員採普選方式選舉。「由人民直接選出」的民主參政制度，正是林獻堂在其出外環遊世界之前於臺灣提倡多年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一個理想目標。1923年，林獻堂率領請願代表團前往日本，提交由「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印刷發行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其中一項理由即是強調臺灣民眾應有參政權利，應得以選出自己的代表組織議會，制訂法律和審定預算。⁷¹

美國的民主政治向來被視為是其建國的重要根基，1908年梁啟超旅美期間，曾對美國政治進行一番評論，「美國政治，實世界中不可思議之政治也」⁷²。自1776年美國獨立建國，實行民主政治，在開國元勳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等人著作的《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文章中提倡聯邦國家政治，⁷³使國家建立一套不同於傳統歐洲政治型態的新制度。此後，美國民主政體成為歐洲政治改革的學習對象。⁷⁴又因實施民主政治的美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崛起並逐漸躋身於世界強權之中，更讓眾人關注她的民主制度。當林獻堂旅遊美國時，自然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有所興趣。

林氏書寫他參觀獨立戰爭歷史古蹟與紀念文物後，特別整理出美國之所以

⁶⁷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八)〉，《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號，昭和6年4月18日，頁11。

⁶⁸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臺灣民報》第一百九十四號，昭和3年2月5日，頁7。

⁶⁹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八)〉，《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號，昭和6年4月18日，頁11。

⁷⁰羅志淵，《美國政府及政治》（臺北：正中書局，1965年），頁325-326。

⁷¹這是第三次提出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主要包含〈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兩篇，由蔡惠如等共計278人連署。於大正12年（1923年）第四十六屆日本帝國議會中提出。資料來源：「葉榮鐘數位資料庫」，題名：「大正12年（1923年）02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識別碼：「NTHU-LIB-001-010200020009」。

網址：<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29/51/17.html>（2015年6月21日）。

⁷²梁啟超，《新大陸遊記》，頁415。

⁷³漢密爾頓、傑伊、麥迪森等著；程逢如、在漢、舒遜等譯，《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a commentar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本書又譯為《聯邦論》。

⁷⁴例如在1830年，法國人托克維爾赴美考察獄政後，撰寫《民主在美國》一書，介紹美國革命、政治制度給法國人民。

會發生獨立戰爭的原因，舉凡政治管理、賦稅問題、教育限制、貿易控制等，多因英國殖民政策之不當。他並提出個人的看法表示：造就今日自由的美國此一大國，是因昔日英王的壓制，殖民者才會有獨立思想，否則「自安於不識不知」。⁷⁵實際上，林獻堂不只對美國的獨立歷史事件有所關注，在其旅途中經過埃及時，也曾述及她脫離英國殖民獨立的歷史背景。⁷⁶此不禁令人聯想，林氏似在提醒日本殖民政府若繼續對臺灣人民採取壓制治理的思維，無法實踐民主、自由、平等，或許有朝一日臺灣人民會揭竿而起，尋求獨立。即如張惠珍的研究表示，林獻堂環球遊記中記載有關歐美國家獨立建國的歷史事蹟，箇中隱含欲將這些歷史教訓引介給臺灣人民知道外，亦帶有對照當時臺灣受到日本高壓殖民政策的反思。⁷⁷林獻堂也對美國執政者的公僕心態與親民作風備加推崇，例如他相當稱許美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自居為國民之公僕」，這種「平民政治素質之風」，才是真實的平等。⁷⁸這些描述內容有助於啟發臺灣人民的民主意識，成為日後與日本殖民政策周旋的力量。

歐美之行對於林獻堂返臺後的政治思考與主張作為產生多少的影響，並無直接證據可茲說明。但1930年代，日本改變殖民政策，為籠絡臺灣人民，於1935年實施地方自治及創設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在此時，林獻堂與一些同志，主要是地主士紳階級，多數曾參與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成立了「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推動以合法手段爭取地方自治權利，實踐臺灣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他也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成為殖民當局籠絡或交好的對象。⁷⁹「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是一個強調施行地方自治制度為目標的團體，其參與者不僅限於臺灣人民，甚至積極與在臺日人合作。⁸⁰實行地方自治制度是邁向民主政治的基礎道路，儘管臺灣總督府實施的地方自治已具有「民選代表」的形式，但是選舉權人仍有限制。林獻堂之所以會傾向接受這個形式上看似「地方自治」的政策，陳翠蓮的研究認為，這是被殖民者的內部矛盾所致，在受到同樣從事政治運動卻持思想極端相左的同志壓力下，使得林獻堂與部分地主士紳走向爭取殖民自治路線，⁸¹此作法亦和梁啟超建議林氏者幾無二致。

很顯然地，林獻堂在美國的遊歷，並未讓其思考「借鏡」該國以殖民體制外的獨立運動方式來換取臺灣的民主自由。換言之，林氏係採行梁啟超建議的

⁷⁵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六)〉，《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八號，昭和6年6月13日，頁9。

⁷⁶林獻堂，〈環球遊記(九)〉，《臺灣民報》第一百八十五號，昭和2年12月4日，頁7。

⁷⁷張惠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臺灣文學學報》第6期，2005年2月，頁104-111。

⁷⁸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九)〉，《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一號，昭和6年4月25日，頁5。

⁷⁹黃富三，《林獻堂傳》，頁52-58；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2002年5月），頁259-296。

⁸⁰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445；456。

⁸¹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第18期（2003年6月），頁154-158。

路線，在殖民體制內爭取臺灣人民參政權利。黃富三認為，林獻堂以溫和妥協態度面對日本殖民，是一種「反殖民運動的一項撤退」。⁸²惟，在〈美國見聞錄〉的內容中，常見林獻堂觸及美國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價值觀，這是林氏窮力爭取臺民參政權的核心理念，美國之行的親身體驗相信對於他在該理念的堅持或強化上得以產生正面影響。若有可謂「借鏡」者，應指此一精神層面。就林獻堂當時所面對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氛圍而論，或許林氏認為在追求上述理念的前提下，採行妥協溫和的策略，爭取開啟臺灣人民參政的機會或管道，據此為基礎，圖謀後繼，臺灣社會或有達成自由、民主、平等的一日亦未可知。因此，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未見結果的情況下，林氏嗣後遂沿循殖民政府的政策轉而投入地方自治運動。

四、從美國強權反思臺灣

事實上，隨著19世紀中葉美國西部大開發的進行，人民生活場域逐漸擴張，造成了自該世紀末葉起都市化轉趨快速。因此，欲瞭解美國現代都市的發展，人口的成長和聚集、交通運輸的改革、建築技術的革新、以至其後工商業部門的興起等，均是典型的觀察面向或指標。⁸³1928年林獻堂前往美國旅遊之際，該國社會正處於快速的「現代化」型態（modern style），與歐洲國家的傳統景觀或氛圍截然不同。張惠珍曾如此形容林獻堂的反應：「來到國勢蒸蒸日上、高度現代化的美國，映入眼簾的一幕幕先進的現代性風景，看得林獻堂驚心動魄，目瞪口呆。」⁸⁴顯然美國的「現代化」實況，超乎了林氏行前的預期或想像，因此「林獻堂傾向於對現代化的驚異」⁸⁵。

林獻堂透過對於美國都市的人口量值、建築景觀、產業經濟及公共休閒空間等面向的描寫，呈現了西方國家「現代化」的景象。由〈美國見聞錄〉中有關「現代化」的敘寫內容來看，其涵蓋了都市化、工業化、自動化、都市空間規劃、運輸網絡建立、衛生文明規範等有形與無形、硬體與軟體的面向。對照20世紀初日治臺灣的都市發展與建設，因為產業結構的變化、運輸工具改變及輕工業的出現，正帶動新一波的城鄉人口移動，都市進入穩定發展階段，而跨區域性的交通網絡建設與各都市的「市區改正」工作亦漸次開展推行。⁸⁶

⁸²黃富三，《林獻堂傳》，頁57。

⁸³李劍鳴主編，《世界現代化歷程·北美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229-234。

⁸⁴張惠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頁101。

⁸⁵尤靜嫻，〈遊目歐美，遊心臺灣——試論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現代性〉，收錄於封德屏總編輯，《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2004》（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國家臺灣文學館主辦，「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青年文學會議」（臺南：國家文學館，2004年12月4-5日），頁262。

⁸⁶至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公布「都市計畫令」及「臺灣都市計畫令施行規則」後，確立臺灣的都市計畫法制。參見黃世孟編譯，《臺灣都市計畫講習錄》（臺北：詹氏書局，1993年）。

林獻堂觀察美國都市發展的方式，基本上仍沿用他在歐洲旅遊時的模式，這種方式實際上也是受到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的影響，梁氏每觀察一地時，多會先記錄該都市的人口數及其發展變化。⁸⁷林氏也認為要瞭解一個都市的發展，人口是首要關注的問題，所以「必先調查其人口幾何，藉是可以知其市街之大小，又可以知其繁盛之程度。」⁸⁸故在〈美國見聞錄〉中，每個造訪過的都市，他都會註記該城的人口數及其特點，甚至人口數量增長的變化。例如，他記錄紐約市的人口數量「是世界第二位的大都會，人口有六百五十萬」；⁸⁹「華盛頓雖為美國之政治中心，其人口僅有五十萬而已」；⁹⁰費城在1701年時「是時市民，僅有四千五百人而已，豈知二百餘年後，其人口之增加，至於五百倍也」；⁹¹或是他觀察到芝加哥市的人口快速增長現象，並表示「真如飛行絕跡而馳，始由數千，而至三百餘萬，其進步之速，可謂冠千古而無兩也。」⁹²1920年代，美國都市人口大規模的增長，主要來自於國內的農村移民和海外移民，農村人口比例不斷下降，都市化程度快速提升。美國都市宛如「吸引移民的磁石」。⁹³

在都市建築景觀上，林獻堂察覺到林立的高樓實可作為美國整體現代文明的象徵，因此遊記內特別提及建築特色。他記載在紐約市區舉目皆是「宏大建築物」；⁹⁴相較於她，芝加哥市則是「高樓大廈之壯觀，實不遜於紐約。」⁹⁵然而，「合眾國有名之都，其建築高至二三十層者，到處多有」，唯有費城較為例外，「全市皆是二三層之紅磚小樓，至於高樓大廈，則甚罕見」，此為該城之發展特點。⁹⁶林獻堂也相當稱讚紐約市的街道規劃，街名以數字標記，方便記憶與尋覓。⁹⁷他第一次看到紐約市區街道紅綠燈交通號誌設計時，更贊許這種交通規則，人們遵守道路規範，就不需警察管制。⁹⁸

在經濟發展方面，由於美國現代化的都市興起，同時也伴隨經濟型態朝向工商業發展的轉變。有關都市經濟的特點與其立基的區位條件，林獻堂在遊記中也作了相關的記載。例如：他指出紐約市便利的交通運輸使其成為貨物集散地，並以具體數字顯示該都市的經濟發展重點在於金融業，且相當看好該城市

⁸⁷例如詳記紐約的人口變化。梁啟超，《新大陸遊記》，頁245。

⁸⁸林獻堂，〈環球遊記(五十五)〉，《臺灣新民報》第二百八十一號，昭和4年10月6日，頁8。

⁸⁹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一)〉，《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三號，昭和6年2月28日，頁9。

⁹⁰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八)〉，《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號，昭和6年4月18日，頁11。

⁹¹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四)〉，《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六號，昭和6年5月30日，頁9。

⁹²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〇)〉，《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二號，昭和6年7月11日，頁5。

⁹³Sam Bass Warner, Jr., *The Urban Wildernes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p. 76.

⁹⁴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六)〉，《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八號，昭和6年4月4日，頁7。

⁹⁵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〇)〉，《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二號，昭和6年7月11日，頁5。

⁹⁶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三)〉，《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五號，昭和6年5月23日，頁9。

⁹⁷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一)〉，《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三號，昭和6年2月28日，頁9。

⁹⁸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五)〉，《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七號，昭和6年6月6日，頁9。按：《臺灣新民報》誤植為〈環球遊記(一三四)〉。

的發展潛力，「若再過數十年，定當凌駕倫敦而上也」。⁹⁹此種論點，早在梁啟超的《新大陸遊記》中即已提出，只是梁氏係以城市人口數量劇增現象觀之。¹⁰⁰同樣以良好交通區位條件奠定發展基礎的都市尚有「羅府」（Los Angeles）（又譯勞斯安極立司；日本稱羅府；臺灣今譯洛杉磯），因其地理位置臨海，利於發展海運，使其成為美國西南部地區農產品的重要輸出港。林獻堂如此形容洛杉磯腹地交通之快速便捷，青果「朝剪於芳園，而夕已在太平洋舟中矣」。¹⁰¹美國工業時代最具典型的都市非芝加哥莫屬，¹⁰²該都市以「全交通之中心點，鐵路貫東西，河道通南北」的優越交通區位，據之發展成為鄰近地區工業製造品及農牧產品的分配中心和轉運中心，也是著名的畜牧加工業城，¹⁰³「街道寬濶，百業繁興」¹⁰⁴。

上述有關美國都市發展狀況的描述，對於也開始現代化建設的臺灣而言，不無引導臺民形塑期待意象，審視殖民政府規劃作為的作用。

此外，林獻堂對於美國都市的觀察也注意到人們的休閒健康面向。例如，有關美國人民對公共衛生的注重，當他至美國舊金山旅遊時，便曾聽聞該市廳「凡街道不許吐唾，不許拋棄廢紙雜物等，犯者罰金五弗。」¹⁰⁵在林氏的認知中，衛生知識，甚至是醫療技術，也是西方文明社會的一大指標。¹⁰⁶

林獻堂於〈美國見聞錄〉中對美國都市規劃有相當程度的關注與著墨，其多聚焦於記載市內土地利用的空間配置及交通運輸等問題，尤以公園提及最多。平時即注重運動及健康的林獻堂，日常生活也經常散步，¹⁰⁷在國外旅遊時也不間斷，赴公園散步便成為最易達成的方式。雖然，美國的都市建設與發展較歐洲傳統國家為晚，但由於生活環境品質意識的提升，19世紀末葉美國逐漸興起都市公園建設，即所謂的「都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首先帶動這股風潮的應屬紐約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的建造，它標誌著自然

⁹⁹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一)〉，《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三號，昭和6年2月28日，頁9。

¹⁰⁰梁啟超，《新大陸遊記》，頁245。

¹⁰¹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四)〉，《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六號，昭和6年8月8日，頁5。

¹⁰²王旭，《美國城市化的歷史解讀》（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頁130。

¹⁰³Fred A. Shannon,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Agriculture 1860-1897*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Inc., 1973), p. 232.

¹⁰⁴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〇)〉，《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二號，昭和6年7月11日，頁5。

¹⁰⁵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八)〉，《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八十號，昭和6年9月7日，頁5。

¹⁰⁶范燕秋，〈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生觀及其實踐〉，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年），頁782。

¹⁰⁷有關林獻堂的運動觀，可參見：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錄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年），頁791-840。

環境重新被配置於都市中，也是對都市工業發展後造成的生活環境破壞的修補手段。¹⁰⁸在都市中，公園使市民生活變得更為健康。¹⁰⁹林獻堂透過對紐約市街環境的細緻觀察，即發現市區內的交通繁雜，空氣污濁，故善於市政者均會重視公園的興建，以提供市民清新之活動環境。¹¹⁰意涵施政應以提升民眾生活品質為先。

遊覽公園也是林獻堂瞭解當地風俗民情的最佳方式，因此他在走訪各國時，常會記錄各類型公園中的戶外活動特色。例如，林氏對於在英國倫敦「亥德公園」（Hyde Park）（日記內載「海多公園」，即現今的「海德公園」）內可進行講演活動，「有十數處講演，有講宗教，有談政治」¹¹¹，「關於談宗教者居多」，甚至是「有馬路以供遊人乘馬，有音樂堂以供遊人清聽」，凸顯該公園特色，並呈現民眾休閒生活的風貌。¹¹²從西方國家對於人民得以自由地在公園進行各類型的演講活動，相對於日本殖民時期對臺灣人民的言論自由的限制，相信林獻堂有所感觸。畢竟其曾積極投入的臺灣文化協會於1927年成立之後，其宗旨即在於提升臺灣人民知識水準，採取多元的方式，舉凡組織讀書會、設立報刊閱讀所、舉辦夏季學校，到以講演和放映電影等方式進行大眾化的文化推廣活動。特別是巡迴方式的講演會，所到之處，廣受民眾歡迎。¹¹³但是，也因此招來官方注目，時受臺灣總督府的干涉限制，使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推展更加艱辛。

相對地，林獻堂對美國社會的族群現象有批評之處。他對美國境內的弱勢族群，黑人、印第安人、婦女問題等皆加以關注，¹¹⁴其中他特別著墨黑白種族隔離問題。林獻堂先從經濟角度分析美國黑人問題，認為「黑人無政治上之權利，不甚感痛苦，無經濟上之權利，則痛苦實甚焉」。¹¹⁵實際上，他對美國黑人種族問題的如此評斷並不周確。因為經濟權利與政治權利二者息息相關，美國黑人經濟弱勢的結果，相當程度地是缺乏政治權利所致。當時的林獻堂僅對黑人受到白人的隔離與限制寄予同情，並對頻繁地耳聞黑人遭受私刑感到訝異。在他的遊記中偶有呈現黑人之所以能獲得自由，應歸功於執政者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 1809-1865）。他如此書寫，「黑人之能得到自由，究非自己之力所致，不過仁人君子，憫其呼天籲地之苦，而為之解放耳，黑人雖得自由

¹⁰⁸Neil Larry Shumsky, ed., *The Physical City: Public Space and the Infrastructur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p. 98.

¹⁰⁹Thomas Bender, *Toward an Urban Visio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19 Century Americ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5), p. 175.

¹¹⁰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二)〉，《臺灣民報》第三百五十四號，昭和6年3月7日，頁7。

¹¹¹《灌園日記》（一），1927年7月24日，頁149。

¹¹²林獻堂，〈環球遊記(十六)〉，《臺灣民報》第一百九十七號，昭和3年2月26日，頁5。

¹¹³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298-306。

¹¹⁴參見：張惠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頁102-103。

¹¹⁵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四)〉，《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六號，昭和6年3月21日，頁10。

，余則甚為黑人慚愧。」¹¹⁶張惠珍的研究指出，林氏所持態度一方面是從人權自由與平等角度同情黑人，另一方面則認為教育和經濟是決定一個民族素質和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因素。¹¹⁷林獻堂觀看美國黑人種族問題時，透露出受壓迫者應有自力改變現狀的覺知，影射臺灣正需如此；而衛生智識、教育與經濟則對一個族群社會地位與發展將具有重要影響。¹¹⁸在日本殖民下臺灣，多數人民欠缺受教機會。就如林幼春當年（1907年6月15日）致函梁啟超時，道出日本殖民下的臺灣教育程度普遍低落，「略識文字，已成鳳毛」，原有經濟大宗多為殖民政府把持，「惟農一道，尚足資生」。¹¹⁹因此對於教育和經濟問題，林獻堂特有感觸。

林獻堂在觀覽美國都市建設現代化的同時亦批評了它的文明現實面，例如梁啟超描述「芝加高之大屠獸場，實託辣斯，稱世界第一」，¹²⁰在林氏親眼目睹令他甚為訝異的屠殺景觀後，才知並非虛傳，因而詳加描述屠宰場內的設備及生產製作等過程。¹²¹林氏批判在機械化與自動化的生產過程中，人類成了配合機器運作的工具，服務價值因機械而存在。這是西方工業革命後，機器取代大量勞動力，並改變工作形態的普遍現象。又，由於機械化生產所帶來的資本累積，可能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抑且智者愈智，愚者愈愚」，林氏故有「文明國之所以為文明，果如是也耶？」之感嘆！¹²²此論點與梁啟超參觀紐約各公司製造工廠時對「託辣斯」（Trust）弊端的批評與感慨相同。¹²³

林獻堂在美國的觀察多少也引發他反思自身所處的臺灣。廖炳惠提出：「在旅行過程中，常常是一種自我和他人再現的心理機制，比較、參考與對照別人的文化社會而顯現出人我之差別。」¹²⁴然而，林獻堂除了從旅遊中觀察臺灣與世界的差異外，更重要的是他不斷地從中吸取值得學習與借鏡的地方。約翰·厄里（John Urry）即言：「一個地方之所以被選擇凝視，是因為人們對該處有所期盼。」¹²⁵以遊歷美國為例，從遊記中林氏詳細記載美國的歷史發展及古蹟景點，可見其對美國的民主自由事物的嚮往與憧憬，並希冀將其所見所聞帶回臺灣，使臺灣人民有所認識、覺知與學習。正如洪銘水指出，林獻堂的遊記內容傳達給臺灣的讀者，「無非希望提升自己的土地與人民的文化素質」。

¹¹⁶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七）〉，《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六號，昭和6年6月20日，頁5。

¹¹⁷張惠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頁102。

¹¹⁸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四）〉，《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六號，昭和6年3月21日，頁10。

¹¹⁹許俊雅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頁1。

¹²⁰梁啟超，《新大陸遊記》，頁361-362。

¹²¹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一）〉，《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三號，昭和6年7月18日，頁9。

¹²²林獻堂，〈環球遊記（一四一）〉，《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七十三號，昭和6年7月18日，頁9。

¹²³梁啟超，《新大陸遊記》，頁280-281。

¹²⁴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175期，2002年3月，頁89。

¹²⁵約翰·厄里（John Urry）著；葉浩譯，《觀光客的凝視》（臺北：書林，2007年），頁22。

¹²⁶其中又以教育乃其最予重視者，這或許促成他在臺灣以倡導學習知識為主要文化行動。

林獻堂之所以會看重教育，一則源出個人的文化素養，二則應與其省思美國強盛的原因之一在於人民的文明表現行為有關。美國對於文化水準的致力提升，值得臺灣人民借鏡。例如：林獻堂在參觀圖書館時，對於館藏許多漢籍甚表欣慰，當他看到華盛頓首府圖書館的藏書時，記述「其藏書百數萬冊，其中漢籍九萬餘冊，日常千數百人在此觀書」。¹²⁷參觀位於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的圖書館時，也記載「圖書館藏書百數十萬部……管理此圖書者，為中國人桂質柏，余甚羨其每日得以讀其所愛讀之書，真是一大快事也。」¹²⁸由此反映出在日本殖民的時代背景下，臺灣人民要大量暢快地選讀漢籍或非便利，對此實感遺憾，故當林獻堂看到美國大學能夠保存大量的漢籍，頗受感動，並特別羨慕管理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能夠隨心所欲地閱讀。有鑒於圖書館的藏書與讀書之便利，待林獻堂回臺後，便見賢思齊，付諸行動。1932年他與一群同好組織「為社會教化而設」¹²⁹的「一新會」，規劃圖書室，提供萊園、櫟社藏書或親自購書或接受贈書等。¹³⁰之後，在日記中也常見林獻堂記錄他每天去圖書館讀書一事。¹³¹事實上，林獻堂個人相當重視閱讀，也具高度興趣，平日所涉獵領域甚廣，同時也會將書籍與同好分享。¹³²圖書室的設立，除能滿足林獻堂本人的求知欲望外，也可藉此空間舉辦相關讀書活動，例如「一新會」的主要文化活動有定期講座、設置義塾、辦理夏季講習會及讀書會等，其目的主要從事文化啟蒙，推廣平民教育。¹³³

推廣平民教育，首要工作就是倡導閱讀，但是閱讀之前，要先學會識字的基礎，這也成為林獻堂推動社會各階層參與教育學習的根本源由與首要任務。在具體的行動實踐上，包括請基督教傳教士李崑玉教育家族子弟學習羅馬字¹³⁴、推廣婦女學習白話字教育¹³⁵、甚至着手提倡兒童教育¹³⁶。其次，培養人民

¹²⁶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頁156。

¹²⁷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八)〉，《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號，昭和6年4月18日，頁11。

¹²⁸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二六)〉，《臺灣新民報》第三百五十八號，昭和6年4月4日，頁7。

¹²⁹《灌園日記》（五），1932年3月13日，頁116。

¹³⁰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第七期（2009年6月），頁49-53。

¹³¹例如：《灌園日記》（五），1932年4月23日，頁182；《灌園日記》（五），1932年4月25日，頁185；《灌園日記》（五），1932年5月3日至8日，頁195-201。

¹³²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頁45-72。

¹³³有關「一新會」的讀書會文化活動討論，參見：鄭麗榕，〈地域社會中的文化運動：霧峰一新會讀書會個案分析（1934-1936）〉，《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6期（2008年10月），頁145。

¹³⁴1932年2月16日開始，林獻堂幾乎每日日記中最後會記上此事。《灌園日記》（五），1932年2月16日，頁75。

¹³⁵《灌園日記》（五），1932年4月6日，頁156。

¹³⁶《灌園日記》（五），1932年5月30日，頁229。

閱讀習慣，林獻堂尤其重視每日閱報的行為。舉凡《萬國公報》、《清議報》、《新民叢報》及《民報》等，這些都是他在臺灣吸收新知的來源。¹³⁷儘管他身處國外旅遊，仍會「讀臺灣寄來二十日分之新聞紙」，¹³⁸或是由猶龍閱讀外國新聞再轉達。¹³⁹令他更為深刻體悟應是在英、美二國旅遊之所見，其旅遊美國波士頓時，關注到新聞媒體的發展，因此記錄了波士頓新聞報紙的創辦歷史。¹⁴⁰而在之前旅遊英國時，也已觀察到西方人民的閱讀習慣，像是上班通勤之際，幾乎人手一份新聞報紙，這讓他領會到：

其國民皆略能洞悉世界大勢，比他國民較為進步，未始不是能讀新聞之賜也。故凡欲知其一國國民的智識程度之高低，試先查其能否讀新聞的人數之多寡，然後判斷其知識程度之高低，諒當不至大謬也。¹⁴¹

人民能普遍閱讀新聞報紙之行為，意涵國民智識水平相對為高。林獻堂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時，該會即舉辦許多文化活動，其中的讀報社就是與新聞傳播有關。¹⁴²英、美社會在新聞媒體的發展與人民的教育水平表現上，讓林獻堂有所省思，是以返臺後林氏繼續於「一新會」舉辦「土曜講座」（後改為「日曜講座」）演講，林獻堂認為這是「啟蒙運動，最善之法」。¹⁴³綜觀上述作為，即是意欲透過讀書、演講的方式傳達知識給識字或不識字的臺灣人民，期能有效地推廣教育，提高文化水準，以達類同於美國或西歐強權國家的國民素質。

1941 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Pearl Harbor）後，美國正式對日宣戰。由於臺灣是日本南進基地，因而美軍於 1944 年底開始對臺密集空襲。林獻堂的日記中對此有多處記錄。¹⁴⁴在文字使用上，他常以「敵機」二字稱呼美方軍機，猶

¹³⁷謝金蓉，〈百年前的臺灣旅客：梁啟超與林獻堂〉，載於《思想》編委會編，《思想》第2期（臺北：聯經，2006年6月），頁211。

¹³⁸《灌園日記》（一），1927年7月12日，頁137。

¹³⁹《灌園日記》（一），1927年8月15日，頁159。

¹⁴⁰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五)〉，《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七號，昭和6年6月6日，頁9。按：《臺灣新民報》誤植為〈環球遊記(一三四)〉。

林獻堂在遊記中記錄的「波士頓新字」新聞紙，即指發行於1704年4月24日美國第一份以連續出版的新聞報紙，其名為《波士頓新聞通訊》（*Boston News-Letter*）。報紙發行人為時任郵政局長之一的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 1653-1728）。初期報紙的版面僅為單張雙面印刷，新聞內容則是將從倫敦傳來的外國數週前的消息以剪貼方式處理，或是提供當地的即時新聞。參見：Michael Emery, Edwin Emery and Nancy L. Roberts,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 (ninth Edition) (A Pearson Education Company, 2000), p. 24.

¹⁴¹林獻堂，〈環球遊記(十七)〉，《臺灣民報》第一百九十八號，昭和3年3月4日，頁7。

¹⁴²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頁101-103。

¹⁴³一新會舉辦的講座總計200回，自1932年4月9日至1936年2月23日止。林獻堂，〈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序〉，霧峰一新會編，《一新會日曜講座演題目錄》（霧峰：一新會，1936年），頁1。

¹⁴⁴參見黃富三，〈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戰爭〉，《臺灣文獻》第57卷第1期（2006年3月），頁15-18。

如與日本政府立場相同，視美國為「敵國」。¹⁴⁵但美國在林獻堂的印象中，仍是一個值得借鏡的強權國家，其內心似乎也存在著日本最終不是美國對手的研判。特別是在戰爭末期，美國攻取馬尼拉（Manila）時，日本首相小磯國昭（1880-1950）對戰局的描述呈現悲觀景象時，林獻堂對此所下的評語為：「無限之感慨」。¹⁴⁶根據日記及黃富三的研究指出，林獻堂對軸心國的侵略甚表反感，認為好戰之國必遭報應而滅亡。但是，此時的他仍為國（日本）效力，積極參與維護社會秩序與地方治安的相關事務，特別擔任「大屯郡友會事務長」一職，¹⁴⁷親至西屯、北屯、大甲、鹿港、清水等多處進行戰時宣導工作的講演，像是「島民崛起運動旨趣徹底演講會」。¹⁴⁸黃富三認為，這是林獻堂「表面上是配合日人之需要，實際上他已在為戰後新局做準備了。」¹⁴⁹不論戰後新局是何方政權進入，從林獻堂的日記內容中明顯可見，他嚮往民主，並希望時局儘早平和，因為唯有和平時日才能實現臺民對於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追求。¹⁵⁰由此可以理解他為何會在戰時想從事宣導地方治安的戰務工作。此外，戰爭結果是由英、美領導的強權國家戰勝日本侵略國，雖無明確文獻可徵，但吾人不失合理地推測此一結果極可能加深林獻堂對西方民主自由國家制度的期盼。

五、結語

美國雖然奠基於歐洲移民帶來的傳統文化，但她更擁有因開墾與融合而產生的新文化與新精神，建立了以自由、民主與平等為其國家和社會運作的價值核心。1928年，林獻堂前往美國旅遊時，美國正處於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階段，在大約一個半月的停留時間中，林氏感受了民主自由的氛圍，也體驗了現代化的文明。他藉由傳播媒體的刊載，將在美國的所見所聞以遊記的方式呈現，引介給臺灣人民，冀能廣開民智，遂行其理念。

林獻堂美國之行停留地點的安排規劃、觀察現象的視角和感受，與早先遊歷美國的梁啟超、黃朝琴所提出者頗為相似，林氏進行此趟遠行時很可能以之作為參考，尤其是影響其思想主張甚深的梁啟超，因此性質上傾向於「驗證」之旅。由〈美國見聞錄〉的記載可知，林獻堂參觀的景點以歷史古蹟、都市建築、公園、博物館等為主，從中對美國的歷史和社會文化也提出了感想、觀察

¹⁴⁵例如：「敵機投彈」。《灌園日記》（十七），1945年1月5日，頁12。

¹⁴⁶《灌園日記》（十七），1945年2月4日，頁53。

¹⁴⁷《灌園日記》（十六），1944年4月14日，頁130。

¹⁴⁸《灌園日記》（十七），1945年4月25日，頁150；《灌園日記》（十六），1944年6月3日，頁197、1944年7月3日，頁227、1944年7月7日，頁229、1944年8月3日，頁265、1944年8月10日，頁270、1944年8月24日，頁289；黃富三，〈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戰爭〉，頁18-22。

¹⁴⁹黃富三，〈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戰爭〉，頁19。

¹⁵⁰《灌園日記》（十六），1944年9月12日，頁310。

與省思。身處於日本殖民社會中的林獻堂，在遊歷過以民主自由著稱的美國後，在之後的政治主張和態度上似乎也有所借鏡與反思。

透過觀看都市空間的規劃與發展，林獻堂認知美國經濟產業的興盛與重視公共衛生及健康休閒的表現；也觀察了西方人民因普及化的閱讀風氣而具有的知識水準。他意識到美國社會文明的進步根基於人民文化素養與經濟發展，這是其推動各項政治或社會運動，追求理想主張時，在策略上值得借鏡之處。又，林氏停留美國期間遊覽歷史古蹟景點，瞭解當時堪稱民主範型的美國爭取獨立自由、創建民主制度之歷程，就精神層面而言，這對於其爭取臺民參政權利，追求臺灣自由民主平等的企圖應有強化或激勵的作用。事實上，林獻堂在赴美前，其對自由民主的嚮往和文化水準的重視已在參與各項組織活動的作為中表露無遺。然而，當時因為組織團體的內部矛盾和策略路線難行之故，使得林氏「壯志未酬」。美國見聞的啟發，或許是林氏返臺後積極籌辦以增進社會教化作用為宗旨的「一新會」，推廣大眾的文化啟蒙運動，延續了早先其參與臺灣文化協會的初衷，持續關注臺灣社會文化水準的提升，以及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受挫，但仍持續投入地方自治運動的根本原因。林獻堂的政治主張，顯然深受梁啟超訪臺時提供之建議的影響，其一直秉持著一個理念，即與殖民政府合作，爭取臺民參政權。或許他認為，獲得參政權利，提高人民智識，有朝一日，臺灣也得以脫離日本殖民體系，成為另一個「美國」。

林獻堂在前往歐美旅遊之前，日本已在臺灣進行部分現代化的建設，例如：為改善環境衛生而設置「臺灣公醫」；¹⁵¹1899 年起臺灣總督府推動市區改正計畫，至 1936 年公佈〈臺灣都市計畫令〉，其內容以改善市區道路、下水道工程等為主；¹⁵²為增進交通便利性而大量建設運輸系統，於 1908 年完成了南北縱貫鐵路。當林氏途經廈門時，遊記內記載當地街道狹隘而污穢，意涵著林氏認為臺灣的都市建設景觀相對優於廈門；¹⁵³而經香港時，則記載英國政府因認為華人不潔而限制其居住範圍是華人「自侮人侮」，此也意涵當時臺灣在公共衛生上較香港為佳。¹⁵⁴林獻堂之所以會有如此的觀感，實因其身處在「日本透過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向西方國家宣示其現代化治理能力」的時代。¹⁵⁵惟，相比於美國，臺灣的現代化程度實遠遠不及，故當他到達美國後，對於超乎既有生活經驗的現代化實況遂大感驚訝。在訝異之餘，林獻堂對美國高度現代化所產生的負面問題，例如人的主體性被機器取代、貧富差距和資源分配不均擴大等

¹⁵¹參見：鈴木哲造，〈日治初年臺灣衛生政策之展開—以「公醫報告」之分析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7 期（2007 年 9 月），頁 143-180。

¹⁵²參見：黃武達、蔡之豪、內藤昌，〈日治時代臺灣近代都市計畫法制之創設—創設期法制之內涵，並以臺北市之施行為例—〉，《都市與計劃》第 24 卷第 2 期（1997 年 9 月），頁 99-127。

¹⁵³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一)〉，《臺灣民報》第一百七十一號，昭和 2 年 8 月 28 日，頁 7。

¹⁵⁴林獻堂，〈環球一週遊記(二)〉，《臺灣民報》第一百七十二號，昭和 2 年 9 月 4 日，頁 7。

¹⁵⁵林淑慧，《旅行文學與文化》，頁 200。

有所批判，論及高度都市化的紐約時，也貶抑其「崇拜黃金之習」的功利現象。¹⁵⁶就見聞錄中林獻堂對於美國現代化的觀感推繹，林氏反思臺灣現況，應是認為臺灣現代化的程度仍具提升的必要，因為唯有如此，臺民生活水準得以改善，方存增廣智識，實現理想的可能性，但「過度」現代化造成的文化與風氣衝擊，非林氏所能認同，透過遊記的書寫將其引現於臺島，或有警惕之用意。

¹⁵⁶ 林獻堂，〈環球遊記(一三五)〉，《臺灣新民報》，第三百六十七號，昭和6年6月6日，頁9。按：《臺灣新民報》誤植為〈環球遊記(一三四)〉。

附錄：譯名對照表

原稱	美國見聞錄譯名	現行譯名
Albuquerque	亞爾布奎基	阿爾布開克
Bear Mountain Bridge	熊山橋	熊山大橋
Bear Mountain Park	熊山公園	熊山公園
Boston	波士頓	波士頓
Buffalo	布法羅城	水牛城
Chicago	芝加高	芝加哥
Comy Island (Coney Island)	哥尼島	康尼島
Dodge City	多治市	道奇
Fairmount Park	佳山公園	菲蒙特公園
Fordo Theater (Ford's Theatre)	福爾德劇場	福特劇院
Grand Canyon	大峽谷	大峽谷
Los Angeles	勞斯安極立司(羅府)	洛杉磯
Merced	麥舍德驛	默塞德
Morris-Jumel Mansion	朱美爾館	莫里斯·朱美爾官邸
New York	紐約	紐約
Niagara Falls	耐亞嘎拉瀑布	尼加拉瓜大瀑布
Oakland	奧克蘭	奧克蘭
Philadelphia	費府	費城
Plymouth	普里穆斯港	普利茅斯
Potomac Park	頗陀馬克公園	波托馬克公園
San Francisco	桑港(聖佛蘭西斯科；三藩市)	舊金山
Thomas Carlyle	喀萊爾	湯馬斯·卡萊爾
Universal City	宇宙市	環球影城
Vernon	(華盛頓故居)	弗農
Washington Irving	華盛頓厄文	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D. C.	華盛頓	華盛頓
Yosemite Park	約森密忒國立公園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參考書目

文獻史料：

林獻堂，〈環球遊記〉，載於《臺灣民報》第一百七十一號（昭和 2 年 8 月 28 日）（1927 年 8 月 28 日）至第三百八十四號（昭和 6 年 10 月 3 日）（1931 年 10 月 3 日），共計一百五十二回（至第三百六號（昭和 5 年 3 月 29 日）改為《臺灣新民報》）。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二遺著·環球遊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年；臺北：海峽學術出版，2005 年）。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1927 年至 1955 年）（第一至二十七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13 年）。

霧峰林家頂厝，《霧峰林家捐贈之手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01 年）。

專書：

王旭，《美國城市化的歷史解讀》（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71 年）。

李劍鳴主編，《世界現代化歷程·北美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彼得·里爾巴克（Peter A. Lillback）著；黃劍波、高民貴譯，《自由鐘與美國精神》（*Liberty Bell: American Culture's Heritage*）（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 年）。

林柏維，《臺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出版社，1993 年）。

林淑慧，《旅行文學與文化》（臺北：五南，2015 年）。

阿克勒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秦修明、湯新楣、李宜培等譯，《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又譯為《論美國的民主》）（臺北：左岸文化，2005 年）。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輯）（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67 年）。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香港：三達，1961 年）。

許俊雅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2007 年）。

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1840-1945）研究》（臺北：文津，2008 年）。

傅錫祺，《櫟社沿革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7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年；臺灣歷史文獻叢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

黃世孟編譯，《臺灣都市計畫講習錄》（臺北：詹氏書局，1993 年）。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 年）。

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中：晨星，2000年）。

葉榮鐘輯；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主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一年譜》（臺中：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1960年；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版；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年）。

羅志淵，《美國政府及政治》（臺北：正中書局，1965年）。

期刊論文：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47號（2003年6月），頁425-634。

張惠珍，〈他者之域的文化想像與國族論述—林獻堂《環球遊記》析論〉，《臺灣文學學報》第6期（2005年2月），頁89-120。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2002年5月），頁259-296。

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與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的比較〉，《臺灣文獻》第62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61-217。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第49卷第2期（1998年6月），頁1-33。

陳岫傑，〈林獻堂著《環球遊記》之地理研究〉，《臺灣文獻》第61卷第2期（2010年6月30日），頁425-450。

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線為主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第18期（2003年6月），頁141-170。

傅奕銘，〈臺灣近代史中的議會政治演變—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1934）為探討議題〉，《臺灣文獻》第50卷第4期（1999年12月），頁21-59。

黃富三，〈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戰爭〉，《臺灣文獻》第57卷第1期（2006年3月），頁1-42。

潘為欣，〈林獻堂與黃朝琴眼中的美國現代化—以《環球遊記》之美國見聞錄與〈遊美日記〉為例〉，《咁仔店電子學報》（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第二期（2008年8月30日），頁1-16。《咁仔店電子學報》網址：<http://s22.ntue.edu.tw/%B9q%A4l%B4%C1%A5Z/P.htm>（2011年5月30日）。

鄭政誠，〈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讀書生活〉，《兩岸發展史研究》第七期（2009年6月），頁45-72。

鄭海麟，〈從《新大陸遊記》看梁啟超思想的突變與還原〉，《文史知識》2010年第5期（2010年5月），頁27-36。

鄭麗榕，〈地域社會中的文化運動：霧峰一新會讀書會個案分析（1934-1936）〉，《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6期（2008年10月），頁139-184。

謝金蓉，〈百年前的臺灣旅客：梁啟超與林獻堂〉，載於《思想》編委會編，
《思想》第2期（臺北：聯經，2006年6月），頁209-223。

會議論文集論文：

尤靜嫻撰〈遊日歐美，遊心臺灣—試論林獻堂《環球遊記》中的現代性〉，收錄於封德屏總編輯，《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 2004》（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年；國家臺灣文學館主辦，「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青年文學會議」（臺南：國家文學館，2004年12月4-5日），頁249-271。

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錄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年），頁791-840。

洪銘水，〈梁啟超與林獻堂的美國遊記〉，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輯，《旅遊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2000年），113-164。

范燕秋，〈從《灌園先生日記》考察林獻堂的身體衛生觀及其實踐〉，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下冊）（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08年），頁731-789。

學位論文：

王志弘，〈在人群中感受規則：法律感性在臺灣之既有、擬製與重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徐千惠，〈日治時期臺人旅外遊記析論—以李春生、連橫、林獻堂、吳濁流遊記為分析場域〉（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6月）（臺北：益群書店，自刊本，1981年）。

陳室如，〈中國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年6月）。

黃郁升，〈林獻堂《環球遊記》及其現代性論述〉（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1月）。

嚴志玄，〈走向世界—林獻堂環球之旅研究〉（嘉義：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6月）。

外文專書：

Bender, Thomas, *Toward an Urban Visio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19 Century Americ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5).

Huntington, Samuel P.,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1).

- Huntington, Samuel P.,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 Meskill, Johanna Menze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Shannon, Fred A.,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Agriculture 1860-1897* (White Plains: M. E. Sharpe, Inc., 1973).
- Shumsky, Neil Larry, ed., *The Physical City: Public Space and the Infrastructur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 Warner, Sam Bass, Jr., *The Urban Wildernes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以符號學的視角探勘兩首圖像詩的讀解

吳正芬*

摘要

圖像詩，詩中有圖、圖中有詩、圖文合併，具結合文字符號與圖像符號的詩美學特質。本研究借由兩項實驗探勘詩文本以文字融合圖像呈現詩藝，會帶給閱讀者什麼不一樣的讀解，並以符號學的視角分析閱讀者的讀解表現。

第一項實驗，進行詩文閱讀眼球移動資料分析。因眼動儀是記錄眼球移動的利器，本研究的資料收集，即使用 SR Research 所製作的眼動儀 Eye Link 1000 為主要工具，記錄受試者閱讀詩文本的眼動行為，並以 DV 及統計資料呈現結果，作為研究資料分析。本研究主要採用個案研究質性分析。以兩首圖像詩（詹冰的〈水牛圖〉及陳黎的〈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呈現文字符號詩文本及圖像詩文本，由兩位受試者交叉閱讀，隨後寫下詩的主題內容與讀後感想，並由筆者與受試者進行個別訪談、紀錄其閱讀與受測經驗。借由受試者閱讀詩文本的眼動資料與訪談資料，分析並比較其文字符號詩文本與圖像詩文本的讀解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兩位受試者的眼動行為差異頗大。同一首詩，以文字符號詩文本和圖像詩文本型式呈現，果真會帶給讀者不同讀解。詩文融入圖像符號，的確為視讀者增添了想像空間而更近作者核心思想。第二項實驗，則由五位受試者直接閱讀以上兩首圖像詩原著文本，並隨後寫下詩的主題內容與評論或讀後感想，作為語料。據此，筆者以符號學的視角分析其圖像詩的讀解。結果發現，無論文字符號或圖像符號，都是讀解圖像詩的重要因素。由以上兩項實驗研究結果可推見：閱讀圖像詩，無論是詩入圖或圖入詩，其賞析與教學，都不能將圖與詩文分開。結合圖與文，圖像詩才能突顯其深層意義與美感特質。

本研究不但開啟「眼動」應用於詩文本閱讀表現的實驗探索，更以符號學的視角分析閱讀者的讀解表現。期許研究結果能裨益圖像詩的教學與賞析，並提供學界更多相關學術研究的參考。

關鍵詞：符號學、圖像詩、文本符號、眼動、讀解

*建國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
到稿日期：2016 年 01 月 24 日。

A Semiotic Exploration of Two Concrete Poems

Zheng-fen Wu^{*}

Abstract

Reading concrete poetry with image signs and in verbal text involves both semiotics and aesthetics. Using semiotic perspectives, this research carried out two experiments to analyze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the significant complex of signs in two concrete poems.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case studies, the research explored how different processes of reading visual and verbal signs influence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reading two Chinese concrete poems: Bing Zhang's *Water Buffalo* and Li Chen's *Family Trip in the Universe Poster*.

Experiment 1 wa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poetry reading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via eye movement data collected using the Eye Link 1000 Remote Model Eye Tracker and analyzed using Data Viewer. Each poem was presented to two Mandarin-speaking adult readers in original text with concrete image signs and in verbal text-only. After writing down their comprehension of the poems, the readers were asked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ir interpretations, difficulty level, the functions of the visual presentations, and evaluation of their reading behavior. It was found that eye movement behaviors we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two reading trials (one original and one text-only) of the same reader, and also in the two versions (original and text-only) of the same poem by the two different readers. Image symbols add imaginations to their readers and are closer to the author's core thought. They do expand the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oems. In Experiment 2, five Mandarin-speaking adults read the original concrete poems and then answered questions eliciting their criticisms and response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verbal-text signs and concrete-image signs both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e reading and appreciating of the two concrete poems. Based on the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teaching and appreciation of concrete poems, image signs and verbal text are equally important and combining the reading of image signs and verbal text would create an aesthetic and imaginative reading experienc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using eye-move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allows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emiotics and aesthetics involved in poetry reading.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teaching and studies on poetry.

Keywords: semiotics, concrete poetry, text sign, eye movement

^{*} Instructor,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Received Jan 24, 2016.

壹、緒論

本專題研究之主題界定、研究議題、研究目的與架構，簡介如下：

一、圖像詩的意涵與發展

「圖像詩」一詞，來自西方，常見的英文名稱與定義有：

- (一) concrete, pattern or shape poetry，詩文本以文字排列構成具體圖像的具像詩、具體詩、圖案有形詩，如美國詩人 George Herbert (1593-1633) 的 *Easter Wings*
- (二) calligram，是利用排版字體、書法或手寫的方式，將詩詞或詩句組合成特定圖案來呈現詩意的圖像詩，如法國詩人 Guillaume Apollinaire 所創作的 *the Eiffel Tower*
- (三) visual poetry，是 20 世紀後半葉，著重圖像而以跨媒體 (inter-media) 呈現視覺藝術的圖像詩，亦稱視覺詩。無論英文名稱為何，圖像詩具有圖文融合或並列的詩美學特質。

在台灣文學詩史，白話文運動後，新詩的發展產生了現代圖像詩，使現代詩與古典詩更有所區隔。圖像詩文本實驗的先驅作家，詹冰，發表其圖像詩觀點並為圖像詩下了定義：

圖像詩是什麼？我想，圖像詩就是詩與圖的相互結合與融合，而且可提高詩效果的一種詩的型式。假若用這種形式，而不能提高詩效果，那麼就不必寫圖像詩了。當然要寫圖像詩必須要有適於圖像詩的詩材，才可寫出成功的圖像詩。不然的話，是徒勞無功的。¹

除了詹冰 1943 年嘗試創作圖像詩並為圖像詩下了定義，林亨泰 1955 年起也陸陸續續發表了「符號詩」² 作品（如《現代詩》十一期的〈輪子〉、……《現代詩》十八期的「符號論」等）並於 1978 年提出「符號論」，強調詩的象徵是詩語言的「符號價值」的應用。蕭蕭／蕭水順指出，丁旭輝曾歸納林亨泰「符號詩」作品的三個特色：

- (一) 他的「符號詩」是把「文字」視為「符號」、「立體」、「圖像」
- (二) 堅持詩的時間性，而不排斥詩的繪畫性
- (三) 為了增強詩的表現能力與「符號性」，詩中可以加入非文字的圖形或符號。

³丁旭輝在其專書《台灣現代詩圖像技巧研究》第一頁，對「圖像詩」提出了更完

¹ 詹冰，〈圖像詩與我〉，《笠詩刊》，87（1978）：60。

² 紀弦稱林亨泰的圖像詩為「符號詩」。參見：紀弦，〈談林亨泰的詩〉，呂興昌編：《林亨泰資料彙編》（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14-20。

³ 參閱：蕭水順，〈台灣圖像詩繪聲繪影的特技〉，《第五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圖像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5 年 10 月：101-149），105。

整的定義：「利用漢字的圖像特性與建築特性，將文字加以排列，以達到圖形寫貌的具體作用，或藉此進行暗示、象徵的詩學活動的詩。」⁴ 筆者認為，早期詩人的觀點已掌握了圖像詩的意涵與特色。圖與文的並置、融合，建構了「圖像詩」。

在台灣現代詩文學的發展史上，圖像詩的創作，從早期的詹冰、林亨泰、白萩、到當代的蘇紹連、陳黎、方耀乾等，成果豐碩。再加上拜科技發展所賜，圖像詩的創作型式由平面邁向立體，呈現更多元的創作型式，使詩文本不再僅是文字的排列組合，而是融合創意的圖像來增強視覺效果的文藝美學。蕭蕭／蕭水順論及圖像詩的發展，提綱挈領歸結：「圖像詩從現代主義站出來，又為後現代主義添足勇氣，啟發技巧；曾經深入各種不同的新詩中，展現圖像技巧，終要為數位詩翻滾、穿刺，炫人耳目。」⁵ 圖像詩未來的發展，勢必更為活絡。筆者認為，以符號學視角探析圖像詩文本，更能凸顯台灣現代詩獨特的詩藝美學特質。

二、符號學理論對圖像詩研究的啟示：文本符號的意義讀解

我們生活在充滿符號的世界。文字、圖像、指標、象徵符號等，皆具有承載意義的功能，構成人類溝通的符號語言。符號學（Semiology 或 Semiotics）是研究意義活動的學說，⁶也就是研究既存於社會結構下，各種符號（sign, symbol）傳達意義的科學，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符號本身、組成符號所依據的符號系統或符碼、符號或符碼運作所依之文化。

符號的闡釋起源甚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亞里思多德（Aristotle）等，對於符號與世界之關係的探索；而開現代符號學先河的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慣使用 Semiotics）與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慣使用 Semiology）。兩位符號研究的先驅思想家，不但確立了符號學的基本理論，更影響歐洲思想家，如法國結構主義學者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茲簡介三位大師的理論重點如下：

（一）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號學理論重點

美國語用學哲學家，皮爾斯，認為「語言構成人類的整體，人類所使用的字詞或符號，即是人類本身」⁷。他將符號概念運用於分析人類思想或思考的過程，主張「思想」即符號行為（simiotic behavior）；符號為心智所運用，藉以理解事務，語言就是思維（ideas）的符號。皮爾斯強

⁴ 丁旭輝，《台灣現代詩圖像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1。

⁵ 蕭水順，〈台灣圖像詩繪聲繪影的特技〉，《第五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圖像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5年10月：101-149），149。

⁶ 胡易容、趙毅衡，《符號學：傳媒學辭典》（臺北市：新銳文創，2014），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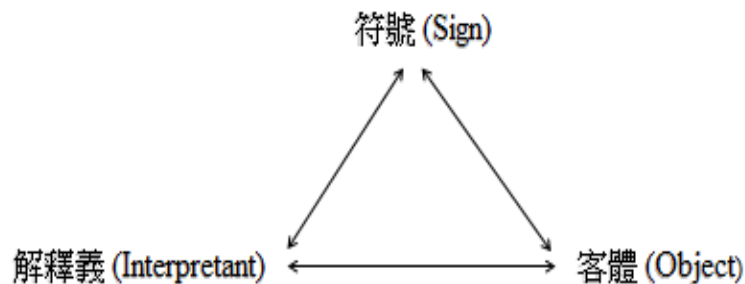
⁷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2,... (1931-1958): 1935, Vol. 189.

調，思想就是符號生產與符號解釋的過程。⁸

1. 皮爾斯「意義的元素」

針對符號如何產生意義，皮爾斯提出「符號—客體—解釋義」的三角關係（triadic relation），如圖一所示：

圖一：皮爾斯「意義的元素」



（圖片參考資料：John Fiske，1990；吳正芬 2015 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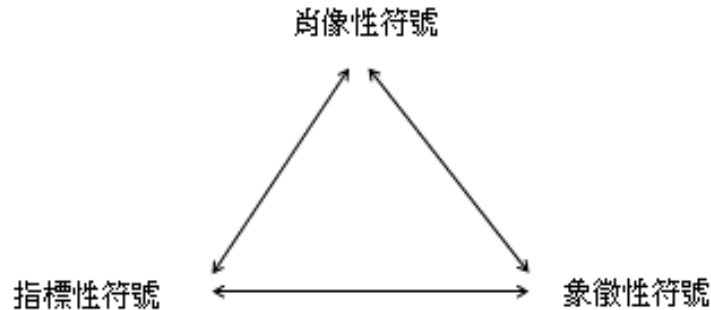
「意義的元素」模式圖中，雙向箭頭所強調的是：每一元素唯有與另兩項元素相連時，才能被理解。符號 (Sign) 指涉其本身以外的某事物—客體 (Object)，且為某人所理解；換句話說，符號能在使用者心理產生作用，此作用即為解釋義 (Interpretant)。解釋義，由符號和符號使用者對物體的經驗所共同製造產生。在皮爾斯「意義的元素」模式中，此三基本元素是研究「意義」所不可或缺的方法。

2. 皮爾斯的符號種類

除了提出符號建構意義的元素，皮爾斯也觀察到「符號」與「客體」之間的關係，並依照抽象性層次的高低分類符號，將符號分成三類：肖像性符號 (iconic signs)、指標性符號 (indexical signs)、象徵性符號 (symbolic signs)。皮爾斯將這三類型符號 (icon, index, symbol) 也可置入「意義的元素」三角模式圖，如圖二：

⁸ 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新北市新店區：正中書局，2011），24。

圖二：皮爾斯「符號的種類」



(參考資料：John Fiske，1990；張錦華等，2013譯：70)

抽象性層次最低的是肖像性符號，其次是指標性符號，而最抽象的是象徵性符號。肖像性符號是藉由相似性或類似性來呈現客體的，如：圖像、雕像、擬聲字等，與它所代表的客體沒有太大差異。指標性符號與它所指涉的客體之間常具有因果關係，且是實質（physical）的，其解釋義與指標性符號相關的背景知識有關；例如，人的體溫超過 37.5℃ 被視為發燒，是以 37.5℃ 作為指標性符號，透過對於人類體溫與體溫計的基礎知識（解釋義），代表「某人發燒」的客體事實。在皮爾斯的符號學論述中，象徵性符號的抽象性層次最高，代表的是符號與客體之間的關係是「三者組合而成的」（triadic）；語言符號即為一例，它們所代表的客體，完全出自於人們對語言的慣例。皮爾斯強調「解釋規則」（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常規、習俗，甚至人或動物的自然本能，都會導致意義的差異。⁹

綜括而言，皮爾斯揭示的「符號—客體—解釋義」三角模式圖，描述了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符號關係。

（二）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符號學的論述重點

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強調語言是奠基於符號及意義的科學。其生平並無論著，但授課講義經由門生巴利（Charles Bally）與施奇海（Albert Sechehaye）整理成經典之作《通用語言學》（*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成為二十世紀現代語言學及結構主義語言學開山之作，對現代語言學及符號學的發展都有相當影響。索緒爾認為，雖然語言只是眾多符號系統中的一種，但卻是表達系

⁹ 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新北市新店區：正中書局，2011），25-27。

統中最具複雜性和普遍性特色，同時也是最具有特色的，因而語言可為所有符號學的研究提供最佳示範。¹⁰

索緒爾所提出的符號二元論，學界眾所熟知，一般將其核心理論整理成「四個重點」¹¹。本文將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基本概念，簡介如下：

1. 語言系統與溝通：「語言」和「言語」

索緒爾指出，語言是一種表示意念或觀念的符號系統，語言學家應關心語言系統與其指涉（refer）的現實之間的關係。考量到語言功能受到社會規約、風俗及其文化變遷的影響，索緒爾主張，語言系統（*language*）是由「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所組成（*language* = *langue* + *parole*）。「語言」是約定俗成的語言系統（含語言單位與規則，例如「文法」）；而「言語」則是語言在日常生活中，因環境或族群差異而有別的實際用語。以華語用語為例，「語言」和「言語」的對照如表一所列例子：

表一：「語言」和「言語」的對照

語言（ <i>langue</i> ）	言語（ <i>parole</i> ）
倒貼！	阿婆炊碗粿！
都有缺點，相互譏笑。	龜笑鰲無尾。 / 五十步笑百步。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老榮民娶美女！是真的嗎？	老芋仔娶美眉！係金ㄟ？
不好意思，再見了！	歹勢，bye-bye 矣！

索緒爾進一步指出，一種語言的「新形式」若反覆多次，且為社會集體所接受，則成為語言事實，進入我們所觀察、分析的範圍，這就是「言語」。「言語」的語意，往往難由字面意義解讀；例如：如表一右列所示，話語的變化可能是因為中文或英文的諧音，也有可能是將臺語發音轉換為中文。對於一個剛剛學習中文的外國人而言，若僅是閱讀轉換過的中文，從表面字義（例如，「老芋仔」）來看，不易讀出真正意思。符號學的研究必須回歸到「言語」被使用的溝通情境，並考量對話情境，透過上下文解讀，才能掌握要義。

2. 符號的構成：「意符」、「意指」與「表意」

索緒爾提出，符號（*sign*）係由意符（*signifier*）與意指（*signified*）兩個部分構成。前者是具有指涉功能的語音或書寫符號，後者是被指涉的概念或內容；兩者若放在社會情境中聯結起來，語意成立，就稱之為「表意」（*signification*）。意符與意指的聯結是任意的、武斷的（*arbit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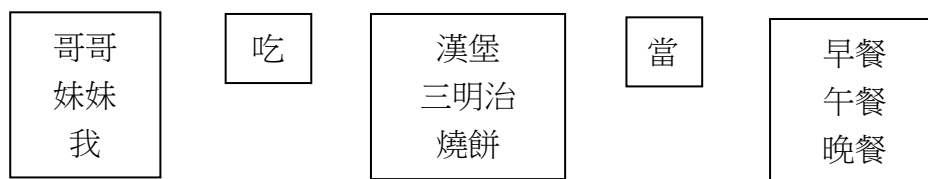
¹⁰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In C. Balley & A. Sechehaye (Eds), (W. Baskin, Tra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68.

¹¹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新北市新店區：正中書局，2011。），15-24。

又是由語言群體約定俗成的，只有在符號體系內才能見得出；例如，「動物」、「顏色」用語與象徵意義，不同的文化所帶來的差異屢見不鮮，可見其任意性。

3. 文本分析的基礎：「組合軸關係」和「聚合軸關係」

索緒爾從符號的組成形式，提出「組合軸」(syntagmatic axis)和「聚合軸」(paradigmatic axis)關係兩大概念，為結構主義學派的文本分析取徑奠定基礎。所謂組合關係，指的是一句話中，各個詞彙彼此之間的關係；意即：在完整的一句話中，某一詞彙只有和前後詞彙互相組合，才能取得完整意義；例如，「他寫詩」句中任一字詞若移除，意義便無法完整。而聚合關係，則是指在同一套詞彙體系中，某詞彙與其相關詞彙之間的關係。同一語言系統，彼此有共同點或存在某種關係的字詞用語，若置入同一語法句中可代換，則我們可說：彼此可互相代換的詞彙，彼此之間有聚合關係；例如，下例框起來之字詞中，「哥哥」、「妹妹」、「我」為聚合軸關係，「漢堡」、「三明治」、「燒餅」是聚合軸關係，「早餐」、「午餐」、「晚餐」也是聚合軸關係。



依照語言開展的過程來看，組合關係是橫向，依照順序的；而聚合關係則是縱向的，彼此之間可代換。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兩大概念，分別牽涉到語言如何「組合」與「選擇」的問題，分析重點在於語言作為符號，所扮演的角色究竟為何？這樣的核心概念和分析邏輯，被後結構主義學派符號學者所沿用。他們運用索緒爾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將文本簡化，藉由幾個基本要素來呈現結構，並討論各個元素與組成方式所造成的效應為何。¹²

4. 語言功能：「共時性」和「歷時性」

欲深入了解文本選擇與組合的效應，索緒爾提出了語言「共時性」(Synchronicity)和「歷時性」(Diachrony)兩個語言學的研究方向，有別於 19 世紀對語言的「歷時性」分析。根據索緒爾的論述，「共時性」指的是語言框架在一個特定時空中，討論語言或符號所指涉的意義、邏輯及心理關係，而「歷時性」則是將符號意義演變的過程納入討論。

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中，「共時性」的語言功能可能南轅北轍。孫秀蕙、陳儀芬以「龍」為例說明了此特性。在西方文化中，「屠龍」的語言功能指向「英雄

¹²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新北市新店區：正中書局，2011)，20-21。

克敵」；但在華人社會中，「屠龍」卻是「不可饒恕」、「犯大忌」之舉。¹³ 因此，可以說，文化差異影響了語言的意涵及其指涉功能。

得注意的是，隨著時空轉變，符號的意義也不斷在變化著。時至今日，《封神榜》以悲劇收場的哪吒，在台灣民俗信仰裡，卻被轉化成為廟會遊街的靈魂人物，伴隨著花車與電子音樂，以活潑鮮明、帶動熱鬧氣氛的形象出現。尤有甚者，將之視為生機蓬勃的「台客文化」象徵，運用在台灣主辦的大國際活動中。正如孫秀蕙、陳儀芬所指出，這轉化已不單是東西文化差異可做解釋，必須從「哪吒」作為一符號，在縱向聚合關係的訊息中，什麼因素影響了他的表意過程，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¹⁴

（三）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符號學觀點

法國當代思想家，羅蘭·巴特，集文學家、文學批評家、社會學家、哲學家與符號學家於一身。其論著與思想，對後現代主義的發展有很大影響，包括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符號學以及「圖像符號學」的分析。

羅蘭·巴特 1977 年出版的《圖像—音樂—文本》（*Image-Music-Text*）一書中，以兩種圖像文本（「新聞照片」與「廣告」）為例，說明其符號表意過程的分析方法。他特別指出，「意象的構成」（the composition of a image）是「一組意義指涉的複合物」（a signifying complex）。孫秀蕙、陳儀芬說明其主要觀點有：

1. 新聞照片的圖像與文本雖然彼此相鄰，但這不意味他們具備某種同質性；唯有將圖像與文字的個別結構研究得徹底窮盡，才能了解兩者之間如何構成一個完整的圖文兼具文本。
2. 符號意義的表達與解讀，仍要回歸到社會文化脈絡才能完成，因為我們對符號的理解是「高度文化性的」（heavily cultural, 參閱 Barthes, 1977:35）；對一則圖像所處的文化掌握度越高，知識越豐富，所能闡釋的延伸義就越完整。
3. 整體而言，圖像文本表意系統的三個元素為：語言式訊息（linguistic message）、製碼圖像式訊息（coded iconic message）、非製碼圖像式訊息（non-coded iconic message）。羅蘭·巴特認為，欲有效地觀察、分析圖像文本，仍需從語言式訊息在圖像所扮演的功能著手，因時至今我們仍處於以文字寫作為主的文明中。語言式訊息之於圖像訊息，扮演了兩大功能：A. 預設（意義）功能（anchorage）：「文本透過意象的指涉物指揮讀者……遙控他趨向語先選好的文本」。B. 情境（意義）功能（relay）：「文本與圖像處於一個互補的關係中……而且要以讀故事的方式來了解整個訊息」。文字指涉的意涵無法在圖像中找到，但兩者並置解讀之後，文本所敘述的故事趨於完整，這就是語言式訊息的情境功能。
4. 文字可以強力主導讀者理解圖像的意旨。當文字與圖像結合時，它不再只是協

¹³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23。

¹⁴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24。

助辨識圖像（明示訊息），而是積極地解釋圖像意義，讓一則圖文兼具文本被解讀的方向不至於多元，甚至無限發展。¹⁵

以上羅蘭·巴特的觀點，提供了探索圖文兼具文本的符號解讀之分析與應證。

（四）符號學觀點的不謀而合

符號學的三個主要研究領域：1. 符號本身、2. 組成符號所依據的符碼或符號系統、3. 符號或符碼運作所依的文化。符號的接收或讀解，經由學習而來，受閱讀者的文化經驗所影響，讀者經由引進其自身的經驗、態度、情緒，一起創造出符號文本的意義。¹⁶

皮爾斯認為，符號分為兩大部分：物理形式和精神上的概念，而唯有透過符號使用者（即使用語言的行動主體），符號才能與社會真實產生關連。皮爾斯的觀點，不但肯定了人是語言的主要支配者，也肯定了符號在外表形象和心理形象之間的差異，與索緒爾關於語言學的核心論述及基本概念不謀而合。

根據索緒爾的論述，組合關係指的是某一完整的句子中，字詞與字詞間彼此的關係，這與圖像符號研究中的情境意義功能十分類似。欲敘述一則故事（或一句話），只有將圖像文本與語言文字文本組合起來，彼此互補，才能取得完整意義。至於聚合關係，指的是一套彼此之間有共同關連，可彼此替換的詞彙系統。聚合關係中的文字與圖像符號的意指近似。語言式訊息之所以在文本解讀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就是因為它可以代換或錨定圖像的意涵。¹⁷

（五）應用符號學理論探討圖像詩的讀解

圖像詩是圖文兼具文本，其文本符號包括文字符號與圖像符號的共構。而符號學的研究，不但聚焦於符號的接收、讀解以及因而所創造出的意義，更強調文本與圖像所處的互補關係。應用符號學理論，可探索對圖像詩文本符號的意義解讀。

三、問題意識

圖像詩的文本，包含文字符號，更添加圖像符號，以便詩人借由豐富的圖文融合創作形式傳達詩意。不具意義的文字排列、堆疊成圖像，不能稱為圖像詩。易言之，圖文經排列、堆疊，融合成藝術性的圖像，須具備意義性，才能建構成為圖文兼具的圖像詩。

筆者認為，圖像詩是詩人運用巧思將文字加以排列、堆疊，創作成圖中有詩、

¹⁵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66-75。

¹⁶張錦華、劉容玫、孫嘉蕊、黎雅麗譯。《傳播符號學理論》（John Fiske 1990 原著：Introduction to studies）。（台北：遠流出版，2013），60-61。

¹⁷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28。

詩中有圖或圖文並列等形式，而達成圖文寫意的具體作用或藉以進行暗示、象徵詩學藝術的詩作。因而，如詩人學者方耀乾所強調，「欣賞圖像詩，不能將圖與文拆開來讀；詩和圖一起解讀，才有意義」。¹⁸ 那麼，詩文本融入圖像符號，是否增進閱讀理解？圖像詩文本的閱讀與純文字符號詩文本的閱讀會有什麼樣差異？

四、研究目的與架構

圖像詩兼具圖中有詩、詩中有圖或圖文並列的詩美學特質。本研究旨在以實驗法探索詩文本加入圖像符號呈現詩藝，會帶給讀者甚麼不同的讀解經驗。因眼動儀是記錄眼球移動的利器，本專題研究先透過其記錄詩文本閱讀歷程之眼球移動狀況，探索圖像詩和文字符號構成的詩文本的閱讀差異；除此，再進一步加上紙本閱讀實驗，借由個案研究質性分析，以符號學的視角探勘圖像詩的閱讀。

本研究主要內容，將先簡介國內已完成之眼動相關研究，接著說明研究方法與探討研究結果。期望研究結果能裨益「圖像詩」的教學與賞析。

貳、文獻探討

本專題研究已彙整相關研究，梳理眼動與眼球追蹤的來龍去脈。底下依序討論：眼球移動的特性、眼球追蹤技術的歷史發展與研究及「眼動」與圖文閱讀相關的研究。

一、眼球移動的特性

眼睛，是靈魂之窗。視覺，是人類學習與認知的主要管道；人類認知訊息處理歷程中有 80% 以上的訊息是經由視覺而獲得，眼球移動亦是認知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感官訊息來源。¹⁹ 正常人的認知過程，是經歷借由眼球進入大腦的訊息處理；眼球移動的軌跡，可提供我們追蹤閱讀歷程中符號訊息的讀解。當我們張開眼睛接觸外界光線，大腦便開始處理所知覺到的刺激，辨識所見到的事物，根據情境及需求，不斷做出必要的反應。如蔡介立等學者所說，眼睛的重要任務，是在第一時間於視網膜把外界光線能量的變化轉變成神經電位的變化，藉由視覺系統將外界刺激傳導到大腦做進一步處理；然而，由於視網膜神經接受細胞分佈的特性，視網膜上不同區域的視覺敏銳度並不相同，在網膜的中央小窩附近區域才能接收最清楚的影像；因此，眼睛必須經常移動，才能看清楚外在的世界。眼球移動的特性，使研究者有機會藉由眼球的凝視位置及停留時間，探討與認知歷程的關係。

¹⁸筆者於 2014 年 9 月 16 日進行詩人訪談，詩人方耀乾教授給予的啟示。

¹⁹Sanders, M. S. & McCormick, E. J. *Human factors in engineering and desig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7.

²⁰眼球移動軌跡的探測，確是探討認知歷程與瞭解閱讀歷程的重要途徑。

分析眼球移動軌跡可以使用各種不同的指標，最主要的三個要件是：跳視（saccades）、回視（regression）、凝視（fixation duration）。²¹這三項要件為探勘閱讀歷程的眼動重點。

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指出，跳視一詞來自法語，原義為風帆的翻動（flick of a sail）²²，現則指為了使眼球中央小窩注視某刺激所進行的快速眼球移動。跳視的平均速度通常高達每秒 500 度視角，由於是如此快速地移動，因此幾乎無法知覺到所經過的訊息。²³跳視的距離與作業的性質有關，閱讀中文，平均的移動距離是 2.5 至 3.3 個單字；²⁴但觀看圖片時則可長達 4 至 5 個視角。²⁵眼球追蹤所使用的基本元件，跳視的資料常包括「跳視時間」（saccade duration）、「跳視幅度」（saccade length/saccade amplitude）、「跳視方向」（saccade direction）、「跳視速度」（saccade velocity）等資料。

介於跳視之間，眼球相對靜止的狀態即為「凝視」；在此時個體才能進行知覺辨識以及認知的處理。凝視的時間與作業的種類有關，閱讀時約需 225-250 毫秒；知覺圖片時則平均為 260-330 毫秒。每個凝視的資料包含其「凝視時間」（fixation duration）以及「凝視位置」（fixation position）等訊息。平均凝視時間可反應出作業對該參與者的難易程度，愈困難的作業平均凝視時間就愈長；而跳視的長度則反應出訊息的密度程度，即訊息密度愈大，跳視的長度就愈短。²⁶

閱讀文本時，閱讀者的眼球軌跡並非都是單向前進，由第一個字讀至最後一個字。有時，閱讀者會在閱讀至某個字句後，將眼球的凝視點移回至先前已看過的文句，此一現象稱為「回視」（regression）。回視通常發生在閱讀者讀到令其困惑的文句時，而其所回視的位置則是被認為可以提供解決困惑線索的文句所在。當閱讀者的閱讀能力愈弱，文章的連貫性愈差或者閱讀的內容難度愈高時，其回視的次數以及回視的總時間也就會顯著地上升。²⁷

²⁰蔡介立、顏妙璇、汪勁安，〈眼球移動測量及在中文閱讀研究之應用〉，《應用心理研究》第 28 期（2005 冬）：91-104。

²¹參閱：Rayner, K., "Understanding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4), 1997: 317-339. 與 Rayner, K., Chace, K. H., Slattery, T. J. & Ashby, J. "Eye movements as reflections of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in reading."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0(3), 2006: 241-255.

²²Gregory, R. L. *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 (4th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²³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眼球追蹤技術在學習與教育上的應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五十五卷第四期（2010）：39-68。

²⁴蔡介立，〈從眼動控制探討中文閱讀的訊息處理歷程：應用眼動誘發呈現技術之系列研究〉。博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臺北，2000。

²⁵Rayner, K. "Eye movements and attention in reading, scene perception, and visual resear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2(8), 2009: 1457-1506.

²⁶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眼球追蹤技術在學習與教育上的應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五十五卷第四期（2010）：39-68。

²⁷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眼球追蹤技術在學習與教育上的應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五十五卷第四期（2010）：39-68。

二、眼球追蹤技術的歷史發展與研究領域

早在二十世紀以前，科學家對人類眼球移動便對產生好奇。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整理了眼球追蹤技術的歷史發展。²⁸其說明中提及，Rayner (1998) 認為，眼球追蹤的研究，至二十一世紀前共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研究可以追溯至 1879 年 Javal 等人對閱讀歷程中眼球移動基本現象的觀察，並延續至 1920 年左右，眼球研究已發現了閱讀中的「凝視」(fixation) 及「跳視」(saccade) 現象，且發現眼球在快速「跳視」的過程中難以知覺到訊息的「跳視抑制」(saccadic suppression) 現象。在第二階段的研究中，由於行為主義的興起，人們將內在認知的運用歷程視為黑箱，故大多數的研究均聚焦於探討眼球移動現象的本質，並未嘗試去推論內在的學習與認知歷程；因此，研究數量相對減少。到了 1970 年代中期，由於認知心理學的濫觴，眼球移動成為窺探大腦及認知系統的有力證據，因而相關的研究又受到學界重視。再加上眼球追蹤技術科技的發達以及資訊科技的進步，眼球移動軌跡可以精確而容易取得，故相關研究又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同時，「伴隨眼視改變典範」(gaze-contingent-display change paradigm) 的發明，科學家不再只是被動觀察參與者的眼動反應，而能即時追蹤其眼動軌跡，並依其軌跡改變呈現的刺激內容。此一典範引進了很多有趣的研究策略，如「移動視窗」(moving window)，並累積了豐富的成果。

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指出，近幾十年來，眼動研究蓬勃發展，已累積相當可觀的成果。²⁹ 眼球追蹤儀被廣泛應用在神經科學、心理學、工業工程、人因工程、行銷/廣告、電腦科學等領域(如：Duchowski, 2002)³⁰。在心理學領域裡，主要用在閱讀(reading)³¹、圖像知覺(scene perception)³²、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³³、聽覺語言處理(auditory language processing)³⁴、注意力(attention)

²⁸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眼球追蹤技術在學習與教育上的應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五十五卷第四期(2010)：41。

²⁹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眼球追蹤技術在學習與教育上的應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五十五卷第四期(2010)：40。

³⁰Duchowski, A. T. "A breadth-first survey of eye-tracking application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and Computers*, 34(4), 2002: 455-470.

³¹參見：柯華葳、陳明蕾、廖家寧，〈詞頻、詞彙類型與眼球運動型態：來自篇章閱讀的證據〉，《中華心理學刊》47(4)，2005: 381-398。

Radach, R., Inhoff, A., & Heller, D. (2002). "The role of attention and spatial selection in fluent reading." In E. Witruk, A. D. Friederici, & T. Lachmann (Eds.), *Basic functions of language, reading, and reading disability* (pp. 137-153).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Rayner, K.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 years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3), 1998: 372-422.

³²Rayner, K., Smith, T., Malcolm, G. L., & Henderson, J. M. "Eye movements and visual encoding during scene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2009: 6-10.

³³Knoblich, G., Ohlsson, S., & Raney, G. E. "An eye movement study of insight problem solving." *Memory & Cognition*, 29(7), 2001: 1000-1009.

³⁴Sussman, R. S., Campana, E., Tanenhaus, M. K., & Carlson, G. M. Verb-based access to instrument roles: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8th annual Architectures and Mechanism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Conference, Tenerife, Canary Islands, Spain, 2002, September.

³⁵及其他訊息處理主題上。在圖像認知處理的研究方面，Loftus 發現，凝視圖片可登錄圖片訊息；³⁶因此，凝視愈久，訊息被登錄的愈多，對圖片的再確認效果也會較好。Rayner 與 Pollatsek 也發現，圖片的整體訊息在最初的凝視就已被登錄；因此，對整體知覺再認會好於局部知覺再認。³⁷

透過眼動追蹤的技術，在各個領域已累積相當多的成果；場域從實驗室到自然環境，感官從視覺到視覺、聽覺雙重路徑，內容從文字到圖像，皆包含在內。

三、「眼動」與圖文閱讀相關的研究

綜合上述得知，眼球追蹤技術與應用，始於西方；眼球移動的特性，使研究者有機會藉由眼球的凝視位置及停留時間，探討眼動與認知歷程的關係；再者，藉由眼球追蹤，針對眼動與閱讀、眼動與教學、眼動與問題解決及眼動與情意特質的運用等議題，可進行論述並提出建議。³⁸十多年來，台灣學界也在蔡介立、陳學志的推動下，完成不少研究成果。根據國家圖書館資料，臺灣 1990 年至今，與「眼動」相關的碩博士論文已有 165 部之多，範圍包括醫療、設計、心理、商業行銷、教育等。其中，語文教學相關的主題，以閱讀居多。本文聚焦「眼動」與圖文閱讀相關的研究論文，簡介如下：

陳學志、彭淑玲、曾千芝與邱皓政也發現，實驗參與者在自由觀看螢幕上的八張圖片時，其平均的跳視長度與該參與者在認知及情意取向的創造力測量指標均有顯著的相關。高創造力的參與者，其平均跳視長度明顯的大於低創造力的參與者。³⁹此一結果也符合高創造力者傾向以整體而非局部片面的方式來覺察世界的發現。⁴⁰

陳明俊以圖畫書發現小錫兵為例，探討國中小學學生圖像理解與眼球運動之差異，研究結果顯示：(一) 故事寓意隨年齡改變，國中九年級的學生已能有高層次的圖像理解。(二) 行為與穿著為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對圖像角色判斷的重要依據。(三) 女性注視時間與掃視次數比男性短，女性的圖像理解歷程較男性短。(四) 個人經驗亦影響掃視幅度，國中九年級的平掃視幅度明顯增大。(五) 國中小學參與者的瞳孔數值主要受畫面色彩影響，與個人情緒無關。(六) 交互參考眼動軌跡

³⁵Kowler, E., Anderson, E., Doshier, B., & Blaser, E.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the programming of saccade." *Vision Research*, 35(13), 1995: 1897-1916.

³⁶Loftus, G. R. (1981). "Tachistoscopic simulations of eye fixations on pictur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7(5), 369-376.

³⁷Rayner, K., & Pollatsek, A. (1992). "Eye movements and scene percep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6(3), 342-376.

³⁸參閱：蔡介立（1999），蔡介立、顏妙璇、汪勁安（2005：91-104），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2010：39-68）等論著。

³⁹陳學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政，〈藉由眼動追蹤儀器探討平均掃視幅度大小與創造力之關係〉。《教育心理學報》，39（2008）：127-149。

⁴⁰Friedman, R. S., Fishbach, A., Förster, J., & Werth, L. "Attentional priming effects on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5(2&3), 2003: 277-286.

與問卷回答得知：男性較會注意畫面的深度，女性則較會注意畫面的文字。⁴¹

胡心瑜以國小四年級美術班與普通班為實驗對象，研究不同性別兒童對少字圖畫書的圖像理解與眼球運動之差異，並發現：在圖像特徵觀察理解上，理解方向正確的參與者傾向有相同的視覺凝視熱點。⁴²

蔡易儒試探科學閱讀的過程行為與文本理解之關係。其一主要發現是：閱讀示意圖之凝視點數目越多，似乎抑制了個人想法的建構；閱讀其他形態的圖之凝視點數目的多寡則似乎與文本理解較無關連。⁴³

吳昭容研究從圖文閱讀的眼動型態建構與驗證機械動態表徵的認知模式，發現了閱讀示意圖之凝視點數目越多，似乎抑制了個人想法的建構；閱讀其他形態的圖之凝視點數目的多寡則似乎與文本理解較無關連。其實驗驗證了讀者能從文字描述空間關係形成心像表徵，但文字和圖片表述空間結構各有優勢，文字的優勢是表達細部的接續關係，圖片則是整體的類比關係。⁴⁴

洪月女以國小六年級學生為實驗對象，研究其科學文本內文字（正文、標題文字、圖片文字）與插圖（圖解、解釋性插畫、裝飾性插畫）之閱讀理解與眼動差異。研究結果發現：插圖所受關注少於文字，而對插圖凝視較多者，閱讀理解卻較佳。標題文字與圖片文字雖皆屬文字印刷，標題文字所受關注卻少於圖片文字。⁴⁵

以上論述，集中在「圖像理解與眼球運動之差異」的探討，主要分析以圖畫書的圖像與示意圖為主，有關圖像詩的閱讀歷程與閱讀理解，仍無論著。本專題研究者試圖開啟「以眼動追蹤探析圖像詩的閱讀歷程」之探索。

參、研究方法

本專題研究執行兩項實驗，包含兩組研究對象進行，研究結果採用個案研究質性分析。茲說明研究設計與步驟。

一、實驗一：以眼動初探圖像詩的閱讀

（一）研究對象：受測者

⁴¹陳明俊，〈國中小學學生圖像理解與眼球運動之差異 -以圖畫書發現小錫兵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⁴²胡心瑜，〈國小四年級美術班與普通班不同性別兒童對少字圖畫書的圖像理解與眼球運動之差異〉（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⁴³蔡易儒，〈初探科學閱讀的過程行為與文本理解之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論文，2010）。

⁴⁴吳昭容，〈從圖文閱讀的眼動型態建構與驗證機械動態表徵的認知模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2012）。

⁴⁵Hung, Yueh-Nu.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An eye movement exploration in science text r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4) 12: 241-260,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2013.

本專題研究主要對象有兩位研究生，**Dragon**（35 歲）與 **Angel**（31 歲），皆是華語老師，是筆者博士班研究所共同修習「閱讀教學專題研究」的同學。兩位受測者均具有正常或矯正後正常視力，經測試後可進行眼動實驗。⁴⁶ 兩位受測者的主修與專長皆非詩歌，亦皆未曾閱讀本實驗研究素材。不同的是，**Dragon** 雖然比 **Angel** 大四歲，但他是來自越南的交換學生，學習華語僅十五年；而 **Angel** 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兒女，中文是其主要母語之一。雖然兩位受測者皆教授華語，語文能力、成長整環境與文化背景卻有異。

（二）研究工具

本專題所採用的研究工具包括：眼動儀 **Eyelink1000**（實驗設備，如圖一）及其 **Data Viewer** 眼動資料分析軟體、實驗素材、問卷記錄與訪談記錄，以及上課參與研究討論之學習日誌。

圖三：眼動儀 Eyelink1000



上圖所示，即受測者進行本閱讀實驗之儀器設備，包括：眼球追蹤儀、兩台電腦 PC 設備（host PC + Display PC）。進行眼球追蹤實驗需要兩部個人電腦，其一為主試電腦（host PC），該電腦與眼球追蹤儀連線，負責記錄及分析受測者眼動軌跡資料，同時也供主試者設定實驗參數進行實驗監控。另一台則為受測者電腦（display PC），負責依實驗者設計的程序呈現實驗材料供受測者觀看。兩台電腦使用網路連線，即時將訊息傳送給另一台電腦；經由連線，主試電腦在偵測到受測者特定眼動反應，可立即改變受測者電腦呈現的刺激材料，供受測者進行閱讀。

實驗進行前，須先完成前置作業，主要包括：

1. 輸入研究素材 PDF 檔或圖片檔，轉製成 EB 視讀的文本材料，提供受測者閱讀；須先複製 EB 執行檔案夾到 Display PC。
2. 執行實驗之各項前後置作業，包括受測者 EB 定位、校正等。
3. 進行實驗。

⁴⁶原本有 5 位同學，但僅有 2 位眼力符合眼動儀受測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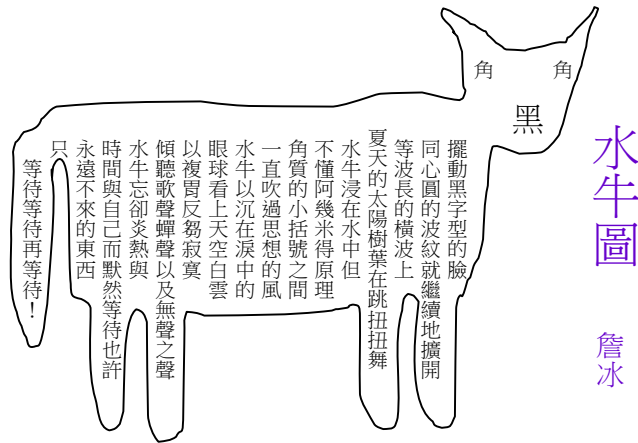
4. 輸出實驗結果，包括：DV、Overlay、Heat Map、數據統計資料、……。

（三）研究素材與設計

本專題研究的研究素材選自詹冰的詩作〈水牛圖〉與陳黎的詩作〈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包括兩首詩原著圖像詩文本、〈水牛圖〉加上線條符號圖像詩文本與〈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改成全文字符號的分行詩文本，如圖四、五、六、七，分別以四種不同組合的文本符號呈現。研究素材輸入電腦，透過眼動儀 **Eyelink1000** 及 **Data Viewer** 製作眼動追蹤資料。

受測者 Dragon 閱讀的是詹冰的〈水牛圖〉加上線條符號圖像詩文本（圖四），以及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文字符號詩文本（圖五）⁴⁷：

圖四：〈水牛圖〉（加上線條圖像詩文本）



圖五：〈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文字符號詩文本）

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

我們只擁有一個地球
我們只擁有一個陰莖
我們只擁有一種飛行
我們只擁有一個死亡
我們只擁有一個地球
我們只擁有一個陰莖
我們只擁有一種飛行
我們只擁有一個死亡
我們只擁有一個地球
我們只擁有一個陰莖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
陰莖者百代之推進器；
讓永恆的鄉愁隨時為
旅行中的我們穿上保險套……

⁴⁷ 參見：陳黎文學倉庫，〈陳黎圖象詩選〉的跑馬文字

<http://faculty.ndhu.edu.tw/~chenli/visualpoems.htm>. 2015 年 10 月 20 日檢索。

Angel 閱讀的是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原著圖像詩文本（圖六），以及詹冰的〈水牛圖〉原著圖像詩文本（圖七）：

圖六：〈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原著圖像詩文本）



圖七：〈水牛圖〉（原著圖像詩詩文本）

黑
擺動黑字型的臉
同心圓的波紋就繼續地擴開
等波長的橫波上
夏天的太陽樹葉在跳扭扭舞
水牛浸在水中但
不懂阿幾米得原理
角質的小括號之間
一直吹過思想的風
水牛以沉在淚中的
眼珠看上天空白雲
以複習反芻寂寞
傾聽歌聲蟬聲以及無聲之聲
水牛忘卻炎熱與
時間與自己而默然等待也許
永遠不來的東西
只
等待等待再等待！

角 角

水牛圖
詹冰

（四）研究步驟與實驗流程

1. 研究前預備

- (1) 研究前，在「閱讀教學專題指導」教師洪月女教授的教導與指引下，訂定「以眼動初探圖像詩的閱讀」為主題焦點，事先討論研究進行方式、實驗

地點與時間、步驟與須注意細節。

- (2) 研究者先完成研究素材之設計。
- (3) 研究者設計問卷，供受測者書寫，以便保持研究紀錄供資料分析。受測問卷，除了 a. 個人資料，還包括 b. 請寫下此詩讀後感想，包含詩的主題、主要內容與感想。請見附件一、二。
- (4) 受測者在實驗進行校正前的檢查：受測者進入實驗室，於接受施測前先接受眼動儀視力合宜檢察、定位測試等實驗進行校正前的檢查。

2. 進行實驗

完成校正程序後，受測者進行實驗。本研究者從中進行實地觀察。以 Data Viewer 眼動資料分析軟體進行記錄。

3. 實驗後資料搜集

- (1) 實驗完成後，彙整 Data Viewer 眼動資料分析軟體進行記錄。
- (2) 實驗完成後，請受測者立即填寫問題。
- (3) 研究者實施個別訪談，並記錄訪談結果。
- (4) 記錄「閱讀教學專題指導」中的討論，將學習日誌作為研究資料。

藉由 Eyelink1000 眼動儀及其 Data Viewer 眼動資料分析軟體，不但追蹤眼球移動行徑，更滙整了數據統計資料。為達成理想研究，本專題實驗流程嚴謹，研究資料盡求完備。

二、實驗二：紙本閱讀

透過眼動儀及眼動資料分析軟體，可以精準追蹤眼球移動行徑。然而，為了免於受測者戴著儀器望著銀幕視讀，會和平時閱讀圖書文本的感覺差異太大，本專題研究進行第二項實驗，改以紙本閱讀，第二組受測者不再配戴眼動儀進行實驗。

（一）研究對象：受測者

實驗二主要對象有五位研究生，年齡在 35 歲上下，是筆者博士班研究所共同修習「詩歌教學專題研究」的同學。

（二）研究工具

實驗二所採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是：實驗素材、問卷記錄，以及上課參與研究討論之學習日誌。

（三）研究素材與設計

研究素材依舊選自詹冰的詩作〈水牛圖〉與陳黎的詩作〈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兩首詩皆為原著圖像詩文本。受測問卷，除了個人資料，還包括閱讀後題

目回答：

1. 詩的主題是什麼？
2. 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3. 請寫下你的感想與評論：

(四) 實驗流程

1. 「詩歌教學專題研究」課中，將兩首圖像詩紙本文本分別發給五位研究生（受測者）閱讀。
2. 請受測者立即填寫問題。
3. 結束問卷填寫後，請受測者說出其讀解經驗，並進行討論。
4. 研究者記錄進行中的讀解經驗分享與討論，將學習日誌作為研究資料。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實驗一研究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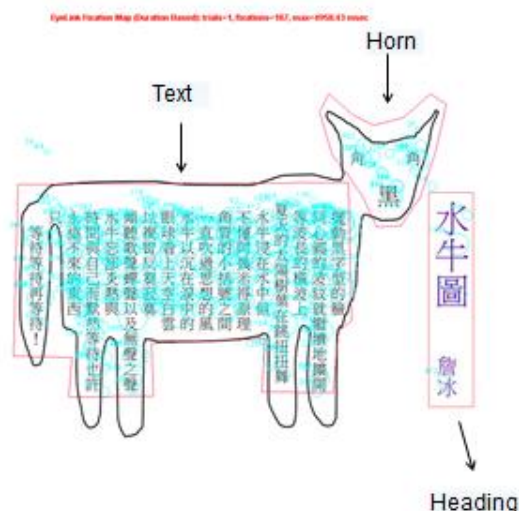
透過 Data Viewer 眼動資料分析軟體 (DV)，依據 Eye Link 1000 所呈現的錄影資料以及數據統計資料，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一、詹冰的〈水牛圖〉閱讀眼動分析

(一) Dragon 閱讀詹冰的〈水牛圖〉(加上線條符號圖像詩文本):

詹冰〈水牛圖〉圖像詩，Dragon 讀了兩遍，眼動 Overlay 如下：

圖八：Dragon 閱讀詹冰的〈水牛圖〉眼動 Overlay



第一次閱讀凝視時間 100462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830.26 毫秒；第二次閱讀凝視時間 85934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693.02 毫秒；結束閱讀時，共 186396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760.8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皆大於一般中文平均凝視時間（830.26

毫秒/693.02 毫秒>225-250 毫秒)。如表二所示：

表二：Dragon 閱讀詹冰〈水牛圖〉的眼動

全部閱讀：

IA	Heading	Horn	Text	Blank	Total
N of Fix	4	19	217	5	245
% of all Fix	1.63	7.76	88.57	2.04	100
Fix duration	2296	7130	176664	306	186396
Mean Fix duration	574	375.26	814.12	61.2	760.8
Regression	0		67		67
Regression rate	0%		30.88%		30.32%
Mean saccade magtitude (degrees of visual angel)	4.3225	2.48	1.9001	7.874	2.107
	17.29	47.12	412.44	39.37	516.22
	516.22/245=2.107				

第一次閱讀：

IA	Heading	Horn	Text	Blank	Total
N of Fix	4	12	103	2	121
% of all Fix	3.31	9.92	85.12	1.65	100
Fix duration	2296	4322	93628	216	100462
Mean Fix duration	574	360.17	909.01	108	830.26
Regression	0		32		32
Regression rate	0%		31.07%		29.91%
Mean saccade magtitude (degrees of visual angel)	4.3225	2.2242	2.0963	12.475	2.354
	17.29	26.69	215.92	24.95	284.85
	284.85/121=2.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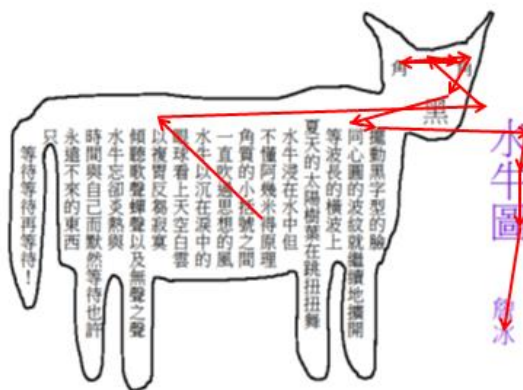
第二次閱讀：

IA	Heading	Horn	Text	Blank	Total
N of Fix	0	7	114	3	124
% of all Fix	0	5.645	91.935	2.42	100
Fix duration	0	2808	83036	90	85934
Mean Fix duration	0	401.14	728.39	30	693.02
Regression	0		35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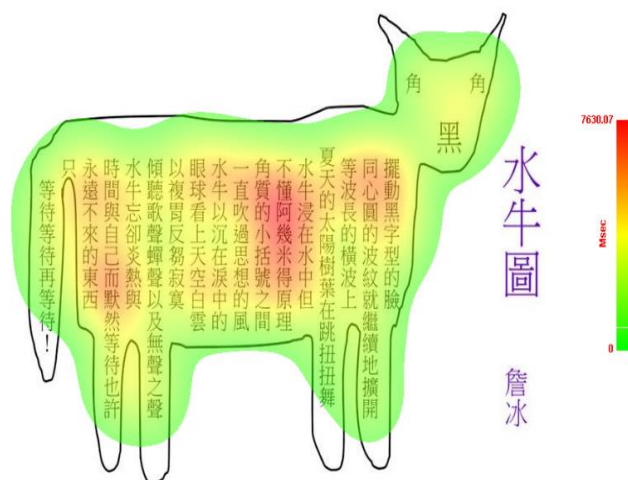
Regression rate	0%		30.70%		30.70%
Mean saccade magnitude (degrees of visual angel)	0	2.9186	1.7239	4.8067	1.8659
	0	20.43	196.52	14.42	231.37
	231.37/124=1.8659				

根據 DV 所呈現之眼球移動行徑，Dragon 首次閱讀圖像詩〈水牛圖〉，第一個凝視點（first fixation）是此圖像詩右上方水牛頭部。眼球移動行徑是由定點，在水牛圖文本中「阿幾米得」（正是熱點處凝視時間較久者），跳至右上，由左而右逐字讀「角角黑」一遍後，右移到詩標題，由上而下逐字讀一遍後，行徑再度移到右上，由左而右逐字回讀兩遍「角角黑」後，移到第一行逐字由上而下閱讀。由此可見，水牛圖像之頭部圖像符號（「角角黑」）是最吸引他首度閱讀之處。底下是 Dragon 閱讀詹冰的〈水牛圖〉前五秒眼動 Overlay：

圖九：Dragon 閱讀詹冰〈水牛圖〉的眼動 Overlay



圖十：Dragon 閱讀詹冰〈水牛圖〉圖像詩熱點



EveLink Flxation Map (Duration Based): trials=1. fixations=186. max=7630.07 m/sec

Dragon 第一遍閱讀並非逐行逐字地讀。除了第一、三、六、十一、十五、十六行，眼球總是略過前後幾個字。但讀第二遍時，除了第二、三、六、十六行，皆由上而下逐字讀。受到圖像符號的影響，Dragon 第二次讀此詩時，視線仍停在圖像裡，甚至以「角角黑」牛的頭形（肖像性符號）為此詩主題。由此可見，圖像符號（肖像性符號）明顯影響閱讀者的關注與文本訊息的讀解，但不一定會促進閱讀理解。

根據問卷答題，Dragon 認定此詩主題是「角角黑」，主要內容是「描寫一只水牛躺在水里，自在的感覺」。其讀後感想是「悠閒的生活要好好享受」。訪談時，Dragon 表示，此詩易懂，他閱讀此詩，經歷了愉悅的閱讀歷程。

（二）Angel 閱讀詹冰的〈水牛圖〉原著圖像詩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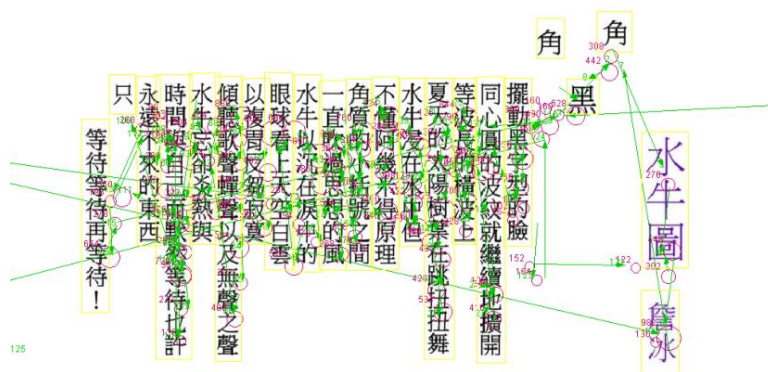
Angel 閱讀詹冰的〈水牛圖〉原著圖像詩文本，只讀一遍；凝視時間 53972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428.35 毫秒；其平均凝視時間亦大於一般中文平均凝視時間（428.35 毫秒 > 225-250 毫秒），如表三所示：

表三：Angel 閱讀詹冰的〈水牛圖〉原著圖像詩眼動凝視

IA	Heading	Horn	Text	Blank	Total
N of Fix	5	5	109	7	126
% of all Fix	3.968	3.968	86.51	5.556	100
Fix duration	2138	2536	47810	1488	53972
Mean Fix duration	427.6	507.2	438.624	212.571	428.35
Regression	1		34		35
Regression rate	20%		31.19%		30.70%
Mean saccade magnitude (degrees of visual angle)	3.904	6.332	2.083	11.83	2.872
	19.52	31.66	224.97	82.81	358.96
	358.96/125=2.872				

根據 DV 所呈現之眼球移動行徑，Angel 讀詹冰〈水牛圖〉原著圖像詩，眼球由圖像中央「水中」移至圖像右上之「角」，然後右移，由上而下視讀標題與作者一遍；接著，移至圖像右上之「角」，然後「黑」，卻省略第二個「角」，直接移至詩文下一行，由上而下，省略首字後逐字視讀，到倒數第五行皆如此。來到倒數第四行，由上而下逐字視讀後，返復讀「而默然」兩遍，眼球移到倒數三行，由上而下逐字視讀後，省略下一行的「只」，直接移至末行「等待再等待！」。底下是 Angel 讀詹冰〈水牛〉原著圖像詩的眼動 Overl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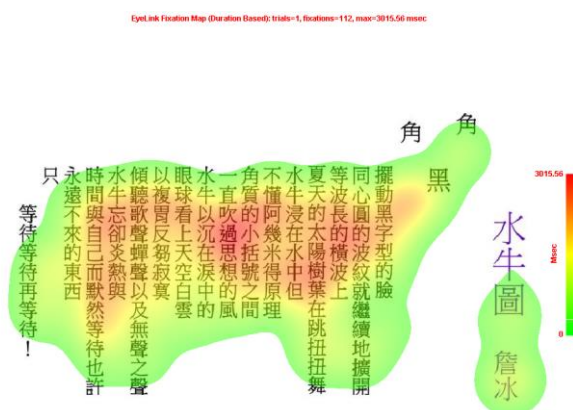
圖十一：Angel 讀詹冰〈水牛圖〉原著圖像詩的眼動 Overlay



其熱點圖如下：

圖十二：Angel 閱讀詹冰的〈水牛圖〉原著圖像詩的熱點

研究結果與分析：



據問卷答題，Angel 認為詩的主題是「牛」，主要內容是「牛的生活，平靜地看著歲月流逝，等待著等待。」她的感想是，「全詩流露出歲月靜止流動感。人們的忙碌在牛的世界沒有意義。牛為自然，大環境。人在它們眼中，自以重要的東西沒有意義」。訪談中，Angel 表示說，文本右上方讓她馬上看出是動物的頭形，這首詩太容易了！Angel 閱讀歷程中，既快速見到其物象，又自覺馬上領悟了詩意。由此可見：圖像符號（肖像性符號）抽象性層次低，明顯影響閱讀文本的讀解。

二、陳黎的〈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閱讀眼動分析

（一）Dragon 閱讀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文字符號分行詩

陳黎的〈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文字符號分行詩文本，Dragon 讀了兩遍。第一次閱讀凝視時間 46808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400.068 毫秒。第二次閱讀凝視

時間 33250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410.4938 毫秒。結束閱讀時，共 80058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404.33 毫秒，皆大於一般文字閱讀的 225-250 毫秒或知覺圖片時的 260-330 毫秒。如表四所示：

表四：Dagon 閱讀陳黎的〈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文字符號詩

全部閱讀					
IA	Heading	Left	Right	Blank	All
N of Fix	28	74	94	2	198
% of all Fix	14.14	37.37	47.474	1.01	100
Fix duration	9350	31958	38572	178	80058
Mean Fix duration	333.93	431.865	410.34	89	404.333
Regression	8	24	27		59
Regression rate	28.57%	32.43	28.72%		30.10%
Mean saccade magnitude (deg. of visual angle)	2.725	2.255	1.808	6.685	2.154
	76.29	166.84	169.99	13.37	426.49
	426.49/198=2.154				

第一次閱讀

IA	Heading	Left	Right	Blank	All
N of Fix	19	52	44	2	117
% of all Fix	16.24	44.44	37.61	1.71	100
Fix duration	6028	22086	18516	178	46808
Mean Fix duration	317.263	424.73	420.82	89	400.068
Regression	7	17	10		34
Regression rate	36.84%	32.69%	22.73%		29.57%
Mean saccade magnitude (deg. of visual angle)	2.681	2.573	1.601	6.685	2.295
	50.94	133.8	70.42	13.37	268.53
	268.53/117=2.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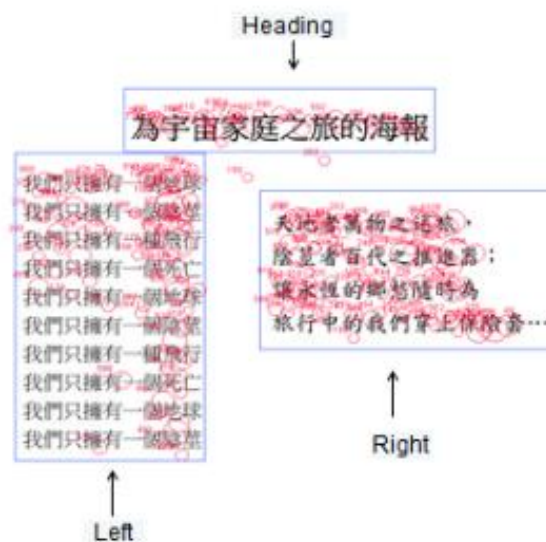
第二次閱讀

IA	Heading	Left	Right	Blank	All
N of Fix	9	22	50	0	81
% of all Fix	11.11	27.16	61.73	0	100
Fix duration	3322	9872	20056	0	33250

Mean Fix duration	369.11	448.73	401.12	0	410.4938
Regression	1	7	17		25
Regression rate	11.11%	31.82%	34%		30.86%
Mean saccade magnitude (deg. of visual angle)	2.817	1.503	1.991	0	1.95
	25.35	33.06	99.57	0	157.98
	157.98/81=1.950				

根據 DV 所呈現之眼球移動行徑，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的文字符號詩文本，Dragon 閱讀了兩遍。第一個凝視點（first fixation）眼球由圖右之「永恆」跳至左上方標題，逐字讀標題「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接著，移到第一行，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逐字讀至第五行之「地球」後，跳回第一行末之「地球」後，略過第二至五行，返回第六行後不逐字讀，只跳讀六至十行之「陰莖」、「飛行」、「死亡」、「地球」、「陰莖」等。然後，眼球移回第一行之「地球」後，由左方移到右方第一行，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逐字讀完。第一遍閱讀時間 46808 毫秒。底下是 Dragon 閱讀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文字符號詩的文本 Overlay：

圖十三：Dragon 閱讀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文字符號詩的文本 Overlay



其熱點圖（Heat map）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四：Dragon 閱讀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的純文字分行詩熱點圖

研究結果與分析：



讀完第一遍，Dragon 並無停頓，眼球馬上返回至上方，逐字讀標題以及第一行。從第二行到左方末行，眼球仍略過每行之「我們只有一個」，只跳讀「陰莖」、「飛行」、「死亡」、「地球」、「陰莖」等。然後，眼球馬上移到右方第一行，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逐字讀至末行之「保險套」，又重複讀「保險套」後，跳至上方詩標題，再逐字讀完標題後，結束閱讀。第二遍閱讀共 33250 毫秒，比第一遍快。

根據問卷答題，Dragon 認定此詩主題是「保護環境廣告」，主要內容是「要保護環境，為下一代留下健康的環境」。其讀後感想是「現在的環境以被我們人類破壞了，不要太過于污染。要好好保護地球，為地球做些環保之類」。訪談時，Dragon 表示，他覺得這首詩很另類，不容易懂！但是，作者用字很有趣。

此實驗雖將陳黎的圖像詩〈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改寫為文字符號分行詩文本，讀者借由詩文本中抽象性層次高的文字符號推敲詩意，尋找詩中畫意，卻未必是作者的核心思想。

（二）Angel 閱讀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原著圖像詩

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原著圖像詩，Angel 閱讀之凝視時間共 38888 毫秒，平均凝視時間 358.58 毫秒（>225-250 毫秒），如下圖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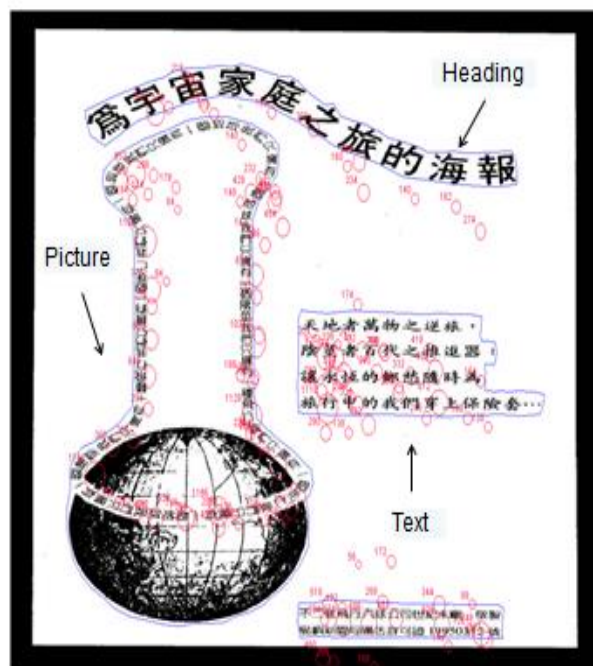
表五：Angel 閱讀陳黎的〈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原著圖像詩

IA	Heading	Picture	Text	Blank	All
N of Fix	5	47	23	36	111
% of all Fix	4.51	42.34	20.72	32.43	100
Fix duration	1710	17588	9618	9972	38888
Mean Fix duration	342	374.21	418.17	277	358.58
Regression	0		7		7
Regression rate	0		30.44%		25.00%

Saccade magnitude (degree of visual angel)	1.548	2.629	1.903	2.189	2.288
	7.74	123.6	43.76	78.82	253.92
	253.92/111=2.288				

根據 DV 所呈現之眼球移動行徑，Angel 閱讀陳黎的圖像詩〈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第一個凝視點（first fixation），眼球由圖右文本內文字「陰莖」往上跳至左上方標題，逐字讀標題文字「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隨後，眼球跳移到地球圖像中間，沿著文字構成的線條，往右上方移動。然後，眼球又跳往圖左上方文字構成的線條，卻立即跳離圖像，眼球移到右方文字符號文本，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逐字讀完四行。接著，Angel 眼球跳移到地球圖像，沿著右方文字構成的線條往返移動兩回；第一回，由下往上；第二回，由上往下。接著，循文字構成的線條移至地球中間，繼續往左，由下往上，眼球卻馬上跳離圖像移到詩文右下最後兩行文字，由左而右、由上而下，逐字讀完兩行，結束視讀。全詩視讀，共歷時 38888 毫秒。底下是 Angel 閱讀陳黎的圖像詩〈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眼動 Overl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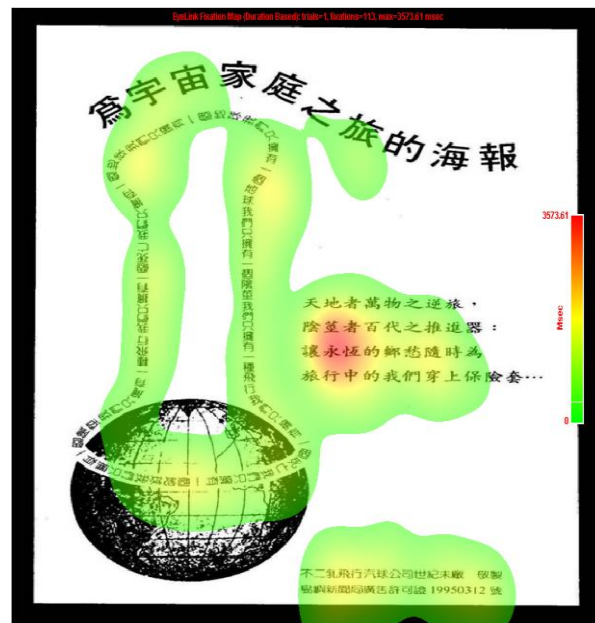
圖十五：Angel 閱讀陳黎的圖像詩〈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眼動 Overlay



其熱點圖如下：

圖十六：Angel 讀陳黎圖像詩〈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原著圖像詩的熱點圖

研究結果與分析：



根據問卷，Angel 對詩的主題認知是「宇宙家庭」，主要內容是「只有一個地球，節制生育」。她的感想是，「看不懂……可能和節制生育有關？」訪談時，Angel 再度強調「實在看不懂這首詩，用猜的！看那圖！哈！哈！哈！」

藉由熱點圖及問卷訪談資料，可得知：在 Angel 的閱讀歷程，圖像符號及文字符號都是讀解的重要因素。詩人除了文字符號的巧妙安排，更藉圖像符號呈現意象，引領讀者進入詩作核心思想。

實驗二：紙本閱讀圖像詩

一、〈水牛圖〉的讀解

底下是五位研究對象（受測者）閱讀詹冰詩作〈水牛圖〉圖像詩之後，寫下的問卷答題：⁴⁸

（一）詩的主題是什麼？

- 甲：圖像詩，論述水牛一生辛勞之後的疲憊與被遺忘。
- 乙：等待永遠不來的主人。
- 丙：水牛
- 丁：水牛
- 戊：水牛

⁴⁸受測者手寫的問卷原文答案，本文使用標楷體。

五位受測者中有三位，直接以圖像符號所呈現的具像「水牛」為主題；另兩位，則以文字符號之「意指」(signified)為主題。此結果應證了皮爾斯的符號種類之論述：圖像符號(肖像性符號)明顯影響閱讀者的關注與文本訊息的讀解。

(二) 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甲：人生的虛空，人勞碌之後，不一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甚至會覺得虛空與茫然的等待。

乙：水牛在水中思想(念)著主人，寂寞的等下去，忘卻了時間及自己。

丙：水牛苦苦等待的思念。

丁：描述水牛辛勤工作，卻不知何時能歇息。

戊：水牛的表情，水牛的行為。

五位受測者中，有一位(戊)認為詩的主要內容是描繪「水牛」，水牛的表情與行為；有三位(乙、丙、丁)將水牛擬人化：只有一位(甲)，以文本符號的象徵意義讀解詩意。研究結果應證了羅蘭·巴特所提出的「情境(意義)功能」(relay)，亦即：文本與圖像處於一個互補的關係。

(三) 請寫下你的感想與評論：

甲：把水牛比喻成會思考的人類，在勞碌耕耘之後，仍然面對未來，茫然的等著，期待著。

乙：樸實的水牛象徵等待那遺棄的主人嗎？憂愁傷悲在情景中並陳。

丙：無望等待的痛苦。

丁：人生中總是不斷地等待希望成真，但也不斷地辛勤工作為了能更生活安逸與自由。

戊：描述水牛每日反反覆覆所做的同樣事情，且略帶無止境的感傷。

五位受測者，由圖像符號所呈現的具像，透過文本符號的讀解，或多或少進入到詩的內在質性。研究結果亦應證了羅蘭·巴特的「情境(意義)功能」(relay)論點。

二、〈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的讀解

底下探討五位受測者閱讀陳黎詩作〈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圖像詩之後，所寫下的問卷答題：

(一) 詩的主題是什麼？

甲：為環境生態、節育發聲。

乙：生命之源：地球

丙：環保

丁：遊子

戊：這是一首詩嗎？有圖及字，兩者混亂了我的視覺，"四行字"文字的解讀讓我覺得主題是保險套，但標題已訂是"為宇宙"圖像是"陰莖"之形，有名顯得視覺形象。

陳黎的〈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圖像詩，含有豐富的文本符號。此詩主題的讀解，五位受測者，五個答案，分別提出不同的解讀。研究結果正如皮爾斯所強調「解釋規則」(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的重要性，常規、習俗，都會導致意義的差異；符號的接收或讀解，受閱讀者的文化與學習經驗所影響。

(二) 詩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甲：地球上有一個保險套，似乎在說明節育的重要，但文字一再說到「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我們只有一個死亡」、「我們只有一個飛行」。似乎強調珍愛地球，大家要共同奮鬥往前，不要製造不必要的災禍。

乙：地球為生命存在之場所；性為生命延續的之過程。

丙：以宇宙給予人類重要的呵護來呈現環境對人的重要，所以呼喚人類要保護我生存的環境。

丁：思鄉情懷，百代的過客，永恆的鄉愁，家只有一個，國只有一個，地球只有一個。

戊：大概是指繁衍的意象吧！從文字的描述意指精子旅行的保險套重要性。

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的圖像符號十分醒目，富含諧趣與幽默。其豐富的文本符號，引發五位受測者的豐富想像力去解讀詩意。此處應證了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所提出的論述：欲有效地觀察、分析圖像文本，仍需從語言訊息在圖像所扮演的功能著手；只有將圖像文本與語言文字文本組合起來，彼此互補，才能取得完整意義。

(三) 請寫下你的感想與評論：

甲：不太了解作者真正要表達的意涵。若從題目「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而言，似乎是在談宇宙進步往前的方向。

乙：此圖像詩為商業性文章，趣味性高於其文學性，較不懂末句「旅行中的我們穿上保險套」之意涵，鄉愁又為何……？作者應為文創工作者。

丙：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是很重要的，要多愛護與維護。

丁：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離鄉背井的經驗，初次離家一定會相當感傷，想念故鄉，思念家人以及家鄉，一切的人、事、物，終究會回到故鄉落地歸根。

戊：(1)圖文的結構給我接扯。

(2)字的分佈在標題內文及圖造形文字有相互的張力，形成眼光的失

焦。

(3)地球的造型吸引我，讓畫面下沉而與右邊文字相互平衡。

(4)海報的視覺符號，結構分成曲線與橫線組成。

由五位受測者閱讀的感想與評論可看出：詩人借由圖像符號與文字符號的並置，建立符碼，增添圖像詩豐富的文本符號，的確帶給受測者（讀者）更豐富的聯想空間；而由多元符號所共構的圖像詩之讀解，則來自閱讀者的經驗與文化背景，可見先備知識與文本符號的讀解，息息相關。

伍、結論與建議

符號學聚焦於符號的接收、解讀以及因而所創造出來的意義，符號學理論適合用來探索圖像詩文本符號的閱讀。本專題研究應用符號學視角，探勘兩首圖像詩文本符號的讀解，底下是研究成果與教學建議：

一、研究成果重點摘要

實驗一「以眼動初探圖像詩的閱讀」藉由眼動儀偵測眼動視讀軌跡，從中探勘不同符號文本所呈現詩文本的閱讀。結果顯示，兩位讀者視讀不同符號文本的眼動表現差異深具意義。實驗結果，以符號學的視角扼要說明如下：

- （一）兩位研究對象，同樣都是華語教師，語文能力、成長整環境與文化背景不同，透過眼動紀錄，顯示其閱讀表現顯然有差異。符號的接收或讀解，受閱讀者的文化與學習經驗所影響；語言能力越強，凝視時間越短，理解力也越強。實驗結果正如皮爾斯所強調「解釋規則」(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的重要性，常規、習俗，都會導致意義的差異。
- （二）文字語言是象徵性符號。在皮爾斯的符號學論述中，象徵性符號的抽象性層次最高，代表的客體完全出自於人們對語言的慣例，常會導致意義的差異。本實驗中，陳黎〈為宇宙家庭之旅的海報〉，若以文字符號（象徵性符號）組成的分行詩文本呈現，讀者（Dragon）借由詩文本中抽象性層次高的文字符號推敲詩意，尋找詩中意象，然卻未必是作者的核心思想。
- （三）圖像是肖像性符號。皮爾斯的符號種類論述中，肖像性符號是藉由相似性或類似性來呈現客體的，與它所代表的客體沒有太大差異，抽象性層次最低。本實驗中，圖像符號（肖像性符號）明顯影響兩位閱讀者的關注與文本訊息的讀解，雖不一定會增進閱讀速度與理解卻引領讀者更近主題核心思想。

實驗二則是探勘兩首圖像詩的紙本閱讀表現，結果接近實驗一所引證的符號學之論述。作者精心經營文本符號，投射意指；借由圖像符號藝術性的吸引力，閱讀者解讀詩意的歷程中已留下深刻印象，較易觸及詩意與作者核心思想。然而，欲有效觀察、分析圖像文本，仍需從語言訊息在圖像所扮演的功能著手；只有將圖像文本與語言文字文本組合起來，彼此互補，才能取得完整意義，正如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提出的「情境(意義)功能」(relay) 所強調，文本與圖像處於一個互補的關係，文字可以強力主導讀者理解圖像的意旨。當文字與圖像結合時，它不再只是協助辨識圖像（明示訊息），而是積極地解釋圖像意義，讓一則圖文兼具文本被解讀的方向不至於多元，甚至無限發展。詩人除了文字符號的巧妙安排，還添加肖像性符號，藉圖像符號引領讀者更貼近詩作核心思想。

二、教學建議

本專題研究實驗結果應證了皮爾斯所強調「解釋規則」(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的重要性；閱讀者所處社會文化常規、習俗，甚至語文智能與涵養，都會導致符號意義的差異。指導圖像詩的閱讀與賞析，教學者應採取各種策略，加強學習者先備知識的引導。

比起文字分行詩文本，圖像詩文本的符號更為豐富，包含文字符號、圖像符號，是詩人借由圖文並置或融合的創作形式來傳達詩意與美感的藝術。本專題研究更發現：兩位讀者閱讀本實驗研究素材四首詩文本，各個平均凝視時間皆大於一般中文平均凝視時間。筆者認為，文本符號的吸引力、深奧度，都會影響讀者的凝視時間。無論圖像符號或文字符號，越是吸睛、越是待解，越令讀者凝視與深思。詩歌美學面向的引導與領悟，是教學者當努力以致的。

再者，本專題研究實驗結果，呈現了圖像詩讀解的有趣現象，也發現圖像符號明顯影響閱讀文本的解讀；正如羅蘭·巴特的「情境(意義)功能」(relay) 所強調，文本與圖像處於一個互補的關係，文字可以強力主導讀者理解圖像的意旨。閱讀圖像詩，無論是詩入圖或圖入詩，其賞析與教學，都不能將圖與詩文分開。總而言之，圖像詩是圖文兼具的文本，結合圖與文，圖像詩才能突顯其深層意義與美感特質。

謝誌

本專題研究的結論恰巧與筆者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詩人方耀乾博士，給予的啟示相符；在此，謝謝方教授。同時，要特別感謝「閱讀教學專題指導」教師洪月女教授的引導；在洪老師的指引下，才能再接再厲，完成眼動專題初步研究以及閱讀與教學的其他相關研究。也謝謝「詩歌教學專題研究」王晴慧教授於詩歌研究的諸多分享以及同學們擔任研究受測對象。中教大博士班修課，彼此腦力激盪，互相勉勵，智慧分享的感覺真好！

最後，要感謝論文發表與校正期間，諸位前輩、審查委員教授的提點。您的耐心閱讀與細心指正，這篇探索性的論文一再檢查、改善，才能正式發表。感恩！

參考文獻

- Barthes, Roland. *Image-music-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 Bohn, Willard. *The Aesthetics of Visual Poetry, 1914-192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Duchowski, A. T. "A breadth-first survey of eye-tracking application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s and Computers*, 34(4), 2002: 455-470.
- Friedman, R. S., Fishbach, A., Förster, J., & Werth, L. "Attentional priming effects on creativity."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15(2&3), 2003: 277-286.
- Gregory, R. L. *Eye and brain: The psychology of seeing* (4th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Inhoff, A.W. & Liu, W. "The perceptual span and oculomotor activity during the reading of Chinese sent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4. 1998: 20-34.
- Hung, Yueh-Nu.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An eye movement exploration in science text r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4) 12: 241-260,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2013.
- Knoblich, G., Ohlsson, S., & Raney, G. E. "An eye movement study of insight problem solving." *Memory & Cognition*, 29(7), 2001: 1000-1009.
- Kowler, E., Anderson, E., Doshier, B., & Blaser, E. "The role of attention in the programming of saccade." *Vision Research*, 35(13), 1995: 1897-1916.
- Loftus, G. R. (1981). "Tachistoscopic simulations of eye fixations on pictur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7(5), 369-376.
- Peirce, Charles Sanders. *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 2,... (1931-1958) : Vol. 189.
- Radach, R., Inhoff, A., & Heller, D. (2002). "The role of attention and spatial selection in fluent reading." In E. Witruk, A. D. Friederici, & T. Lachmann (Eds.), *Basic functions of language, reading, and reading disability* (pp. 137-153).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 Rasula, Jed and Steve McCaffer. *Imagining Language: An Antholog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1.
- Rayner, K. "Visual selection in reading, picture perception, and visual search: A tutorial review." In H. Bouma & D. Bouwhuis (Eds.),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Vol. 10; pp. 67-96).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4.
- Rayner, K. "Understanding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4), 1997: 317-339.
- Rayner, K.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 years of

-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3), 1998: 372-422.
- Rayner, K., Smith, T., Malcolm, G. L., & Henderson, J. M. “Eye movements and visual encoding during scene percep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 2009: 6-10.
- Rayner, K. “Eye movements and attention in reading, scene perception, and visual resear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2(8), 2009: 1457–1506.
- Rayner, K., Chace, K. H., Slattery, T. J. & Ashby, J. “Eye movements as reflections of comprehension processes in reading.” *Scientific Studies of Reading*, 10(3), 2006: 241–255.
- Rayner, K., & Pollatsek, A. (1992). “Eye movements and scene percep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6(3), 342-376.
- Sanders, M. S. & McCormick, E. J. *Human factors in engineering and design*. New York: McGraw-Hill, 1987.
-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In C. Balley & A. Sechehaye (Eds), (W. Baskin, Tra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 Sussman, R. S., Campana, E., Tanenhaus, M. K., & Carlson, G. M. Verb-based access to instrument roles: Evidence from eye movements. Poster presented at the 8th annual Architectures and Mechanisms of Language Processing Conference, Tenerife, Canary Islands, Spain, 2002, September.
- 丁旭輝，《台灣現代詩圖像技巧研究》，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 王正良，〈眾相侈離：台灣圖像詩的視覺探勘〉，《第五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圖像演討會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5.10：261-278。
- 王夢鷗，《文藝美學》，臺北：里仁書局，2010。
- 古添洪，《記號詩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
- 江依靜，《現代圖像詩中的音樂性》，臺北：秀威，2012。
- 江灝譯，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著，《符號帝國》(L'empire des signes)，臺北市：麥田，城邦文化，2014。
- 李幼蒸，《哲學符號學—理論符號學導論》，台北：唐山，1997。
- 林品章、張照聆，〈圖像傳達系統化之理論基礎〉，《設計學研究》，12 卷 2 期 (2009/12/01)：P45 - 68。
- 吳正芬，〈以眼動初探圖像詩的閱讀〉，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第六屆『閱讀評量與教學』理論與實務」研討會，2015 年 12 月 12 日。
- 吳昭容，〈從圖文閱讀的眼動型態建構與驗證機械動態表徵的認知模式〉，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2012。
- 柯華葳、陳明蕾、廖家寧，〈詞頻、詞彙類型與眼球運動型態：來自篇章閱讀的證據〉，《中華心理學刊》，47(4)，2005: 381-398。

- 周慶華，《中國符號學》，臺北市：揚智文化，2000。
- 胡心瑜，〈國小四年級美術班與普通班不同性別兒童對少字圖畫書的圖像理解與眼球運動之差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胡易容、趙毅衡，《符號學：傳媒學辭典》，臺北市：新銳文創，2014。
- 陳明俊，〈國中小學學生圖像理解與眼球運動之差異—以圖畫書發現小錫兵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 陳思嫻，〈陳黎圖像詩中的符號系統〉，嘉義：南華大學「第三屆全國研究生文學符號學研討會」，2003/04/20。
- 陳黎，《陳黎詩選：1974~2000》，台北：九歌出版社，2001。
- 陳學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政，〈藉由眼動追蹤儀器探討平均掃視幅度大小與創造力之關係〉，《教育心理學報》，39(2008)：127-149。
- 陳學志、賴惠德、邱發忠，〈眼球追蹤技術在學習與教育上的應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五十五卷第四期(2010)：39-68。
- 孫秀蕙、陳儀芬，《結構符號學與傳播文本：理論與研究實例》，新北市：正中書局，2011。
- 詹冰，〈圖像詩與我〉，《笠詩刊》，87(1978)：59-63。
-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市：新銳文創，2012。
- 蔡介立，〈從眼動控制探討中文閱讀的訊息處理歷程：應用眼動誘發呈現技術之系列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博士論文，2000。
- 蔡介立、顏妙璇、汪勁安，〈眼球移動測量及在中文閱讀研究之應用〉，《應用心理研究》，第28期(2005冬)：91-104。
- 蔡易儒，〈初探科學閱讀的過程行為與文本理解之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碩士論文，2010。
- 張錦華、劉容玫、孫嘉蕊、黎雅麗譯，《傳播符號學理論》(John Fiske 1990 原著：Introduction to studies)，台北：遠流出版，2013。
- 蘇敏，《文本文學審美風格》，臺北：秀威出版，紅螞蟻圖書經銷，2013。
- 蕭水順，〈台灣圖像詩繪聲繪影的特技〉，《第五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文學與圖像研討會論文集》，臺中：國立中興大學，2005年10月：101-148。
-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符號學要義》，台北：南方出版社，1988。

陳黎文學倉庫：陳黎圖象詩選

<http://faculty.ndhu.edu.tw/~chenli/visualpoems.htm>

Concrete poet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ncrete_poetry

Calligra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ligram>

吳正芬

Visual poet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sual_poetry

How to Write Concrete Poetry : Kenn Nesbitt's Poetry 4kids.com

<http://www.poetry4kids.com/blog/news/how-to-write-a-concrete-poem/> 2015/08/19

附件一：

黎

附件：受測問卷

大家好！
謝謝您參與「眼動與圖像詩閱讀」研究。您的意見與感想將是重要的研究資料，煩請各位提供您寶貴經驗與感想，以便我們進行研究。
此問卷採用不記名方式答題，僅供學術研究。請各位貴賓安心回答。謝謝！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班一年甲班 敬上

一、個人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18 以下 ☐18-25 ☐25-35 ☒35-55 ☐55 以上
職業：☒學生 ☐軍公教人員 ☐服務業 ☐科技業 ☐工業 ☐其它_____

二、請寫下讀後感想

(一) 此圖像詩的主題： 角角黑

(二) 此圖像詩的主要內容：
- 描寫一只水牛在躺在水裏，自在的感覺

(三) 您的感想：
- 悠閒的生活要好好享受。

附件二：

簡

附件：受測問卷

大家好！
謝謝您參與「眼動與圖像詩閱讀」研究。您的意見與感想將是重要的研究資料，煩請各位提供您寶貴經驗與感想，以便我們進行研究。
此問卷採用不記名方式答題，僅供學術研究。請各位貴賓安心回答。謝謝！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班一年甲班 敬上

一、個人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18 以下 ☐18-25 ☐25-35 ☒35-55 ☐55 以上
職業：☐學生 ☒軍公教人員 ☐服務業 ☐科技業 ☐工業 ☐其它_____

二、請寫下讀後感想

(一) 此圖像詩的主題： 牛

(二) 此圖像詩的主要內容：
牛的生活，平靜地看著歲月流逝，等待著
等待。

(三) 您的感想：
金錢流露出歲月靜止流動感，人們的忙
在牛的世界沒有意義，牛為自然，大環境。人在
它們眼中，自認以重要的東西沒有意義。

附件三：

黎

附件：受測問卷

大家好！
謝謝您參與「眼動與圖像詩閱讀」研究。您的意見與感想將是重要的研究資料，煩請各位提供您寶貴經驗與感想，以便我們進行研究。
此問卷採用不記名方式答題，僅供學術研究。請各位貴賓安心回答。謝謝！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班一年甲班 敬上

一、個人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18 以下 ☐18~25 ☒25~35 ☐35~55 ☐55 以上
職業：☒學生 ☐軍公教人員 ☐服務業 ☐科技業 ☐工業 ☐其它_____

二、請寫下讀後感想

(一) 此圖像詩的主題：保護環境廣告。

(二) 此圖像詩的主要內容：
要保護環境，為下一代留下一個健康的環境

(三) 您的感想：現在的環境已被我們人類破壞，不要大過於污染，要好好地保護地球，為地球做些環保之類。

附件四：

簡

附件：受測問卷

大家好！
謝謝您參與「眼動與圖像詩閱讀」研究。您的意見與感想將是重要的研究資料，煩請各位提供您寶貴經驗與感想，以便我們進行研究。
此問卷採用不記名方式答題，僅供學術研究。請各位貴賓安心回答。謝謝！
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班一年甲班 敬上

一、個人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18 以下 ☐18~25 ☐25~35 ☒35~55 ☐55 以上
職業：☐學生 ☒軍公教人員 ☐服務業 ☐科技業 ☐工業 ☐其它_____

二、請寫下讀後感想

(一) 此圖像詩的主題：宇宙家庭

(二) 此圖像詩的主要內容：
只有一個地球，節制生育

(三) 您的感想：
看不懂.....
可能和節制生育計劃有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十四期徵稿啟事

(投稿截止日期：中華民國105年06月30日)

中華民國105年9月出刊

-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以下簡稱「本學報」)是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負責發行之學術期刊，本刊以英語、國文、地理(及休閒、觀光遊憩)、美術(暨藝術教育)、兒童英語、翻譯(口、筆譯)、台灣文學、歷史研究領域為主之學術專刊，每半年發行一次(預訂每年三、九月出版，截稿日為每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舉凡相關領域之論著皆所歡迎，敬請公私立大學專、兼任教師、學術研究單位人員、博士研究生(於基本資料表上請指導教授簽名)踴躍賜稿。來稿刊出前，均經過正式之審查程序。
- 二、本學報除公開徵稿外，為拓展本刊視野，豐富其內容，增進其學術能量，得於不違背本學報宗旨之前提下，經總編輯(由院長擔任)推薦，經編輯委員會審定後成為特稿。
- 三、稿件得以英文或中文撰寫，並遵循APA及MLA最新版格式，本學報內容可能用於非商業性之複製。
- 四、稿件字數中文以不超過30,000為原則，英文以不超過15,000為原則；中文摘要約600字，英文摘要約350字，無論以任何語言，均請由左至右橫排。
- 五、稿件版面以A4紙張，註明頁碼，一律採電腦打字，並請用Word軟體編輯(12號字，中文字體以新細明體，英文字體以Times New Roman，1倍行高，中文標點符號用全形，英文標點符號用半形，邊界採用Word預設格式)。
- 六、來稿一律請附：中英文篇名、摘要、關鍵詞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 七、請將稿件電子檔以附件檔案形式電郵至coarts@cc2.ncue.edu.tw (收件人：曾盈琇小姐)；另外請影印三份，連同其他文件掛號交寄至『50007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
- 八、本學報稿件審查採匿名雙審制，文稿中請避免出現作者相關資訊，編輯委員會斟酌審稿員意見及建議後做最後決議，未獲採用者則致函通知，恕不退稿。
- 九、投稿若經刊載，稿件著作權歸屬本學報，本學報亦有刪改權，投稿時需繳交「投稿授權聲明書」。本學報不接受已刊登之文章，如發生抄襲、侵犯著作權而引起糾紛，一切法律問題由投稿者自行負責。
- 十、來稿且刊出後，將致贈投稿者二十份抽印本及當期學報一本，並附上該論文PDF電子檔，不另支稿酬。簽署著作權授權書的稿件刊登者，其文章將收錄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圖書館機構典藏系統、國家圖書館、南華大學彰雲嘉無盡藏學術期刊資料庫、文化部、華藝數位電子期刊資料庫、凌網科技數位出版品營運平台、遠流/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文學院 曾盈琇小姐

地址：50007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電話：(04)723-2105 分機 2022 / 2023 傳真：(04)721-1221

電子郵件信箱：coarts@cc2.ncue.edu.tw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14

Call for Papers

(Submission Deadline: Jun. 30, 2016)

Vol. 14, Sep. 2016

1.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JOH)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effor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t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 welcome papers and reviews on areas of English, Chinese, Geography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nd tourism studies), Art (including art education), Children's English, Translation (including interpretation), Taiwa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JOH appears twice a year, in March and September (the deadline of each will be June 30th and December 31st). Faculty members and doctoral candidates (submitting with th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of the advisor) of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are all welcome to contribute papers. All received papers will be sent to two peer reviewers for review at the cost of JOH.
2. Contributions should consult the format demonstrated in the latest edition of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r *The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3. The manuscript should not exceed 15,000 words. The abstract should be approximately 350 words. Every contribution should be typed from left to right horizontally.
4. A4 or Letter Size paper is required for all contributions. Please use Microsoft Office Word to edit your papers. The essay should be typed in single space and in the font of Times New Roman Size 12. The punctuations should be typed in single-byte, and the margins should be in the default setting of Word.
5. All submissions should be complete with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itle, abstract, keywords and author's information.
6. When submitting a manuscript, please send three hard copies along with other documents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50007, Taiwan, R.O.C.
- In addition, please send an electronic version in Word format to the following email address: coarts@cc2.ncue.edu.tw.
7. A submission under consideration is sent to at least two reviewers recommended by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Be sure to avoid leaving any author-related information on the manuscripts. Based on th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of these reviewers, the members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and the editor, who meet periodically, make final decisions. Authors of unaccepted papers will be notified, but manuscripts will not be returned.
8. Once submissions have been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authors shall sign an Agreement to assign property rights of their works to JOH for search, download from the Internet,

and modify. Please also send in the Agreement with your signature when submitting a manuscript. JOH will not publish submission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elsewhere.

9. Authors are entitled to twenty offprints of the article and one copy of the issue in which their article appears; no monetary compensation will be offered. The articles whose authors have signed to authorize their copyrights will also be collected i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hua University Boundless Treasure Academic Journal, Ministry of Culture, Airiti Library, HyRead and WordPedia.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s. Elaine Tseng

No.1, Jinde Road, Changhua City, 50007, Taiwan, R.O.C.

Tel: (04)723-2105 ext.2023/2022 Fax: (04)721-1221

E-mail: coarts@cc2.ncue.edu.tw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

第 十三 期

發行人：郭艷光

總編輯：彭輝榮

主編：陳冠君

出版機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

出版日期：2016 年 3 月初版一刷

創刊年月：2002 年 11 月

刊期頻率：半年刊

其他類型版本說明：本刊同時登載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
網站，網址為 <http://coarts.ncue.edu.tw/>

展售處：五南文化廣場 (04)2437-8010

台中市北屯區軍福七路 600 號

國家書店 (02)2796-3638#223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59 號 2 樓

印刷：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106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200 號 8 樓

電話：(02)2393-4497

傳真：(02)2394-6822

網址：<http://www.crane.com.tw>

劃撥帳號：0107926-1

戶名：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蘇家宏律師

定價：NT\$500

書號：0031352 ISSN: 2305-9761 GPN: 200910600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NCUE Journal of Humanities

Volume 13, March 2016

Issued by College of Art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Champion Chen

Published by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8F., No. 200, Sec. 2, Jinshan S.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43, Taiwan

Tel: 02-23934497 Fax: 02-23946822 E-mail: service2@crane.com.tw